

文本自身的反驳

——果戈理的妖魔元素对“现实主义”神话的解构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在讨论“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这一传统论题的争论时,对于别林斯基关于果戈理“现实主义”盟主定位的神话怎样反驳?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叶夫多基莫夫等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从果戈理创作的宗教本质上作出了颠覆性批驳;从民俗学、美学角度分析的则有巴赫金、纳博科夫等。可是如果仔细审视一下果戈理文本自身的妖魔元素,就会发现它们本身就是对“现实主义神话”不言自明的解构。妖魔元素贯穿果戈理的创作始终,其中隐含着作家的创作目的和思想,在不断变化的妖魔形象中,也是作家自我认识的生产过程。这种自我认识与别林斯基对其“现实主义”的命名背道而驰。

关键词:果戈理;妖魔元素;解构;“现实主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01-09

一、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定位及名家论说

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妖魔元素贯穿始终,尤其在其早期作品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简称《夜话》)《密尔格拉得》中时常可见,鬼、妖、精、怪、魔(本文中按照汉语习惯,合并为“魔鬼”和“妖精”;在指这两类形象时,又简称魔鬼形象)作为重要角色,直接参与情节,与其他角色正面交流和冲突。在这两部作品中,《索罗庆采市集》《五月之夜》《圣诞节前夜》《可怕的报复》《维》等都是被常提及的此类篇目,不过,《夜话》与《密尔格拉得》中的魔鬼形象也有所区别。而到了城市题材的《彼得堡故事》中同样有魔鬼形象,只不过是人形的变形,代表篇目则有《外套》《鼻子》《肖像》等;其中,主人公的离奇遭遇完全不合乎常理,却又很少说明;不完全是魔鬼,但具备了其基本特点,成为抽象性质的“幻影”,在文本中的影响程度不减,而蕴含的意味更丰富,距离作者的意图也更近了。到《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魔

鬼形象开始转向幕后,因而作家被贴上“现实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标签,但它们仍然在情节及主题表现中有重要作用,虽然不作为独立的明显的角色影响情节及思想输出。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可怕的报复》充满了妖魔气息”,而“这种妖魔气息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弥散着”^{[1]355}。笔者认为,“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虽然表面上看,《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出场的是些让人嘲笑的庸俗之人,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些妖魔的幽灵,他们蛰居、游荡在俄罗斯大地的各个角落,使得整个俄罗斯仿佛地狱般笼罩着一种妖魔气息”^{[2]40}。

从台前到幕后,从具象到幻影,魔鬼形象的变化,侧面反映了作家创作风格、创作思想的转变。自作家本人生活的时代至今,评论家对此的关注也经历着转变。与作家同时代的评论家自然不能不提别林斯基,我们知道,他对果戈理的创作在态度上前后有巨大转变,他早期曾高度评价果戈理的小说,认为“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是

收稿日期:2022-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征^{[3]183}，同时，他也是首先激烈批驳果戈理宗教观念的人，在《与友人书简选》出版后，两人近乎决裂、分道扬镳。别林斯基不满果戈理以基督、《圣经》等宗教概念表达崇高事物，更愤怒于他对宗教性质的“宽恕”“恭顺”的宣扬；认为他未区分精神信仰与宗教体制，是落后的制度的辩护士。对比其过去作品的“纯粹俄国的幽默，平静的、淳朴的幽默”^{[3]194}，与现在借着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导地主如何更多地榨取农民的金钱，别林斯基指责作家违背了俄国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即应当抨击正教、君主制及官方民族性。当然，此处的“民族性”与别林斯基早年褒扬作家时提到的“民族性”意义完全不同。总体上，他以较纯粹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评判果戈理及其作品，似乎果戈理从前到后不曾改变。他所赞赏的作家的写作风格，按他的话说，就是“十足的忠实”。别林斯基评述的消极影响在于，其过于纯粹、立场鲜明的角度使得不少后世评论家忽视了果戈理作品中的妖魔元素和宗教气息，甚至极大影响了20世纪中国果戈理研究的最初方向。

白银时代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名著《果戈理与鬼》认为，果戈理的“魔鬼作为神秘之本质和现实之本质，集中了永恒的恶”^{[4]3}；魔鬼主题——“无条件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的鄙俗”——是其整个创作历程的唯一主题^{[4]3}。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作家就时常面对渗透我们整个世界的恶的问题，而且是人格化了的恶。被别林斯基看作是现实主义代表作的后期作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赫列斯塔科夫和乞乞科夫，被梅氏认为是“现代俄罗斯的两种面孔的本质，是永恒的、全世界的恶——‘人的永恒的鄙俗’的两种位格……就是两个魔鬼的形象”^{[4]5}。这显然是从形而上和宗教层面揭开了果戈理创作的本质。

此一时期还有罗赞诺夫对果戈理的评述，他体现出回到文本自身的倾向，开始进入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在罗赞诺夫那里已经对果戈理开创了现实主义流派的“著名观点”提出了疑问，表达了十分戏剧性的观点“果戈理杀人”^{[1]359}。不过，虽然罗赞诺夫承认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里绝对没有反映现实”，但似乎又无意识地认为，他“以惊人的手法给生活描绘出一系列讽刺画”^{[5]16}，其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性。这种立场上的挣扎，削弱了罗赞诺夫见解的力量。

但无论如何，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的批评著作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看作彻底的现实

主义者，把他的作品只看作忠实地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国的现实。这也正是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即他的象征性、神秘性和宗教性。

别尔嘉耶夫对果戈理的阐释决定性地改变了传统解读。他首先颠覆性地转变了以往评论家看待果戈理的立场和角度，毫不含糊地断定，果戈理的创作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象征主义的。他敏锐地发现：“果戈理是唯一一位身上具有妖魔感的俄罗斯作家——他艺术地表达了恶的黑暗的妖魔力量的作用。”^{[1]355}他认为，“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6]85}，鲜明地指出了果戈理所受宗教影响之深远及其作品的宗教性，但也指出作家在宗教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以此解释了作家及其作品的悲剧性，这皆因作家在现实与非现实间的摇摆不定，对社会矛盾介于疏离和完全融入之间的态度。值得重视的是，别尔嘉耶夫直接提出了“魔鬼”角色，从宗教哲学角度对果戈理及其魔鬼进行解读，认为“果戈理寻找地上的上帝之国，然而他是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去寻找的”^{[6]85}。就魔鬼形象在中后期作品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可谓敏锐而准确；他把作家后期作品中的“庸俗人物”称为“幽灵”“人的碎片”，不是任何形式的“完整的”人，这些幻影一般的人物，影响力穿越时空，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别尔嘉耶夫指出，这些人物的社会价值在于揭示了俄国社会和人的共性，并有将其归于俄国民族气质，乃至人性本身的倾向，提出果戈理作品中存在着“俄罗斯人所具有的虚伪的灵魂”^{[6]85}，“是它产生了旧制度中一切恶劣的东西”^{[1]358}。在美学角度，别尔嘉耶夫使用美术上的“解析主义”一词，就果戈理笔下“人的碎片”及其动物特征做出概括，同意了罗赞诺夫“果戈理杀人”的观点——使得“人”没有了完整的形象。最后，别尔嘉耶夫做出预言，这类特点在俄国改革前后一直存在，甚至就是现代人类的本质特征。总体来说，别尔嘉耶夫的观点打开了新的视角，并难能可贵地将新立场坚持下去，从现在来看，其预言也不可谓不正确。

随后的20世纪，随着新文学思潮的出现，对果戈理及其魔鬼的非常规解读继续延伸。过往评论家看待果戈理及其作品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集中在两点：一是继续站在宗教哲学角度，对作家宗教观念的探讨；二是深入文本本身，体会作家创造形象的美学特色。相应地，魔鬼们在此两方面也分别获得了关注。

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中直接指出,“果戈理著名的‘现实主义’是十分矛盾的”^{[7]66}。在描述这种矛盾性时,他认为果戈理首先塑造了一个合乎常理的环境,“平凡而粗俗的现实主义”,“然后,一个异常的小细节不期而至,也不知出自何处,致使一种崭新的现实突如其来”^{[7]66}。叶夫多基莫夫还举出卡夫卡的作品,认为二者作品的相同点是,“取代上帝真实世界的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滑稽模仿”^{[7]67},强调二者作品中强烈的戏剧性。至于塑造魔鬼形象的结果,他认为,是“摧毁了无神论,不是通过上帝的存在,而是通过魔鬼的存在”^{[7]68}。他认为果戈理笔下的魔鬼是一种反向的证明,证明其作品中不尽人意的“现实”是真正现实(基于宗教世界观)的扭曲,因而果戈理与教会的关系,叶氏认为,虽然他对上帝的找寻是一种否定性寻找,但其向往的“终极答案”仍然存在于教会中。简言之,其作品塑造“魔鬼”的意图是劝人向善的。此外,叶夫多基莫夫还将米·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以教授外貌出现的撒旦之不同寻常的幽灵”^{[7]68},归因于受果戈理及其魔鬼形象的影响,仿佛果戈理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新流派的预言。而再后来的布尔加科夫研究,也都采取了这种影响说。

宗教界之外,有评论家倾向从民俗学、美学角度对果戈理作品进行解读,而不偏重作家本人的道德观念和作品的道德意义,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评论者在此方面过度热心,以至于曲解。从民俗学角度的解读者以巴赫金为代表,在他的评论著作《拉伯雷与果戈理》中,首先排除经由法国自然主义拉伯雷对果戈理产生的影响,直接引入乌克兰古代民间节庆传统来解读果戈理作品中的“笑”。果戈理的“鬼故事”产生的环境与基调被解释为“节日本身的题材、悠闲快乐的节日气氛”^{[8]7}和节日衍生出的迷信气氛。魔鬼等妖魔元素被认为是民间的诙谐。这样,果戈理思想(社会和宗教)上的进步意义看似被削减,实则回到了长久被忽视的对象(各种妖魔元素)及其起源本身。然而,巴赫金同时指出,这些元素虽然在迷信气氛中产生,但并不具有宗教性,旨在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性,表达百姓试图摆脱官方宗教束缚的愿望。巴赫金对这些元素究竟是否具有宗教性又似乎有自相矛盾的成分,这一点应与罗赞诺夫一样进入了相似的两难境地。

而从美学角度的解读,也出现了对传统批评的挑战。其代表有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该著对细节的进入更多且更细致,对细节的解读也

更无拘束。纳博科夫以《外套》为例,对大家熟知的这部作品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如果果戈理的句子突然“变得朦胧,透露出隐秘的意义”,也就是“突然变焦”,那么“对果戈理来说,这样的变焦恰恰是他艺术的基础”^{[9]141}。“果戈理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错,所有人都有点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9]144}纳博科夫的立场仍然稍微偏向现实层面,认为果戈理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戏剧手法,观察了现实生活,并将观察成果忠实再现。纳博科夫将作品中的荒谬,部分归于现实本身的荒诞,部分归于作家错位的观察角度。值得一提的是,纳博科夫关注到了果戈理中后期作品中“次级人物”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未把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魔鬼”形象单独抽出。另外,对于作家的宗教观念,纳博科夫也极少谈起,也可以说他坚决拒斥谈作家的宗教观念。这部非常规的评论著作开拓了研究的新角度,对20世纪果戈理研究的贡献与影响颇大;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见的。与以往评论家观点过于明显的割裂,虽然保证了独特性,却也在进入文本时似乎出现了偏差。

这样,这些优秀的评论论著仍有各自的局限。对于果戈理及其创作,或是高度概括出“妖魔感”,或是揭示出“神秘之本质”,或是点出“摧毁无神论”,或用“诙谐”命名,或冠之“生活的裂缝”,或以“杀人”惊人——皆为霹雳式见解,又与文本似近非近;皆似颠覆了“现实主义”的神话,又显得摇摆不定。也许就是“魔鬼”“妖精”作怪。不如进入文本捉“妖精”吧。

二、早期作品中妖魔形象及其转变

果戈理笔下的妖魔元素大致有“超自然生物”与“超自然现象”两类。早期作品中,超自然生物以“魔鬼”和“妖精”为代表,所有的超自然现象也是因妖魔而起。

关于“魔鬼”和“妖精”,《夜话》《密尔格拉得》中的村民对二者的存在都深信不疑,并根据朴素的宗教信仰,认为画十字能压住其“邪气”。与此同时,民众也承认,魔鬼与妖精的行事方式不能按照常理解。两种超自然生物都具有神秘性。两种生物都擅长利用人性的弱点诱人犯下过错乃至罪行。同时,早期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魔鬼”更倾向指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劝人行恶、不受人尊重、通常外貌也十分丑恶的形象。但魔鬼不仅出现在死后

世界,也会在活人的社会中游荡、作恶,甚至能像普通人一样混在人群中生活。魔鬼通常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乃至进入了果戈理作品中市井人物的日常语言。如《索罗庆采市集》中的帕拉斯卡,认为爱慕自己的男人“准是个魔鬼”;其他作品中许多人物互相咒骂时,“魔鬼”也常常用作诅咒对方。而“妖精”形象更为复杂,大体上指民间传说中存在的非自然生物,来源可为非正常死亡的鬼魂、自然的精灵、巫师、女巫等,其行事目的、风格与魔鬼不尽相同。“妖精”性格有善有恶,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被诅咒的角色。与魔鬼不尽相同的是,妖精被认为很难真正融入人类社会。不仅因为妖精通常在外表上难以伪装,容易被人发觉,也因为在一些民众的认识中,妖精是被魔鬼驱使的、相对次等的生物。在民众的认识中,也有其他对妖精的更为复杂、模糊、带有戏谑意味的认识。如《维》中的乡民认为,“女人老了就成了妖精”,“妖精都有一条短尾巴”等。

果戈理的创作进入中后期之后,风格趋向成熟。早期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占据相当篇幅的妖魔,渐渐从情节表面消失了。构成情节载体的人物,也由相对平面化的、淳朴的小俄罗斯乡民变为了更为立体复杂、更加难以概括的人物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超自然生物的特征,尤其“魔鬼”的特点,在一些典型人物身上渐渐体现了出来。情节中的妖魔元素也并未完全消失。

果戈理的超自然生物们、超自然现象从显到隐的过程,尤其是魔鬼形象的转变,体现了“魔鬼”的性质从非自然生物到自然生物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可以从《夜话》的各篇中渐次体现出来。

《夜话》是果戈理央求家人搜集民俗素材后写就的一部浪漫意味较为浓厚的作品集。根据作者书信,1829年时他有了搜集民间故事、民族服装、民间习俗等素材的愿望。此书着力强调民族元素,文笔质朴,对素材的加工不露斧凿痕迹,甚至叙述者也是假托了一位乡村养蜂人“红发潘科”。在借养蜂人之口述说的序言中,果戈理极力表现了对自己民族传统的自豪感,并在作品开头便渲染出了轻松愉悦的气氛。

《索罗庆采市集》作为定下基调且对小俄罗斯民俗介绍最全面、巴赫金所言“节庆”氛围最为浓厚的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提到了魔鬼,最重要的是几乎贯穿整个情节主体的“红褂子”传说。魔鬼的红褂子在丢失后诅咒一切经手的人,直到被人在“划了十字”后撕碎;而魔鬼年复一年地寻找褂子的碎片。在故事中人们讲起这个传说时,褂子还

有一部分未被魔鬼找回;在故事结束后,故事中的魔鬼出现在了讲故事的人们身边。一场恐慌后,似真似幻的“红褂子”仍在折磨听到故事的人们,直到故事中的青年男女喜结连理后,魔鬼才消失。然而,这个传说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被想要得到爱情的格利茨科和他的茨冈人朋友所利用。至于这位茨冈人是否与故事中的魔鬼有联系,虽然作家在对其外貌描写上提到了一些与魔鬼的相似点,但并未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本篇中的魔鬼与人联系极为紧密,灵活地穿插在传说与现实、“市井传说”与“男女爱情”两条情节线之间。魔鬼并未主动加害于人,然而魔鬼的传说引起的恐慌与离奇事件促使文中的年轻男女得以成婚。人群中最具与魔鬼相似性质的人——帕拉斯卡的后母,这一人物并不善待他人,且对文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持阻挠态度。这一安排也具有民间故事的特色和讽刺、戏谑的意味。

《圣约翰节前夜》是《夜话》中难得的悲剧结局的作品。其中出现了妖精、魔鬼和女巫。在主要情节开始前,叙述者转述了魔鬼巴萨甫留克的故事。该魔鬼是整部《夜话》中法力最强的,有驱使其他魔鬼与妖精的能力;也是《夜话》中第一个未被战胜的超自然生物。巴萨甫留克与人相处的方式是迫使人接受其“礼物”,并使接收人付出代价。他故伎重演,诱惑男主人公彼特罗杀死爱人的幼弟,换取金钱,并借此获得爱情。但彼特罗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此,他失去了记忆,而记忆返回之日,便是他必须消逝之时。在结尾,魔鬼的影响也还未消失。此文中的魔鬼形象有较明显的劝诫意义:魔鬼的许诺是不可信任的,魔鬼要求的是人的道德的彻底泯灭。而魔鬼对彼特罗要求时,以及接近结局时,都写到了女主人公的幼弟伊瓦西,即“男童”的消失,也象征了主人公纯真的品质、性格的“童年”的消逝。

《五月的夜》在开头转述一个民间传说:上帝有一把很长的梯子从天上通到下界。圣天使长们在复活节的前夜把梯子架好;上帝刚跨下第一级梯子,所有的邪魔鬼怪就一个倒栽葱翻下去,纷纷跌下地狱,因此在复活节这天,一个恶灵也不会残留在人间。由此为本文奠定了基调,暗示文中情节的结局美好。然后讲一个女落水鬼的故事。被妖精后母所害投水自杀的少女变成女落水鬼。她心存执念,执意要认出妖精为自己平复冤屈。最终借助一位凡人的帮助找出后母;作为酬谢,她帮助他获得了爱情。本篇中的妖精形象较为完善地体现了妖精有善有恶的特点。此外,将恶的妖精与民间传说中向来丑恶的后母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将善良的女落水鬼与美丽纯

真的少女联系在一起,可见作者此处的创作风格跟民间联系紧密,人物形象虽然典型,但还未出现创见,文风淳朴。

《失落的国书》有魔鬼出现。主人公(转述者的爷爷)被骗走国书,为了找回国书,被迫与魔鬼玩牌,在玩牌过程中,魔鬼诡计多端,屡屡更改牌面,主人公险些被打败,最后他靠着自身力量并未战胜魔鬼,而是画了十字。这一方法与民间传说中“画个十字压住妖精邪气”的认识契合,实质上也是凭借了“上帝的力量”。

《圣诞节前夜》也出现了魔鬼。虔诚的主角铁匠瓦库拉,在求爱失败后被魔鬼看中并加以诱惑,但与前文《圣约翰节前夜》的彼特罗所不同的是,铁匠反向利用了魔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满足了爱人提出的不合常理的要求。这是在本部书中利用魔鬼最为成功的一次。本篇似是为了强调魔鬼可被战胜,反映出了作者此时的宗教观念。

《魔地》也出现了魔鬼。描写了在一块中魔的地上被魔鬼恐吓和愚弄的一个人。此文中魔鬼的形象相比前文,并未出现新的元素。那个人被捉弄得狼狈不堪。此处的魔鬼表面上是知晓人的弱点的,它的行动在起初是成功的,但也使得主角更加虔心信奉上帝,所以实质上魔鬼仍是失败了。

在《伊万·费多洛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中,不含超自然生物形象或超自然现象,主要表现人在空虚无聊时的反常行为,主人公的异化亦未达到中后期作品人物的程度。因此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第二部作品集《密尔格拉得》是转变的关键点,其中既有含有超自然角色的作品,也有不含超自然角色的作品,前者为《维》,后者为《塔拉斯·布尔巴》最为典型。在这部作品集中,如果角色、情节中不含有超自然元素,那么人物便会被典型化的人物。

在《维》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超乎寻常乃至离奇的元素安排到人物身上,与人物的性格融为一体。《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除了妖精,还写到了第一位未被宗教力量战胜的超自然生物形象。女妖精首先诱骗、捉弄了文中的哲学生,但对方使用了驱魔降妖的咒语,反向战胜了她。被“打死”的女妖精,在倒下时变化为绝代佳人,使学生内心产生了怜悯与不安,匆匆离开现场。而后来的情节中,学生受一位百人长所托为其亡女念经超度,却发现那少女就是女妖精。与《夜话》中的妖精形象相比,该文中的女妖精已经彻底融入了人类社会。

后文里,哲学生从乡民的转述中,知道了其他和自己经历相似的、被妖精加害的事件,内心开始受到震动。超度的每一夜,女妖精都重又出现,想靠近学生复仇,但都被学生的祈祷文和咒语勉力击退。直到最后一夜,女妖精召唤来了“维”。“维”外貌极其丑陋,除了拥有“铁打的”面孔,“长长的眼皮一直垂到地上”。他的眼皮被群妖抬起后,与哲学生四目相交,使学生暴露了行踪,并因惊吓过度,命丧黄泉。虽然只在简短的一段中出现,但“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果戈理的倾向开始发生转变,妖魔的力量与神秘性开始增长,不可预料的因素开始增加。相应地,文风也开始变得沉郁而复杂。但作品的中心思想与《夜话》相比,转变并没有那么明显。结尾借助哲学生的同学之口,表明是哲学生信仰的动摇和内心的恐惧使他在妖精面前暴露了弱点,最终导致他丧命。这仍然强调度信宗教的重要性。但相比《夜话》中深信有信仰就能从妖魔的神秘力量下得救,《维》开始质疑得救的可能性,神秘色彩开始占据上风。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部描写哥萨克生活的带有史诗性质的作品。本篇行文风格与《夜话》中的大部分作品乃至本作品集中的其他作品都迥然不同。人物形象,不论个人形象还是群像,都带有浓重的史诗英雄色彩,主要渲染其性格的豪放、信仰的虔诚、作战的英勇和结局的悲壮。人物所具有的超自然色彩是在积极层面上的。人物在娱乐、作战、举行宗教活动甚至谈情时,所作所为显得格外热烈而冲动,都有超乎常理的成分。他便使用了浓烈夸张、重褒轻贬的笔法来塑造哥萨克。又因为取材贴近现实,但在描写中显出离奇色彩,因而在讨论早期作品的超自然色彩时,是不能忽视这部作品的。这是超自然元素向自然人物的渗透。

其他作品中,也有超自然元素向人物和情节更深入渗透的迹象。如《旧式地主》中,在妻子去世后,呼唤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并带领其走向死亡的“声音”。如《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两个无聊的、不具备正常交流能力的、因鸡毛蒜皮小事一生仇视对方的主人公,都带有不可思议的色彩。

三、创作中期超自然元素的变异

《彼得堡故事》代表转变彻底成熟了。虽然在一些作品中,作家仍然着力描写超自然事件,但超自然生物的形象已不是描写的重点,而开始为更为重要的目的服务。

此作品集的超自然生物延续了来自《密尔格拉得》的神秘色彩，且其中的非宗教性更加明显。它们已不能简单明晰地用魔鬼、妖精来分类，已经不再纯粹地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而具有更复杂的形成原因，具有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单纯、更有所指向的行事风格。果戈理从这部作品开始，更深层次地探究超自然现象的来源，探讨超自然生物与自然生物（人类）的关系。超自然生物开始与创作目的以前所未有的紧密度联系在一起。需要辨明的一点是，笔者并不认为果戈理的创作风格从这部作品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其作品风格与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仍具有相当大的差别。我们仍可举含有和不含超自然生物的作品为证。《涅瓦大街》中不含明显的超自然生物，此乃定下《彼得堡故事》基调的首篇。虽然不含超自然生物，但文中两位主人公在这条街道附近都有着离奇的经历，各自追逐一名女子，却因为性格使然，获得了相反的结局。果戈理在结尾表明，不可信的是这条大街、这个环境本身。“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10]35}从这篇小说开始，果戈理开始有意强调超自然现象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乡间和乡民的故事中，也存在于繁华的都市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里。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有意展现环境对人施加的影响，和人为了适应环境做出的种种改变。如本文中，性格更加圆滑、并不理想主义的比罗戈夫被人毒打后，在大街上闲晃片刻，心情竟又恢复如常了。而理想主义者、无法做出相应改变的比斯卡廖夫，最终在狂热和失望中自杀身亡。虽然果戈理已开始强调环境的反常性质，但并未对环境做出批判或对环境未来做出预言，也未针对环境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是将其转化进亦真亦幻的情节中，有意模糊情节的现实性。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果戈理自此开始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在讨论作家的晚期作品时也会发现。

接下来，在《外套》《鼻子》《肖像》三篇以物品为题的作品中，都具有上文提到的更靠近创作目的中心的超自然生物形象。果戈理主要旨在探讨人的一部分是如何非自然化的。前两篇作品基调一悲一喜，二者都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人的异化和非理性化成了讨论的重要主题。人创造的东西开始反向控制人本身，让人产生不合常理的执念。人性开始分裂，在当事人未知的情况下接近了非自然。《外套》更像是从悲剧的角度指出产生执念的人是接近反常的。小官员阿卡基在费尽苦心得到的新外套被抢后求助无门，患上暴病，郁郁而终。死后他的

鬼魂不得安息，成了抢他人外套的角色。果戈理并未明确将矛盾的源头指向造成阿卡基走投无路的社会环境，而仅是借助独立的几段环境描写含蓄点出；将部分原因归于阿卡基本人对外套一物过度炽烈的欲望。处境艰难的中下层人物在生前是受环境所害者，死后执念化为鬼魂，转为蛮不讲理的加害者。这一反转的安排具有悲凉的讽刺意味。果戈理“含泪的笑”的艺术特色初现锋芒。

《鼻子》则更接近站在超自然一方的“上帝视角”，对主人公科瓦廖夫加以嘲讽。其鼻子离奇出走，竟具有与主人相似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以拜客的官吏形象招摇过市，并长时间未被人发觉。文中的次要人物也具有为了喜剧性而添加的反常、夸张色彩，如医生、职员、警长等。至于是什么让科瓦廖夫的鼻子不翼而飞又突然回到原位，文中并未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本人在结尾处指出了文中的一切超常之处，可又反写一笔，有意模糊该类事件的反常性，说明“其中确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这类像因果报应一般的离奇事件“不多，但总是有的”^{[11]63}。强调反常事件的合理之处，越发明确地将反常产生的原因归向物欲充斥的社会环境。这种倾向和文字特色延续到了《肖像》中。

《肖像》主要旨在说明人失去道德与纯真后相当于行尸走肉。放高利贷者担任了类似《圣约翰节前夜》中巴萨甫留克的角色，同样是用金钱让人出卖道德，并在之后的命运中折磨借贷者，直至他丧失理智、做出恶事、结局凄惨。此人死后，改由其肖像继续诱骗包括主人公恰尔特科夫在内的其他人。此人既是物欲的化身，又有与魔鬼类似的性质，可见果戈理将过于旺盛的物欲归为使人性丧失的罪魁。比巴萨甫留克这一形象更加超越的是，被堕落的超自然生物（魔鬼）当作交换筹码的不仅仅在道德层面，更是囊括了对美的鉴赏力和创造美的能力。果戈理已认识到，这两种能力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反宗教性的魔鬼更可怕的是要求人性彻底泯灭的“魔鬼”，果戈理的确对此有所意识。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更加深入了中下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作者将第一叙述者留给了“狂人”本身。本文讲述一个小职员渐渐彻底转变为失常的“狂人”，逐步接近超自然的过程。此人生活环境逼仄，处境艰难，但他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和极其敏锐的眼光，对细枝末节极度在意，对相当多的事物抱有固执的成见，对自己的境况十分不满。狂人与狗群“交往”，在其中寻找优越感和慰藉，又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不起眼的形象，感到更深的愤懑和无力。

最终他在环境和人性的双重夹击下,彻底痴癫,在臆想中成为西班牙国王。他直到被送进疯人院,仍未认清自己的处境。《狂人日记》重点在于从人性内部探讨人转为非自然的“非人”的原因,对社会环境也未明显地加以挞伐。只在结尾处,“狂人”渴求关怀、拯救时,让读者思考能予以“狂人”慰藉的“母亲”究竟来自何方,让读者思考“狂人”获救的可能性,使读者自然而然将目光集中在外界,继而思考社会环境是否出现了问题。该种塑造手法更加平稳流畅,充分反映了果戈理此阶段创作风格的成熟。

《马车》旨在嘲讽爱说大话且好面子的人;《罗马》一作并未完成。本文不予讨论。

综上所述,文风渐趋成熟后的果戈理,在《彼得堡故事》中将眼光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与人性,但也未完全抛弃过去的创作特色,将其擅长刻画的超自然元素以更加平顺的手法编织入人物和情节中。与他更有倾向性的主题选择对应的,是为主题更深刻地服务的超自然元素。果戈理从其中渐渐探索,发展了自己标志性的艺术特色。

四、创作晚期超自然元素的宗教化

果戈理晚期作品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为代表。在这两部作品中已经不存在明显的超自然生物形象,也不再出现超自然现象。但这两部作品中,果戈理的创作风格已经完全成熟,情节中的超乎寻常在另一种意义上达到了顶峰。在他的早中期作品中,超自然生物尤其是魔鬼的性质更加不露痕迹地深入到了角色本身。

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果戈理与鬼》中的观点,赫列斯塔科夫和乞乞科夫这两位主角便是魔鬼的化身。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们又是同一种力量的两极。^{[4]25}我们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精彩地概括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形而上意义,但仍然不够全面。晚期作品中的“魔鬼”性质是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还是被分解、散落在各个角色之间?

《钦差大臣》作为果戈理最为著名的戏剧作品,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了他本人的期望。根据果戈理的书信,他向普希金请求获得一个题材作为情节的动机时,只要求那个故事是“纯粹俄罗斯的”,即重视题材的真实性。谈到这部剧作的重要角色,我们同意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主角赫列斯塔科夫身上没有任何激烈的、确定的、彻底的、到达极限的、绝对的特质。赫列斯塔科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对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如吃喝)具有极高的、与他臆想中

的身份相符合的标准;但他却没有值得一提的才能,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甚至也没有突出的性格特点。与剧中其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已久、圆滑老练的人物相比,他又显得浅薄、幼稚。但赫列斯塔科夫身上唯一“不同凡响”的是,他十分擅长扮演自己未能达到但眼热已久的角色。他在见到市长之初感到心虚,但在他一发现对方惶恐不安、自己可能被误认作重要人物后,便几乎天衣无缝地表现出了自己头脑中对这类人物的认识——或可称为社会对这类大员形象的共识,且在情节中全程未被识破。他看出市长夫人和市长女儿对他的殷勤后,也顺水推舟开始扮演起了风流人物,险些被他得手。他似乎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官员,反而是有所倚靠的,有一种超越眼前存在物的事物在身后支撑着他。这种事物的力量也能感染到其他人,例如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奥西普,本来对自己主人的性格和实际情况十分了解,起初面对他人的询问和试探,仍然实话实说;但后来发现市长等人对自己主人反常的殷勤,他也飘飘然,甚至开始无意识地配合主人的“表演”。

这位冒牌“钦差大臣”的人物形象,与早期作品中明显非常理的魔鬼、妖精,与中期作品中被非自然化的人物都不相同,但本质上都具有一些相同的性质。他们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能广泛证实的,他们都具有通行无碍的极强的渗透力,能扮演不属于自己的角色(如早中期作品中放贷人的形象),灵活周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他们对自己“作恶”的本质没有认识,对他们来说,这是无须思考的、自然而然的、合情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无比愉悦的。但如果正常的社会人认为这些行为自然而合理,那必然是来自外界的某些原因使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甚至扭曲。“魔鬼”性质是自外界渗透入这一主人公本身的,其他众人(围绕赫列斯塔科夫的所有人)以不同的角度折射了外界,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主人公本身的侧面烘托。果戈理在给谢普金的信中,这样解释针对《钦差大臣》的广泛恶评:“一丝真实的影子就会招来群起而攻之,这不一个人,而是整整几个阶层。”^{[12]146}可见,魔鬼并非仅限于赫列斯塔科夫,而是众多角色。

另外还应注意结尾,“钦差大臣来访”的消息再度传来,剧中懊悔早先“受骗”的众人反应各异,然都呆若木鸡,果戈理安排了一个长时间的哑场。作家本人曾言《钦差大臣》是“没有结局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作者的倾向,更做出假设,如果另一位赫列斯塔科夫在结尾来到剧情中,接

下来会如何？市长等人还会“受骗”吗？我们相信，只要站在赫列斯塔科夫背后的“幽灵”不消失，使人的认识出现偏差，扭曲的事物就不会消失，那么第二位冒牌“钦差大臣”仍有全身而退的可能。这里，文本中的超自然力量已经指向了更高层面。尽管此时果戈理不至于认定自己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但他对自己作品中反映的现实的妖魔性已有所认识。

果戈理在致普希金的信中，讲到《死魂灵》的创作目的：“我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哪怕从一个侧面，把整个俄罗斯表现出来。”^{[12][134]}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果戈理仅提到了“表现”，而未表明他会探索解决“整个俄罗斯”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接近他中期的创作特点。对于实现果戈理的创作目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可谓不可或缺。首先应关注到乞乞科夫本人的形象特征。他与赫列斯塔科夫一样：他们都有一种在社会各阶层畅通无阻的能力；而环境中又隐藏着存在已久、极易被利用的弱点。他们借助这种能力深入了所处环境的内里，所经之处，一些久未暴露的事物纷纷显形。他与赫列斯塔科夫又在代表性上不同：前者代表官僚，后者代表商人。前者背后是被戏剧性赋予的虚幻的权力，后者面前是不择手段竭力争取的金钱。前者通行无碍的渗透力来自其臆想的、欣羡的、乐意表现出的虚假幻象，后者的渗透力则来自其主动改变、自我构架、积极融入时做出的现实努力。乞乞科夫在构思计策、规划方法、实行路线时极为“脚踏实地”，在情况有变时能积极解决，遇到不同对象时也能表现出不同的嘴脸，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一切为着他所追求的事物服务；因此在被揭发前，他的旅程虽时有碰壁，但总体而言仍然顺利。前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荒诞性体现在“无意识”上；后者则是在有意识地利用环境与人性的缺陷，荒诞性体现在他收购死农奴这一行为本身。实质上，这里被通常认为的荒诞性，恰恰因为收购“死农奴”的“农奴”一词同时具有“魂灵”的词义，而成为收购“死魂灵”，从而使得文本而具有了妖魔感，魔鬼乞乞科夫来认领他的一众小鬼了，这符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断。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文本中的“次级人物”。在塑造“次级人物”时，《死魂灵》出现了向早期作品风格回归的迹象。乞乞科夫收购“死灵魂”途中遇到的五位地主，每个人都具有超乎常理的夸张特质——其一谄媚逢迎（马尼洛夫）、一精打细算（科罗博奇卡）、一蛮横无赖（诺兹德廖夫）、一粗俗无知（索巴克维奇）、一吝啬成癖（泼留希金）；他们所处的环境，也与各自性格相符。这些超乎寻常性同样

携带了妖魔特征。因而，与《钦差大臣》类似，《死魂灵》的魔鬼性质，不仅集中在一个主人公身上，更是分解、散落在各个角色以及环境之间。然因文本结尾大篇幅的、感情深厚的对环境的感叹，对“罗斯”（须注意作家在此处使用了古称）“母亲”的热烈的甚至充满希望的呼唤，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小俄罗斯，而是试图深入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所以，文本中对妖魔性的俄罗斯的表现，就有了呼唤“圣洁力量”的宗教性。

不过，在妖魔形象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始终是果戈理对现实俄国的观察与认识，同时也是其自我认识的生产过程。根据果戈理的书信所述，他越到创作后期，越意识到了自己对“恶”（魔鬼）的洞察力。这一点，甚至他自己对其也感到恐惧。然而他只为追求戏剧性地反映一些真实缺陷，并无意对社会制度加以批评；他寄希望于朴素的宗教力量和民族性格中的积极面，认为那是让“罗斯母亲”保持完整、纯粹的关键；他更倾向于从人性内部解决问题。因而，他自始至终也不能理解自己朴素的思想 and 外界要求他“进步”的声音产生的冲突，更无法理解来自激进者站在思想制高点对其的批判，也扛不起别林斯基为他制作的“批评现实主义”的大旗。

至此，不难看出果戈理作品中超自然元素创作的目的。自始至终，这些超自然的形象都是与宗教提倡的行善、救赎等精神相对立的。在广义上也是与“整个俄罗斯”必要的精神相冲突的。他描写这些元素，只是为了大胆地、从反方向反映人性与环境未被广泛发现的真实一面。他对以魔鬼为代表的超自然生物态度大体上是否定的，但他使用离奇、讽刺、戏谑的手法强化了其中的荒诞性和戏剧性，并未把这种广义上的否定拔高到批判现实的层面，也未提出解决途径。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看待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将他过度拔高为“敲响农奴制社会的丧钟的人”，也不能认为他的作品思想内涵“觉悟不足”，对于加在作家头上“现实主义大师”的头衔也应谨慎看待。因为，果戈理本人的作品已经自行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神话。

参考文献：

- [1] 别尔嘉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 耿海英,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2] 耿海英. 非现实主义的果戈理[J]. 俄罗斯文艺, 2009(3).
- [3] 别林斯基.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C]//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 满涛,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社,1979.

[4]梅列日科夫斯基. 果戈理与鬼[M]. 耿海英,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5]罗赞诺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M]. 张百春,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Н. А.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M]. М.,2004.

[7]叶夫多基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 杨德友,译. 南京:学林出版社,1999.

[8]巴赫金. 拉伯雷与果戈理[C]//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9]纳博科夫. 尼古拉·果戈理[M]. 刘佳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果戈理. 涅瓦大街[C]//果戈理全集(3). 徐振亚,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果戈理. 鼻子[C]//果戈理全集(3). 徐振亚,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果戈理. 果戈理书信集[M]. 李毓榛,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Refutation of Texts Themselves

—— The Deconstruction of Myth of “Realism” by the Devil Element in Gogol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When discussing the debate on this traditional topic of “Pushkin tendency” and “Gogol tendency”, how to repute the myth which Belinsky locates Gogol as the leader of “realism”? A group of religious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such as Berdyaev, Merezhkovsky, Rozanov, Evdokimov, have subversively refuted it at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Gogol’s creations; Bakhtin, Nabokov and others analys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aesthetics. However, if it exam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il element of Gogol’s texts themselves, it is found that they are the apparent deconstruction of “myth of realism” themselves. The devil element penetrates Gogol’s creations all along, in which writer’s creative purpose and thought are implied; and in the ever – changing images of the devil element, it is also the production of writer’s self – knowledge. This self – knowledge runs counter to Belinsky’s designation of his “realism”.

Key words: Gogol; devil element; deconstruction; “realism”

作为文献纪实文学体裁的“超文学”

张变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欧洲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超文学”是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提出的关于体裁的表述,特指全新的文献纪实文学。为了呈现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人民承受的灾难,阿达莫维奇突破了传统纪实文学的局限,以磁带录音的方式引入口述史方法,记录悲剧性历史见证人的口述文献,以第一人称自白等多种叙事策略还原真相,把人在历史事件中的悲剧体验突显出来,从而使真相获得极大的冲击力。这种体裁此后用于表现围困期间列宁格勒人民承受的苦难,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考察“超文学”体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回应历史呼声、拓展文献概念、筛选拼贴的原则以及共同叙述者等方面,阐明“超文学”体裁的内涵,并说明其对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的影响。

关键词:阿达莫维奇;超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10-07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词中谈道:“我的导师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我想在今天心怀感激地提起他的名字)也认为,以20世纪的各种梦魇为对象写作小说是一种亵渎。这里不能有任何杜撰。应该展示原原本本的真相。需要一种‘超文学’。应该由证人出面说话。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1]15}作家在这里谈到的“超文学”,是一种具有体裁意义的概念,在文献纪实文学中,直接呈现见证人的口述,将现实真相推到首要位置。“超文学”作为体裁的表述始终与阿达莫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的文献纪实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后,一些重要媒体的标题中都使用了“超文学”的概念:“阿列克谢耶维奇因‘超文学’创作而获奖。”^[2]本文梳理这一体裁概念的确立和发展,说明其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的里程碑意义。

一、“超文学”概念的提出

“超文学”是由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A. Адамович)提出的概念,最初仅是针对文学对复杂

现实的表现力而言,强调当下的写作要有“超”出一般文学的力度。1983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召开了一次文学研讨会,议题之一是:文学如何应对核战争的威胁?此时的文学,对于“核威胁”主题的创作和讨论方兴未艾。当战争不仅是杀人,而且要毁灭人类时,传统的虚构文学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都感到无力表现历史的真实。虚构永远也赶不上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现实呼唤一种更有力的表达方式。针对这种现状,阿达莫维奇提出以“超文学”来表现“不可理喻”的现实。这是作家倡导的写作原则,呼吁文学创作要直面当下现实,以全新的手法和面对真相的勇气表现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超文学”在创作观点上对抗平庸的循规蹈矩,在创作手法上以超过寻常的力度忠实于现实,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阿达莫维奇通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转向纪实文学的例子,说明纪实文学能够更加直接有力地表现现实。

“超文学”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并将之视为阿达莫维奇开创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对既有的纪实文学的突破。1986年10月《文学

收稿日期:2022-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写作研究(16BWW032)”

作者简介:张变革(1967—),女,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报》上发表了阿达莫维奇与当代文学评论家伊万诺娃(Н. Иванова)关于“超文学”的对话。此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爆发,作家当初所忧虑的核灾难成为现实。“超文学”提倡的强有力的面对现实灾难的文学创作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阿达莫维奇阐释了“超文学”这个概念所对应的残酷现实:“也许,‘超文学’这个概念表达得不够贴切,但应该有与‘超级死亡’‘超级杀戮’‘超级武器’相对应、相抗衡的表述。”^[3]针对评论家提出的问题——如何使文学既贴近当下又不失其固有的以“美拯救世界”的使命,阿达莫维奇认为应以新的体裁来回应。他从文学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程度上重新解读经典,说明体裁演进的内在动力在于有力地回应现实。他认为,当下(指苏联1970、1980年代)非虚构的文献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共同构成了文学的两翼,都需要达到直入人心的力度。“如果读(或写),那就要猛烈地直击,达到‘文献式’目标。如果作品不是‘文献式’,那就是马尔克斯式!”^[4]²⁸²将文献纪实文学提到与虚构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是时代对非虚构文学体裁提出的要求,也是作家自己创作实践的结果。在这种理论表述之前,作家已经使用这种全新的文学体裁,与其他作家合作完成了文献纪实作品《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Я из 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и》,1974)和《围困纪事》(《Блокадная книга》,1977—1985)。

“超文学”也被当代文学界称为白俄罗斯文学现象,这与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的特殊遭遇相关。二战期间,白俄罗斯人民遭受的创伤尤其惨重,如果说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那么位于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则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战争。白俄罗斯共有9200个村庄被德国纳粹毁坏,其中4885个村庄被彻底烧毁,627个村庄的村民被集体屠杀,4258个村庄的部分村民被杀害。^[5]¹如何使白俄罗斯人民遭受的战争灾难得到呈现,如何叙述才能使这些无辜的人不被历史遗忘,这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需要一种全新的创作手法,即确立一种全新的体裁,来表现这种现实。如巴赫金所言:“对现实的一定方面的理解,只有在具有一定表达方法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这些表达方法只能运用于现实的一定方面。”^[6]²⁸³阿达莫维奇认为,能够面对这种现实的,是一种全新的文献纪实文学。

阿达莫维奇是战争的亲历者,14岁时就目睹了德国军队焚毁村庄的暴行。他认为,作为幸存者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他先后尝试以不同的体

裁进行写作。最初作家以传统体裁完成了几部小说,如1961年的《屋檐下的战争》(《Война под крышами》),1963年的《儿子奔赴战场》(《Сыновья уходят в бой》)。1972年,作家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哈登的故事》(《Хатынская повесть》),反映白俄罗斯哈登村庄被烧毁的悲惨历史。这些作品先后获奖,并被搬上了银幕和戏剧舞台。但作家认为,它们的表现规模和力度都还不够,还不足以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都表达出来。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经历的极端现实,远远超过虚构文学对同类题材的表达,需要一种全新的文献纪实体裁,将人们感受到的一切都传达出来。他写道:“我确定无疑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学都不足以接近人们眼神中、声音中和言语中所传达出的真实,哪怕是一点点。”^[7]¹⁹⁸

“超文学”体裁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杀戮的战争历史,这也决定了它所展示的是灾难现实。这种体裁不仅表现白俄罗斯人民经历的灾难,还展现列宁格勒900天围困中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并有力地呈现出一系列悲剧历史事件中人民的苦难,如研究者所言:“大屠杀的恐怖见证和被围困之城的生活,本身就会引起道德和情感的强烈冲击,甚至是负面的生理反应。当这些文献材料按照艺术文本的规律进行加工,达到文献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时,审美效果就产生了。”^[8]²⁹“超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表述,可以概括这类文献纪实文学写作的总体特征。

二、《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与“超文学”体裁的形成

巴赫金曾谈到体裁对文学创作的关键作用:“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表述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6]²⁷⁶可以说,新的体裁形式首先是由呈现现实的方式决定的。苏联传统的纪实文学在表现题材上大都囿于社会政治框架,很少关注个人感受;在表现手法上,大都以第三人称转述见证人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削弱了对灾难亲历者感情呈现的力度。显然,传统的纪实文学不能满足作家的创作要求。

为了捕捉住人们言语和表情中所传达出的历史真实,阿达莫维奇使用了全新的方法,用录音机录下人们的口述见证。录音磁带成为全新文献纪实文学体裁产生的物质条件。这种方法已经超出了传统纪实文学的做法,赋予文献以举足轻重的地位,将保留原始文献当成作家的历史责任。这与研究口述历史

的学者保尔·汤普逊的观点相吻合：“录音机可以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们的叙事技巧——首次得到真正的理解。”^{[9]21}

作家们这样谈到对见证人口述文献的珍视：“我们的任务是保存记忆，将人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疑惑、愤怒，像保存‘血浆’一样呵护好，不仅记录下他们讲述用的词语，而且还有讲述时的声调、眼神、脸上的表情，把当时那种氛围存留下来，以书页的形式直接呈现给读者。”^{[5]6}对待口述的这种虔敬态度，必然带来对“文献”的全新的理解。“文献”概念的内涵在发生变化，外延越来越大，越来越向人的精神世界延伸。阿达莫维奇在《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中，这样谈到“文献”：

“时间过了这么久，人们讲述的这些记忆、故事，被记录在录音带上，到底算什么？在何种程度上是文献？又是什么文献？我们不怕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听到了人们是如何讲述的。他们各不相同，但在某些点上又高度相似，我们就找到了答案。是的，这是文献。是心理文献，社会文献。这不仅是人们对战争时期哈登人苦难经历的记忆，而且，即使从今天我们所处的70年代来看，这也是关于事件真相的极有分量的文献，虽然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5]74}

这是作家对形成体裁之材料的“活文献”——人声文献的发现，是对见证人心理感受作为文献的肯定。这种文献以巨大的规模和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方式见证出人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灾难，并成为具有充分人文价值的社会文献。作家对心理文献和社会文献的界定，无疑拓展了文献的内涵和外延。

传统理解的文献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是说明书类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文字。严格说来，文学中没有纯粹客观的事实，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我越写文献文学，就越坚信：客观文献是不存在的。没有纯粹的与现实完全一致的文献。”^{[10]213}只有票证类文件才符合纯文献的标准。也就是说，任何文献从其选取的角度和描述的方式来看，都不可能没有人为因素，都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而完成的叙事。对于纪实文学使用的文献，当代文学理论家(И. Шайтанов)认为，进入文学的文献不应追求物质化的客观性，而应侧重其对人内心产生的真实感，这种文献应具有个体化特点：“我们期待回忆录的是事实的准确性，但事实不仅是日期和事件，还有印象。也许，正是印象构成回忆录的主体部

分，这是最具个体特征的时代文献。”^{[11]7}阿达莫维奇也谈到活文献——人声文献——所具有的艺术效果：“这些故事首先传达出的是心理的真实。讲述者的记忆如此清晰：他经历了什么，感受到什么，看到什么。这种真实不仅令你信服，而且让你痛苦得难以忍受。人的记忆如此集中于那骇人的事件，仿佛把它们猛地拉到你面前，如此‘规模宏大’，以致你也成为灾难的见证人，不再是听众和观众，而成了见证人……”^{[5]74-75}人声文献不仅是使读者成为见证人，而且使其本身就成为历史见证，如理论家所言：“文学中的文献体现出独特的意图，即追求成为见证，见证事实(事件、人物、物体、精神、智力状况等)。”^[12]

为了保留文献原始自然的真实性，“超文学”强调以第一人称直接呈现见证人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说说话人所使用的口语，不仅是字词的选择带有讲述者的用词特点和文化心理的表征，而且记录下叙事时的口气、表情、动作等传达见证的情绪表征，使一个个见证人被还原成活生生的人，见证出灾难时刻人身体和内心受到的创伤。只有这样，才能在还原灾难事实的同时，对见证主体表达出应有的尊敬。这种记录方法拒绝传统纪实文学中仅仅转述事件或者概括事件的抽象文字，那种抽象恰恰是将构成见证人之主体鲜活特征的细节剥离了出去，从而使文字失去情感冲击力，失去生命力。

口述形成的历史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将关切个人生活的话题从隐秘的私人领域带入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将其变成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公共话语的建构。口述史的书写改变了历史的观察视角，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认知，或者说可以重塑历史。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事件也是人民生活中的集体性事件，是群体的民族的精神事件，也是个人生活命运的重大事件。对这些声音的记录，使个体性的述说得到集体性的汇集。人们渴望了解历史，是因为借助历史可以理解自己的人生，理解自己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形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自我的深入认知。如弗洛姆所言：“真相有一种解放的作用，它能释放能量，去除思维迷雾。”^{[13]45}也就是说，获得真相可以使人成为独立思考的人，成为真正的自我，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口述记录的意义就在于使普通人得到该有的尊重，“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许多默默无闻的人民”^{[9]24}。《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

中,在人们的口述中,战争杀戮的客观事实显现出来。纳粹军人针对白俄罗斯村庄的屠杀方式通常是:在村子里先把男人拉出家门扫射,然后把女人和孩子赶进木屋和茅草棚,机枪扫射后再放火点燃,接下来是把村里的建筑一个个烧毁。在村外的做法是,先把人赶到林子里,再放狼狗进行猎杀。法西斯的这些残酷暴行,借助亲历者的口述得以还原,形成历史史实,成为建构民族灾难和历史记忆的社会文献。在被敌人杀戮中所经历的恐惧和痛苦,则成为见证人内心苦难的心理文献。阿达莫维奇谈到这种心理文献的可信度:“这些故事中,人心理的真实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事实。”^{[5]75}这种真实是由细节对心理描述的逼真而达到的,是人们受到战争创伤的事实,也是对经历灾难之人情感和人格的尊重。这种真实的细节是由见证悲剧历史的普通人说出的,带给人的冲击力丝毫不亚于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给人的震撼。如《我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中,一个母亲对被法西斯烧死的儿子的哭诉:“我的儿呀,我的儿,你干吗要穿胶鞋呢?为什么把脚伸到橡胶里呢?橡胶烧着了,你的小脚就会被烧着,不停地烧……”^{[14]388}

成为历史事实的材料有口头的和书面的,通常人们以为此前记录的书面材料更具客观性,更有文献价值。但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认为:“因为原始沟通是口头的,所以口头录音提供了最精确的文献。”^{[9]134}这也是口述史得以确立的基础。这种口述实录的见证文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纪实文学。这是对旧形式的突破,是一种体裁的创新。《我自烈火熊熊的村庄》出版后,阿达莫维奇很长时间都在寻找对这部作品体裁的界定,曾将其称为“文献悲剧”(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трагедия)和“记忆之书”(книга - память),但最后这些名称都没有让作者满意。最后出版的书上,对体裁的界定是“文献小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

三、创造性的剪辑与拼贴:《围困纪事》与“超文学”体裁的发展

阿达莫维奇对这种全新的文献文学体裁高度信任,认为它达到了还原历史真实、捍卫人之尊严的目的,并将其用于对列宁格勒围困的写作,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列宁格勒围困为题材的作品已经有很多,从抒情散文到大型小说,再到戏剧作品,都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在这些作品之后,一个没有围困经验的白俄罗斯作家能写出什么新的内容呢?促使阿达莫维奇写作《围困纪事》的动力来自

对普通人所经历的围困故事的震惊:“一个母亲把饿死的孩子藏到衣橱里,不让人知道,好用他的食物配给证领取食物给活着的孩子。”^{[14]371}这些关于饥饿和心理折磨的故事让作家意识到,那里经历的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悲剧”^{[14]371},其惨烈程度与白俄罗斯哈登村庄惨绝人寰的杀戮相当。普通人见证历史悲剧的史实让作家想到以这种全新的文献纪实体裁加以呈现。为了说服列宁格勒的作家格拉宁(Д. Гранин)与自己一起完成这部作品,阿达莫维奇写道:“写作这本书不是由于我们有才华,我们要做的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让灾难亲历者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经历的围困,哭出、喊出自己的痛苦。”^{[14]372-373}作家在这里再次强调了这种“超文学”体裁的特点,以口述史方式让亲历者说出历史真相,使文字有力地传达出普通人经历苦难的声音。

巴赫金曾谈到任何体裁都是一个复杂完整的体系:“每一种体裁,如果这是真正重要的体裁的话,都是用来理解性地掌握和穷尽现实的手段和方法的复杂体系。”^{[6]282}对于文献纪实文学体裁,对文献进行筛选和进行蒙太奇拼贴(简称拼贴)成为文本结构组织的重要方法。所谓蒙太奇拼贴,最早源于电影技术术语,主要指镜头的剪辑、组合,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С. Эйзенштейн)最早使用“蒙太奇”这个术语,用来说明两个以上独立的镜头剪辑在一起阐释的独特效果。这是20世纪电影叙事的一种方法,即中断镜头的流畅性,将表达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按特定目标组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在20世纪文学和更广义的文化艺术中,蒙太奇成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组织方法。蒙太奇拼贴是“语义元素的重新组合或在结构上构建一个刻意离散的艺术作品”^{[15]21}。这不仅是一种处理材料的艺术手法,而且是文献纪实文学重要的文本组织原则。

阿达莫维奇在《我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筛选和拼贴的方法组织材料,用多人叙事的话语拼贴。“一个讲述者被另一个人的叙述打断,然后连接起来,再被打断,然后补上作者的注释。”^{[16]83}《围困纪事》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筛选和拼接的方法,不仅是对口述见证,还对日记等文献材料进行创造性编选组织。这部作品中,除了口述,被用于文献的材料更加扩展,包括了大量的日记和回忆录,从而使这一体裁得到极大的发展,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围困纪事》共有两部,第一部主要根据围困中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写成。作者使用了几十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的口述回忆和日记,在每个意义单

元之间,插入自己的解释和议论,呈现了1941到1942年春围困中人们承受的艰难。第二部分在剪辑组织材料方面做了大胆创新。作者选取了三位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列宁格勒人的日记,他们分别是知识分子、16岁的少年以及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作家将三个人的日记根据时间和主题进行分段交错排列,从战争开始到经历饥饿困顿的全过程,穿插着作者的概括引导性话语,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饥饿与死亡威胁下人的生命体验,以及支撑人生存下去的理性、尊严、意志和爱。正如作家所言:“如果给他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下一个定义的话,也许就是:尤拉·里亚宾金的日记是良心的杰作,格·阿·克尼亚泽夫的日记是理智与精神的杰作,利季娅·奥哈普金娜的记述是爱的杰作……本书的三位主人公是人类生存的三根决定性支柱的化身。”^{[17]519}对三位主人公日记的穿插拼接俨然就是一个展开的戏剧场景,重现了当时的寒冷饥饿,以及人内心的痛苦挣扎。日记是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白和忏悔的特点,作者的引导性插话仿佛是理性客观的戏剧旁白,与自白忏悔的话语相交织,使编排在不同主题章节中的日记形成此呼彼应的共鸣和交响,达到以个体记忆对抗时代遗忘的效果。作家要做的,不是以记者和编辑的态度对待收集到的材料,而是如同历史学家一样,将其视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记忆的伦理义务就在于让生者记住死者,让生者更有感恩和生命担当,让死者更有尊严:“这一切存在过,就应该让活着的人知道。”^{[17]519}

阿达莫维奇与格拉宁写作《围困纪事》的过程中,再次提到体裁问题——“从大量的筛选和拼接中产生出新的文学体裁”^{[18]438}。为了给《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和《围困纪事》中的体裁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阿达莫维奇苦思冥想,想到过“录音文学”(магнитофо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公共小说”(соборный роман)、“史诗规模的合唱文学”(эпически - хоровая проза)、“非虚构”(невывмышленная проза)、“口述史”(устные истории)等等名称。^{[19]18}《围困纪事》最后发表时的体裁称谓是“文献小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

四、历史与未来的真实: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体裁的传承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也是从录音机开始的,第一台录音机也是阿达莫维奇帮忙买的。她自觉地使用这种“超文学”体裁写作,使其更加丰富

和完善,成为表达当下主题最有力的文学体裁。谈到文学体裁的影响,如研究者所言:“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20]34}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性地继承了“超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这包括:全面肯定文献的历史性和主体性,坚持田野调查和文献数量上的规模,使共同叙事者的概念更加明确,在筛选文献和进行蒙太奇拼贴方面更加多样,写作的题材更加拓展,将苏联历史中决定国家和普通人命运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都纳入写作中,对不同性质的战争和灾难的表现比传统写作更加触目惊心。

文献纪实文学不仅是追求真实,还要达到强烈的感人效果,要以艺术手法将口述者内心经历的恐惧和痛苦凸显出来,才能使真实具有穿透力,达到更高的境界:“这种新体裁关注的是另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层次上的真理。”^{[21]286}为了说明这种文献纪实“超文学”体裁达到的高度,阿达莫维奇曾将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于1985年的《最后的见证者》与白俄罗斯1948年出版的儿童见证集《我们将永志不忘》(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ем)进行比较,同样是写儿童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但因为写作方法也就是体裁方式的不同,达到的艺术效果也迥然有别:“这里是把情感里面的真实用力拉出来,那里是让所有描写都符合既有的成规。”^{[21]285}

阿达莫维奇曾在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时,谈到这种文献体裁创作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不是随便采访某个人,写下他们的记忆,而是要找到那些其个人命运和记忆能触到时代痛点的人,其对灾难事件的痛苦经历刻骨铭心,能触及人们最敏感的神经。第二,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特殊的共情感知能力,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是作家才华的一部分,无此就谈不上高质量的作品,这种体裁也难以形成,难以被有效使用。第三,要有高度发达的审美鉴别力,即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并将其拼接成作品的能力。”^{[22]381-382}

发现普通人身上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能成为时代历史代言人的小人物,是作家开启“超文学”写作的第一步。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特点体现为:对俄罗斯现代社会历史的审视改变了以往历史宏大的书写模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平民化的历史阐释。作家从政治的、“精英”的历史,走向了普通人书写的民间

历史。历史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渗透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在大历史中的动人心魄的遭遇,才是历史本质的具体呈现。这些历史是20世纪中叶以来半个世纪苏联人所经历的重大灾难事件——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苏联解体。作家所关注的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无数小人物没有被言说的苦难,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有意疏漏的历史。作家让每个受访者都说出自己的感受,说出时代历史在自己身上经历过的故事。这些小人物也因为这些叙事而进入历史,成为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时代的见证人,成为承载伟大的普通人。

对口述材料进行筛选和拼贴,是“超文学”写作的重要方法。阿达莫维奇曾谈到对材料的删选:“6000页关于围困的事实的材料中,只有十分之一进入书中。”^{[22]385}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曾谈到对材料的筛选:“有时候从80页的材料中只留下半页。”^{[10]212}收集事实材料的原则是文献必须具有历史和人性价值,能够呈现时代及人内心的品质。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我把材料集中起来,按其表现时代样式的需求收集。”^{[10]218}

“超文学”强调为历史做见证的道德伦理义务,文献的数量同样是使其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保障。为了得到“活文献”(“人声文献”),作家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他人的情境中,好使所要写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23]231}。阿达莫维奇在谈到在收集写作《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的文献材料时,写道:“我们已经有4年之久在收集人们的声音,让人的声音发表出来,还要让人们持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离事件发生差不多30年后,我们开始收集这些声音。”^{[5]75}《围困纪事》的写作过程历时5年多,作家们采访并收录了200多份口述资料。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初的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使用了阿达莫维奇开拓的这种手法,采访了500多名战争亲历者女兵,用录音机录下她们的口述,在此基础上创作成书。此后的每部作品都是历时数年,在采访数百人基础上完成的。

口述者说出的见证也是作家想要说出的话语。阿达莫维奇谈到《围困纪事》的震撼力:“当我们记录下经历了哈登悲剧、列宁格勒围困之人的记忆时,人们不住地惊呼:这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些朴素的故事背后,突然出现了对人全新的认知。而通往深处的引导人不是但丁,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杰柯莉娅·克鲁格洛瓦、玛丽娅·伊凡诺夫娜·德米特里耶芙娃……”^{[4]287}

口述者与创造性记录的作家共同成为作品的叙述者,是“超文学”创作主体的特征。这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我的书仿佛是人民写出的,反映的是大众的认知。”^{[10]213}如评论家魏尔所言:“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挑选‘拍照记录’的见证人时,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在她的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尽管这些话是借别人之口说出的,但表达的是她和见证人共同的感受。在这里,这就是最高的专业技能。”^{[24]10}普通人的叙事说出的也是作家隐含于心的话语,是作家内心成长的记录。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是这些材料在形塑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10]218}忠实记录普通人的心灵故事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内心感受,再将其呈现为心灵的艺术,这是作家所特有的能力,“听人忏悔的牧师、手术台前的医生、以‘口述史’写作的作家都属于这一行列”^{[24]10}。

“超文学”概念提出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作中积极回应,承担起“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责任”。她不断提到阿达莫维奇在文学创作方面给予她的启示和引导,胜过任何一所大学所能给予的。她在几部文献文学作品发表时,对体裁的表述也做了尝试,《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发表时被称为“文献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оза),《铁皮娃娃兵》发表时的体裁称谓是“文献小说”(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后来将法庭事件加入,加入的部分被称为“文献中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到《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发表时,作品的副标题是“关于未来的历史记事”(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也可以说是作家对体裁的一种阐释。从这些表达中,可以看出作家为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命名的努力,从而使其与作品内容相符合,并摆脱传统的“纪实文学”的窠臼。直到阿达莫维奇提出“超文学”的概念后,“超文学”成为这种文献纪实体裁的情境性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学界更多使用的是作家们最初尝试的“声音体裁”等表述,但“超文学”的概括性提法已然与阿达莫维奇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和体裁探索联系在一起,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述,不仅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文学体裁的内涵,而且将读者带入写作的场景,增加了体裁的历史感。

参考文献:

- [1]阿列克谢耶维奇. 关于一场输掉的战争:诺贝尔授奖演讲[J]. 刘文飞,译. 世界文学,2016(2).
- [2][EB/OL]. <https://www.vesti.ru/article/1767702ysclid=l6nq54zcc3685437031>.

- [3] Иванова Н. Б. и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Но кто спасет красоту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 октября 1986 г.
- [4]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Ну так сделайте сверхлитературу! [М]. Ничего важнее. М., 1985.
- [5] Алесь Адамович. Янка Брыль, Владимир Колесник [М]. Я из 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е. М., 1979.
- [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C]. 钱中文,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7] Адамович А. М. Хатынь, о себе повествующая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8).
- [8] Несмелова О. О. Война, фашиз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 средствами Nonfiction [J]. Филоло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2012 (4).
- [9] 保尔·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 [C]. 覃方明, 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Интервью вела Татьяна Бек [C]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6(1).
- [11] Шайтанов И. О. Попытка прогноза [C] //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Мемуары на сломе эпох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0(1).
- [12] Луцевич Л. Ф.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и это — документ [EB/OL]. <http://imli.ru/seminary-i-konferentsii-2008/1827-kruglyj-stol-literatura-i-dokument>.
- [13] 艾·弗洛姆. 存在的艺术 [M]. 汪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14]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Как быть гениальным [M] // Додумывать до конц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евоги века. М., 1988.
- [15] Кукулин И. В. Машины зашумев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советский монтаж стал методом неофиц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M]. М., 2015.
- [16] Тоне А. Г. Проблемы жанровой эволюц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прозы 1970 — 1990 — х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M]. М., 1999.
- [17] 阿达莫维奇, 格拉宁. 围困纪事 (第二部) [C] //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8 · 苏联卷 8. 张小军,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18]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Немного футурологии [M] //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Мы — 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 М., 1991.
- [19] Игнатив Н. Е. Жанровые искан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истики 1970 — 90 — х гг [M].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 1998.
- [20] 乌尔里希·韦斯坦因.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C]. 刘象愈,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21]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Из «Зеленого тетради» 1987 год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1(4).
- [22] Адамович А. М. Додумывать до конц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евоги века [M]. М., 1988.
- [23] Что дает нам сегодня память о войне? [J].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82(5).
- [24] Вайль П. Л. Жанр, в котором работает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 последняя надежда [M].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от 30 мая 2008 г.

(责任编辑 刘海燕)

Hyperliterature as a Documentary Literature Genre

ZHANG Biange

(College of Europ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Hyperliterature” is a genre — specific expression proposed by Belarusian writer Adamovich for a specific creative context,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a new documentary literatur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catastrophe suffered by the Belarusian people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 Adamovich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literature by introducing oral history methods in the form of tape recordings, recording the oral documents of witnesses to tragic historical events. By restoring the truth with various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first — person confessions, she highlighted human experience of tragedy in historical events, thus giving the truth a powerful impact. This genre has since been further developed to manifest the suffering of the Leningrad people during the sieg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yperliterature” genre, clarifying its meaning in terms of response to historical voices,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document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sifting and collage and common narrators. The article also explains its influence on Alekseevich’s nonfiction writing.

Key words: Adamovich; Hyperliterature; Alekseevich

论电影《美人鱼》中的环境审美观念与生态思考

岳芬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关注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影的重要态势,一向引领时代潮流的香港电影自然不会置身其外。上映于2016年的《美人鱼》就是港台电影关注生态问题的代表作之一。影片选取的“美人鱼”这个原型,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美人和鱼的组合,象征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最佳形式。对这一形式的破坏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周星驰用一种独特的电影艺术方式回应当前人类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他的电影艺术开始肩负起更大的伦理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美人鱼》;周星驰;环境美学;生态观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3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17-04

关注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影的主要趋势,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以电影艺术的方式投入维护生态环境、反思生态困局的运动中,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影片,甚至逐渐形成了新的类型电影——“生态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既包括生态灾难电影,也包括一些生态伦理电影和生态纪录片等。数年前,徐兆寿就曾对此进行过大胆的预言: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高涨,生态电影将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产品,并且以故事片、娱乐片、动画片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认识。同样,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生态电影也会有一个好的前景。^[1]

如今看来,他的预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现实的肯定。上映于2016年的《美人鱼》(3D)就是港台电影关注生态问题的代表作之一。对生态问题的思考无形中增加了影片的厚度,让周星驰的“无厘头”从“娱乐至死”的浅层感官层次走向深层的社会思考。

影片选取的“美人鱼”这个原型,具有丰富的生

态内涵。美人和鱼的组合,象征人类对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最佳形式。对这一形式的破坏,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借助电影艺术,导演对现实进行大胆批判,不仅提升了影片对生态问题继续反思的力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厚重感。

一、审美原型中的生态环境内涵

电影中的美人鱼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象的审美原型,它原本只是传说中的形象,是人类融入自然理想的象征。最广为人知的是安徒生关于美人鱼的童话故事,它几乎成为后世所有美人鱼想象的全部来源。美人鱼的存在减轻了人类对大海的恐惧,甚至点燃了人类探索自然的愿望。

周星驰巧妙地挖掘出美人鱼这一兼具人类学和社会学特质的历史文化资源,让这个过去只出现在童话故事和相关动画电影中的形象获得“新生”,长相甜美的演员代替了观众对美人鱼形象的抽象想象,无论观众接受与否,这个形象都将美人鱼这个抽象的观念符号具体化了。在此基础上,周星驰尝试性地将美人鱼及其传说故事引入自己的“无厘头”风格中。

在电影中,传统意义上的美人鱼和王子相爱的故事变成了美人鱼和现代富豪的爱恨纠葛,前者的

收稿日期:2022-05-2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欧美环境美学中的中国元素研究”(20ZXD001)

作者简介:岳芬(1983—),女,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美学及跨文化研究。

爱情悲剧转化为后者的“任务”，鉴于这种先入为主的情节，电影中的美人鱼及其经历显得更加悲壮。前者只是因为孩子般的叛逆走上了一条放弃永生、获得短暂爱情的不归路，后者则是为了某种沉重的社会使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也让影片在爆笑的情结之外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霾。

除了身体样貌完全一致之外，电影里的美人鱼和童话中的美人鱼没有任何联系。在电影中，美人鱼并不美好、也不可可爱，反而是一个“杀手”。当然，它杀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整个族群的生存。从生态的角度来讲，它更像是一个“图腾”，族群通过它实现生存和繁衍的希望。电影将这个抽象的图腾形象具体化了，让它在现实层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周星驰的电影无疑为美人鱼这一重要的文艺原型形象增添了新的内涵。对比安徒生关于美人鱼的童话，电影里的美人鱼更具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特质，前者是想象中的、具有完美人格的存在物，但它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不仅由于它的存在是理想化的、具有神化色彩的，还因为它对爱情的理解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具有超越常人的品性。后者则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它不仅有爱有恨，还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爱恨情感，它对世界的看法相比童话中的美人鱼要更为复杂。

美人鱼原型并非只是亲和、美丽的，如果严格追溯，美人鱼并非都是善良的，在西方文学和文化史上，美人鱼有的时候也同海妖的形象纠缠在一起，象征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恐惧。电影中的美人鱼混合了善与恶两种元素，是人类多元文化的综合体，也是人类在不同阶段对自然有不同认识水平的产物，甚至代表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人群对自然的不同态度。电影最终将这些可能的形象杂糅起来，又借助现代光影方式进行反映，创造出一个兼具善和恶、动物本能和人类理性的情感动物。

新的美人鱼原型形象的塑造对于电影本身也具有重要价值，它所代表的保护海洋生态的主题让这原本可能落入现代都市爱情窠臼的影片瞬间披上了思想的崭新外衣，这样一来，电影的可读性不仅为单薄的故事性提供了支撑，还拓展了影片的叙述空间，使相对简单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变得富于张力。美人鱼是具有人类智慧和动物天性的混合体，它和人类的爱情并非童话意义上的理想，而是集合了人类生存愿望的生态标的。

总的来说，如果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来看，《美人鱼》在中国尤其是香港电影领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的作品，尽管它在对话台词、故事情节以及演员表演等方面还有欠缺，但它的思想性和导演将“无厘头”与生态主题相结合的大胆尝试却是值得肯定的。影片无疑丰富了美人鱼这个文化原型，不仅赋予了它现代意义，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思想的传播。甚或可以说，电影的教育作用超越了艺术作用。

二、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理想

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美人鱼》这部电影编织了人类回归自然的梦，它以书面文学无可替代的方式让神话、传说或童话中的故事变成了跃然生动的“现实”——至少在放映的几小时内让观众信以为真。当美人鱼与人类产生爱情的时候，周星驰让观众在美人鱼身上看到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可能。

从仇恨开始，以相爱结束，这样的情节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如果将生态主题剥离开来，单纯探讨故事情节的话，这类题材还显得十分“老套”。但是，当周星驰将生态这个主题注入电影中后，这类题材便如点石成金一般被重新“激活”，对生态危机的描绘在观众内心深处引起的共鸣，让他们完全忽略了故事内容的重复性问题，而专注于情节的发展当中。

周星驰为生态主义者提出的回归自然这一理想提供了极具个性化的方案，同卡梅隆等西方著名生态导演一样，周星驰“努力使电影成为有益于修复生态和精神的人文资源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2]。作为香港娱乐片导演中的翘楚，他一反“娱乐至死”、以盈利为目的的理念，转而投入具有思想性的艺术活动中。他把自然和非人类生命体这些概念化的存在转变为具体的形象，从而将人与自然融合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变成了可供探讨甚至践行的方法。尽管人与非人类生物在现实中无法产生相应的情感，但是这一夸张的象征性表达却为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情感并非只有生存竞争这一狭隘的状态。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即便人类为了生存需要不断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但是人类的存在同非人类生物的存在依然能够实现共荣。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一切自然物反而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关联，因而，在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自然会形成更为复杂的情感关系。

《美人鱼》将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视为解决人和自然相互敌视的方法，就算现实生活中人和自然物无法形成人类和美人鱼相爱这样的超自然情感，至少可以在人和自然物之间建立起某种情感纽带。尽管周星驰将自己的“无厘头”发挥到

极致,观众能够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不断爆发出欢笑,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仍然是悲观的,让观众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亲和并非不可能,但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要牺牲一定的“利益”。人类妄图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想同非人类生物和平共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时候,即便人类放弃自身的利益,也未必能取得自然的谅解。美人鱼最后的结局可能很难让沉浸在童话氛围中的观众接受,却是人类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由美人鱼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却深植于人类社群文化和集体心灵深处的形象,周星驰通过电影艺术找到了一种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可以说,他“实现了被现实价值压抑的自我认同的重建与满足”^[3]。他用人与生物相结合的、既大胆而又古老的艺术手段,为人与自然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看似“无厘头”、实则符合人类集体精神需求的方案。观众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人鱼”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人和自然最终能够达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总之,生态思想的介入,为电影艺术构筑了新的话语空间,“生态批评的引入为生态电影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几乎是每一个生态主义者的理想。只是生态环境不断破坏、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实,让他们趋于悲观,他们很难在密集的钢筋混凝土都市中找到安放梦想的场所。《美人鱼》这类以倡导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电影,不仅为观众编制了童话般的世界,也为生态主义者们提供了艺术表达的方式,让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落感得到平复,也让他们重新对生态保护的未来充满期待。

三、艺术的环境批判力量

正如学者鲁晓鹏所说:“同所有的文化工作者一样,电影生产者对他们希望居住和想象的世界具有坚定的信念。”^[5]周星驰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对自身艺术成就不断突破的努力,还尝试性地在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基础上进行提升,他也为当今的生态电影及其背后的生态保护运动提供了参照。他的美人鱼既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形象,更是他对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存在方式进行反思的象征。

尽管电影这种单纯的艺术手段无法取代生态保护运动,但是,它却为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形象化的电影对观众的影响比任何单一的伦理说教更有效。与其说《美人鱼》是一部娱乐片,不如说它是一部以保护生态为目的、以“无厘头”为手段、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教育片。

统观周星驰的电影,讽刺性始终是其艺术表现

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他对“度”的把握却是十分严格的,他往往将讽刺性规训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多数时候仅限于爱情、友情等这类较为常见的主题中,很少触及深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主要同“无厘头”电影自身偏重娱乐性有关。

而在《美人鱼》中,周星驰一反常态地加大了讽刺的力度,以至于走向了深层的社会批判。他从一开始对美人鱼的定位就使得影片走上了严肃艺术的“不归路”。令人神往的美人鱼不再是美的象征,反而变成了与死神结盟的“刺客”。美人鱼不仅代表人鱼族这个群体,更代表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样一来,电影的情感色彩就从轻盈变得沉重,单纯的童话故事变成了复杂的族类仇杀。

如果将美人鱼和房地产商人的爱情故事与传统童话故事中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相比,观众能够发现两者在叙事情节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主旨方面,两者却相去甚远。美人鱼同房地产商人的爱情具有某种都市化的讽刺意味,前者对后者的爱情是具有妥协性的。从电影的结果来看,美人鱼的爱情和它的付出最终实现了阻止海洋遭到进一步破坏的愿望,尽管如此,它也未能完成复仇的使命,只是暂时性地保住了族群的生存权;尤其是美人鱼最终的消失,无疑更增添了电影的悲剧性和批判性。美人鱼没能也无法同人类建立真正的爱情,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已经无限接近了,但是在现实中却仍然隔着巨大的鸿沟,他们不仅无法跨越种群的界限,更难以得到各自种群的承认。这让影片的悲剧性更加浓郁,也让人类与自然的融合只能停留在理想和想象的层面。

人类的贪婪与美人鱼的执着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电影对人类欲望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对美人鱼代表的自然物进行了悲观主义的描绘。在结局上,周星驰的美人鱼和安徒生的美人鱼是一样的,它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同现实进行抗争,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却败给了残忍、冷漠的人类。电影延续了童话故事对人类的抨击,却强化了讽刺的力量和残酷的结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在否定性方面要比童话走得更远,童话故事至少给予读者以希望,而电影则将所有的希望都归于泡影。完成使命后的美人鱼却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爱上美人鱼的商人也落得孑然一身的凄凉境遇。

作为一部 21 世纪的当代电影,《美人鱼》几乎具备先锋电影的一切属性,但它却未将外在的电影形式作为叙述的焦点,反而将目光聚焦于思想性和批判性的理念上。它对人类过往的经历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和批判,就像东野圭吾的悲观主义作品那样,

对人性的“恶”进行猛烈抨击^[6]。它所针对的并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人类行为,而是人类对自然进行长期破坏的行径。虽然影片从一开始就省略了人类破坏自然的“前史”,但是人类填海造陆、大规模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却有很漫长的历史,人鱼族对人类的仇恨积蓄已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的批判性就更为强烈了,它不仅是针对当前人类的行为,同时也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周星驰特有的“无厘头”风格的映衬下,这种批判性就显得“扎眼”了。不得不承认,周星驰在这一方面是颇具“天赋”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香港娱乐电影在社会批判层面的高度。

综上所述,《美人鱼》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批评性的作品,在生态电影批评远未获得充分展开的中国当代电影中是不多见的。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他早期电影中偶尔流露出的某些讽刺性是很难同这部电影相提并论的,这也大大增加了该影片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凭借该影片,周星驰证明了自己的艺术深度,让观众看到他不仅善于“搞怪”,还善于利用“搞怪”来揭示现象、传递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凭借“搞怪”,他让自己的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大幅度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成就。

四、结语

周星驰似乎对“流行”具有某种“天赋”,自“无厘头”风格以来,他始终让自己的电影同步于流行趋势。在全球关注生态问题的时代,他再一次赶上了潮流。他用电影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当前人类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美人鱼》正是这样一种

“能够让人反思自我、现实、社会……带给人们警示、启发与教育”^[7]的电影。当谐谑的“无厘头”与严肃的生态伦理相碰撞的时候,周星驰及其代表的香港电影被赋予了艺术性和娱乐性之外更丰富的内涵,其内涵和思想性大大超过了形式。《美人鱼》的出现让周星驰的电影艺术成就步入了更高的台阶。通过电影,保护生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相关主题不再是刻板的伦理说教,反而变得生动起来,不仅让观众更易于接受,还让生态保护和生态观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认同。在这部电影中,艺术的外在审美形式和内在的思想价值得到统一,欢笑过后的观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参考文献:

- [1]徐兆寿.生态电影的崛起[J].文艺争鸣,2010(6):21.
- [2]吕丽塔,张葳.生态批评视域下的《阿凡达》[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3):39.
- [3]卞祥彬.生态电影的叙事机制与文化认同[J].电影文学,2020(5):140.
- [4]常如瑜,岳芬.生态电影的批评空间[J].电影新作,2013(4):31.
- [5]鲁晓鹏.中国生态电影批评之可能[J].唐宏峰,译.文艺研究,2010(7):97.
- [6]常如瑜.东野圭吾的 Angel 与生态悲观主义[J].中州大学学报,2020(1):21.
- [7]朱鹏杰.国产惊悚片的类型特征与文化价值[J].电影新作,2020(2):10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Concept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about the Film *Mermaid*

YUE Fen

(School of Humanity,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22, China)

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issues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ilms in recent years, and Hong Kong film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leading the trend, will not be excluded from it. The *Mermaid*, released in 2016, is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films focusing on ecological issues. The reflection on ecological issues has increased the thickness of the film, making Chow's "Wulitou" from the superficial sensory level of "entertainment to death" to the deep social thinking. The prototype of "mermaid" selected in the film has rich ecological connot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beauty and fish symbolizes the best form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nature. The destruction of this form is undoubted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ow responded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facing mankind in a special way, and his film art began to shoulder greater ethic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Mermaid*; Stephen Chow;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concept

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研究： 以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

王庆生, 李欣

(天津商业大学 管理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随着国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幸福感指数亦随之上升。旅游是人们放松身心、探索未知、丰富自我的途径,也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博物馆旅游作为“文化+技术”完美融合的重要平台,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旅游业带来的社会福祉。文章以有“海上故宫”之称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文本数据,利用扎根理论工具,探索与分析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构成。研究发现,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包含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六个维度,并就此提出提升对策。文章对于实现人们美好生活愿景和促进博物馆旅游良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博物馆旅游;幸福感;维度;国家海洋博物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4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21-08

英国作家欧文说过“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由此得知对于人类来说,生活的美好意义通过幸福感得以体现。我国经济已经迈上高速发展之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从满足温饱转向实现自我的精神文化需求。旅游业使人们在领略自然风光、观瞻名胜古迹和丰富文化世界等活动中,获得舒适的感官体验和内心满足的心理体验,成为人们追求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1]。因此,打造幸福产业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愿景和使命。

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产品朝着丰富文化内涵方向提质升级,文化的涌入能够使得人们在游前充满期待、游中收获满满、游后回味无穷,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大量高科技走进旅游业,人工智能、VR、3D等技术使得旅游活动更加新奇、智慧和方便,人们更加推崇高科技所带来的极致享受。博物馆旅游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也是现代科技为人类带来福祉的重要体现。因此,文章以

有“海上故宫”之称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探索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有利于提高游客的幸福感,并推动博物馆旅游健康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博物馆旅游

文化产业的繁荣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与旅游融合能够延伸城市文脉、强化身份认同、构建新型关系,文化与旅游的强强联手能够充分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博物馆作为保护和展示人类宝贵文化的重要机构,拥有众多且独特的文化资源,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博物馆真实性、科学性、创造性和艺术性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兴旺,旅游业可以带动博物馆参观人数激增,二者相互融合、互利互惠。学界也随着博物馆旅游的逐步完善和壮大对其展开细致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博物馆旅游者行为的研究都比较丰富,集中于游客动机^[2]、满意度^[3]、期望^[4]、感知^[5]等方面,对旅游者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博物馆健康发展与提高游

收稿日期:2022-07-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研究”(71373174)

作者简介:王庆生(1963—),男,河南偃师人,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区域旅游发展研究。

客满意度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二) 幸福感

人们努力生活的意义就是不断追寻幸福,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幸福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心理学中,西方对幸福感的研究基于哲学的“享乐主义”理论和“实现主义”理论,形成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两个分支。Diener 等认为主观幸福感基于自身的快乐体验,需要考虑情感因素的作用,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三部分^[6]。Ryff 的心理幸福感理论是基于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角度,认为幸福感包括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性、对环境的掌控、生活目标和个人成长六个方面^[7]。

(三) 旅游者幸福感

基于心理学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8]、医学^[9]等众多领域对幸福感展开探索。旅游业是一个创造快乐与幸福的产业,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人们愈加重视旅游过程中的幸福体验,因此,幸福感同样适用于旅游行业,“旅游者幸福感”逐渐成为学者们探讨的话题。旅游者幸福感是指人体在旅游过程中,体能、智力、情感、精神达到某个特定水平而产生的美好感觉,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度认知。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研究中很多借鉴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利用 Diener 等人构建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去探究旅游过程中主观幸福感与游客互动^[10]、游客互动和体验价值^[11]、地方依恋^[12]、旅游动机^[13]、旅游品质感知^[14]等要素的关系、作用或者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采用“拿来主义”借鉴其他领域的幸福感不足以能够解释旅游过程中的全部现象,缺乏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界定与科学测量^[15]。就此,学者们开始摒弃心理学等领域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开始基于旅游学的系统理论,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准确把握和界定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探索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者幸福感构成模型。例如,张晓等利用自然主义哲学中的理论诠释了旅游者幸福感是由愉悦感、抽离感、临场感、获得感、满足感、能动感和仪式感七个维度构成^[16];妥艳娟等基于原型理论,认为旅游者幸福感是由积极情感、控制感、个人成长、成就体验、社会联结和沉浸体验六个维度构成^[15]。Smith 和 Diekmann 提出引发幸福感的“最佳”旅游形式包含快乐和享乐主义(玩得开心、休息放松)、有意义的经历(例如教育、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利他主义和可持续性(例如,对环境友好或有益于当地通信)三个维度^[17]。

张天问和吴明远认为追求幸福感是游客的动机,感受悠闲时光、获得福乐体验、提升积极情感、抵消负面情绪、感受社交的快乐进而提升人生境界,是旅游幸福感的重要内容构成^[18]。

还有部分学者探究具体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幸福感维度构成,例如,高杨等探究赴藏旅游者游前、游中和游后的幸福感时间动态变化和空间特征^[19];杜豪楠和李翠林以新疆康养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者旅游过程中体验的变化规律,探究幸福感维度特征^[20];Lyu 等提出邮轮旅游体验有三个维度,即情感体验、关系体验和思维体验,分别对旅游者幸福感产生不同时效和不同程度的影响^[21]。因此,旅游目的地管理者也意识到旅游者幸福感所蕴含的意义,并将其作为一项发展战略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福祉^[22]。

(四) 研究述评

学者们逐渐反思借鉴心理学的理论模型来研究旅游者幸福感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矛盾或者冲突。因此,部分学者的研究思路开始转向采用定性或者定量的研究方法,针对全部旅游者或者部分特定旅游情境下,探索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建模型,开发用于测量旅游者幸福感的科学有效的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撑。在博物馆旅游方面,虽然对旅游者行为研究较为深入与透彻,但是目前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内容还处于起步阶段,博物馆旅游是旅游者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因此文章探索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一方面,扩展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应用实践领域,开拓了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博物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游客的满意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地概况

国家海洋博物馆坐落在天津滨海新海洋中新生态城,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2.3 万平方米,共设 6 大展区和 15 个展厅,是中国首座国家级和公益性的海洋博物馆,中华民族千年蓝色文明的历史故事和海洋记忆在这里交相辉映;是集保护收藏、科普教育、学术研究和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展示机构,承载着宣扬中国海洋战略和价值观,推动中国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重任,其地位可与故宫博物院相媲美,被称为“海洋上的故宫”。

国家海洋博物馆始终秉持高展位、高质量、高要求和高水准的展馆设计理念,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构建,内部设有餐厅、电影院、咖啡厅和商

店等服务设施,同时借鉴了具有先进经验的国外诸多博物馆的多媒体、虚拟现实和模拟复原等技术,为游客展示了生命起源的摇篮、中国不可撼动的蓝色国土和包含万物的宇宙奥秘,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人类从陆地到海洋和海洋到宇宙的神圣故事。新时代赋予博物馆在保护发扬祖国文化的同时增进人民福祉的新使命,国家海洋博物馆正是新时代“文化+技术”的旅游体验平台,具备研究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课题的重要条件,因此文章选取国家海洋博物馆为案例地展开研究。

(二)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进行收集数据,理论抽样是研究者在收集过程中同时进行编码和分析,直到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理论达到饱和时停止抽样^[23]。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两部分。

一是网络文本,在四通八达的网络时代,旅游者更愿意在一次旅游活动后在相关媒体平台上发表自己本次旅游体验的看法,采取评论或者游记的方式将想法进行展现,以供其他旅游者进行参考和借鉴,网络文本通常具有真实度高、隐私性强、传播性快和获取简单便捷的特点,有利于质性研究二手数据的获得。加之国家海洋博物馆知名度较高,开业时间不长等特点,更容易获得游客的网络评价,因此从携程和大众点评两个知名网站进行搜索,剔除有打广告嫌疑、复制粘贴较多和不贴合研究内容的评论,共获取有效评论 512 条,共计约 12000 字,笔者对网络文本进行整理与编号,将取自携程的评论记录为 XC001, XC002,以此类推,将取自大众点评的文本记录为 DZ001, DZ002,同样类推完成编号工作。

二是访谈文本,访谈可以得到更加接近事实的结果,从旅游者角度探究幸福感维度构成,访谈文本是扎根理论研究重要的一手数据。访谈是在网络文本基础上,更加针对和深入地收集所需资料,考虑到访谈对象的认知程度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进行收集基础数据,在阅读相关文献和结合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列出以下提纲:(1) 旅游者认为博物馆旅游活动中是否会存在幸福感?(2) 如果存在幸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3) 旅游者在博物馆旅游感受到的幸福感与生活中和其他旅游活动中有什么区别?(4) 这种幸福感对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本研究以访谈提纲问题作为提示,适当进行追问以获得更加精确和有效的信息内容。本文作者在 2021 年 12 月进行实地访谈,访谈对象共 12 人,每人访谈时间 15—40 分钟不等,征得

访谈对象的同意后进行录音,全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文件转化成文字,共计约 15000 字。整理文本后笔者对访谈对象进行 M01、M02 等编号,访谈对象编号及基本信息详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受教育程度
M01	女	22	学生	本科
M02	男	34	法务人员	本科
M03	女	32	教师	本科
M04	男	33	销售人员	本科
M05	男	60	退休职工	初中
M06	女	63	退休职工	高中
M07	女	55	无	初中
M08	男	33	程序员	本科
M09	女	18	学生	本科
M10	男	55	职工	高中
M11	女	24	行政人员	本科
M12	女	26	学生	硕士

(三)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主张不预设假设,从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中进行提取概念、自下而上建构理论去解决某一问题或现象^[24]。文章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对收集的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数据分别进行选择式编码和轴心式编码独立分析,并将编码结果进行整合,最终确定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文章借助 NVivo 12 Plus 质性研究软件进行编码和分析。

三、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分析

(一) 网络文本分析过程

1. 开放式编码

扎根理论的初步分析是将原始文本进行梳理,逐字逐句编码从中提取相关概念,将复杂丰富的文本内容进行精简化和概念化,尽量以原始文字作为初始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进行归纳总结,合并同类项形成范畴。从此次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网络文本中共提取出“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增长知识和见识”等 57 个概念,归纳总结为 22 个范畴,分别是:开心愉悦、震撼难忘、放松心情、兴奋激动、增强爱国情感、积极思考、拓宽知识面、亲友相伴、加深感情、结识新朋友、免费参观、功能多样化、人文关怀、不虚此行、服务设施完备、基本需求、寓教于乐、亲子游、受益匪浅、身临其境、设施现代化、智慧化旅游。

2. 轴心式编码

初步分析所获得的范畴较为凌乱和分散,轴心式编码是寻找和发现范畴之间的逻辑和关联,将范畴之间的关系厘清并进行总结,在相关旅游者幸福感^[15,17]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开放式编码步骤得到的 22 个范畴进行整理和分析,共归纳出 6 个主范

畴,分别为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其中,“情感”主范畴包含开心愉悦、震撼难忘、放松心情和兴奋激动4个范畴;“个体成长”主范畴包含增强爱国情感、积极思考和拓宽知识面3个范畴;“社会联结”包含亲友相伴、加深感情和结识新朋友3个范畴;“满足感”包含免费参观、功能多样化、人文关怀、不虚此行、服务设施完备和基本需求6个范畴;“家庭教育”包含寓教于乐、亲子游、受益匪浅3个范畴;“沉浸式旅游”包含身临其境、设施现代化、智慧化旅游3个范畴。具体编码结果见表2。

表2 网络文本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概念
情感	开心愉悦	玩得开心;心情很好
	震撼难忘	看完很震撼;挺难忘的
	放松心情	感到很放松;感觉很舒缓
	兴奋激动	心情很激动;体验后有点兴奋
个体成长	增强爱国情感	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
	积极思考	增强保护海洋的意识;思考生命起源;想到海洋和宇宙的联系
	拓宽知识面	增长知识和见识;拓宽眼界
社会联结	亲友相伴	陪伴父母;和男朋友约会;和闺蜜一起来的;舅舅舅妈带着过来
	加深感情	沟通交流;了解对方
	结识新朋友	和其他游客相见甚欢;认识了别的小朋友
满足感	免费参观	门票免费;参观不收费
	功能多样化	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拍照打卡地
	人文关怀	服务到位;人性化
	不虚此行	值得推荐;名气很大;重游;新鲜好奇得到满足
	服务设施完备	餐厅饮食满意;场所齐全;停车方便;设备齐全
	基本需求	场馆面积大;环境优美;馆藏丰富;馆内安静
家庭教育	寓教于乐	研学活动;孩子学到知识
	亲子游	带娃好去处;带孩子滑雪
	受益匪浅	带孩子来这里觉得意义非凡;孩子回去主动写作文
沉浸式旅游	身临其境	穿梭海洋;标本栩栩如生;感觉自己深入其境
	设施现代化	体验项目众多;3D电影;现代化高科技设施;互动性强
	智慧化旅游	网上预约门票;智慧导览

(二) 访谈文本分析过程

访谈对象共12人,男性5人占比42%,女性7人占比58%;年龄30岁以下4人占比33%,30岁以上的有8人占比67%,其中经过调查,此次访谈对象中的年轻夫妇和中老年群体,多数以陪伴孩子为由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孩子得到收获,家长会感到幸福;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67%,博物馆旅游对学历较高的人群具有较强吸引力,大多数人自驾前往。

1. 开放式编码

访谈文本与网络文本采用相同的扎根理论操作程序,开启新一轮逐字逐句编码工作。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所列提纲获得的访谈文本更具针对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经过编码和分析共获得63个概念和24个范畴,其中访谈文本与网络文本的分析结果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但也存在不同。经过对比发现,访谈文本比网络文本增加了一个“安全保障”和“特色活动”的范畴,其中每个范畴所包含的概念也有些区别,例如,“功能多样化”范畴里增加了“红色记忆”概念,“寓教于乐”范畴内增加了“锻炼孩子动手能力”概念,增加的“安全性强”和“孩子不会跑丢”两个概念形成新的范畴“安全保障”,“云端集体婚礼”与“特殊活动”形成“特色活动”新范畴。

2. 轴心式编码

以上研究获得24个范畴,寻找这些范畴之间的关联,最终获得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六个主范畴,经过对比发现与网络文本轴心式编码所获得的主范畴一致。其中,“安全保障”和“特色活动”都是游客开展博物馆旅游的动机,并且如果因此实现就会拥有满足感,据此,将这两个范畴归纳到“满足感”这一主范畴内。具体编码结果见表3。

3. 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构成

本研究通过对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对两部分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整合与分析,得到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维度的构成,其中包括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六个维度。

(1) 情感

情感是旅游者在一次博物馆旅游活动中的情绪体验,情感将伴随完整的一次旅游活动,影响着旅游体验的各个阶段,并且在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都有所波动^[18]。旅游业幸福感研究中基于享乐主义,将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后有学者认为忽视了负面情绪的作用,并提出旅游研究人员应该避免将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25],例如游客在进行黑色旅游活动时的情感体验必然是悲痛、难过和震撼等消极情绪,但这次旅游活动过后会带给游客不忘历史、珍惜现在和感慨生活美好的积极情感体验;蹦极和跳伞等刺激性旅游活动,在体验过程中可能内心充满恐惧、紧张和害怕,但游后便是一种挑战自我的兴奋和激动情绪^[26],因此有些旅游活动的确是负面情绪占主导地位,但也能给旅游者带来积极的内心

体验,从而令其感受到幸福感。

表3 访谈文本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概念
情感	开心愉悦	玩得开心;心情很好
	震撼难忘	看完很震撼;挺难忘的
	放松心情	感到很放松;感觉很舒缓
	兴奋激动	心情很激动;体验后有点兴奋
个体成长	增强爱国情感	感受海洋文明;彰显大国风范
	积极思考	增强保护海洋的意识;思考生命起源;想到海洋和宇宙的联系
	拓宽知识面	增长知识和见识;拓宽眼界
社会联结	亲友相伴	陪伴父母;和男朋友约会;和闺蜜一起来的;舅舅舅妈带着过来
	加深感情	沟通交流;了解对方
	结识新朋友	和其他游客相见甚欢;认识了别的小朋友
满足感	免费参观	门票免费;参观不收费
	功能多样化	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拍照打卡地;红色记忆
	人文关怀	服务到位;人性化
	不虚此行	值得推荐;名气很大;重游;新鲜好奇得到满足
	服务设施完备	餐厅饮食满意;场所齐全;停车方便;设备齐全
	基本需求	场馆面积大;环境优美;馆藏丰富;馆内安静
	安全保障	安全性强;孩子不会跑丢
	特色活动	云端集体婚礼;特殊活动
家庭教育	寓教于乐	研学活动;孩子学到知识;锻炼孩子动手能力
	亲子游	带娃好去处;带孩子滑雪
	受益匪浅	带孩子来这里觉得意义非凡;孩子回去主动写作文
沉浸式旅游	身临其境	穿梭海洋;标本栩栩如生;感觉自己深入其境
	设施现代化	体验项目众多;3D电影;现代化高科技设施;互动性强
	智慧化旅游	网上预约门票;智慧导览

本研究不论是网络评论还是访谈对象,都认为本次博物馆旅游令自己开心、愉悦,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让自己感到放松,看到栩栩如生的标本表示兴奋和激动,也有的游客表示“在看到浩瀚的宇宙与广阔无边的大海时,感觉到人类的渺小,很震撼”(XC231),“在海洋灾害馆内,体验了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很逼真,感到有些害怕,人类一定要提高保护环境意识”(XC105),由此可见,博物馆旅游者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当下的放松和快乐,还能够感受一些非积极情绪带来的超出预期的一些收获,也就是博物馆旅游为游客的福祉所作的贡献,因此本研究认为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包括“情感”维度。

(2) 个体成长

个体成长是在博物馆旅游过程中增长知识、拓宽眼界、增强身份认同,达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体验,这是旅游活动给个人带来的有意义、充实并令

人感到幸福的感觉。基于实现主义幸福观所发展而来的心理幸福感认为旅游所带来的幸福感是自我实现,能力提升和人格展现的幸福^[7]。文化旅游、红色旅游、贫民窟旅游、黑色旅游和探险旅游等旅游产品的出现,本身的功能也不是单纯的“享乐”,核心功能是为旅游者提供更高层次、更富内涵、更具效益的体验^[27]。让人感受到这是一场充实、有价值、能够感受到生命意义的一次旅游,同样也和上文研究中“旅游活动中消极情感也能带来积极影响,使旅行充满意义”相呼应。

博物馆旅游是文化旅游中最直接和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所以这种“个体成长”的幸福感会更加显而易见。关于国家海洋博物馆游客的调查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此次旅游收获颇丰,增长了知识和见识,能够拓宽眼界,同时也能在气势磅礴的展馆氛围内感受到我国海洋历史的源远流长和蓝色文明的发展历程,提高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为生在中国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同时也会积极展开思考,提升自己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和主动性。由此可见,博物馆旅游给人们的幸福是深远的,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扎根于内心深处,拨动人心弦并持续不断地泛起涟漪,个体得到成长的同时,国民的整体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了一个高度。

(3) 社会联结

社会联结是旅游者在博物馆旅游过程中和其他人产生的互动或者形成的人际关系。人在外旅行时,必然会存在与人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或是与身边一起游玩的亲友,或是在同一个旅游目的地一见如故的“驴友”,或是恰巧都对某些景观某些事物感兴趣而结识的新朋友,又或是独自一人旅行时,遇到困难和工作人员进行交谈。总体而言,一次完整的旅行会有人际交往事件的出现,现有研究表明,人际交往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人的情绪并对人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此,旅游过程中产生愉快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样也是游客感受到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发发现博物馆旅游者大多数不是独自一人,与家人、男朋友、同学等一同前往的人数居多,并表示亲友陪伴的旅游活动中,通过交流与沟通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巩固感情,也会起到孝顺父母、教育孩子、消解误会等正向影响。有的游客表示“我和我朋友很久没见了,决定来网上比较火的网红博物馆转一转,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M11);“刚才在餐厅也遇到一对和我们年

龄相仿的夫妇,他们也带着孩子不止来了一次,我们就在一起交流了孩子教育的问题”(M03)。诸如此类,亲友相伴、巩固感情或者结识新朋友,都能够让游客对彼此的人际交往感到满意,并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幸福感的体验。

(4) 满足感

满足感是游客对一次完整的博物馆旅游活动各方面感到满足的一种状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对于旅游者来说,开展一次旅游活动的动机和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幸福感这类高层次的需求才能够产生^[28]。

调查发现游客认为国家海洋博物馆展馆面积大、馆藏丰富、环境优美、氛围安静等,这是针对博物馆建设而言的旅游者基本需求;“服务实施完备”,博物馆内有餐厅、咖啡厅、电影院等场所,饮水机、卫生间、导览设施和展示讲解等设备齐全,停车方便等都是令游客感到满意的要素;“人文关怀”是当下旅游业一直宣传的“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实施,人性化和服务到位能够给游客宾至如归的感觉,调查中很多游客对馆内工作人员的服务感到满意,但也有游客提出质疑“现下疫情防控严格是好事,但我们带着孩子和老人在外面因为扫很多码,手忙脚乱地在外边冻了很久才进来”(M02),这位游客表示希望今后能够获得主动有效的帮助;“免费参观”使得游客的抱怨大大减少,没有门票虽然不代表没有消费,但是从心理上大大提高了游客的满足感;“安全保障”是游客认为馆内监控数量多,孩子跑不出去,孩子走失也有广播进行播报,这让带着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安心;“功能多样化”是博物馆跟上时代的脚步加快转变职能的最重要表现,除了最初保护收藏、科普教育等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外,增加了休闲娱乐、拍照打卡等功能,这是博物馆和旅游密切结合、互融共通的体现。

很多游客表示对此感到满意并愿意推荐给亲友,网络文本表现出很多游客有重游意愿,访谈对象中很多则已经不是第一次游玩,很多带着孩子的游客表示这是第五次参观,网络评论与访谈的差异在于网络评论的目的是分享第一次游玩的心情和攻略,也是给其他游客提供参考,因此很多游客是在首次来访后留下的评论,之后是否重游无从得知,但访谈对象的回答是真切的来访次数,这一点毋庸置疑。总而言之,游客有“不虚此行”的满足感,是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重要奠基。

(5)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对孩子展开教育活动,从而达到在旅游中使孩子受益匪浅的效果,这是博物馆旅游幸福感构成的明显特征。博物馆是服务于大众具有教育职能的公共机构,为公众提供了解文化和学习知识的平台,博物馆旅游对青少年来讲更是一种教育友好型和创新型的方式。不同于学校统一教育的系统体系,家庭教育是从一个孩子出生就贯穿于其整个生活乃至整个人生的教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博物馆旅游可以提供区别于口头传授的教学方式,对于抽象认知思维还不够健全的青少年来说,这种有实物、有叙事、有想象、有体验的方式获得的信息更加立体和深刻。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国家海洋博物馆来访游客中,父母、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等带着孩子的人群占多数,很多游客表示国家海洋博物馆是亲子游好去处,孩子来这里游玩的主动性很强,通过观看标本和展品提高孩子的识记能力,互动项目众多提高孩子动手能力,最新开业的滑雪项目可以提高孩子运动能力,强身健体。有游客表示“孩子回去很开心,还写了一篇保护海洋生物的小作文给我们看”(DZ013);“我孙子在家很喜欢看大百科,到了这里还跟我讲这是什么生物,回家后还特别兴奋地跟他奶奶讲在博物馆都看到了什么,越来越聪明了”(M05)。提起孩子时的游客都侃侃而谈,在他们开心且自豪的话语中不难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确实能够提高能力、开阔眼界、加强沟通,孩子受益匪浅的同时,家人的欣慰与自豪也是油然而生。因此,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家人来说,在娱乐之余还能促进家庭教育,期望以外的收获是这次旅游令人感到幸福的源泉。

(6) 沉浸式旅游

沉浸式旅游是博物馆通过数字化等新科技打造虚拟现实的视听效果,令游客拥有沉浸其中身临其境的美好体验。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人们对旅游产品提出更高要求,旅游业的竞争愈发激烈,而有了新科技的加持,博物馆利用全息、投影、虚拟等技术,成功从平面展示的普通平台升级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示的新型展览综合体,技术手段与文化产品的完美结合是博物馆旅游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消费主力市场是青年人市场,该庞大的人群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艺术欣赏要求更高,因此沉浸式旅游是该群体最受欢迎的服务形式^[29]。同时,通过创新理念提质升级也是博物馆吸引消费市场主力的有效手段,是让

大众深刻体会到科技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为现代人带来福祉的重要推动力。

国家海洋博物馆秉持着以实物展出的传统展示理念,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模拟复原、交互影响、穹顶巨幕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通过展品陈列、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三种方式实现了观众与海洋记忆、真实与想象、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多重对话^[30]。调查发现,游客认为现代化的设施设备能够带来穿梭海洋、身临其境的美妙体验,智慧化旅游带来了便捷和愉悦感,游客不再是站在冰冷的文物面前,而是沉浸式地参与其中,聆听远古海洋走向现在、浩瀚宇宙向我们走来的动听故事,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为来访游客提供了一场直观、真实、强烈的视觉盛宴,深刻感受与体会到海洋与宇宙的魅力。

四、提升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的对策

(一)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博物馆和旅游业都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机构,因此博物馆旅游若想成就令人满意的旅游产品,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建设和服务理念,作为博物馆首先要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在建设时要考虑到场馆的氛围、面积、藏品丰富度、设施设备齐全和文化协调等多种因素。其次,博物馆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必需要素例如餐厅、停车场、卫生间、休息场所等也应俱全,这是令游客感到满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后,人文关怀必不可少,服务到位和主动提供帮助能够获得游客的好感,产生宾至如归和不虚此行的感觉,提高游客的重游率。

(二) 加强文化与技术融合渗透

静止的文物和标本展示相对而言比较枯燥,但与现代的高科技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做到“文化遗产活起来”,展品不再是冰冷、缺乏感情面对观众,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与游客互动起来,在这种叙事的氛围内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输出,身临其境、穿梭历史的视觉效果使得游客在愉悦的氛围内获得知识增长,引发人的主动思考,彰显文化自信。同时,众多博物馆免门票的措施使得经费一度紧张,而沉浸式旅游项目的开展是很多民办博物馆创收的重要途径,智慧化旅游能够令游客感受到技术带给现代化旅游的福祉。

(三) 推动多种职能高效发挥作用

博物馆和旅游融合后职能增加,每一项职能都有其相应的游客需求群,国家海洋博物馆做到了将各项职能高效利用,使得各种需求的游客都能得到满意,作为教育科普的场所,这里是最适合亲子游和

研学游的基地,寓教于乐的方式能够令青少年受益匪浅,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家庭和谐;体验项目数量多让人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环境优美,加之新媒体平台的宣传营销,引来大批人拍照打卡;红色记忆馆让人回首峥嵘岁月,感恩先辈热爱祖国……博物馆作为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应是长盛不衰的旅游目的地,多种职能的高效发挥能使博物馆在一众旅游地中脱颖而出。

五、结论

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宗旨是确保游客能够获得旅游幸福感,博物馆作为文化旅游地,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很多旅游地所不能比拟的。文章以国家海洋博物馆作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出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六个维度,分别为:情感、个体成长、社会联结、满足感、家庭教育和沉浸式旅游,这六个维度下分别由不同的范畴构成,并就此提出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提升对策。了解博物馆旅游者幸福感构成对博物馆旅游产品提质升级、提高自身吸引力、推动文化输出和提高旅游者福祉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梁学成. 旅游产业增进社会福祉的逻辑诠释[J]. 旅游学刊, 2019, 34(7): 3-4.
- [2] 张瑛, 范应梅, 李文龙. 大学生民族博物馆旅游动机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4(2): 97-104.
- [3] Kirilenko A P, Stepchenkova S O, X Dai. Automated topic modeling of tourist reviews: Does the Anna Karenina principle appl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3: 1-13.
- [4] Julia H. Museums and touristic expectation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1): 23-40.
- [5] 张春香. 基于因子分析的屯垦博物馆游客感知评价体系研究:以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3): 433-438.
- [6]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 J. Pers Assess, 1985, 49(1): 71-75.
- [7] Ryff C D.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6): 1069-1081.
- [8] 刘继兵, 田韦仑.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居民幸福[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10): 130-138.
- [9] 韩娟, 马佳佳, 陈东莉, 等. 相对剥夺感在ICU护士资质过剩感与工作幸福感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护理学杂志, 2021, 36(20): 68-72.
- [10] 陈晔, 张辉, 董蒙露. 同行者关乎己? 游客间互动对主

- 观幸福感的影晌[J]. 旅游学刊, 2017, 32(8): 14-24.
- [11] 马鹏, 张威. 游客互动、体验价值、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一个民宿旅居者视角的实证检验[J]. 消费经济, 2017, 33(5): 83-90.
- [12] 王舒媛, 白凯. 西安回坊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与幸福感[J]. 旅游学刊, 2017, 32(10): 12-27.
- [13] 王华, 马志新. 川藏线骑行者旅游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旅游满意度的中介作用[J]. 旅游科学, 2020, 34(6): 53-65.
- [14] 杨金华, 章锦河, 储光. 新冠疫情下旅游品质感知与幸福感增强逻辑: 基于衡阳居民本地出游的调查及主体间性自省[J]. 人文地理, 2021, 36(3): 167-174.
- [15] 妥艳娟, 白长虹, 王琳. 旅游者幸福感: 概念化及其量表开发[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6): 166-178.
- [16] 张晓, 刘明, 白长虹. 自然主义视角下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5): 37-51.
- [17] Smith M K, Diekmann A. Tourism and wellbe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6(Sept.): 1-13.
- [18] 张天问, 吴明远.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 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51-60.
- [19] 高杨, 白凯, 马耀峰. 赴藏旅游者幸福感的时空结构与特征[J]. 旅游科学, 2019, 33(5): 45-61.
- [20] 杜豪楠, 李翠林. 网络视角下新疆康养旅游幸福感维度特征: 基于扎根理论[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36(7): 27-34.
- [21] Lyu J, Mao Z, Hu L. Cruise experie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of Chinese touri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20(2): 1-11.
- [22] Pyke S, Hartwell H, Blake A, et al. Exploring well-being as a tourism product resour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5: 94-105.
- [23] 陈钢华, 李萌, 相沂晓. 你的目的地浪漫吗: 对游客感知视角下目的地浪漫属性的探索性研究[J]. 旅游学刊, 2019, 34(12): 61-74.
- [24] 吕宁, 韩霄, 赵亚茹. 旅游中小企业经营者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扎根研究[J]. 旅游学刊, 2021, 36(3): 57-69.
- [25] Prayag G, Hosany S, Muskat B,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perceived overall image,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 to recommend[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5, 56(1): 41-54.
- [26] Knobloch U, Robertson K, Aitken R. Experience, emotion, and eudaimonia: A consideration of tourist experiences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56(5): 651-662.
- [27] 张晓, 白长虹. 快乐抑或实现?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转向: 基于国外幸福感研究的述评[J]. 旅游学刊, 2018, 33(9): 132-144.
- [28] 邱泽南. 基于扎根理论的主题乐园旅游者幸福感构成要素研究[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29] 邹驾云. “沉浸式”体验助力文旅消费提质升级[J]. 人民论坛, 2020(15): 84-85.
- [30] 宋厚鹏. 海洋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承: 国家海洋博物馆文化展示的视觉逻辑[J]. 东南文化, 2021(2): 146-15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Study on the Dimension of Museum Tourists' Happiness: Taking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China as an Example

WANG Qingsheng, LI Xin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life quality, the happiness index also increased. Tourism is a way of relaxing, exploring the unknown, and enriching people's liv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people's pursuit of happiness.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culture + technology", museum tourism can allow more people to enjoy the social well-being brought by tourism. Taking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known as the "Forbidden City at S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grounded theoretical tool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museum tourists' well-being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nline text data. It is found that museum tourists' happiness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emotion, individual growth, social connection, satisfaction, family education and immersive tourism.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he artic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alizing people's vision of a better lif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useum tourism.

Key words: museum tourism; happiness; dimension;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China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李国谨

(郑州商学院 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为了探究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结合城镇化发展阶段和引入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来构建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2016—2021年两系统的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来看,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在2020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从低度协调耦合升级为高度协调耦合,但距离极度协调耦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强化。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国家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5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29-06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文件中。2010年第一次确立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5个国家中心城市,2016至2018年第二次确立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4个国家中心城市,截至目前,共有9个国家中心城市。在中国城镇体系规划设置中,国家中心城市是最高层级,即“塔尖城市”,具有定位层级高,综合服务能力强,城市规模大,资源集聚度高,城市知名度高,发展潜力大,经济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等特征^[1],对于推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引领城市群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健康发展^[2]具有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发展以人为核心、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发展为基础,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而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更是肩负着带领整个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

郑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于2017年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塔尖城市”,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其龙头带动作用,引领区域协同融合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具有全局性意义。基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评价体系,有效测评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关于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围绕内涵、特征、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等方面,研究层面多以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为主,而单个城市方面研究的比较少。石玉(2019)依据第二届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层论坛参会专家的观点从推动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都市圈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3个方面对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2]。赵弘和刘宪杰

收稿日期:2022-07-23

作者简介:李国谨(1990—),女,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商学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旅游发展。

(2020)通过分析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用可持续城市理念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见^[1]。宫汝娜和张涛(2021)界定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度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3]。朱佳、张萌物、王津津(2019)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2017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4]。章蓓蓓和彭晓曼(2021)运用熵值法对国家中心城市与超大城市进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5]。

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由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构建多种协调关系的数量模型,引入多学科,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实证测度评价。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区域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而以国家中心城市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韩冬(2021)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动态测度2012—2018年九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空间格局演进^[6]。

基于此,本研究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收集整理2016—2021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状况,为其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引领作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可循环样本。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2021年为研究时段,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郑州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环境公报等政府部门统计数据。为确保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于缺失的少量年度数据,采用插值法和相邻年份均值法进行补充。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遵循指标选取的客观性、科学性等原则,从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地反映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城市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新时期的要求下,致力于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发展,切实影响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结合城镇化发展阶段,其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由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3个维度共13个具体指标组成。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了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压力”表示制约生态环境的因素,“状态”表示在压力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呈现出来的结构和表现,“响应”表示人类采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由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和生态环境响应3个维度共8个具体指标组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高质量发展系统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0.0477	
		人口密度/(人/km ²)	正向	0.0807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向	0.0407	
	经济城镇化	人均GDP(元)	正向	0.0281	
		GDP增速(%)	正向	0.0361	
		第三产业占比(%)	正向	0.0266	
		社会城镇化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0.0287
	生态环境系统	生态环境压力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 ²)	正向	0.0345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正向	0.0495
			人均教育支出(元)	正向	0.0313
		生态环境状态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正向	0.032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负向	0.0919
			失业率(%)	负向	0.0271
生态环境响应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负向	0.0288	
		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负向	0.0342	
	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负向	0.0207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 ²)	正向	0.020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452	
生态环境响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0.1957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0.070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正向	0.0282	

(三)综合指数模型

1. 指标标准化

由于21个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尽相同,会影响最终结果,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和评价结果的有效性,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因此本文运用极值法对21个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S_{ij} = \frac{Y_{ij} - \min(Y_{ij})}{\max(Y_{ij}) - \min(Y_{ij})} \quad (1)$$

负向指标:

$$S_{ij} = \frac{\max(Y_{ij}) - Y_{ij}}{\max(Y_{ij}) - \min(Y_{ij})} \quad (2)$$

式中: Y_{ij} 、 S_{ij} 表示第*i*系统中第*j*项指标的初始数值和标准化数值,且 $1 \leq i \leq m, 1 \leq j \leq n, \max(Y_{ij})$ 、 $\min(Y_{ij})$ 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能够真实反映评价对象,保证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运用一种客观赋值法——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所示,计算过程如下:

(1)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系统在该指标中特征比重 p_{ij}

$$p_{ij} = S_{ij} / \sum_{i=1}^m S_{ij} \quad (3)$$

(2)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U_j

$$U_j = -\frac{1}{\ln m}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4)$$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W_j

$$W_j = \frac{1 - u_j}{\sum_{j=1}^n (1 - U_j)} \quad (5)$$

3. 综合评价指数

通过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分别用 $f(o)$ 、 $f(v)$ 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f(o) = \sum_{j=1}^n (S_{ij} \cdot W_j)$$

$$f(v) = \sum_{j=1}^n (S_{ij} \cdot W_j) \quad (6)$$

(四)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有效地反映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和动态变化过程。计算公式如下:

$$E = \left\{ \frac{f(o) \cdot f(v)}{[f(o) + f(v)]^2} \right\}^k \quad (7)$$

$$T = \alpha f(o) + \beta f(v) \quad Q = \sqrt{E \cdot T} \quad (8)$$

式中, K 为调节系数,本文研究分析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所以 K 取值为 2, E 代表耦合度,且 $0 \leq E \leq 1$ 。 T 为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α 、 β 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 $\alpha = \beta = 0.5$ 。 Q 表示耦合协调度,且 $0 \leq Q \leq 1$, Q 值与两系统的协调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Q 值越大越接近 1,说明两系统的协调度越高。参考相关的文献,对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类型进行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耦合度(E 值)	类型	耦合协调度(Q 值)	类型	特征
$0 < E \leq 0.3$	微度耦合	$0 < Q \leq 0.4$	I 级低度协调耦合	$f(o) > f(v)$ 表示生态环境系统滞后
$0.3 < E \leq 0.5$	轻度耦合	$0.4 < Q \leq 0.6$	II 级中度协调耦合	$f(o) = f(v)$ 表示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同步
$0.5 < E \leq 0.8$	中度耦合	$0.6 < Q \leq 0.8$	III 级高度协调耦合	$f(o) < f(v)$ 表示高质量发展系统滞后
$0.8 < E \leq 1$	高度耦合	$0.8 < Q \leq 1$	IV 级极度协调耦合	

二、结果分析

(一)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1)~(5),对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的 21 个指标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1 所示。

基于权重结果,根据公式(6)计算得出 2016—2021 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f(o)$,同时还测算了人口、经济和社会 3 个维度的发展指数,以便具体分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见表 3 和图 1 所示。

表 3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指数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人口	0.0574	0.0873	0.1073	0.1484	0.0946	0.1592
经济	0.0361	0.0716	0.1060	0.1359	0.0858	0.1439
社会	0.0532	0.1169	0.1417	0.1925	0.1414	0.2021
高质量发展	0.1467	0.2758	0.3550	0.4768	0.3218	0.5052

如表 3 所示,整体上来看,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自 2017 年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以来实现快速增长,由 2016 年的 0.1467 上升为 2021 年的 0.5052,增加了 0.3585。但在 2020 年

出现大幅度下降,由 2019 年的 0.4768 下降为 2020 年的 0.3218,这是由于在 2020 年全球范围内暴发新冠疫情,导致各行各业停产停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阶段,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也随之降低。2021 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疫情控制局面整体良好,郑州虽仍有散发疫情扰动,但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韧性,各行各业开始全面复苏,高质量发展指数出现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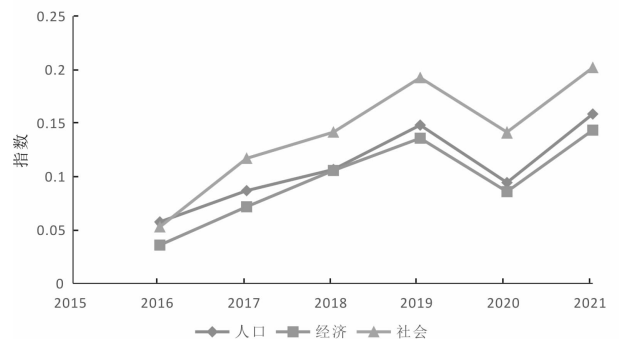


图 1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内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如图 1 所示,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果来看,2016—2021 年人口、经济和社会指数整体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 2020 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3 个维度的指数均出现下降,且在 2021 年恢复增长。人口指数主要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程度以及实现就业的状况,在疫情防控期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面临困境,部分线下门店破产倒闭,旅游业出现断崖式下滑,从而导致 2020 年人口指数出现下降。经济指数主要反映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2020 年 GDP 增速只有 3%,同 2019 年增速相比,下降了 3.5%,人均 GDP 也只有 96134 元,最终造成经济指数出现下降。社会指数反映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收入与支出的协调情况,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失业率增加,人均教育支出、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拥有床位数等社会保障投入减少,从而影响社会指数随之下降,在 2021 年经济有力复苏,3 个维度的指数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整体而言,社会指数 > 人口指数 > 经济指数,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

根据公式(6)计算得出 2016—2021 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的指数 $f(v)$,同时测算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 3 个维度的具体发展指数,以便具体分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的发展,见表 4 和图 2 所示。

表 4 生态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指数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压力	0.0645	0.1005	0.1245	0.1431	0.0902	0.1338
状态	0.0902	0.1304	0.1545	0.2094	0.2107	0.2419
响应	0.0201	0.0401	0.0647	0.1035	0.1104	0.1499
生态环境发展	0.1748	0.2710	0.3437	0.4560	0.4113	0.5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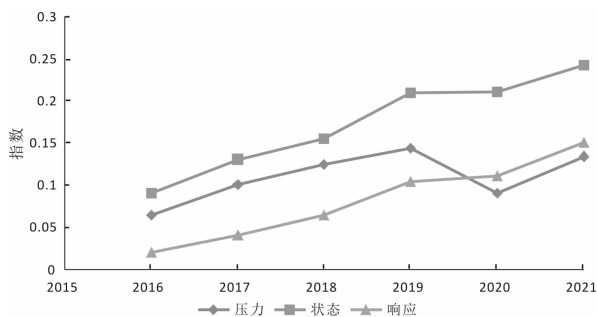


图 2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从表 4 可以看出,郑州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从 2016 年的 0.1748 增长到 2021 年的 0.5256,增加了 0.3508,同时受疫情的影响,在 2020 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并且在 2021 年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持续回升。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果来看,2016—2021 年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整体处于不断

上升的趋势,只在 2020 年 3 个维度的指数出现波动。压力指数 3 个指标均为负向指标,反映经济发展面临生态环境的压力,综合评分越高代表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越大,该指数在 2020 年经济陷入停滞,各行业停产停工,工业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量大幅度减少,从而出现大幅度下降情况。状态指数反映生态环境的结构和资源的人均状态,该指数整体变化幅度不大,在 2020 年有了小幅度的提升。响应指数反映居民对宜居环境的需求和成效,该指标整体保持持续上升态势,在 2020 年疫情时期也保持小幅度增长,表明郑州更加注重建设宜居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营造美好家园。总体而言,状态指数 > 压力指数 > 响应指数,且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总体还不高,说明未来生态环境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7)~(8),计算得出 2016—2021 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指数,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变动情况,见表 5 和图 3 所示。

表 5 郑州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

年份 指数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耦合度	0.9847	0.9998	0.9995	0.9990	0.9705	0.9992
耦合协调度	0.3979	0.5229	0.5909	0.6826	0.5964	0.7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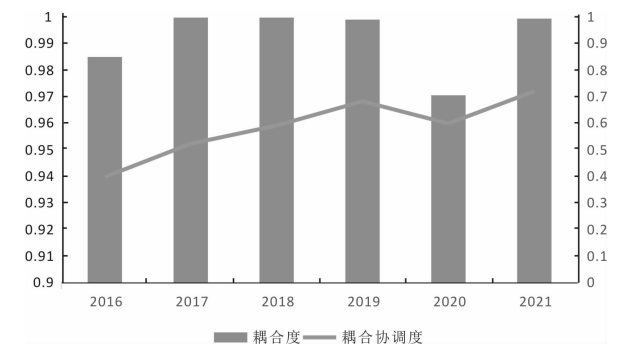


图 3 郑州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

从表 5 可以看出,2016—2021 年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耦合度在 0.9705—0.9998 之间,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表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相互作用力较大,具有较强影响的协同效应,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耦合协调度方面,整体上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从 2016 年的 0.3979 上升到 2021 年的 0.7176,增长了 0.3197,耦合协调度类型由 I 级低度协调耦合升级为 III 级高度协调耦合,上升了 2 个等级。2016 年两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小于 0.4,属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发展特征为生态环境指数大于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低协调—高质量发展滞后型。2017—2019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 0.4—0.8 之间,类型由Ⅱ级中度协调耦合发展为Ⅲ级高度协调耦合,这一时期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充分抢抓战略机遇,全面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速度及潜力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指数快速增长,而生态环境的发展落后于高质量发展,是生态环境滞后型。2020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降为Ⅱ级中度协调耦合,这一时期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经济陷入停滞阶段,高质量发展指数降低,而生态环境指数上升,是中协调—高质量发展滞后型。2021年耦合协调度指数达到 0.7 以上,属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发展特征为生态环境指数大于高质量发展指数,这一时期郑州虽然偶有疫情发生,但是我国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局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经济恢复持续增长,从而高质量发展指数逐渐稳步上升。

三、政策建议

虽然目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但距离达到极度协调耦合阶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为促进两系统协调水平的全面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产业质量提升,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郑州应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产业的优势和基础以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农产品食品药品、高新技术、文旅、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进行质量提升行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加强先进制造业质量提升,培育一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5G 平台,发展新能源、汽车、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着重建设产业基地,提升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加强高新技术产业质量提升,建设创新平台,实现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重点项目的技术突破;加强现代服务业质量提升,加快建设物流枢纽和物流基地;加强文化旅游质量提升,发展线上线下旅游服务;加强农产品食品药品质量提升,建设高标准生产示范基地和现代化牧场。

(2)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泉和动力。立足技术基础,聚焦重点领域、重

点产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创新研发机构,提升内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在企业方面,树立营造创新研发氛围,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建设双创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具有技术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在人才方面,引进高端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以及高水平创新团队,弥补高端人才不足短板,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制约的现象,自己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另外,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国内外高端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建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分支机构以及引进国际一流研究型学院,推进郑州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或科教中心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实现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3)建立区域生态经济体系,厚植国家中心城市生态底色^[1]。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要重视保护环境,强化环保政策,坚守生态红线和底线,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打造健康舒适的中原绿城,增强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设一批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依托高新技术,发展绿色农业、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绿色崛起”。对传统的产业,要严格监督和控制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的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提高工业废弃物利用率,降低消耗,实现污染物的循环利用。提高环境标准,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社会经济的高质量水平。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持续绿化和美化城市环境,打造美丽街区,推进建设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有效应对突发的洪水、疫情等灾害,提高城市抗风险的能力,创建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四、结论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 2016—2021 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态势,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整体上来看,郑州高质量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自 2017 年郑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以来实现了较快增长,但随着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经济陷入停滞阶段,从而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出现下跌,在 2021 年新冠疫情出现常态化的情况下,经济回归潜在增长轨道,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从分维度来看,人口、经济和社会指数整体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 2020—2021 年随着疫情的状况出现波动。

(2)郑州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增长趋

势,在2020年疫情期间呈现小幅度下降,并且在2021年发展指数持续回升。从分维度发展指数结果来看,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整体也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20年经济陷入停滞,各行业停产停工的情况下,压力指数出现下降,但状态和响应指数处于缓慢增长阶段。

(3)从总体上看,2016—2021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两系统的耦合度在0.9以上,属于高度耦合阶段,表明两者之间协同效应较强,保持有序的互动关系。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从低度协调耦合升级为高度协调耦合,总体可以达到0.7以上,但也存在着高质量发展滞后型、环境优势不明显等问题,距离达到极度协调耦合阶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两系统协调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 [1]赵弘,刘宪杰.以可持续城市理念推动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0(5):76-84.
- [2]石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层论坛综述[J].区域经济评论,2019(5):154-156.
- [3]官汝娜,张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测度研究: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105-110.
- [4]朱佳,张萌物,王津津.国家级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9(12):6-11.
- [5]章蓓蓓,彭晓曼.基于熵值法和TOPSIS法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分析[J].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21,35(5):42-48.
- [6]韩冬.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演进研究[J].生态经济,2021,37(6):158-16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LI Guojin

(Zhengzhou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s national central 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sure - state - response (PSR) model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systems from 2016 to 2021.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on the whole show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but they will dropped significantly in 2020;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shows a steady upward trend, from a low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o a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high - quality coordinated coupling, and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strengthen it.

Key word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目标及路径

阎建合

(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新时代、新审计、新作为。结合审计工作实践,在科学界定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内容的基础上,剖析了审计监督的总目标和分层目标。审计监督要坚持跳出经济讲经济、跳出审计讲审计、跳出监督讲监督的基本原则,可以采用内部控制环节法、梳理审计事项法、问题清单列举法和党纪衡量法等有效方法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同时,从注重建议的建设性、注重整改的实效性、注重监督的融合性和注重惩戒的严肃性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确保审计监督取得实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权力运行;审计;监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6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35-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1];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只要有公权力存在,就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使各项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工作者立足审计监督首先是经济监督、聚焦主责主业、心怀“国之大者”,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进常态化“经济体检”,充分发挥了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审计监督已逐步成为国家公权力运行监督中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的专业职能力量,并与其他监督系统统筹协调,贯通衔接,整体推进,相得益彰,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在权力运行中的综合效应,笔者从审计监督内容、目标、着力点、原则、方法、途径等视角深入思考,积极探索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的新路径。

一、科学界定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内容

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内容既包括权力运行自身的内容,又包括权力运行所涉领域的内容,还包括权力运行的成效内容。在具体的审计监督中,三个方

面的内容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关系。

1. 对权力运行自身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事后监督,是依托于审计结论而延伸出来的、有关规范权力运行的建设性监督建议,应重点做到“五个关注”:关注权力行使部门的权力配置,分事设权行权,分级授权;关注行使权力的方式、步骤、程序、时限;关注权力运行中的关键人、关键处、关键时、关键事;关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决策、执行、监督;关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发现问题机制,精准纠偏矫正机制,从而达到规范权力运行的目的。所以,王寿林指出,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必须划清权力界限,注重对权力自身的监督^[3]。

2. 对权力运行领域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发挥审计部门的主责主业,是立足于经济监督的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监督,应重点做到“六个围绕”:围绕党委政府重要工作、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开展跟踪审计;围绕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和资金绩效开展财政审计;围绕推动防范化解风险,开展金融和企业审计;围绕稳投资、稳增长重大政策要求开展投资审计;围绕改善民生和环境保护开展民生和环境资源审计;围绕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由此引入政府审计,即对国家和社会事

收稿日期:2022-08-15

作者简介:阎建合(1972—),男,河南南阳人,郑东新区管委会高级审计师,研究方向为政府审计。

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

3. 对权力运行成效的监督

这种审计监督侧重于发挥大数据作为审计部门的现代手段的作用,是立足监督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综合治理等牵涉到政府方方面面的权力运行成效,具体包括经济成效、社会成效和政治成效等方面。重点关注行权机关是否在法律规定(重点是经济法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权力运行的经济与社会成效、民众对权力运行的满意度评价、是否有超越权力的现象发生等等,重在量化审计运行的经济和社会功效。所以,学者吴松江、胡扬名认为权力运行效率高低由权力运行机制本身决定,同样离不开对权力运行成效的有效监督^[4]。

二、明确细化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目标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审计监督,其目标应分为总目标和分层目标两个方面。

1. 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总目标

总目标是通过权力运行审计监督,聚焦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主责主业,发挥“经济体检”作用,促进改革,推动发展,维护国家政令统一。监督被审计的公权力机关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改善权力运行管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综合能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促进权力运行规范、有序、高效。

2. 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分层目标

根据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目标实现效果的大小,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秩序标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约束的权力最终会走向灭亡。在现实工作中,权力运行并非无边无际,随心所欲,而是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秩序下运行。从审计监督的角度来看,其主责主业是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从而维护财经秩序、规范权力运行,这也是审计监督最基本的目标。在审计监督工作中,只有加强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财政财务收支的专业化“体检”,定期依法、依规对被审计监督单位财务运行进行标准化“体检”,及时发现“权力”机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财经问题、预判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并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和化解,才能当好国家财产“看门人”,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者”,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化运行。

第二层次是效果目标,即弹性标准。审计监督的效果目标体现在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等多个方面,这也是衡量一项审计成效的现实标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被审计事项的差别很大,加上审

计方式方法的不同,会导致审计监督的效果目标有大有小、有高有低,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努力实现审计监督效果的最大化。例如,在审计一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在代建项目中存在几笔大额支出无明细的问题,明显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审计结束后,审计单位在依法依规对该问题进行处理的同时,结合审计程序、审计目标和实际审计效果等,在充分剖析前述问题出现的背景、原因、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的基础上,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具体的审计监督建议。并以此为例,梳理出类似问题可能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预防该问题再次发生的基本措施等信息,协同上级管理部门组织专门人员对辖区内其他国有企业的财务主管、财务人员进行警示性提醒和专门培训,确保审计效果的及时性、长久性和有效性。

第三层次是复合目标,即健康标准。权力运行规范有序、综合效益健康可持续,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计监督目标。要实现审计监督的复合目标,就需要在基本目标、效果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表象看本质,进一步研判、权衡、评估,着力从决策层、体制层、管理层,甚至从有关法律法规层面,去发现问题和漏洞,督促或建议有关单位完善体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审计实践中,经常发现不少被审计单位缺乏严密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有的制度目标单一,明显缺乏复合性,制度运营缺乏健康的运行标准……对此,审计结束后,均会提醒被审计单位应及时完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制度运行和监督程序,规范制度合理化标准,以确保审计的复合目标,实现被审计单位权力运行健康有序。

第四层次是最高目标,即政治标准。道理千万条,政治第一条,这也是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最高目标。在具体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切实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公权力运行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心怀“国之大事”,聚焦民生热点、焦点和难点,加大对民生政策落实、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民生项目组织实施的审计监督力度,真正做到为国而审,为民而计。通过审计监督,全面督促掌握公权力的人员牢固树立政治自觉,坚定不移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要求,在权力运行中实现制约有力、监督有序、规范高效。

三、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着力点

审计监督属于监督权,职责法定,有规定的权力

行为边界,而权力运行的范围却十分宽泛。加强审计监督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加强权力运行审计监督,就要紧密结合审计监督的职能范围和权力运行的特点,重点关注两个过程:审计监督的过程和权力运行的过程。

1. 着力点之一:审计监督的过程

在审计监督的过程中,要在准确把握和界定与财政财务收支相关的业务、管理活动的基础上,确定审计工作的着力点。具体包括:一是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认识审计监督,着力于审计在促进宏观调控、防范经济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从坚持、保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考虑,着力于加强全国审计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做到应审尽审。三是从构建全方位权力运行监督体制出发,着力于审计监督的治本功能,注重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有机贯通,统筹协调,促进审计和其他监督的一体化、制度化。

2. 着力点之二:权力运行的过程

结合权力运行的特点,在综合分析研判的前提下,确定监督权力运行的着力点。在具体的实践中,权力运行本身可能就是财政财务收支活动,也可能是权力运行的目标产生了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还可能是因权力运行而引起了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等等。比如立法部门的立法活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制而非审计监督制约,但是立法部门作为预算执行部门开展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则在审计监督范围。因此,监督权力运行的着力点,应立足于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合法、制约有度,致力于审计监督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落脚于权力运行的规范运作、廉洁高效。

四、严格把握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原则

在整体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中,审计监督作为一项专门机关的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经济体检”的作用,其主要任务是审计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加强权力运行审计监督,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

1. 跳出经济讲经济

审计监督虽然是围绕经济监督开展相关工作,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时期尤其是这样。因此,在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围绕经济开展审计但又不能囿于经济,而是要用讲政治的理念引领审计监督,从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高度开

展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提升宏观调控效果、防范经济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发现的问题,着力发现隐藏在违规决策、违法操作、违规经营等背后的政治问题,深挖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切实为维护党的大政方针和财经秩序保驾护航。同时,在审计目标确立、审计方案制定、审计项目实施以及审计人员选配等事项中,也要坚定政治方向,把握政治标准。

2. 跳出审计讲审计

审计是监督部门,但更是服务部门,审计监督应服务于工作大局,服务于党委和政府决策,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努力发现问题,又要推动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具体实践中,应立足长远,更加关注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注重揭示防范经济运行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更加注重保障民生项目和资金的安全,切实为国家经济管理之“管”做好清除障碍工作之“疏”,为规范秩序运行之“畅”做好违法非法之“挡”,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之“好”做好漏洞破损之“修”。

3. 跳出监督讲监督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虽然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但两者在推动改革、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等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通过审计监督,要善于发现权力运行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缺陷以及制度上的漏洞,提出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以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要敢于、善于查处违反工作纪律行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经济职责行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而引起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以维护党和国家的财经秩序,促进廉政建设。要善于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在党内监督的带动下,立足于本职工作,恪守职责,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监督领域综合优势,推动监督贯通融合,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要善于充分揭示重大经济贪腐、重大财务舞弊、重大财政造假、重大会计信息失真、重大生态损毁、侵害群众重大利益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地反腐败,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五、积极探索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方法有多种,对于具体的权力运行,要采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审计监督项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日常审计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宏观控制法与微观操作法,以供参考。

(一)宏观控制法

1. 内部控制环节法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一个单位为实现其工

作目标,往往会采取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监督制约等一系列方法、措施,以确保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其本质就是划分权力、制约权力,建立完善权力内控机制,而内控机制的运行就是权力运行的体现。由此,对其权力运行进行审计监督,就应结合该单位的特点,以内控机制的运行为主线,重点关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以及内部控制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等情况。同时,还要着重关注其风险控制、不相容岗位分离控制、授权审批、会计系统控制、财产保护控制、预算控制、营运分析控制、绩效考评控制等情况,学会从各种控制中寻突破、促发展、强监督。

2. 梳理审计事项法

每一个审计项目通常都有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内容以及具体组织实施办法,按要求需制定审计工作方案,接受任务的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再制定详尽的审计实施方案,在执行具体审计实施方案过程中也会不断修正和完善。所以,在实施审计前,审计组应根据审计实施方案详细梳理出具体审计事项清单,针对每一个审计事项再制定具体有效可行的审计程序,通过执行审计程序,加强对权力运行行为开展审计监督。

3. 问题清单列举法

在党委例行的巡视巡察工作结束后,通常会根据相关要求列出被巡视巡察单位整改的问题清单,以利于加强整改提高。同时,在审计监督权力运行工作中,也可以针对被审计单位特点,列出权力运行中易发多发腐败问题的风险点。事先列出问题清单,比如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滥用职权问题清单、玩忽职守问题清单、徇私舞弊问题清单、违反工作纪律清单、违反廉洁纪律清单等。带着问题清单去审计,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增强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 党纪衡量法

任何权力运行都有法定的行为标准,财政财务收支活动也不例外。在审计监督工作中,要善于从纪挺法前、从严治党的角度,运用党纪的标准去衡量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合规性。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突出了纪法协调、纪法衔接,完善了六项纪律的具体条款,既涵盖了具体的违反党章纪律要求的行为,又抽象概括了其他法律等规定的违纪行为。在具体的审计监督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以及有关兜底条款,为衡量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合规性提供了党纪标准和依据。

5. 尝试问题发现的新视角——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在权力运行审计监督中,将法治精神融入工作,以崭新的视角去尝试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法治思想,忠于宪法法律,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问题识别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问题发现的重要指引;问题呈现可以是违法,也可以是违反道德。

问题领域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涉及新情况、新问题,引领社会风尚、树立价值导向的事件。

问题判断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支撑问题方案直接依据的,尝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如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其依据和理由。

问题实质为有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找准问题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问题解决方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确保问题解决方案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断提升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

当然,上述方法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具体的审计监督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多策并举,注重多种审计方法的结合和交融,努力实现审计监督效果的最大化。前述方法侧重于宏观、总体、面上的研究,在具体的局部、点上,下面就比较常见的资金、银行存款、租赁收入等微观事项,需要引入相对微观、有效、切实可行的方法。

(二) 微观操作法

1. 绘制资金流程图法

绘制资金流程图应从银行账户入手,对进入银行账户的某一笔大额资金做详细的记录,进入A账户的时间、数额、来源、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转出B、C…账户的时间、数额、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再转出M、N…账户的时间、数额、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再转出X、Y…账户的时间、数额、原因、经济活动、转出单位,直至目前情况。当然这只

是绘制出某一笔的资金流程图,还可以根据需要绘制出多笔甚至所有的资金流程图。

编制资金流程图可以清晰地反映资金的沉淀问题。对资金沉淀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区分合理沉淀和不合理沉淀。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资金使用方向。梳理出资金流时间、金额,和资金规定的用途做一比较,就可轻易判定是否高度吻合的一致。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隐形的定期存款问题,资金可能存在一定时期不被使用,被人为地控制使用。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抵押、担保问题。尤其对非担保公司、企业进行抵押、担保应当给予其决策程序和正当事由充分关注。

资金流程图可以反映有违公平的交易问题。主要是对这种合同、交易进行内部决策、具体执行、报批审批等程序审查。

资金流程图还可以反映资金的侵占问题。针对具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真实性的审查。

2. 银行存款入手审查法

一个单位银行存款是相对活跃、相对重要的资产,是单位经济活动的血液。对银行存款的审查主要是以下方面:

账面要素审查必不可少。从账务的角度能反映银行存款的资料主要有总账、明细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的收入凭证和支取凭证,这些都是要逐一进行抽查核对的。

对银行存款的变动分析必不可少。引起变动的的原因,无非是银行存款的增加和减少,增减的考量源自资产的处置,债权的收回,负债的增减,权益的增减,因此对资产、债权、负债、权益的仔细关注,细致分析,成为查明银行存款完整性的必要。

对经济活动的筛查必不可少。抽查其中的经济活动,研究其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关系,弄清银行存款的流动方向、金额、时间。坚持“凡动即用”的观点,坚持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分析。

紧盯“人”和“银行”是关键。银行存款的活动说到底“人”和“银行”两个主体相结合的活动,“银行存款”的活动需要人的经办、人的审批,这里的“人”的身份、职务、工作职责、办公地点、住所都是值得考究的;这里的“银行”的名称、办公地点、对外营销活动政策也是值得关注的。

3. 租赁收入查实法

查实租赁收入,唯有多了解,主要是以下方面:

对有关环境的了解: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当前的经济形势、环境条

件、监管状况等。内部环境主要是指租赁市场、地段、配套等。

对有关当事人的了解:主要当事人是指出租人、承租人,了解其缔约资格和缔约能力。缔约资格主要包括其信誉品质,业务范围的涵盖,参与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过往业绩考察等。缔约能力是指持续拥有专业胜任能力的队伍、必要的硬件装备、匹配的资金和技术软实力,完善的内部管控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相关当事人主要是转租人、抵押人、租赁物的权属人(有时并非和所有人同一)。

对有关资料的了解:主要是指租赁合同、租赁物、转租、交付、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多联收据、付款凭证、收款凭证等。

对有关标的物的了解:租赁物(租赁合同中动产和不动产)、押金或担保物(担保合同)、水费(供水合同)、电费(供电合同)、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合同)。

对有关权属的了解:主要是指其所有权(其取得、转让、限制、消灭)、使用权(其取得、期限等)、抵押权(其取得、交付、管理)等。

对有关责任的了解:既包括正常履约的价款支付和费用的承担,又包括违规违法违约产生的罚款、违约金、赔偿金、保险金,没收的担保金,还包括违规处置的担保物所得、背离合同的价款所得、贪占各种款项的孳息所得、对各种价金的其他非法的所得。

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物业管理条例》等,还应当包括党和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等。

4. 座谈了解法

严肃性、正式性的询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而座谈是在一个相对轻松甚至是气氛活跃的环境中进行,可用来寻找一些线索或打开一些突破口,为我们发现问题提供方向支持。座谈有助于广泛搜集信息,有助于深入挖掘事实,有助于及时纠偏错误信息。我们应学会掌握有关座谈知识,善于运用座谈方法,以便于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

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设计工作问题事项,制作问卷调查表,发放问卷调查表,对问卷调查情况给予汇总、分析,进而了解有关情况。

提出问题询问,首先要形成自己的问题清单,然后有针对性地选择座谈对象,进行一对一的询问,然后根据回答的内容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解。

组织安排交流,交流对象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

不动声色观察,有针对性地选择座谈对象进行

交流,内容可以提前设定,也可以漫无目的的交谈,这种交谈主要旨在观察对方,通过对方外表、性格、言谈举止等情况判断求证预设问题。

座谈活动结束后,要对座谈的内容进行固定,通过制作记录、载明时间并由对方签字予以认可的方式进行固定;要通过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存在疑问的应继续收集证据予以求证,以进行正当性、合理性排除。

六、做好四个注重,确保监督实效

通过审计,不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方面的问题,反映出与经济方面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权力运行等方面的问题,还能体现国家权威。有鉴于此,借助于什么途径来发挥权力运行审计监督的最大效果呢?笔者以为,应注重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1. 注重建议的建设性

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善于站位改革发展的大局,从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管理性漏洞等方面去综合分析、研判,提出有利于遏制不良苗头和倾向性的问题,化解可能引发重大风险隐患的建设性意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2. 注重整改的实效性

引导地区经济规范发展,必须注重审计整改的时效性。针对审计监督发现的不同问题,督促被审计单位分类制定整改计划,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立行立改与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相结合,促进增收节支,挽回经济损失,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原则,督促被审计单位坚持问题导向,

建立完善制度,加强风险防范和监督制约,进一步健全规范权力运行的长效机制。

3. 注重监督的融合性

立足于构建全面的监督体系,将审计监督自觉与其他监督相结合,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优势,为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提供专业性支撑,进一步凝聚监督合力,实现各类监督协调一致、有机贯通,促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完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由此,必须加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的有效融合。

4. 注重惩戒的严肃性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扰乱经济秩序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小官巨贪、懒政怠政等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依法制作移送处理书,将有关问题及时移送有权处理部门依法处理、严肃惩戒、依法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2]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3] 王寿林.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的理论思考[J]. 科学社会主义,2020(4):123-126.
- [4] 吴松江,胡扬名. 论影响政府权力运行效率的四种内在冲突[J]. 甘肃社会科学,2011(4):205-20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udit Supervision of Power 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Content, Goal and Path

YAN Jianhe

(Zhengdong New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ork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has defined the content of audi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alyzed the general goal and stratified goal of audit supervision. It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constantly standardize the audit supervision of power operation, and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alking about economy beyond economy, audit beyond audit and supervision beyond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work practice, Four basic methods of audit supervision are given: internal control link method, sorting audit items method, list of problems method and party discipline measurement metho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aspect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supervision: constructive suggestion, effective rectification, integrative supervision and rigid punishment.

Key words: power operation; audit of power operation; auditing supervision

论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

李东风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失权与复权制度是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个人破产法立法实践起步较晚,因此相关的制度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立法模式选择、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三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构想。从立法模式的选择上看,裁判失权主义和裁判复权主义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实体规则来看,应当同时从破产债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将失权与复权规则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性、破产清偿的比例等因素相联系,同时加快我国大陆地区个人诚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就程序规则而言,应设置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复权申请审查和庭外和解等法庭审理前置程序的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应平等保障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诉讼权利。

关键词: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立法模式;实体规则;程序规则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7

中图分类号:D922.29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41-05

我国现行的破产法一直被称为不完整的破产法,因为其适用主体仅为企业法人,而以个人为主体的破产法律制度却迟迟未曾建立起来。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的经济活动和实施的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在逐步增大,个人遭遇经济风险、负担大量债务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时有发生,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隐患。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为了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发展,同样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上尽快与国际社会接轨。在企业破产制度已经在我国逐步普遍适用的背景下,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社会意义日益凸显,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我国目前在个人破产领域的立法工作相对谨慎,步伐也相对比较稳健。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的建

议。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此后,浙江省温州市、台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地的法院先后开始试点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并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2020年通过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等两部地方性法规代表着此类地方性立法的最高水平。各地政府和法院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所做的尝试值得肯定,然而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相关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实践起步较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失权与复权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是上述地方性法规共同的弱点。作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本质是对破产债务人权利的限制和恢复。鉴于失权和复权在立法目的上的一致性,它们不能被人为割裂,而应该被看作一套完整的制度。作为法律术语,“系部门法用语,是被作为‘类概念’使用的,是对权利被限制或剥夺这一

收稿日期:2022-09-03

作者简介:李东风(1979—),男,山东莘县人,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类现象进行概念的构词”^[1]。为鼓励与监督破产债务人清偿债务,减少债务纠纷,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破产制度中设定相对完善的债务人失权与复权规则,对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进行一定的权利限制,满足特定条件时再解除这些限制。作为对债务人进行合理惩戒与有效保护的手段之一,失权与复权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所独有的,企业破产制度中并没有其适用的空间。^[2]

本文拟从模式选择、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构想,以期为将来相关领域的立法实践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设性思路。

一、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模式选择

从立法例上来讲,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有关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当然失权与复权主义模式、裁判失权与复权主义模式和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主义模式。我国现行的破产法中不包括个人破产的相关内容,自然也不包括失权和复权制度。考虑到社会现实情况和公众的呼声,未来破产法的修改肯定会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那么,就失权和复权制度来说,应该采取上述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呢?

就个人破产失权制度而言,大部分有个人破产法的国家采取的是裁判失权主义模式。裁判失权主义是指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并不必然导致其失权的产生,只有等到法院进行专门的失权裁判后债务人才发生失权的法律后果。这一模式规定了严格的限制破产债务人的行为条款,相较于对债务人相对比较友好的当然失权主义(破产宣告后无需裁判即自动进入失权程序)立法模式,裁判失权主义模式囊括的失权范围更广,世界上采用这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也更多,主要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

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求,裁判失权主义应该更适合我国。这是因为它更具权威,更有利于强化失权制度对破产债务人的社会监督效果。

其一,失权作为破产债务人破产宣告后的一种或然后果,在法律上具有附属性、制裁性、强制性的特点,犹如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应当将具体个案中的失权范围与程度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性、破产清偿比例、破产后果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联系起来予以规定和适用,唯其如此,才能体现这一制度的公平性。裁判失权主义通过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

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立法目的。

其二,我国目前还未在全社会普及个人信用评级制度,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构建过程中,公民的信用意识也需要强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产立法实践表明,当然失权主义的推行有赖于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我国在这两项制度的建设方面尚存在短板。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当然失权主义既无益于保护债权人的公平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债务人的生存权益,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其三,失权的范围和限度应当从具体案情和实际需求出发,而裁判失权主义就有利于破产法院根据破产债务人主观过错的大小、破产途径、剩余债务数额大小等因素在法定限度内确定其失权的内容、范围和限度,将对破产债务人行为能力的限制控制在既足以惩戒其过失,督促其尽快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又不至于妨害其再生能力的范围之内。

从我国非个人破产领域的相关立法来看,对破产责任人采取的也是裁判失权主义。例如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破产责任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资格的限制,是以他们对“该公司、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为法律前提的,而是否负有个人责任,必须由法院的生效裁判予以确认。

与失权制度类似,当然复权主义、裁判复权主义和混合复权主义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有关复权制度的三种立法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裁判复权主义无疑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最佳选择。当然复权主义意味着破产程序截止后,只要债务人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或事由,就可以自动解除因破产宣告而带来的公法与私法上的权利限制,无需向任何司法机关报告和申请。这种立法模式等于没有任何监督机构参与债务人的复权程序,尽管对于破产人来讲少了很多麻烦,但由于其对债务人过于宽松的限制措施,执行力度几乎为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由于我国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建设尚处于未成熟阶段,我国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中使用频率最高、安全性最高的裁判复权主义,即破产债务人的失权考验期限届满后,经过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审查,认为符合复权条件的,方能解除对其的权利限制。

首先,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与个人破产制度相关的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建

立完整。在这种情况下,设定严格的复权审核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破产申请的数量,节省司法资源,从而提高司法机关处理个人破产案件的效率。

其次,由于我国的破产惩戒机制尚不成熟、不完善,采取裁判复权主义是更安全、更审慎的选择。它相当于是给与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一个衡量债务人诚信程度的功能,如果评价结果是债务人已诚信地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就发生复权效果,反之则不能,债务人则继续处于权利受限状态。无论对破产人还是债务人,这都将是更为公平合理的举措。

最后,破产债务人即便符合法定的破产复权条件,若不向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申请,由其作出统一公告,便难以产生公示公信的效果。而由法院或其他裁判机构统一宣告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有些破产者在失权期内仍然存在失信等不当行为,如果没有法定机关的审核把关,容易放纵这部分债务人,进而损害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二、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实体规则

关于个人破产失权的实体规则,即对破产债务人权利限制的具体内容,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可以归为三类:经营型职业资格限制、信誉型职业资格限制和高消费行为限制。经营型职业资格如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信誉型职业资格如担任司法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事关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特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消费行为如入住高级宾馆,购买奢侈品、高额保险理财产品、出境旅游等。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深圳、浙江和江苏等地的相关地方性立法,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整体设计应同时从破产债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

由于地域和文化相近,我国香港地区设定的失权制度实体规则对我国的破产失权制度的建构极具借鉴意义。《香港破产条例》以其详尽的内容为我国大陆地区个人破产失权制度的设计与制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方案。目前我国惩治债务失信人(老赖)的民事制裁制度中已经借鉴了该条例中的某些制度(如限制高消费),且适用效果良好。我国香港地区破产失权制度最重要的经验是既限制破产失权人的经营型职业资格,又限制其信誉型职业资格,同时也限制其高消费和出入境自由等行为。这些都属于对个人信用要求较高的领域。“对个人信用的否定,是个人信用的破产,因此受破产宣告的人应受到从事那些对个人信用要求较高的职位、职业或行为的限制。”^[3]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和《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的颁布施行是我国在个人破产法领域的破冰之举,其规则适用情况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两部地方性法规均允许债务人乘坐飞机经济舱、高铁二等座,在三星级以下宾馆、酒店消费,进行旅游、度假。与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中的“限高”条款相比,其有关失权的规定相对比较温和,更为人性化,是符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规定。当下,对于我国许多城市居民而言,乘坐飞机、高铁,入住经济型宾馆、酒店,已成为其正常的工作所需,如果不考虑奢侈程度不加区分地一律限制,则势必影响其经济再生能力,最终损害的还是债权人的利益。破产失权制度涉及破产人的平等权、人身权、政治权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权利。虽然对债务人的特定权利进行限制具有程序的正当性,但是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要考虑比例原则,债务人的失权必有其范围限度,复权应该有时间限度。如失权的范围及程度或复权的期间超过了债务人的应当承担责任的区间,即是过当的失权,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在我国失权和复权制度的设计中保持债务人和债权人权利的平衡是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破产债务人宣告破产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在设定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实体规则时也应该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应当将失权与复权规则同破产人的主观恶性、破产清偿的比例、破产后果的严重程度以及破产案件的性质类型等因素联系起来规定和适用,而不应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做统一处理。对于破产人的失权期限、程度和范围的规定也不能统一化和简单化,而应当根据导致失权的诸要素分别作出处理。具体来说,应将因参加商业经营活动、因过度消费、因债务人恶意逃债、因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破产宣告行为区分开来,分别设定不同的失权与复权规则。如债务人的破产宣告是基于其商业经营活动的失败,则说明其商业经营能力有所欠缺,应限制其经营型职业资格,如禁止其出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免给公司、债权人及其自身造成更大的损失;如破产宣告是基于其个人财务管理能力的缺失(如过度消费等),则应对其生活消费进行严密监控,禁止其特定领域的消费(如购买豪车、豪宅等奢侈品),同时应限制其信誉型职业资格,如禁止其担任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以免其损害公众对这些职业类型的信赖利益;如债务人系因不可抗力造成破

产,则对其失权范围和期间的设定不可过于严格甚至苛刻,否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个人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前提。“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完整的社会运行与社会治理子系统,对于市场主体无效信用的修复是其必然涵盖的环节。”^[4]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建立初衷既然是保护“诚实而不幸”的破产债务人,那么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突出对这一群体的有效保护。对于不诚信甚至有不法行为的破产债务人则应给予严厉的失权处罚,并将其信息载入国家个人诚信档案系统中,对其复权资格也应该严格审查,以儆效尤。另外,鉴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民事执行制度中规定了对被执行对象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应当在将来的个人破产立法中将因失权导致的“限高”措施与债务人因恶意逃债和失信而对其施加的“限高”措施区分开来,以保障破产债务人的正当消费利益。

三、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程序规则

程序是所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正义是保证法律制度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5]为个人破产制度设定切实可行的程序规则是个人破产案件得以顺利展开的制度保障。没有一整套成熟而完善的程序规则,个人破产案件的审理将无法进行,那么个人破产的各项实体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应由法院主管。同时,有些国家法律也规定,对司法机关主管的某些特定纠纷案件,仲裁机关甚至行政机关也可以参与调解或审理进程。这种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有利于高效地解决现代社会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民商事权益纠纷。

然而,在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地方性探索中,在具体的程序设计环节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最突出的一点是暂未设置法庭审理的前置程序,破产债务人的破产和复权申请都是直接提交给有审理权限的法院。具体来讲,无论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还是《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抑或是台州、温州、苏州等地市的相关地方性法规,都没有设置任何法庭审理的前置程序,这一方面影响了相关案件的审理效率,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那么相关的法庭审理前置程序如何设定呢?国外的相关立法中已有较为成熟的作法可资借鉴。例如,法国政府内部设有债务过剩状态审查委员会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所有的个人破产和复权申请都要

经过这个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向法院提出申请。^[6]这个机构的设置无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压力,将不符合破产和复权条件的申请人挡在了法院门外。由于破产和复权申请的受理需要前期做大量的调查、沟通和协调工作,只有政府牵头并协调,相关案件的立案和审理才能有效推进。

我国今后在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的政府管理部门,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的效能,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和利用好司法资源。具体而言,可以结合案件的性质确定审查机关,如案件涉及的问题较复杂,则专属于法院审查;除此之外其他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交由仲裁机构或专门的政府机关审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办案效率。

前置程序也可以通过庭外和解程序的形式进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独特优势,自然也可以用在个人破产和复权申请的程序中。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信赖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法定的破产失权、复权制度之外,设定适当的庭外和解程序,允许当事人之间约定失权与复权的内容和期限,以提高个人破产程序的效率,提升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效果。当然,由于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的范围及内容涉及个人信用问题,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的失权与复权内容应当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未经登记公示则仅在双方之间有效,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就庭审程序本身而言,破产债务人申请复权时应当向审理该个人破产案件的同一法院提出,其方式可以为正式递交书面复权申请书,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数据信息申请,特殊情况下(如申请人不具备撰写申请书的条件与能力)也可以口头申请。法院受理破产人的复权申请后,应当首先对其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人是否为适格主体、是否有明确的复权请求、是否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本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代理人是否拥有合法代理权等问题予以先行确认。形式审查合法后,再进行实质审查,审查破产人的复权申请是否符合个人破产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复权条件。经实质审查认为其复权有理由的,法院应作出准许复权的裁定。反之,则应作出否定复权的裁定。

为保证失权和复权制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还应建立完善的复权相关诉讼制度,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诉讼权利给与同等保护。对于肯定复权的裁

定,债权人应有权提出上诉;对于否定复权的裁定,申请复权人应有权提出上诉。无论裁定是否准予复权,法院都应将裁定书送达复权申请人,并予以公告。

四、结语

作为个人破产法三大支柱性制度之一,失权与复权制度对于建构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至关重要,是我国相关的全国性立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和《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为代表的一批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我国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立法的高度,仍有必要对相关立法的原则和具体性规定做进一步的厘清,以期为将来的全国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扫除障碍。本文从模式选择、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构建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构想。

从立法模式的选择上看,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考虑到目前我国发展阶段与相关立法较为发达国家的差距,裁判失权主义和裁判复权主义立法模式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实体规则而言,我国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整体设计应同时从破产债务人的身份资格、日常消费行为和个人信贷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与考量,应当将失权与复权规则同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恶性、破产债务清偿比例等

因素相联系,同时加快我国大陆地区个人诚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就程序规则而言,应设置法庭审理的前置程序,在政府机关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的效能,充分利用好庭外和解这一我国特有的矛盾解决方式,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和利用好司法资源;同时,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相关案件,应规范庭审流程,同时保障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诉讼权,以体现我国个人破产法律法规同时保护“不幸的破产者”和债权人利益的立法初衷。

参考文献:

- [1] 彭益鸿. 论失信被执行人失权[J].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2017(1):85.
- [2] Gene Paul Ali. Bankruptcy and Debtor Rehabilitation[J]. Oxford Law Review, 2015(8):8.
- [3] 张红. 关于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构想[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99.
- [4] 范志勇. 论自然人破产失权、复权法律制度:多元价值革新与双重体系构造[J]. 经济法学评论, 2020(2):67.
- [5] 徐阳光. 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0:190.
- [6] 伊恩·拉姆齐. 21世纪个人破产法[M]. 刘静,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1:4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ss and Rehabilitation of Rights System in Personal Bankruptcy in China

LI Do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06,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loss and rehabilitation of righ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personal bankruptcy, and due to the late start of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personal bankruptcy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models, substantive rules and procedural rul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adjudication is more suitable for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s far as the substantive rules are concerned, overall planning and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identity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bankrupt debtors, their daily consumption behaviors and personal credits; when judicial branches deal with such cases, they should consider such factors including the subjective malignant nature of the bankrup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bankruptcy repaymen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its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 credit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s far as the procedural rules are concerne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be set up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e-trial procedures for court hearings, such as the review of applications for rehabilitation of rights and out-of-court settlements, so as to maximize th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qually protect the litigation rights of bankrupt debtors and creditors.

Key words: personal bankruptcy; loss and restoration of rights; legislative model; substantive rules; procedural rules

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内在逻辑

谢京凯, 孙 犇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模式正经历从国家监管型向协作共治型转变的过程,但重新分配信息审核责任的内在逻辑尚需厘清。这一变化的直接动因是传统信息监管模式的失灵,政府需要尝试重新定位自身,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成为新生力量;逻辑基础则是由于网络信息平台逐渐具备了公共产品属性,需要对公共产品供给者进行合理规制以保障公共利益。对平台企业设置额外责任,是为了防范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利。

关键词:网络信息治理;网络信息平台;公共产品;公共利益;权力与权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8

中图分类号:D9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46-05

一、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实践背后的逻辑之问

互联网治理是21世纪以来国家的重要课题之一。类似于信息过滤的技术标准定义^①,法律监管意义上的网络信息审核,一般指监管者以预设内容标准对网络信息进行实时或事后审核,处置其中的违法和不良网络信息,以维护网络生态健康。网络信息审核是互联网治理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一环,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在网络信息进入传播链前,审核环节能够有效筛选危害性内容,一旦网络信息审核机制失灵,网民的上网体验质量将难以得到保证,国家的网络信息内容安全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网络内容安全的考虑,传统上网络信息审核的任务都交由国家机关本身承担,以保障监管者履职的可靠性,处理形式多为对有害信息本身和载体进行搜索屏蔽、网站禁用和设备IP地址封锁等直接强制性措施。近年来,我国开启了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立法进程,要求网络信息平台承担内容更多、限制更严的网络信息审核义务,不再限于以往的协助检查等被动义务形式,尝试以新姿态进行网络信息治理。从立法趋势看,国家已开始高频率地出台新法律和修订旧法律,传达出对网络社会治理工作的关

注信号,主要表现为以法律形式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②,并对一些代表类型的平台进行了细化规定^③。此外,立法者也意识到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商存在不良利益趋向的潜在问题并尝试规制^④。总体来看,我国关于信息审核责任设置的立法方向已经比较明晰:让网络信息平台在更主动、更有效、更安全的基础上履行更严格的信息审核责任。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网络管理体系是世界各国治理互联网领域的整体趋势,更多维度的规制手段能为国家带来更有弹性、更加灵活的网络治理能力,政府和网络信息平台企业都能在互联网信息大潮中寻得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产生维护国家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一股合力。

然而,在我国近年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实践进展充分的前提下,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法治逻辑并未相应地得到厘清,由非公权力主体担当信息审核工作主力军的做法不免在比例原则的审视下存疑:是否必须由网络信息企业承担更多责任才能有效治理网络信息?这一要求是否超过了对市场主体设置义务的合理限度?^{[1]74-75}由网络信息平台商承担更多的信息审核职责,势必会对其施加额外的经营成

收稿日期:2022-08-12

基金项目:司法部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17SFB5008)

作者简介:谢京凯(1997—),男,湖南郴州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治政府建设。

本压力,包括人力、管理和技术开发投入等方面。平台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处理网络信息,但此举显然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无合理根据的义务负担意味着权利受到了不合理限制,意味着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天平失衡。为了保证公权力运行处于合理尺度范围内,必须为信息审核义务再分配提供明确的法理支持。

二、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直接动因:旧模式退出和新力量登场

(一)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

传统网络信息治理模式是国家监管型,呈现以公权力机关为主要力量的治理形态,手段具体体现为政府网信部门要求信息服务平台清除相关信息、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直接处罚等方式。在我国互联网发展前期信息资源数量不大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对保障网络信息秩序有较显著的效果。但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更新,上网冲浪的门槛持续降低,素质参差不齐的网民使得被散布的违法、不良网络信息数量剧增。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与网民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网络信息的数量级亦呈几何倍上升,审核网络信息的工作难度陡增,已然超出政府机构和公安部门的能力范围。

传统的行政手段监管失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治理资源不足、技术困难和观念陈旧。治理资源不足和技术困难的问题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网民基数增多直接造就了网络信息的海量,尤其是在我国人口量级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前提下,以有限的政府资源管制持续膨胀的网络信息必然捉襟见肘;专业技术上的困难也同样源自网络技术本身的前端性,执法者常需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状况,而上网的门槛变低也进一步增大了追查网络面具背后违法者的技术成本。自国家互联网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公权力机关局限的治理观念进一步增加了治理难度:将网络信息治理工作简单理解为依靠政府本身力量筛查网络信息和攻关技术,没有真正认识网络治理即社会治理的深层性质。画地为牢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全能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真正全能,反而限制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局限了公权力机关更新治理手段。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的政府改革方向,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有为政府”是更适合当下网络信息治理局面的政府模式,寻求政府转变职能、社会和市场协作助力是破局的当务之急。

(二)网络信息平台企业:破除治理困局的新力量

在网络信息治理困局中,要从传统威权式政府的陷阱中跳脱出来,政府必须要改变自身定位,建立在单一依赖公权力基础上的任何做法都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治理困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为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创新打下了社会基础。鼓励社会化协作和全民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必要路径,多元主体协作共治正是国家所需要的网络治理新思路,有效治理网络社会必须寻求在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各主体中寻求破局点,调动公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进入治理体系,更多考虑如何发挥网民、网络企业和网络行业组织等主体的作用。网络信息平台作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企业群体,在信息治理上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是网络企业的典型代表,是在平台经济学与互联网信息经济融合中产生的新形态,以网络社交类平台和网络媒体类平台为代表。^{[1]73}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政府明确界定了两个概念: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是指制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是指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而网络信息平台企业兼具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的身份,在提供信息传播服务的基础上也产出信息产品,是性质比较特殊、传播影响力比较大的网络信息服务者,把关网络信息平台中的信息流动是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必然要求。

从网络信息平台对网络信息的规制能力角度来说,如此之举也有相对于公权力独力治理的额外优势。首先,信息平台搭建信息审核制度是由内而外的,相较于政府从外往里的治理体系方向,无疑更具有可操作性:网络信息平台可以通过在自身代码系统上设置、调整电子程序来实现信息审核的大部分形式性工作内容,直接规制第一手的数据信息。政府部门的治理手段具有效果滞后性、程序烦琐性,对不良信息难以达到即时处理的效果。在网络信息平台的电子服务系统中,由代码程序设置的规则反而比法律规则更有直接的执行力,因为违规行为的判定和处罚都是预设程序即时触发的。面对大基数的信息处理,执行代码化的规制标准也更能保证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因为电子程序并不会在主观上滥用处置权。同时,在面对新情况需要调整审核标准时,私主体内部制度的弹性明显要强于法律法规,这也使以网络信息平台为主的信息审核制度能更好地跟上网络世界

的快节奏。

三、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逻辑基础:公共影响力与公共利益相关联

从比例原则的角度上来说,要求私主体承担传统意义上属于公权力主体的职责,必须要确定这份责任不会对私主体造成过度的权利限制,这是要求平台商作为互联网社会的私主体承担公共性社会责任的应然前提。

(一)网络信息平台具备公共产品属性

微博、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网络信息平台的典型代表,借由功能丰富性、信息时效性、传播快速性等多项优势,以信息关系为纽带,在互联网发展大潮中强势占领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成为公众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人手拥有移动网络收发端的时代,民众获取信息的便捷度和自由度前所未有。然而,在浩瀚的网络空间中缺乏索引和分类的巨量网络信息反而难以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则提供了代为摘选的服务,把经过加工编辑后产出的信息产品推送给用户,使得用户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知识鸿沟”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网络信息平台普遍上还采用用户偏好算法,根据用户个人资料、阅读习惯调整推送内容。另外,传播学者认为网络信息平台在公众意见的表达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网络信息传播会受到网络信息平台的“扩音效应”影响,网络信息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兼具权威信源和传播主体的双重作用,这也体现了网络信息平台同时包含内容生产者和传播服务商的特征。而在网络舆情事件波动中,网络新闻是引领舆情事件发展的重要力量来源,各类型舆情事件中约三成由网络信息平台首次曝光,其“具有不可比拟的引爆力,占据着舆情传播的高地位置”,平台内的评论区“是网民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说,网络信息平台对现代网民的网络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信息窗口作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共产品属性。

公共产品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最为经典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54年提出的论述,他认为公共物品是为“非竞争性”的物品,任何个体对其的使用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质量,用户数量的多少并不会带来边际成本。之后其他持相近观点的学者在定义表述中补充了“非排他性”,即一旦开放该物品的使用,任何人对该产品的使用权都不会被排除。^[2]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的两大基本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能被纯粹地归为公共产品类的存在并不多,由于两种属性难以共存,大部分产品被划分为“准公共产品”,并

需要根据属性程度高低再作细分。以公共产品标准审视网络信息平台,首先会发现其具备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平台提供信息内容产品是面对平台所有用户,任何用户获取该信息内容都不影响其他用户以普遍标准体验产品。在排他属性上,则必须对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分类讨论。大部分网络信息平台提供的程序软件基本上都采用免费下载模式,在使用上不设门槛,通过其他手段盈利,这一类网络信息平台具有比较典型的非排他性特征,可以被认为是公共产品。也有少部分网络信息平台采取收费会员制,要求预先付费才可使用,信息内容产品面向特定群体提供,因此这类网络信息平台是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在后者收费使用的模式下,为了保持盈利必须保证产品质量优势以吸引客户,收费的网络信息平台往往会自我施加更严格的信息审核标准。因此,在讨论公共产品属性与网媒平台信息审核义务的关系时,应当“举重以明轻”,将重心放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网络信息平台上。

(二)资本存在对公共产品属性的内在异化风险

搭便车问题是任何公共产品都不可避免的。搭便车问题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个人利己性的影响下,每个人都会利用低代价的公共产品获取远大于代价的收益。因此公共产品往往都是负经济效益,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才会认为只有国家机器会主动负担公共产品的提供。但在现代社会,经济效益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可能获得潜在经济效益。基于利益需求驱动,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才会逐渐普遍化。

网络信息平台作为窗口承载民众日常大部分的信息输入,具有相当稳定、成熟的盈利模式:信息时代的信息内容生产者必须通过作为主流信息渠道的网络信息平台发布内容,才能保证产品的时效性和受众广度,借以在同类竞争中取得优势;同时,民众对信息获取手段便捷性、信息本身时效性具有要求,网络信息平台也是信息渠道中比较优秀的选择,加之“用户惰性效应”的影响,大众也更习惯于借助网络信息平台获取最新的信息内容产品。在这样一对相互吸引彼此的供求关系链中,网络信息平台成了交汇点,作为中介角色的服务商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网络信息平台自身也生产信息内容产品,组织优势地位能为优势者带来信息差,信息平台能通过后台数据分析热点趋势,生产更受用户欢迎的信息内容产品,进而转换为相应的经济价值。这是网络信息平台成立和发展的内在经济动

因,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网络服务被免费提供。网络信息平台有各种基于用户覆盖度的获利渠道,例如各类付费订阅服务或是在应用程序、网页中插入商业广告。因此,平台的组织优势地位是其盈利模式的核心所在。在竞争良性的预设环境下,平台的经营策略应当是提升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以稳固和扩大用户群。

但是,“资本是要逐利的,既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也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3]任何经营模式一旦被资本裹挟,其本身的属性就会逐渐异化,资本逐利性对网络信息平台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极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竞争环境。由于流量是平台用户关注度和影响力的象征指标,广告投放商和信息内容发布者更容易以流量为标准来选定自己的合作方,在这一语境下资本逐利性演化为“流量至上”的经营理念,使得平台之间开始恶性竞争:平台方默认允许“标题党”类信息在平台上出现,甚至自身也会发布此类劣质信息产品。这实际上是利用平台用户的猎奇心理赚取点击量以谋取经济利益。同时,由于网民存在基于日常习惯产生的使用惰性,除了用户在平台上获取预先期望的信息之外,页面的推送信息也有捕获用户注意力的机会,不良信息就可能潜藏其中。而网民个体甄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并不强,容易在引导下产生误解,甚至会向自己的社交圈扩散,可能导致诈骗、数据泄漏等不良后果,性质更恶劣的虚假信息还可能诱发负面社会恐慌和政府信誉受损事件。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微信公众号、“大V”微博造谣发布虚假信息引发的负面社会事件正是因此产生。此时,网络信息平台的公共性就不再为民众带来便利,反而为失控的资本所利用。

从网络信息治理的角度来说,公共产品的资本裹挟问题不仅是市场秩序风险,同时更是对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潜在威胁,公共利益可能因此受到侵害,国家必须寻求合适的规制方式以控制风险。比起外部规制手段,以法定角色的职责标准约束网络信息平台主体,能够从内在角度影响网络信息平台行业价值判断。换言之,为平台主体分配严格的信息审核责任能从根本上纠正资本逐利性所带来的恶性经营问题:当网络信息平台从信息运载者成为网络信息的监管者,属性的属性叠加和顺位变动将使其不再仅从市场经营的角度考虑网络信息内容审核标准的问题,而是需要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顾及整个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业的运营环境,以合理方式利用平台的公共影响力。

(三)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意味着更严格的产品责任

公共产品本身具备增进公共利益的功能。在政府权力构架越发精简的改革背景下,社会化治理方案相应地将更多的社会利益保障责任转交给了私主体进行协作共治,这也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身份趋于复杂。不同于公权力主体,私主体的复杂身份牵制着其自身的行为动机,不同的价值判断导致不同的行动模式,如何作为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意志对多重身份的排序情况。同时,在现代社会,任何公共产品对民众生活都影响广泛,公共产品一旦出现劣质化趋势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基于社会责任的要求,公共产品提供者理应对公共产品的质量承担更加审慎的把关责任。在传统政府包揽公共产品供给的背景下,这一逻辑关系是隐秘的,因为公共产品中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与政府行为动机重叠,甚至会被误包裹在“权责一致原则”的外衣之下。但是,一旦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政府关联,就必须明确这样的价值判断: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严格义务源于社会参与主体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意识,而无论其提供者是否为政府主体。对于网络信息平台商来说,资本的逐利性本质与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常处于矛盾之中,但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在面对商业经营者的角色时往往难以占据上风,这正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责任义务的意义所在。

四、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内在逻辑:信息“权力”与信息“权利”的平衡需调适

“由于权力与权利本身所体现的自由,其必然包含一定的选择空间与幅度,比例原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为该空间及幅度之内的权力与权利运行提供尺度。”^[4]使公权力保证不越界的同时令其为社会提供有效管理服务,是当代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在传统治理模式失灵时,国家如何以良法行善治是一门学问。“如果简单、机械地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进行‘齐抓共管’,并不必然会形成治理合力,也可能导致相互掣肘、彼此削弱、推诿扯皮、多元共谋等治理问题。”^[5]从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再分配的直接动因来看,政府处于互联网信息治理困局中,势必寻求角色定位的变更,具备规制能力优势的网络信息平台更适合承担起信息审核工作主力位置的空缺,这是为网络信息平台分配信息审核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当然,政府转变职能、吸纳新生社会力量为网络社会管理提供支持是正确的做法,但如何以适当的手段形式达成目标才是难点。因此,对任何可能导致公权力越界的做法都应当考虑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否成立。

笔者认为,网络信息平台信息审核责任分配的内在逻辑如下:网络信息平台已经逐渐发展出了公共产品属性,网络信息平台公共性越强,组织优势越大,滥用地位优势的影响也就越大,应当对其加以规制。网络信息平台的公共产品属性,代表着平台与用户间的单向影响关系。严格来说,在审视对社会影响力巨大、事关国家利益的行业或者企业时,不应简单地以符号化的私主体为其定性,而要考虑其对更为弱势的其他社会参与者的影响关系。在特定私主体关系间的语境中,假设某一方主体拥有对相对方主体特定事项的控制能力,具有控制能力的主体方就可被称为有特定的“私权力”。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信息平台企业直接控制着中国网民的信息获取窗口,已经在实质上掌握了远大于私权利范畴的“私权力”,网络信息平台企业群体甚至可能拥有超越政府的信息媒介影响力。表面上看,为网络信息平台设置信息审核责任是对其单方面设置限制,似为不利,但在其从法律层面担起这份责任的同时,网络信息平台也获得了管理网络信息的更多权限,可以说是国家对平台本已掌握的“私权力”进行了“确认”。国家以类似“职权”的方式将网络信息审核工作安置在了平台主体上,并非是向社会转移治理成本,也非滥纵网络资本肆意影响社会,而是将私主体一定程度地“公共人”化,借助公法的“权责统一”规则来规制网络信息平台。平台商的实质身份不再仅是私主体,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应者也理应承担更多关于信息内容的审核责任。综上所述,要求网络信息平台承担严格的网络信息审核责任,并不是对网络信息平台权利的过度限制,而是对

网络信息平台企业滥用“私权力”的防范以及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注释:

- ①《信息技术信息过滤产品安全检验规范》第二条对“信息过滤”进行了技术标准定义,指“对网络上的信息内容进行实时分析,对预先定义的非合法信息内容进行过滤和拦截”。
- 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九条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
- ③《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审核责任要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对公众号类型的社交信息服务平台提出了对应的审核责任要求。
- ④《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是针对从业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禁止性规定。

参考文献:

- [1] 查云飞. 德国对网络平台的行政法规制: 迈向合规审查之路径[J]. 德国研究, 2018(3): 72-87.
- [2] 王艳阳. 中国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法律制度研究[D].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12: 14.
- [3] 人民日报评论部.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N]. 人民日报, 2022-02-08.
- [4] 刘权. 比例原则适用的争议与反思[J]. 比较法研究, 2021(5): 182.
- [5] 冉连, 张曦.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内涵、挑战与路径创新[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11): 3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nternal Legal Logic of Redistribu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XIE Jingkai, SUN Wei

(School of Legal,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model in China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o public-private supervision. However, the legal logic of redistribu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still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e direct cause of such change is the malfunction of traditional model in information governance—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djust its role whil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enterprises gain more influence. As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ype of public goods,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ose suppliers properly in order to ensure public interests. Adding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n platform enterprises can prevent those enterprises from abusing their power and protect people's legal rights.

Key words: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enterprises; public goods; public interests; power and legal rights

主持人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医疗卫生史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期刊发的3篇论文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工作,分别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推动种痘事业的兴起,最终根除了天花对人民健康的威胁;为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党和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包括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多部门通力合作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药品下乡;作为中共特别党员的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教育,为根据地和新中国培养了宝贵的医疗卫生人才。这些成果多角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本刊将在下期继续围绕医疗卫生史刊发若干文章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专题主持人胡安徽,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药物地理、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中药杂志》《中华医史杂志》《医疗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红旗文稿》《军事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专著(编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贵州省哲社重大项目、贵州省哲社重点和一般项目、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项目、临沂市社科联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曾获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委员、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学术先锋等荣誉称号。

药品下乡:最初的努力与成效(1953—1964)

李 剑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1953—1964年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卫生部致力于推动药品下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时期曾出现两次药品下乡高潮。通过增加下乡药品的种类、降低药品价格、延伸销售网点、培训基层人员等措施,农村居民的医药可及性大大提高,这种工作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关键词:当代中国;非处方药;下乡;回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09

中图分类号:F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51-06

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即采取了多项措施,药品下乡就是其中之一。1953—1964年,卫生部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共同致力于推动药品下乡,并形成两次高潮,其工作模式则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目前未见学界有关药品下乡的研究。爬梳原始文献,探讨其

历史动因以及最初十年的做法与成效,有助于丰富当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的研究内容,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和实践成果的认识。

一、初衷:“要把药品供给广大人民”

(一)“把卫生工作推广到死人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广大农村生活极端贫困,医

收稿日期:2022-09-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新中国早期中医药的历史叙事”(21FZSB018)

作者简介:李剑(1964—),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医学史研究。

药资源匮乏,偶有药贩下乡,药价也非常昂贵。^[1]长期奋斗在艰苦环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的医药卫生状况有着清晰的认知,服务占全国85%以上的农村人口,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用列宁的话,就是“把卫生工作推广到死人的地方去”。^[2]

当时,全国400余家公、私药厂集中于沿海城市,原料药品仰给外国,生产能力低下;医药商业逐利导向明显,农村医药奇缺。1949年10月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定:发展制药工业,大量生产原料药,成立中国医药公司。^[3]

1950年8月,中国医药公司在天津成立,以统一领导全国医药生产和购销。^[4]在同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式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直陈农民和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强调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随后召开的全国制药工业会议,讨论了我国制药工业“面向工农兵,中药科学化、西药中国化”的方向,确定了“发展原料药为主,制剂为辅,自强不息,生产自给”的方针。^[5]增加农村医药供给成为上述会议的共同议题。

目前所见最早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发展国药”和“成药下乡”的建议,是天津隆顺榕药庄的刘华圃。1951年10月考察华北农村后,他提出上述建议,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同年,刘华圃组建“天津市成药公司”,率先开展成药下乡工作。^[6]

中国医药公司成立后,对农村药品供需情况做了调查。1952年6月,该公司第一届全国大行政区公司经理会议上,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强调,“中国医药公司的任务只有一点,要把药品供给广大人民,满足广大人民对药品的需要。”^[7]11月的中国药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也强调:“药品下乡是药品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环节。”^[8]12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定,“组织药品和卫生器材下乡,作为今后药材生产供应工作的中心任务”。^[9]

药品下乡首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药品,经过努力,1953年,药物和卫生材料产量已超过抗战爆发前6倍,尽管如此,但农村缺医少药现象仍十分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医药公司提议,联合商业部、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开展成药下乡工作。药品下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展开。

(二)药学工作者的讨论

1953年,非处方药物制度尚未在我国施行,药品下乡实际上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常见病、无须医生处方的中西成药,故而此时期的“成药”与“药品”互

见。“药品下乡”一经提出,便引起药学工作者的热烈讨论。慰农指出,首先要确保下乡药品质量上乘。“在中药方面,应当讲究一下合理的制造方法,选制一些效用确实的丸散膏丹。在新药方面,应该慎重选制一些普通常用的特效而价廉的药剂。”^[8]¹⁰⁹他建议由卫生部搜集各地整理出来的中、西成药配方,加以审核综合,制订《中药丸散膏丹经验方规范》《新药经验方规范》,并组织公、私药厂规范制药,普遍供给农村。他还对下乡药品的宣传、包装、价格、基层网点设置等提出建议。万子平认为,农村中、西药人员匮乏,成药下乡必须切合需要。他推荐了13种内、外用西药。^[9]¹¹¹罗莹主张尽量采用国产药材,制成各种制剂,用通俗的文字说明药品的用途、用量和用法,便于农民自行购买、应用,预防和治疗疾病。此外,“在制造的时候,这些药品必须切合农村中的多发病,效用确实安全,避免夸大宣传,在价值上必须低廉,以免增加农民们的负担;在包装上必须严密,并适合一个治疗量,避免有所变质浪费或不足;最重要的这些家庭用药的处方必须由卫生部门拟订或批准,并且指定一定的药厂制造,经过检验合格之后才能销售。”^[10]江苏某药房则针对农村常见病,推荐了若干消化道、呼吸道疾病及寄生虫病常用药。^[11]毫无疑问,学者们的建议和和药店的做法,既体现了他们对农民医疗条件改善的重视,也彰显了他们真诚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的殷切希望。上述建议多被吸纳。在当年晚些时候有关部门的通知中,既表明有关部门对药学工作者意见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这些部门对药品下乡的积极态度。

二、探索:政策安排和工作模式

(一)下乡药品的品种及生产组织

1953年11月21日,商业部、卫生部、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执行药品下乡的联合通知》。通知明确了药品下乡的方针任务:面向工农,薄利多销,依靠供销社,利用城镇药房和商贩开展工作,稳步前进,以维护人民身体健康,解决农村医药需要。通知还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原则和分工。^[5]³⁹按照通知,中国医药公司安排药厂生产及基层销售人员培训;供销合作社系统负责农村和中小城市的供应。为适合农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便利携带和保管,防止误用滥用,通知规定下乡药品包装应坚实价廉,采用小量包装,并附以简单通俗的说明。此外,通知还确定了每种药品的规格、应用范围、用法和注意事项。^[12]这些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取得了积极效果。

经卫生部审定,中国医药公司初步规定了首批27种下乡药品。其中,有解热镇痛片等内服成药15

种,清凉油等外用成药 12 种。^[13]另有 56 种中成药。医药工业部门委托信誉素著的药厂监制成药,并冠以“保健”商标。中国医药公司还拟定《药品下乡实施方案》,统筹安排药品生产调拨。^[12]更多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增加了部分品种,^{[14][13]}如黑龙江省将下乡成药品种调整为 32 种。^[15]

(二)“药品下乡”的基本做法和各地的探索

1. 基本做法

1953—1964 年间,中、西成药主要依靠县以下供销合作社、百货公司、贸易公司和卫生院(所)等承销。中国医药公司山东、河北、山西、黑龙江、重庆等省、市公司组织成药下乡时,都注意依靠供销合作社,通过价格优惠、稳定供货、送货上门等措施加强协作,深入农村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建立业务关系。^[16]中国医药公司还综合各地经验,总结出一套“四摸”(摸发病情况、摸医疗卫生条件、摸用药习惯、摸市场需求)、“五帮”(帮助营业员熟悉商品知识、帮助组织进货、帮助陈列商品、帮助宣传介绍、帮助改进经营管理)、“三进社”(人员、技术和小成药同时进入基层供销社)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后来在全国推广,有效地推动了药品供应基层农村。

在此期间,各地都转发了“三部一社”通知,成立了省、专、市(县)级药品下乡工作委员会,协同开展药品下乡计划、销售和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基层销售人员,短训班是常见的方式。各地医药公司还派出联络员,会同当地卫生部门深入农村,为基层供销合作社培训下乡药品营业员。^[15]各地医药商业部门还编印了大批《成药下乡手册》、药品广告、宣传画。河北定县专区的做法颇有特色:利用农村集市、群众集会,用黑板报、广播及在学校和团体中宣传等办法,介绍成药下乡的意义,说明成药的品名、用法等。^{[14][169]}

2. 各地探索药品下乡路径

1953 年 3 月,辽宁抚顺市协调卫生、商业和合作社等部门,在市郊合作社设立药品部,推销中西成药等。8 月,该市卫生局等单位组成调查组,到市郊 31 个合作社的药品部,检查督促工作进展,帮助解决问题。^[17]黑龙江按“限制品种、扩大数量”原则确定了 32 种下乡药品;对不适合在农村销售的品种,如氨基比林、米格来宁、安眠药片等,按原价折算换货,以保证用药安全。至 1953 年 8 月,黑龙江省 2028 个基层供销合作社中,已有六成以上供应下乡药品。^[15]

1953 年 9 月到 10 月,广东省卫生厅牵头成立了该省推行药品下乡工作委员会,负责药品下乡的

计划、推行、布置及检查督促等。该委员会选定解热止痛片、菌痢药片、驱蛔虫片、疟疾药片、胃痛片、止咳糖浆、龙胆紫和红汞水等常用药为下乡药品。前 4 种药品当年 11 月出厂供应,年底时全部品种出厂。该省根据“面向工农、薄利多销”原则,主要依靠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中西药店、杂货店销售,并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办法,以顺德、连平、徐闻、文昌 4 县做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18]湖南、广西的做法与广东类似。^[19]

至 1953 年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辽东、河北、安徽、黑龙江和武汉、旅顺、大连、上海、重庆等省、市卫生厅(局),均已会同当地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医药公司等有关单位,推出首批下乡药品。^[15]药品下乡取得了很大成效,1954 年温州合作社和百货商店的成药销售额分别上升了 19 倍和 3.88 倍即是明证。^[20]

药品下乡后,减少了农民使用不法摊贩所售伪劣药的机会,增强了农民对人民政府的认同感。河北定县四湖村和辛庄的群众都自动提出愿意增股的要求,希望增加药品供应品种。^[18]上述工作模式和具体做法,成为此后药品下乡工作的范本。

3. 保障措施及其成效

由于制药工业的迅速发展,1953 年底,国产药品已能部分取代进口品种。中国医药公司第一届全国计划会议上,确定当年组织国产货源占比由 1953 年的 40% 增至 60%,并确定包销国营药厂及地方国营药厂的药品,扩大对私营药厂加工订货,促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为扩大对农村的药品供应,会议指示,必须依靠合作社、县(区)医院、百货公司,利用中、小批发商和中药铺等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同时,有重点地适当地增设机构,充实门市经营。^[21]

卫生部一直关注药品下乡工作进展,尤其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54 年 2 月,《健康报》指出,许多地区未能掌握好下乡药品的品种、范围,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和缺点,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18]8 月,该报社论要求各级卫生部门协助训练售药员,经常进行业务指导;^[22]并批评部分地方培训工作不到位,造成农民误用和中毒事故。^[23]10 月,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派工作组去热河、哈尔滨、沈阳等地调研中成药产销和供应存在的问题,随后加强了对中成药生产的指导。^[24]

经过努力,1954 年农村药品供应额比 1953 年增加了 4.58 倍。1955 年第一季度比 1954 年同期增加了 2.38 倍;1955 年上半年下乡药品已占总销售额的 23%,1955 年底增至 28%。大多数县(区)

有一个国营公司或合作社经营下乡药品,并向私商开展了批发业务,乡村基层合作社大多开展了零售业务,乡村药价基本趋于稳定。^[25]至1954年11月,全国已有9962个基层合作社、306个县百货商店及278个贸易公司经营成药。各地训练了2918名经营成药的营业员,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成药经营工作的开展。^[26]1955年3月,中国医药公司各地分、支公司准备供应农村的药品总值比上年增加了60%。1月到3月,该公司重庆采购供应站运到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的成药,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多,品种也由上年的93种增至122种。当时全国经营成药的基层合作社和百货商店逾13000个,经营品种近200种。经过训练,熟悉成药性能的营业员已有5000多名,并创造了“背药下乡、送货上门、就地传授”等便利农民的销售方法。^[27]

三、高潮: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的药品下乡

(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阶段的药品下乡

为配合酝酿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商业部、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1955年7月19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成药下乡的指示》。^[28]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农业合作化开始加快步伐。1956年1月26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对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9]

面对新形势,中国医药公司要求各省、市医药公司扩大和改进农村医药的供应,重点增加供应消灭主要疾病的药物。各地普遍建立药品下乡的联络员制度,分片包干,帮助基层开展业务,加快了专区级机构和县药房建设,并认真推广“三进社”和“四摸五帮”经验。^[25]

1956年初召开的中国医药公司全国经理会议上,研究规划了农村医药商业网的设置及农村医药供应工作,安排了消灭疟疾、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麻风、梅毒等七种主要疾病的药品。^[30]2月召开的1956年度全国医药第二次平衡供应会议上,决定增加全国药品供应量37%,重点加强地方病防治用药和农村需用成药的供应。奎宁片等治疟药比上年增加0.5~4倍;解热镇痛药和驱虫药也比上年增加58%~98%。^[31]6月4日,商业部、卫生部、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加强农村药品供应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农村药品供应(包括牲畜用药),做到农村人畜两旺,保证农业生产发展。通知对商业、卫生、供销部门在加强农村药品供应工作中的具体任务和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5]63}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医药经营体系更加健全,医药市场更加统一,为推行药品下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1957年,全国医药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952年的9倍多,用于防治地方病的药物及用量较大的解热镇痛药均已实现了国产化。^[32]1957年3月10日起,中国医药公司降低医治血吸虫病、蛔虫病、钩虫病、麻风病的药品售价,降幅为7.7%~46%,减轻患者负担150余万元。^[33]

至1957年底,医药商业机构已发展到1339个,较1952年底增长4.4倍;人员发展到30693人,较1952年底增长23倍;^[34]各地普遍加大了基层营业员培训力度。^[35]下乡药品销售额逐年上升。以通过百货公司和供销社下乡的医药金额计,1956年比1953年增长10倍;1953年下乡药品占医药销售额的5.2%,1954年升为16.5%,1955年升为23.8%,1956年升至24.9%。药品下乡工作的开展,部分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对提高劳动出勤率、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33]

(二) “大跃进”时期的药品下乡

1958年1月,商业部确定了“对适合农村需要的一般医药用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4月召开全国医药工业会议,研究医药工业贯彻“多快好省”和“大中小型结合”的方针,加快中西药品生产等议题。^[36]5月,商业部在京召开“全国医药跃进规划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在二三年内改变农村医药卫生的落后面貌,人强马壮,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经大会议决,这一口号作为全国医药商业供应农村的方针。^[15]

在此背景下,1958年6月初,第一商业部和卫生部在河南省登封县召开医药供应工作现场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医药跃进规划会议”精神,推广该县发展基层销售网点的做法和经验。^[37]第一商业部曾传六副部长在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医药卫生的状况还很落后,去年全国医药系统的贸易额为11.5亿元,其中供应农村的部分只占3.5亿元(平均每人7角钱)。……这次确定的医药供应方针就明确规定,今后医药供应工作的重点是在农村,供应的范围是既管人,又管兽,也管工农业化学试验用品,目的是为了保证人强马壮,为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时间是争取二三年内。”^[38]

商业部医药局随后在黑龙江省青冈县、河北省张北县召开推广登封经验的会议,推动了各地、县以下医药供应网点的发展,使公社医院能够就近买到医药商品。^[15]四川大足县学习登封经验,很快建立了医药供应网,便利农民群众就医购药。^[39]

为进一步加快全国医药商业对农村的供应,1959年9月、1960年3月和11月,国务院三次发布通知,降低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类药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连续3次亿元以上全国药品大幅度降价,有效增加了农村医药的可及性,满足了当时主要疾病防治的需要。^{[5]101,103,109}

国民经济调整后,鉴于农村幅员广大,农民购买力低,经营医药商品的基础薄弱等因素,医药商业部门调整了农村医药市场发展方略,更加强调整循序渐进。1962年的全国医药计划会议指出,“全国医药跃进规划会议”提出的口号,有要求过急、包得过多和脱离实际的缺点。^[15]为解决这些问题,1963年10月,《人民日报》对黑龙江省肇州县医药商店作了专题报道。商业部通知全国商业企业学习该医药商店勤俭办商业的经验,以期扭转“大跃进”的做法。^[40]12月,中国医药公司在肇州县召开勤俭办企业经验交流会,推广肇州县医药公司建设县以下批发和零售网点的做法。这次会议,对全国农村基层医药商业的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生产,尤其是解决农村疾病问题。黑龙江省木兰县自1963年春调整城乡药品分配比例,农村由过去的73%提高为76%,适合农村需要的中成药也由40%提高到80%,并提前下拨了当年夏季用药。该县药材公司还通过下乡巡回医疗、医疗单位用药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基层需求,到偏远生产队送医送药。^[41]辽宁金县医药公司则通过加强下乡联络员的工作、召开供应会议、培训供销社售货员、实行合同供应等措施,提高了工作质量。^[42]

四、结语

组织药品下乡,逐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是贯彻新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方针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制药工业的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销售渠道的拓展,基层人员的反复培训,药品价格的下降,无不体现出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农民关心。各地形成的药品下乡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并长期延续,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制药企业和无数像“担子经理”陈新如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长期努力和坚持^[43],逐步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部分满足了农民对基本药物的需求,这项工作的显著成效和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因医药资源总量和分布所限,尽管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药品下乡的两次高潮,仍未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1960年代初下乡成

药品种少、剂型单一等问题仍然存在。^[44]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宣教工作依赖群众运动,农村误用药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45]

参考文献:

- [1]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云南省志卷七十: 医药志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278.
- [2] 汝作. 把卫生工作推广到死人的地方去 [J]. 新医学报, 1949(1): 38-39.
- [3] 萧离. 自强奋斗生产自给: 记全国制药工业会议 [N]. 健康报, 1950-09-28(2).
- [4] 新华社. 统一领导医药购销和生产中国医药公司在津成立 [N]. 人民日报, 1950-08-12(03).
- [5] 该书编写组.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1990年)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 [6]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北历史名人传: 工商经济卷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12.
- [7] 中国医药公司编. 中国医药商业史稿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56.
- [8] 慰农. 药品下乡问题 [J]. 药学通报, 1953(3): 108-109.
- [9] 罗莹. 推行家庭用药是组织药品下乡的有效办法 [J]. 药学通报, 1953(3).
- [10] 万子平. 对于药品下乡的个人见解 [J]. 药学通报, 1953(3): 109-111.
- [11] 江苏省泰县溱潼利民药房业务组. 对药品下乡的补充意见 [J]. 药学通报, 1953(7): 293-294.
- [12] 上海正为农民制造家庭常用药品 [J]. 药学通报, 1954(3).
- [13] 中国医药公司初步规定二十七种下乡成药 [J]. 药学通报, 1954(4): 170-171.
- [14] 该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2009.
- [15] 许多省市推销成药下乡供应农民需要 [J]. 药学通报, 1954(4): 169-170.
- [16] 国营医药公司积极组织成药下乡 [N]. 人民日报, 1954-04-25(2).
- [17] 抚顺市人民政府卫生局. 东北抚顺市药品下乡工作初步总结摘要 [J]. 药学通报, 1954(3): 129-130.
- [18] 推行药品下乡 [J]. 药学通报, 1954(1): 44.
- [19] 健康报发表社论号召做好成药下乡工作 [J]. 药学通报, 1954(4): 171-172.
- [20] 大公报讯. 中国医药公司温州药房开展下乡成药业务 [J]. 药学通报, 1954(3): 129.
- [21] 中国医药公司确定增加组织国产货源、促进新药下乡 [J]. 药学通报, 1954(3): 128-128.
- [22] 社论. 当前农村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N]. 健康报, 1955-08-12(01).
- [23] 卫生主管机关协助合作社搞好销售成药的工作 [N]. 健康报, 1954-01-14(4).

- [24]各地大量制造中药成药[N]. 人民日报,1955-02-28 (2).
- [25]王化民. 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入开展药品下乡[J]. 药学通报,1956(1):2-3.
- [26]中国医药公司成药下乡工作有成绩[N]. 人民日报,1954-11-09(2).
- [27]新华社. 医药公司供应农村药品增加[N]. 人民日报,1955-03-23(2).
- [28]王季平总纂,孙国忠主编.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吉林省志卷23:医药志[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571.
- [29]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J]. 新黄河,1956(2):6-11.
- [30]李文彦. 中国医药公司规划农村医药供应工作[N]. 人民日报,1956-01-24(2).
- [31]全国医药1956年度第二次平衡供应会议闭幕[N]. 新华社新闻稿,第2108期,1956:13-14.
- [32]轩济东. 从全国化学工业综合展览会来看我国医药工业发展情况[J]. 药学通报,1957(12):571-572.
- [33]中国医药公司通讯组. 中国医药公司降低几种药品的价格[N]. 人民日报,1957-03-15(06).
- [34]商业部医药局. 医药商业十年[J]. 药学通报,1959(9):433-437.
- [35]抚顺市社会科学院. 抚顺市志第六卷[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201.
- [36]本报讯. 纪全国医药工业会议[J]. 中药通报,1958(7):219-220.
- [37]第一商业部与卫生部召开登封现场会议[J]. 药学通报,1958(7):304-304.
- [38]曾传六. 登封县树立了医药卫生工作的旗帜![J]. 药学通报,1958(7):305.
- [39]崔义田. 发展中西药生产满足人民需要[J]. 药学通报,1959(5):207-209.
- [40]新华社讯. 肇州医药商店:勤俭办商业的一面旗帜商业部通知全国商业企业学习它的经验[N]. 人民日报,1963-10-19(01).
- [41]母子光. 黑龙江省木兰县药材公司面向农村,支援农业[J]. 药学通报,1963(5):232-232.
- [42]辽宁省金县医药公司. 开展农村医药供应工作的一些体会[J]. 商业工作,1964(17):6-7.
- [4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6.
- [44]郝玉良. 帮助基层配制农民需要的制剂[J]. 药学通报,1966(4):176-177.
- [45]张文清. 农村药剂工作的几点体会[J]. 药学通报,1957(8):371-37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Household Drug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itial Efforts and Results(1953—1964)

LI Jian

(Basic Medical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dong,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From 1953 to 1964, state-owned businesse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we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medicines to the countryside to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medicines to rural residents.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there were two upsurges in sending medicines to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varieties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reducing drug prices, extending sales outlets, and training grass-roots personnel, the accessibility of medicines to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working model continued until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review

对决天花：种痘事业的兴起与天花的根除

贾吉庆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天花疫情发生,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较差,许多民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普遍对接种牛痘缺乏热情。为此,党和政府将天花疫情防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制订天花防治规划、领导各地训练种痘员、加强种痘宣传,同时建立健全了天花疫情报告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一次全民性的种痘运动,遏制了天花疫情的蔓延,改善了新中国的卫生状况,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花;防治规划;种痘运动;成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0

中图分类号:K249;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57-05

卫生问题不仅是生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开展的一系列针对天花疫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构成了党和政府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方面的一项国家实践。由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和条件落后,卫生部门借助政治与社会资源,以一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天花防治工作,完成了一次“群体防疫”。关于天花防治工作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部分讨论,且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国家部门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是遏制天花疫情的主要力量。本文以地方史志、老旧报刊资料为基础,重点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力量是如何主导和介入天花防治中去的,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中国卫生防疫机制变迁等问题。

一、新中国的天花流行概况及原因

天花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曾被英格兰人称为“最恐怖的死亡使者”,在中国也常有肆虐,资料显示,天花每隔数年即暴发一次,仅在1933—1946年的十余年间,因天花疫情传播发病的人数就高达38万^{[1]102},病死人数不可考,在卫生条件极度落后的近代中国,一旦身染天花,则严重危害生命健康。1945年,“湖北来凤天花流行,高洞乡卧床者十有其三;

死者十有其二。”大河坝上30余死者周身溃烂,臭不可闻,抬夫皆以白嵩塞鼻^{[2]343}。北京市自1937年至1950年每年均流行天花,据1948—1949年统计,市区发病高于郊区,发病年龄以9岁以下儿童为最高,占总发病数的61.02%;其次为20岁~29岁,占21.65%^[3]。天津市1931—1949年中有14次较大流行,1949年发生96例,死亡19例^[4]。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天花的流行仍为猖獗,且避疫方式较为消极,如湖北省1949年冬,京山县政府机关、学校因天花流行,只好迁移校址去八里头避疫。1950年1—10月,该省天花发病数达4182人,病死1067人,死亡率达25%。此时人痘种植尚有一定市场,该省公安夹竹园的沈俊义,用人浆疮为他人种痘,引起天花流行,更加重了疫情的肆虐^{[2]343-344}。即使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天花的发病、死亡人数也十分多,如青海省1950年西宁、化隆、共和3市、县共发生天花76例,死亡率为0.64%^[5],广西壮族自治区有7896人发病,2552人死亡,死亡率达32.32%^[6]。从全国范围来看,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103},其肆虐如此严重,除因其本身的巨大传染性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卫生工作的忽

收稿日期:2022-09-19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

作者简介:贾吉庆(1997—),男,河南方城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医疗卫生史。

视,我国的卫生基础严重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是一个极其严酷的局面。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约有2600家医院,病床8万张,这些为数不多的医院在空间分布上极其不均,地域广大的农村只有20133张病床。药品的制造与供应更是跟不上,许多医疗药品国内都无法生产,甚至有些技术性相对不高的医疗器械也必须从国外购买^{[7]2},部分地区的农村甚至连中医都没有,且有的医生素质不够高,乱投药饵,有的医生用“鸬鹚菜”“娃娃宁”等去治天花,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浪费群众的钱财^[8]。“广大农村普遍缺少医药,农民有病只有求神拜佛,遇有疾病流行,只有听天由命”^[9],“巫神僧道及其他游民趁机欺骗,因而引起社会不安与恐慌,以致人民流亡,造成更大的传播机会”^[10],可见,民众落后的卫生观念也是天花流行的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并没有足够的防疫常识,“发生疫病后不知预防办法,往往手足无措……有的还因上学、串门等把传染病带至别处”^[8]。这些因素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花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二、党和政府的天花防治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天花疫情流行所带来的危害已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若不加以严力防控,势必会影响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新政权的巩固,卫生防疫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军委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天花早已可以用种牛痘的方法预防,但仍远未根绝”,面对天花疫情流布而出现的病患,“单靠治疗既无条件也无可能。只有积极采取预防措施”^[11]。预防为主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经验积淀,而贺诚的讲话也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由李德全任部长,贺诚、苏井观任副部长^{[7]28},自此,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有了统一而集中的领导机构。1950年2月,卫生部又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指出:“天花最易预防,只要推行普种牛痘,隔离病人及接触者……即可能奏效。”^[10]为了保障地方痘苗充足,卫生部采取重点防治的办法,为天花重点流行区域运送牛痘苗^[12],还于河北省涿县建立卫生试验区,积累了天花防治的初步经验^[13]。同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副部长贺诚对“预防为主”方针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对天花等急性流行病“应该马上着手,组织普遍的预防”^[14]。1950年10月7日,政务院下发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利用秋季的黄金时间推行免费种痘^[15]。

全民性的种痘事业正式发端于1950年10月12日,卫生部发出《关于种痘暂行办法的指示》,为推进种痘运动的规范化,还颁布了《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即应种痘”,“届满6岁、12岁、18岁时再各复种一次”,同时要求全国人民普遍种痘^[16],为各地的普种牛痘提供了原则性指导。各省、直辖市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制订天花防治规划。河北省即提出要在2—3年内消灭天花的计划,推动种痘工作^[17]。山西省人民政府为严格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秋季种痘工作的指示》,要求该省各级卫生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形,参酌卫生厅卫防字第三〇一号通知,大力开展工作^[18]。1950年11月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秋季种痘运动指示及注意事项》,推行秋季种痘,并一律免费^[19]。安徽省以市县卫生机构为基层种痘领导地位,并抽调干部与中西开业医务人员协助地方领导机构^[20],为种痘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推动规划的实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1年4月10日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明确了防疫工作的方向,制订并通过了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关于防疫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共14个文件^[21],为各地区开展防疫工作提供了制度参照。

三、种痘队伍的组织与种痘宣传的开展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件精神与各省区的指示,各地开始有序地加强领导、组织推行种痘工作。为了充分了解各地的天花流行情况,1950年,卫生部先后派出400余名工作人员,分赴黄泛区、皖北、苏北等灾区协助当地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环境卫生及流行病情况^[22]。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约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23]。山东省鲁中南地区还规定各级政府由首长负责领导卫生科及相关部门建立各级防疫委员会,直接领导种痘运动。为了保证种痘的效果,还组织了一批医务人员成立巡视小组来监督种痘工作,听取群众的反映^[24]。

为解决种痘人员的缺乏问题,各地着力培养了一批素质过硬的种痘员。如1951年江西省要求本省采取“带徒弟”的形式“一面做、一面教”,各地乡村以本乡不脱产的乡村干部、妇女干部、小学教员以及中医、知识青年为主要训练对象,由各乡政府挑选保送受训。城市的训练以区为单位,由区政府召集、由卫生院派员到区政府训练。训练内容以种痘手册为教材,

从实地工作中教会学员,内容涉及免疫学常识、痘苗保存、消毒法、种痘方法等。训练时间以三天为基础,为了保障种痘员的生活,该省还规定每名种痘员由省卫生厅补助伙食费一万元,这些种痘员在乡村每种一人,由省卫生厅补助旅费30元^[25]。通过这些措施,各地的种痘队伍迅速壮大。如1953年2月,北京市西矿区卫生院组织当地医生分段负责进行。为发挥助手作用,该市的红十字会首先开办了种痘员训练班,先后在工矿、街道等地利用休息时间和一个下午共举办5次训练,训练了包括急救员、接生员和积极分子在内的137名种痘员,他们通过约4个小时的学习,掌握了消毒、点浆、平划法以及种痘禁忌等简单规则。许多红十字会员感受到入会后不但提高了卫生知识水平,还学会了技术,可以为人民服务,认为“做新中国红十字会员真是无比的光荣”^[26]。

为了有效动员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种痘运动中,各地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种痘宣传。如许多群众坚持“桃树开花再种痘”,只认为种痘是在春季,不明白秋冬种痘的好处。且大部分人认为种一次保一辈子,不懂种痘只管三五年的道理^[27]。为此,山东省济宁市的红十字会在种痘前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该地一开始在3个乡进行重点布置和动员,之后在区里召开村干部会议,作全面布置,再由乡脱产干部召开村干部会议,具体落实到村里,主要是扭转群众“非春暖花开不种痘”的思想,在种痘时,还通过画报和标语等方式进行个别的说服工作,消除了“产后6个月不种痘没关系”等落后的想法,根除了春季种痘后不再重复种痘的做法^[28]。吉林省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种痘所用的痘苗、卫生材料费用一律由人民政府承担,不向群众收费,提高了群众的种痘积极性。为提高广大群众对普种牛痘的认识,该省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破除了群众中带有迷信色彩的思想^[29]^[27-28]。

多样的卫生宣传教育形式,不仅使广大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与各种措施、增加了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了卫生水平、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也增加了群众对战胜天花病毒、建设美好新中国的信心。

四、天花疫情防范制度的完善

为了及早发现天花疫情与病例,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1951年3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春季防疫指示》,要求各地必须认真贯彻疫情报告制度,城市须设置以十户为单位的卫生小组长、街卫生委员、街段责任医师。农村地区建立十户卫生

小组长、村卫生委员、区卫生助理,构成基层疫情报告网,以便在疫情发生时可以及早采取措施,弄清楚传染来源,同时向上级报告^[30]。在卫生部指引下,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对各种传染病预防与处理的意见,规定发现天花等疫情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31]。部分地区还实施奖惩办法,如1950年2月,河南南阳地区专署颁布防疫奖惩法,即在防疫工作中能及时报告疫情,协助治疗及抢救患者,积极扑灭疫情者可分别给予表扬、记功、嘉奖。凡对疫情报告不及时者,给予警告、记过、通报批评等处分。5月,专署又指出疫情要随有随报,疫情报告制度在南阳地区渐趋完善^[32]。

对天花疫情突发的重点疫区进行紧急有效的处理,是防止疫情传播与流行的关键。为此,1950年2月10日,中央卫生部联合军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凡遇传染病人,应及早发现并诊断,进行随时消毒,调查其传染来源,并立即向上级报告,此外对接触者实行健康隔离”^[33]。1952年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城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1952年4月15日,周恩来又在反细菌战工作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34]。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将天花等列为甲类传染病,制定了紧急防治处理办法。当发现天花病人后,即按照管理办法进行紧急防治处理,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外,向家属陈述利害,并进行就地隔离、护理、医治病人;对病人接触过的物品、器具进行消毒处理;严密观察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封锁疫区,在一定范围内应急种痘,扑灭疫情^[35]。此次对重点疫区采取的紧急措施,很快切断了传播链,使天花不能继续扩散,从而就地被消灭。由于各地在普遍种痘的基础上又加强了紧急防治措施,进而有效制止了天花的传播,天花流行地区大大减少。

突发性疫情出现后,各疫区之间加强交通卫生检疫是必要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烟台市即在人民政府的指示下建立海港检疫所,此后,安东、集安、图们、营口、山海关等地也相继设立检疫机构^[36]。同年11月27日,政务院发布《进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规则》,规定检疫机关“负责检查船员、旅客的病疫,船舶的卫生设备及有

关预防接种、货物消毒……工作证件”^[37]。1950年2月27日,卫生部召开全国第一次交通检疫会议,确定今后交通检疫应以防止传染病流行、保证人民健康作为重点方向^[38]。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将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流行性脑炎、鹦鹉热、雅斯病、麻风、炭疽等10种疫病列为检疫传染病。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又颁布了《民用航空检疫暂行办法》^[39]。1957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通过,以国家主席令的形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规定鼠疫、霍乱、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6种疾病为检疫传染病^[40]。这些详细的检疫办法,为各地交通检疫机关和卫生防疫机关开展工作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依据。

五、天花的彻底根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关怀人民的健康,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令人恐惧的天花。在短暂的时间内消灭了一个传染病,其成就是巨大的。以河北省1950年推行的种痘运动为例,因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卫生宣教,河北省仅半年即种痘800万余人次^[41]。湖北省在1950年的《湖北省普及种痘、消灭天花三年计划》指导下,同年8月30日,又成立基层卫生组织,大规模培训种痘员,1950年秋季完成了本省人口10%的种痘,1951年春季完成本省人口32%的种痘任务,1953年内将全省2400万人口一律种完,从1954年起本省再无天花病例报告^{[2]343-344}。1950年,吉林全省天花发病率为9.37/10万,到1955年下降到0.03/10万。从1956年起,全省控制了天花,此后,未再有患者发生^{[29]27-28}。在种痘运动中,江苏省镇江市水上居民有五六千人,他们的生活流动性大,组织起来种痘比较困难,由于渔民来去不定,比较散漫,加上天气冷,他们怕种痘时受凉,尤其是儿童,思想有顾虑,担心接种要脱衣服,实际上只要卷起袖子就可以种痘,因此,该地诊所采用“抢种”的办法,趁着中午或天气暖和的时候划船渡到江中,挨组挨船地为他们接种,并且把种痘工作重点放在划船组,因为他们生活较苦,平时对卫生不够重视。后来,镇江市改进工作方式,先与派出所和卫生委员会联系,主要依靠骨干分子发动群众,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再进行种痘。具体做法是:选出较大的船只设立临时种痘站,由骨干分子四面八方地发动群众来种痘。有的积极分子一次一次地扶着抱着小孩来种痘,有的划着船送人来接种,大家的力量一经发动起来,工作很快就完成

了。小孩子全部种上痘苗,一名从来没种过痘的60多岁大娘,也种上了牛痘。在湖北安庆,为了不耽误农民生产时间,该地在下乡之前先与乡级干部取得联系,说明种痘的意义以及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怀,再由他们传达给群众,然后进行调查研究,确定分组集中的办法,计划一次性全面接种,该地共组织26个种痘队,由卫生学校300多名同学组成。同时为照顾农村劳力少的人家,各组又抽出少数人用流动方式到每家种痘,群众反映良好,认为种痘不要钱,都积极配合。可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扑灭了连年肆虐的天花疫情,同时也以出色的防疫成绩,使人民群众把自身幸福的获得感与人民政府自觉地联系起来,内化为对党和政府真挚的情感认同。

参考文献:

- [1]黄永昌.中国卫生国情[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
- [2]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卫生[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73.
- [4]张宏铸.天津通志·卫生志[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03.
- [5]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六十七·医药卫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4.
- [6]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24.
- [7]《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 [8]新乡专区大力防治传染病 部分干部忽视卫生防疫工作亟待纠正[N].人民日报,1950-04-24(3).
- [9]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 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九月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上)[N].人民日报,1950-10-23(1).
- [10]李德全,贺诚.中央两卫生部指示开展军民春季防疫 各级政府、部队、团体、医务人员应把此项工作看成当前紧急任务之一[N].人民日报,1950-02-11(3).
- [11]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45-154.
- [12]卫生部采各项措施协助各地防治疫病[N].人民日报,1950-02-25(3).
- [13]中央卫生部防疫医疗大队 建立涿县卫生试验区 取得改善农村卫生工作的初步经验[N].人民日报,1950-04-03(3).
- [14]贺诚.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总结报告[J].新华月报,1950(1-6):164-167.
- [15]周恩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M].北京:中

- 央文献出版社,2008:394 - 396.
- [16]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640 - 643.
- [17]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河北省志·卫生志(第86卷)[M]. 上海:中华书局,1995:204.
- [18]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动秋季种痘工作的指示[J]. 山西政报,1950(11):134.
- [19]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西省卫生志[M]. 合肥:黄山书社,1997:170.
- [20]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卫生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290.
- [21] 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各种传染病防治方案 保护人民健康 保证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N]. 人民日报,1951 - 05 - 06(2).
- [22] 卫生部先后派出四个防疫大队到灾区去开展卫生及防疫工作[N]. 人民日报,1950 - 06 - 06(3).
- [23] 李德全.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J]. 新华月报,1951(11):37 - 38.
- [24] 防止天花 准备大生产 鲁中南布置种痘[N]. 人民日报,1950 - 01 - 15(3).
- [25] 江西省各市县一九五一年种痘实施计划[J]. 江西政报,1951(第C1期).
- [26]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 - 2014·第2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十字运动[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102.
- [27] 智力樵. 农村群众对种痘的看法[N]. 人民日报,1950 - 01 - 24(5).
- [28] 济宁市分会打通群众思想进行秋季种痘[J]. 新中国红十字,1952(1).
- [2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志·卷40·卫生志[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 [30] 中央卫生部发出春季防疫指示[N]. 人民日报,1951 - 03 - 23(3).
- [31] 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J]. 北京市政报,1950(8).
- [32] 王利平. 南阳地区卫生志[M]. 南阳:南阳地区卫生局内部印行,1986:66.
- [33]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90.
- [34]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J]. 党的文献,2003(5):15 - 27.
- [35]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3—1955):第2卷[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733.
- [36] 邓铁涛. 中国防疫史[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49.
- [37]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60:59.
- [38] 防止传染病流行保障人民健康 卫生部召开交通检疫会议 就统一领导及增加技术设备等问题作了决定[N]. 人民日报,1950 - 03 - 14(3).
- [39]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307.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1957 - 12 - 24(4).
- [41] 张文,马彦杰,刘和一. 执行预防为主方针 河北开展卫生宣传防疫工作半年中八百万人接种牛痘[N]. 人民日报,1950 - 08 - 12(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Duel Smallpox: The Rise of the Pox Breeding Cause and the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JIA Jiq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mallpox epidemic occurred in almost every province across the country. Compounding the problem,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ere poor those days, many people held feudal superstitious ideas, and generally lacked enthusiasm for vaccinia vaccination. To this en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mallpox epidemic as a political task, taking measures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smallpox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leading the training of pox breeders in various places,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pox,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smallpox epidemic reporting, based on the above measures, a nationwide pox campaign has been completed, curbing the spread of smallpox epidemic, improving the health situation, and shaping the good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mallpox;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ning; kind of acne exercise; effect

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探析

张业蕾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卫生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集体授课,二是个别指导。他亲自向学员传授医疗卫生的理论知识 and 实践经验。他指导学员临床学习,既让学员打下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培养其独立施治能力。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具有授课内容全面、方式方法多样、教育手段灵活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山东抗日根据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1

中图分类号:D61;J120;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62-05

罗生特(1903—1952),原名 Jack Rosefeld(雅各布·罗森弗尔德),奥地利医学博士,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先后担任新四军、山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罗生特面对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人才奇缺的现实局面,在竭尽全力抢救伤员的同时,把培养医学人才作为重要任务,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传授医学知识,培训医疗骨干。^{[1]62}他不仅是医疗技术卓越的医生,还是出色的医学教育工作者,总是毫无保留地对医护人员进行言传身教,深得“医护人员好评”。^{[1]71}在罗生特的精心培育下,“学员们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一批批医护人员成长起来”,不但适应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为新中国卫生战线输送了大批骨干。^{[1]161-162}

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罗生特在中国的生活、医疗技术、医德及在中奥友谊中的作用等方面,对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鲜有专论,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探讨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教育,既有助于拓展罗生特研究的新视角、新内容,又能丰富中共党史和医疗教育史的研究成果。

一、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理念

(一)主张开办卫生学校以培养医疗卫生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面临缺少医务人员、缺少医疗器械、缺少基本药物的困难局面。罗生特认为,在这些困难中,医疗人才不足是最大的不足,故而他提出了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是当务之急的建议,得到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的赞同。^{[2]32}1941年6月,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即宣告成立,当年7月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62名。罗生特亲自制定培训计划并担任教员,讲授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妇科、泌尿科、药理及战地救护等课程。^{[1]61}虽然战场上救护伤员的工作极为繁重,但罗生特仍然坚持定期到卫生学校讲课,毫无保留地向学员传授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2]32}。

(二)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以提升教育实效

罗生特倡导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培养和提高学员的医学理论水平与实际操作能力。他善于结合临床实践对学员进行培训。罗生特亲自为学员讲授专业课程,坚持言传身教,抓住一切机会、充分利用医疗卫生实践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环节对学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引导。为尽快提升学员理论水平,

收稿日期:2022-09-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征时期民间对红军医疗救护资料辑录与研究”(18BDJ055);2022年度临沂市社科联科普项目“沂蒙根据地医疗救护故事口袋书”(2022LX296)

作者简介:张业蕾(1982—),女,山东青岛人,博士,临沂大学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研究中心研究员,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罗生特建议积极拓宽教育载体以提升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他笔耕不辍,时常在卫生刊物上发表文章,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向医务人员和其他读者传播医疗卫生知识。此外,罗生特还提倡培养学员实事求是、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通过实践性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学习热情,坚定做一名好的医务工作者的理想信念。^{[1]104}

(三)推崇教学相长以实现师生共同进步

罗生特秉持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营造和谐深情的师生关系,努力实现师生共同成长进步。罗生特认为,一方面应培养学员认真严谨的学习和工作态度,另一方面应留心观察学员的点滴进步,切实给予表扬以激发学员继续勤奋学习的持久动力。此外,对学员出现的不足或失误错误,罗生特认为应当立即指出,并耐心细致予以引导和纠正,努力提升学员认真负责的态度,竭力避免粗心大意带来的不良后果。为向学员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罗生特认为教师也要加强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与实践技能。他崇尚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追求,奉行“终身学习”的教学理念,秉持严谨的教学态度,认认真真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恪守知行合一的实践准则,努力促成教学相长。^{[1]51}

二、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举措

(一)结合实际需要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作为军医和新四军卫生学校的教员,罗生特主要是对军队学员进行专业医疗卫生教育,同时,他还注重对群众特别是儿童进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授,培育并增强他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与观念。早在苏北阜宁的时候,农民李士芳8岁的儿子患血吸虫病,经罗生特数月的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阜宁羊寒区儿童团有4人得了“大腮帮症”,罗生特也给他们治好了。罗生特在给孩子们治病的同时,耐心地教给当地群众特别是儿童团的小朋友们卫生知识,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预防疾病再次、多次发生^{[2]33}。

罗生特善于从根据地实际和军民实际需要出发,适时进行计划生育、流行病防治等公共卫生知识的教育普及。抗战时期,根据地有不少已婚女同志,她们有的怀孕,有的带着孩子。在日伪军频繁“扫荡”和“清乡”的险恶环境中,女同志无论怀孕还是带着孩子,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故而,很多女同志不希望自己怀孕,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有孩子。^{[2]34}罗生特便开设了人工流产手术门诊,并培养医务人员掌握人工流产手术。^{[2]35}与此同时,他积极宣传教育男同志实施绝育手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计划生育

的观念,罗生特给大家讲避孕、绝育知识,实际上是开了计划生育的先河,^{[2]36}增强了人们计划生育的意识和观念。此外,当出现流行性疾病,罗生特总是迅即在医务人员和干部中开展宣传和授课,耐心细致地做临床示教和手术示范。

罗生特重视通过医嘱等形式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教育。罗生特为罗荣桓诊治后再三叮嘱:途中要多坐担架,尽量少步行,少骑马,骑马时速度不要太快;他还对罗荣桓说,如果能戒掉烟酒更好,要少吃油脂多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和素食,要注意休息,若过度疲劳,血尿还会复发。^{[1]127}罗生特嘱咐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务必注意管好罗荣桓的饮食,让他少吃油脂多的东西,不要吃辣椒,要多吃蔬菜、水果,也可以吃一些鱼虾,最好戒掉烟酒。^{[2]56}通过医嘱方式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有助于患者提升医疗卫生素养,进而帮助患者康复。

(二)遵循教学规律开展医疗卫生教育

其一,注重临床实践。

罗生特善于在临床实践中结合病例对医护人员进行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罗生特十分重视在临床实践中结合病例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每次查房和做手术前,他都会根据病例对医护人员进行讲解,手把手地传授操作技术、无菌技术等,提醒他们应注意的问题;每遇到一些大的手术和疑难病例,他都会向医护人员反复讲解病例的病理及诊断治疗的方法,使医护人员更好地掌握相关医疗知识和技术。与此同时,罗生特还给医务人员做学术报告,尽快提高他们的医学理论水平。^{[1]104}

有个典型事例:1941年秋的一天,罗生特给学员们讲鞘膜积液的诊断治疗,利用当时有鞘膜积液病人的机会,讲完理论知识后,紧接着就在院部给学员们做了手术演示,学员们印象极为深刻,很好地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和手术操作要领。其中,杨易立学员回队后即效法罗生特的演示教学做了3例手术,且每例手术都很成功。

罗生特某次给一位患乳腺癌的病人做切除手术时,为了在临床实践中教育医务人员,他首先向手术室的同志反复讲解技术要领及注意事项,亲自主刀实施乳腺切除手术示范,从而使医务人员掌握了乳腺切除手术。在为位难产妇女接生后,罗生特随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解难产妇女的护理方法,使他们很快掌握了护理的要领和具体操作办法。^{[1]62}

其二,善于因材施教。

罗生特注重培养学员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生特讲授课程时非常注

重培养学员从实际出发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根据地的实际条件,他在讲解如何固定伤肢问题时说,夹板不一定非要用木板制造的,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如果有树枝就用树枝,如果没有树枝则可以用枪把、伞把甚至用高粱秆也行;假若这些也没有,那么用鞋底也行,它们都可以代替木制夹板。从实际出发,在正视困难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救护伤员,这既彰显了罗生特实事求是的精神,又体现了他因地制宜的教学风格。

罗生特善于运用实物展览的方式帮助学员认清自身使命,激发学习热情。罗生特曾成功地做了许多膀胱积石摘除手术,摘除的积石成了卫生部内的展览品。一些原本学习上不安心、认为当医生不如上前线的学员在看了那些拨弄后能叮当作响的石头后,对卫生工作的兴趣大大提高,并立下救死扶伤、做好医务工作的志愿。^{[2]74}

其三,集体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当时的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学员绝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学校也没有固定校址,常常在行军间隙上课,教学标本除了学员自己寻找的几副骨骼外,几乎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医学教学,困难不言而喻。为了适应学员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罗生特常常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地反复讲解和示范教学,对少数基础差的学员则“开小灶”,个别指导,故而学员们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都得到了提升。

在学员进行外科临床学习时,罗生特先集体讲解和示范皮肤如何消毒、切开、结扎止血、缝合包扎等基本技术,而后让学员进行练习。对动手能力差的学员,他手把手地逐一指导,从而使学员能在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外科手术的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2]72}较好地提升了教学实效。

其四,融贯中西、兼收并蓄开展教学。

融贯中西、兼收并蓄是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的主要特色。他虽获得奥地利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学识渊博,但是他很谦虚地认为自己所学不一定就比中国传统医学高明。相反,他很赞赏那些按照传统的办法,如按照季节的不同,用猪油、羊油或牛油为主要材料制成软膏,或用土法制成膏药,他很看重这些膏药的疗效,甚至有将这些样品带到奥地利的念头。罗生特的谦虚深得中国人的欢迎。他将自己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贯彻到医疗卫生教育中,从不夸夸其谈显示自己知识多么渊博,而是从实际出发,融贯中西,教育学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哪些简单的手段来护理病人^{[3]120}。

(三)教与学良性互动以提升教学质量

其一,鼓励和激发学员持之以恒。

罗生特在医疗卫生教育中既秉持认真严格的态度要求学员,同时也注重对学员的爱护、鼓励和表扬。学员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都给予表扬和鼓励,激发大家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50}。二师高级研究班学员听课非常认真,罗生特对他们的听课学习表现非常满意,时常夸赞学员们遵守纪律和积极钻研的学习态度^{[2]51}。罗生特的肯定更加激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耐力,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其二,明确要求并以身作则。

罗生特时常告诫学员,做一个好医生,除了要有高明的医术,还应该有鹰一样的眼睛和音乐家的耳朵,用精确而敏锐的观察去认识病人,辨别病情;应该有一双灵巧的手,手术时才能缩短时间,以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还应该有戏剧家的嘴巴,以明快的语言去安抚病人,以减轻病人的精神不安。^{[2]52-53}为此,他同吴之理、宫乃泉等开展手术比赛,切磋技艺,在他的身体力行下,二师卫生干部一时间钻研医术蔚然成风。^{[2]53}

其三,自我提升与教学相长。

罗生特尤其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提高,为此他不停地努力学习,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他把几本外文专业书籍当成珍品,行军时装在马袋里,到了宿营地,有空就看,晚上还在小油灯下阅读到深夜。通过这种方式,罗生特医疗技术不断提升,为他更好地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他在教学中特别注意吸收学员的意见和建议,善于汲取学员在某领域的专长,在教学中提高自己医疗水平,实现了教学相长。

三、罗生特医疗卫生教育的成效

(一)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

据罗生特的警卫员、护士和随身医生李光回忆,1942年,罗生特和宫乃泉、吴之理、齐仲桓等人各显神通,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医疗手术友谊赛,罗生特名不虚传,一举夺魁。这一活动的举办,“带动了全军卫生系统学习医疗技术的热潮”^{[1]62}。罗生特在山东工作期间,为我军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制度,如工作制度、工作规范、卫生勤务、卫生法规等,^{[1]63}有助于通过完善的制度提升医疗卫生教育效果。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政委的谷广善说,罗生特在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1]145}。

蔡和等人回忆罗生特的医疗卫生教育时说,罗生特“针对当时部队中医务工作者大都没有受过职

业训练、素质差,以致医疗水平较低的现象”,积极倡议军区卫生部创办了卫生学校,他与黄农等医学专家都亲自到卫校讲课,“对军区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较为正规、系统的培训,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使军区卫生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军区为广泛普及卫生知识,还创办了卫生刊物”,“罗生特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医学论著”。他“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的论述”“使同志们学了不少东西”。“这一刊物很受欢迎,对促进军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1]146}

(二)培养了医疗卫生人才

其一,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在山东莒南时,罗生特常去陈家老窝的山东军区卫生学校讲课。据李光回忆,学员们评价罗生特“学识渊博”,“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在罗生特任教期间,“共培养学员3期100多人”,“为山东军区造就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1]161}。弥补了战争造成的医疗队伍减员,提高了医疗水平。除了通过正规院校培养医学人才,罗生特还利用战斗间隙,举办各种短训班,讲解战伤救护和伤员处理的知识,如止血、固定、扩创、缝合、包扎、护送、人工呼吸等。这有助于弥补战争造成的医疗队伍减员,提高了医疗水平。^{[1]162}据杨易立回忆,“罗生特善于身教言传,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1]170}刘洪德回忆在罗生特身边的日子时指出,正是由于罗生特的“教育和培养”,自己在以后的战斗、工作中“成长和成熟起来”。^{[1]175}

黄农的爱人张慧新回忆,罗生特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工作者”,他根据“当时山东军区医务人员缺乏、医疗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坚决主张并支持“办好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卫校和训练班”。他“亲自到设在陈家老窝和桑庄等地的卫校和培训班授课”。“通俗的语言,生动的讲解”,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学员们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一批批医护人员培养起来了”^{[1]161}。“不但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许多学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了卫生战线上的骨干”。不仅如此,罗生特还多次在西辛庄、上峪子等地给全卫生部及直属所的医务工作者举办学术讲座,讲的内容有生殖系统疾病、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上至部长,下至普通护理员都前来听讲,深受教益与启迪”。罗生特还在莒南县陈家老窝村亲自设计、由卫生部组织施工,建起了一所近百间房屋的战时医院,他充分利用这里的条件进行现场教学、临床指导,培养了我军的医护人员。^{[1]162}

其二,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学理论水平。

罗生特的学生和助手李磊回忆,“为培养我军医务干部,罗生特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常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亲自为军区卫校讲授战伤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等课程。在临床实践中,他十分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养,坚持言传身教。每次查房时总是耐心地进行临床教学,每次手术,总是手把手地传授操作技术、无菌技术,提醒应注意的问题。在平时,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给医务人员做学术报告”,提高了大家的“医学理论水平”。^{[1]104}

张勤将罗生特奉为良师益友,他回忆说,罗生特“特别注意培养医药卫生人才”,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了我军医药卫生人员的水平。从罗生特1943年秋到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部任顾问后,“卫生部直属单位钻研学术的风气日盛”。他“亲自给外科医生作专题讲座,给爱好泌尿科的医生系统地讲课。遇到疑难杂症和重大手术,罗生特都是边做边进行示范教学。尤其是1944年后,他和熟悉德、英文的卫生部长黄农(王雨田)同志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地培养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卫生人员。他特别注重基础医学教育,使我们的医学理论和临床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医疗业务素质有了明显的改观”。^{[1]181}

山东军区卫生学校第一期学员王丁一指出,罗生特不辞辛劳地传授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传授,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军医。^{[1]195}王丁一回忆说,“罗生特在授课时非常认真”,从最基本的技术教起,使大家“逐步掌握了外科手术的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1]196}。

其三,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医德修养。

据李光回忆,罗生特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抢救伤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才”,李光说,在罗生特的关怀和教育下,他就由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军医”、“一位解放军的干部”。^{[1]144}李光还说,罗生特对大家工作中的错误,总是心平气和地指出,严肃批评,以理服人。有一次,李光“用蒸笼对手术器具进行高温消毒”,“不慎引起蒸笼起火”,“损坏了几件器具”,他认为一定会受处分,令他没想到的是,罗生特并没有对他进行处分和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工作务必“认真负责”,“不能有半点疏忽”。罗生特的话不仅使李光“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工作中要认真负责”的教诲“几十年来一直牢记在心”并落到实处。^{[1]151}罗生特高尚的医德深刻地影响着学员,“几十年来”,李光也没有忘记罗生特的教诲和嘱托,“不断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医学理论”,努力地为

人民服好务。^{[1]67}

据方政等对罗生特的回忆,罗生特的“精湛医术”与他“多年养成的”“严肃的医疗作风”,对“跟随他学习、工作的医务人员影响极深。”^{[1]123}

据参加山东军区卫生学校第一期的学员孙炳华回忆,罗生特对培养卫生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非常令人难忘^{[1]206}。学员刘求在怀念罗生特时说,“虽然我和罗生特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蔼可亲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那种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作风、渊博的医学知识,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他的学生,大家从他身上得到不少启迪和教诲。^{[1]91}

四、结语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丰富的医疗卫生教育实践,这些宝贵的实践呈现鲜明的特点,既体现在教育内容方面,也彰显于教育方式方法方面,具体而言:教育内容较为全面,如疾病诊疗教育与预防教育相结合,医疗知识技术教育与高尚医德教育相结合;教育方式方法多样,开办卫生学校与专题培训相结合,制定详细培训计划与稳步推进落实相结合,理论讲

授与实践培训相结合,因材施教与因地制宜相结合,集体授课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教育手段灵活,语言讲述与动作示范相结合,文字表达与作图讲解相结合,运用教具与实物展览相结合、自我提高与教学相长相结合。

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医疗卫生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与其高度负责、无私奉献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也与他精湛的医疗技术、开阔的教育视野、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定的人民立场密不可分。这些因素至今仍闪耀着时代光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弘扬。

参考文献:

- [1]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莒南县委员会.罗生特在中国[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 [2]黄瑶,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 [3]格尔德·卡明斯基.罗生特传[M].李传松,等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 [4]刘涛,陈答才.《群众》周刊(1937—1949)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文本样态及启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5): 13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Jack Rosefeld' Medical Education in Shandong Resistance Bases

ZHANG Yelei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in which Rosefeld engage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Shandong Resistance Bases: One is collective teaching, and the other is individual guidance. He personally imparte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the trainees. He directed the college's clinical studies, provided students with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ultivated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governance. Rosefeld's medical education ha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teaching content, diverse methods, and flexible educational means.

Key words: Jack Rosefeld; medical education; Shandong Resistance Bases

中动结构的特征解读及句法分析

郭霞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系,北京 100083)

摘要:从中动句中 NP 的语义类型、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以及修饰语的强制共现三个层面考察了英汉中动结构的特征,结果发现典型中动结构的句首名词短语充当,受事非典型中动结构的句首名词短语可以是工具、处所或材料等旁格角色;英语中动结构中施事必须隐含,隐含施事的语音实现需要借助介词或从句等句法手段,而汉语中被当作中动结构的句子在能否补出隐含施事上存在差异性;英汉中动句修饰语的强制共现是为了满足完句的需要。在“NP + V 起来 + AP”结构中,AP 的语义指向有三类,除了指向句首 NP 和 V,还可以指向显性或隐含的施事论元,能够出现或者补出施事论元的“V 起来”结构不属于中动结构,不符合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

关键词:中动结构;非典型中动句;V 起来;隐含施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2

中图分类号:H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67-07

一、引言

中动结构的研究最早始于印欧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跨语言普遍性。SUNG 最早将汉语中的“NP + V 起来 + AP”格式作为中动结构加以研究^{[1]55},曹宏、古川裕和何文忠等也认同“V 起来”句为中动句^[2-4];而宋红梅则认为“V 起来”不是中动句,而是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5],熊仲儒也指出“V 起来”句从句法的角度应该归入述补谓语句^{[6]52};严辰松认为汉语中动句是比附印欧语中动句而来^[7],吴怀成也认为没有必要增设中动范畴,中动句本质上为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8]。这说明学界对于汉语中是否存在中动结构仍存在争议。纵观以往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汉语中动句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歧:一是对中动结构范畴界定不一,有些仅局限于受事主语句,而排除工具、处所以及材料等构成的非典型中动句,有些是将感事做语法主语的句子也纳入中动句中;二是指出修饰语的必要性,但没有对修饰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三是考察汉语中“V 起来”句时仅关注到动词后修饰语指向句首名词短语

和动词的情况,而忽略指向隐含施事的考察。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说明汉语的“V 起来”句并非完全对应于中动结构。

二、中动结构的特征解读

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是采用主动形式表达被动含义(JI^[9]),英语的中动句一般构成“NP + V + AdvP”格式,而汉语的中动句一般构成“NP + V 起来 + AP”格式,如:

(1)a. The bureaucrats brides easily.

b. The floor paints easily.

c. The book translates easily.

(2)a. 这本书念起来很容易。

b. 这件行李运起来很容易。

c. 这些车开起来很平稳。

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较为复杂,吴怀辰认为“中动”属于语义属性,他把中动句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①中动句属于受事主语句,即中动句的主语是谓语动词的逻辑宾语;②中动句隐含一个施事论元,但是这个施事论元在句法上无法实现;③中动

收稿日期:2022-09-24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20&ZD297);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名词与动词互转的生成语法研究”(21BYY047)

作者简介:郭霞(1991—),女,安徽潜山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句法语义学。

句表述的是受事主语具有某种属性,并非描写具体时空发生的事件;④中动句所描写的主语具有的属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用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操纵中动句的受事主语就可以显现出来;⑤由于中动句的主语的某种内在特性使得动词所表述的情况具有修饰语所描述的特点。^[8]典型的中动结构句首名词短语为动词的逻辑宾语,充当受事的语义角色,如(1a)中“the bureaucrats”为动词“brides”的宾语,其语义角色为受事;(2a)中“这本书”是动词“念”的宾语,其语义角色也为受事。根据句首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曹宏和吴怀成等直接将汉语中动句等同于受事主语句^[2,8],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以下将从中动句的语义类型、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以及修饰语的强制共现三个层面来解读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

(一) 中动句的语义类型

汉语中动句并非等同于受事主语句,中动句论元结构特点在于逻辑宾语占据语法主语的位置,但是语法主语并非只能局限于受事,还可以是工具、处所以及材料等语义角色,如:

(3) a. 这把刀切起来很好使。(工具)

b. 这支钢笔写起来很流利。

c. 这种碗吃起来很方便。

(4) a. 这辆卡车装起来很容易。(处所)

b. 这床睡起来有点小。

c. 这儿住起来挺安静的。

(5) a. 这种油漆刷起来很上色。(材料)

b. 冷水洗起来也很方便。

c. 这种绷带缠起来很容易。

从句首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来看,例(3)中“这把刀”“这支钢笔”和“这种碗”为工具角色,例(4)中“这辆卡车”“这床”和“这儿”为处所角色,例(5)中“这种油漆”“冷水”以及“这种绷带”充当材料角色。曹宏也认为中动句的句式可以扩展到工具中动句和处所中动句^[10],即典型中动句的语法主语为受事,而非典型中动句的语法主语可以充当工具、处所以及材料等旁格角色。英语也存在非受事论元充当语法主语的中动句,YOSHIMURA 将这类结构称为“旁格主语中动结构”(Oblique Subject middles)^[11],ACKEMA & SCHOORLEMMER 称之为“附加中动结构”(adjunct middle)^[12],如:

(6) a. The scissors cut metal easily.

(工具)

b. This fountain pen writes well.

(7) a. This tent sleeps five. (处所)

b. The truck loads easily.

(8) a. Cotton irons beautifully. (材料)

b. Polyester cleans faster than cotton.

c. This wood carves beautiful toys.

例(6)—(8)中语法主语分为充当工具、处所以及材料等语义角色,构成英语的非典型中动句,这些语法主语在底层为动词的旁格宾语。KEYSER & ROEPER 认为英语中动句中动词的外论元被贬抑,而且动词丧失了给宾语指派格的能力,所以逻辑宾语为了获得格而移位到主语的句法位置^[13]。实际上,非典型中动句的允准也与动词的非选择性有关,熊仲儒指出汉语不仅存在主语的非选择性,也有宾语的非选择性,宾语的选择与功能范畴有关,不同的功能范畴可以为动词选择不同语义角色的论元^[14],如:

(9)

a. 吃饭 切肉 喝酒 读书

b. 睡火车站 吃饭馆 打室内 读 M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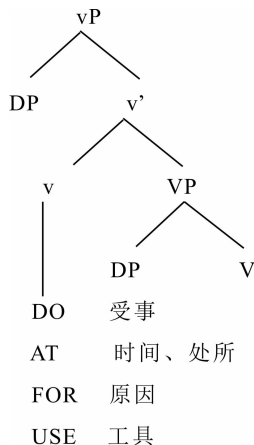
c. 睡上午 飞半夜 打下午 做晚上

d. 哭家破人亡 吃头痛 玩儿趣味 气这个荒谬的结局

e. 写这支笔 切这把刀 垫这本书 喝那个杯子

例(9)表明动词后可以出现不同语义角色的论元,可以是典型的受事,也可以是地点、时间、原因、工具等,这是因为扩展动词的功能范畴的不同:

(10)



例(10)的树形图表明动词的论元并非由动词选择的,而是由轻动词选择的,如 DO 选择受事论元,AT 选择时间论元或处所论元,FOR 选择原因论元,USE 选择工具论元,即功能范畴能够为动词选择语义角色不同的论元。论元角色本身并不是离散的

范畴,题元角色允许不同等级成员的存在,最典型的是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原型施事有自主性、感知性、使因性和位移性特征,原型受事有变化性、渐成性和受动性特征,但是实际语言中有些名词短语并不是所有的特征都具备,比如工具、处所和时间等成分的受事性就很弱,所以中动句跟狭义的受事主语句并不完全等同,中动句中除了受事中动句,还有工具中动句,处所中动句以及时间中动句等,单纯的局限于受事中动句,会造成中动句的范围过窄,也难以和被动句区分,因为被动句句首的名词短语通常也是受事,按照语义角色分类,被动句也称为受事主语句。此外,中动句句首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并非没有限制,JI 和曹宏都曾将句首名词为“感事”的也归入非典型中动句^[9-10],如:

(11) a. Children scare easily.

b. 孩子们很容易受惊。

这种处理是值得商榷的,例(11)中“Children”和“孩子们”充当感事角色,为动词的域外论元,而不是域内论元,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动词的逻辑宾语,而是逻辑主语;此外这种句式不能通过主动形式表达被动含义,不符合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所以并不存在感事中动句。

(二) 隐含施事的实现方式

关于中动句的生成,一种是以 HALE&KEYSER 以及 FAGAN 等为代表的词汇观(非移位观)^{[15][41][16]},他们认为中动结构在词库中生成,中动结构的题元角色在词库中就达到了题元饱和,因为句子缺少主语,内论元就移位到句首成为句子的主语,外论元没有在句法上投射。另一种是以 KEYSER&ROEPER、STROIK 以及 SUNG 等为代表的句法生成观^{[13][17][11][67]},他们认为中动结构涉及域外论元的降级和域内论元的升级,中动词的逻辑主语在句法层存在。词汇观和句法生成观的分歧在于句法层是否存在逻辑主语,即中动词在句法层选择一个论元还是两个论元的分歧。

英语中动词的词汇概念结构只包含一个内部论元,包含一个核心的子事件,中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在语义上存在差异,语法上中动词属于非宾格动词,如:

(12) a. The bread cut easily (when I took it out of the oven)

b. The pot broke.

例(12a)中动词“cut”的论元结构为“I cut the bread”,“cut”为及物动词,“the bread”为动词“cut”的宾语;(12b)中非宾格动词“broke”的论元结构为

“broke the pot”,“the pot”为“broke”的宾语。中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共同点在于只带一个逻辑宾语,而中动句和非宾格动词句的区别在于:一是中动句强制性的要求副词“easily”共现,而非宾格动词不需要;二是中动句具有非事件性,而非宾格结构表达已完成的事件,如:

(13) a. * I saw bureaucrats bride easily.

b. * I saw the floor was easily.

c. * I saw chickens kill quickly.

(14) a. At yesterday's house party, the kitchen door opened.

b. Because of the wet weather, I dropped the ball and it bounced.

c. I saw the ice malted.

英语中中动句和被动句类似,在显性句法层面可以出现两个论元,但是被贬抑的外部论元需要介词引进,如:

(15) a. That book read quickly for Mary.

b. Math books never read easily for me.

c. The window opens easily with a knife.

例(15a)中“read”的论元结构为“Mary read that book”,其隐含施事“Mary”由“for”引导;例(15b)中隐含施事也由“for”引导;例(15c)中充当工具角色的“a knife”由介词“with”引导。隐含的施事还能以从句形式出现,如:

(16) The car handles smoothly when Sophy drives it.

以上表明英语中中动句存在隐含施事,隐含施事不能直接出现,只能通过介词的引介或从句来显性实现。

汉语隐含施事的引介方式与英语有所不同。汉语中中动句研究较多的是评价性“V 起来”句,构成“NP + V 起来 + AP”格式,可以分为两类,如下所示:

(17) a. 这篇文章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b. 这桃子摸起来很软。

(18) a. 这种收音机携带起来很方便。

b. 这种自行车骑起来很费劲。

曹宏指出评价性“V 起来”的句式意义是“在‘V’‘NP’的时候,‘NP’通常‘AP’”^[10],她所指的只包含例(17)这类 AP 语义指向 NP 的中动结构。熊仲儒指出 AP 不仅能指向 NP,还能指向 V^{[6][35]},如例(18)。这两类不同的中动结构可以通过删除测试来证明:当 AP 指向 NP 时,可以删除“V 起来”,如例(19);而当 AP 指向 V 时,删除“V 起来”不能成立,

如例(20):

(19)a. 这篇文章很耐人寻味。

b. 这桃子很软。

(20)a. *这种收音机很方便。

b. *这种自行车很费劲。

AP 指向 V 的不能转换成“NP AP”格式,但可以转换成“[V NP]AP”的格式,如:

(21)a. 携带这种收音机很方便。

b. 骑这种自行车很费劲。

例(17)和例(18)不仅在 AP 语义指向上存在差异,在“V 起来”之前能否直接补出隐含施事上也存在差异性,如:

(22)a. *这篇文章我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b. *这桃子我摸起来很软。

(23)a. 这种收音机我携带起来很方便。

b. 这种自行车我骑起来很费劲。

当 AP 指向 NP 时,有些结构是排斥施事主语出现的,如(22a),例(22b)似乎能说,但是添加了施事“我”之后,“很软”并不是形容“这桃子”的本质属性,而是说明摸桃子产生的感觉是“很软”。而当 AP 指向动词时,施事主语是可以自由出现的,而且也没有改变句式意义,如(23a)和(23b)。

此外,AP 除了指向 NP 和动词,还可以指向隐含施事,隐含的施事论元可以在“V 起来”之后(即 AP 之前)直接补出,如:

(24)a. 司徒聪相当地矜持,“那话说起来(司徒聪)很痛苦的,以后……”(王朔《痴人》)

b. 说句公道话,现在农村有些工作难度大,干起来不仅(农民)辛苦,而且不讨好。(选自人民日报 1993)

c. 那匹马骑起来(你)很舒服,它也很听话。(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例(24a)中“很痛苦”是说“司徒聪很痛苦”,其语义指向为隐含的施事成分,(24b)中“辛苦”指向的也是“农民”;(20c)中“很舒服”是指骑马的人很舒服,其语义指向也为隐含的施事。有些“V 起来”句子中甚至可以出现两个并列的 AP,并且两个 AP 有不同的语义指向,如:

(25)a. 民事官司打起来很麻烦也很累,这辈子涉及我韦唯的民事官司不想再打。(顾伟《“官司”后的韦唯》)

b. 现在,大连人普遍接受“开发区”这个新名词,喊起来很亲切、很自豪。(《读

者报刊》)

c. 一位负责招聘管理护工的老护士说,护工的工作干起来不仅脏、累而且耗时、耗力,因此有的人刚培训完了没几天就辞职了。(选自人民日报 1998)

例(25)中每个“V 起来”句式都包含两个并列的 AP,但是 AP 有不同的语义指向,(25a)中“很麻烦”指向 V,即“打民事官司”,但是“很累”则指向隐含的施事“打官司的人”;(25b)中“很亲切”指向“开发区这个新名词”,而“很自豪”直接指向隐含施事;(25c)中有四个 AP,其中“脏”“耗时”“耗力”指向“护士的工作”,而“累”实际上指向隐含的施事。隐含施事的出现改变了主语和谓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例(23a)为例,虽然“这种收音机”是“携带”的受事,但是隐含施事“我”成了“携带”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改变了原本属于中动句的被动意义,无法再通过主动形式表达被动含义,这说明能够补出施事论元的“V 起来”句并非中动句。

(三) 修饰语的强制共现

不同语言的中动结构需要不同的修饰语,英语中动结构需要副词性修饰语,汉语中动结构一般需要形容词性修饰语,如果去掉修饰语,中动结构往往不能成句,如:

(26)a. Bureaucrates bride easily.

* Bureaucrates bride.

b. The baggage transfers efficiently.

* The baggage transfers.

c. The toys assemble rapidly.

* The toys assemble.

(27)a. 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 这辆车开起来。

b. 那种脚手架安装起来很麻烦。

* 那种脚手架安装起来。

c. 那匹马骑起来很舒服。

* 那匹马骑起来。

不管是英语中动句还是汉语中动句,一般要求动词后的修饰语强制性共现。曹宏指出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没有修饰语,句子中一般有对比重音、强调性的 do、否定词等,如:

(28)a. CHICKENS kill.

b. Chickens do kill.

c. Chicken won't kill.

(28a)中对比重音让 CHICKENS 成为句子的焦点,(28b)中强调性的 do 让动词 kill 成为句子的焦点,(28c)中的否定词则构成了否定焦点,熊仲儒、

杨舟指出焦点范畴在语音上或句法上的实现能够帮助完句范畴定值从而达到完句作用^[20],所以中动结构中^{没有}修饰性成分焦点范畴也能够帮助完句。对于中动结构中修饰性成分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LEKAKOU^[21]等认为是为了满足句法或结构上的要求,中动句的修饰语可以帮助找回隐性施事,但是英语中动结构中的修饰语大部分不能指向隐性施事,有些指向句首的名词,有些指向动词,隐性施事地找回大部分还是依赖于动词本身的词汇概念结构。CONDORAVDI认为修饰语的出现是为了满足语义上的要求,修饰语的作用是为了限制任指算子的范围^[22],如果没有任指算子的约束,会不合法,如:

- (29) a. This book sells easily.
 b. Gen: e[sell(e) & Book(Theme, e)]
 [easily(e)]
 Restrictor Scope

例(29)的意思为“in general, events of selling this book are easy”,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通指算子 Gen 能够帮助表达“命题的通指性”。杨永忠等认为修饰语的出现是为了满足语用表达的需要^[23]。修饰语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满足语义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完句的需要。HALE & KEYSER 指出,包含一个内部论元的动词构成的句子一定包含一个核心的子事件,而且它的内部可能存在复杂的子事件^{[15]55},如:

- (30) The pot broke easily.

在(30)中一定涉及 the pot 本身情状的变化,即锅材料的完整性分类, easily 不是形容锅破碎的方式,而是形容导致锅的材料完整性分离的情境。二是 easily 位于句子的句末,很容易成为句子的自然焦点,焦点范畴能够帮助完句。汉语“V 起来”句中的形容词性修饰语可以用来修饰事物或整个事件情境的状态,修饰语同样位于句末,位于自然焦点的位置,也能够帮助完句。

以上论证说明中动结构具有跨语言相似性,英汉中动句的语法主语都能够实现为典型受事以及非典型的工具、材料和处所等语义角色,构成典型的中动结构和非典型的中动结构。但是也存在差异性,英语存在隐含的施事,施事在句法结构中被贬抑,不能直接出现,只能借助其他句法手段引进,属于典型的中动结构;而汉语中 AP 指向动词的“V 起来”句可以直接补出隐含施事,这说明汉语“V 起来”句并不完全都是中动结构。此外,英汉中动结构中修饰语或焦点范畴的强制要求,其实是为了满足中动结

构完句的需要。

三、汉语“V 起来”句的句法分析

曹宏、熊仲儒以及王和玉、温宾利等探讨了汉语“V 起来”句的句法语义,看法并不一致。曹宏认为“NP + V 起来 + AP”中“V 起来”和“AP”组成状中结构,她认为“起来”表示起始义^[10];熊仲儒认为曹宏忽视了 AP 语义指向的不同,AP 既能够指向句首的名词短语,还能指向 V,此外“起来”表示的是估计义,而并非是“起始意义”。熊仲儒认为“V 起来 AP”构成动补结构,“V 起来”为主要谓语,“V 起来”与“V 得”句在语义指向和句法结构上均存在平行性,并根据 HUANG^[24]对“V 得”的分析来分析“V 起来”句,如下:

- (31) a. [S [NP1 这瓶酒] [INFL]
 [VP [NP2 张三] i [V ' [V1 醉得] [S ' PROi 站不起来]]]]]
 b. [CP [IP [VP 这篇文章] i [V ' [V 读起来] [CP Proi 很耐人寻味]]]]]
 c. [CP [IP [VP 这种收音机] i [V ' [V 携带起来] [CP Event 很方便]]]]]

例(31b)中 Pro 和 VP 指示语位置的“这篇文章”同指,表明 AP 的语义指向为句首名词短语;例(31c)中 AP 的语义指向为整个 Event,表明 AP 的语义指向为动词,这两种句法结构根据 AP 语义指向的不同,很好地区别了 AP 指向句首名词短语和指向 V 的不同。但是汉语“V 起来”句中 AP 的语义指向还可以指向隐含的施事,如:

- (32) a. 司徒聪相当矜持,“那话说起来很痛苦的,以后……”
 b. 在《冬夜》中所有的诗,说起来很惭愧啊。
 c. 这么一想,我们大家都不敢再提这件事了,提起来心里就发乱。
 d. 死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东西全抢光,想起来真伤心。
 e. 洋货用起来确实舒服……
 f. 这种稿子校起来很疲劳。

如果不考虑隐含施事,同样将“V 起来”与“V 得”句平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句法结构,以(32a)和(32b)为例:

- (33) a. * [CP [IP [VP 那话] i [V ' [V 说起来] [CP Proi 很痛苦的]]]]]
 b. * [CP [IP [VP 冬夜中所有的诗] i [V ' [V 说起来] [CP Proi 很惭愧]]]]]

在不考虑隐含施事的情况下,根据控制理论,无

语音形式的 Pro 需要受到最近的名词性成分的统制,只能跟位于 VP 指示语的显性语法主语同指,但是这样会造成错误的解读:如(33a)的解读为“那话”是“很痛苦的”,(33b)的解读为“冬夜所有的诗很惭愧”。所以当 AP 指向隐含施事时,施事论元可能没有语言实现,但是同样占据一定的句法位置,如:

(34) a. ... [VP 那话 [V' [V] [VP [Spec]i [V' [V 说起来] [CP Pro_i 很痛苦的]]]]]

b. ... [VP 冬夜中所有的诗 [V' [V] [VP [Spec]i [V' [V 说起来] [CP Pro_i 很惭愧]]]]]

例(34)中无语音实现的施事占据 VP 的 Spec 位置,和 Pro 同解,可以实现为说话人“我”,如(35a);隐含施事也可以直接在 AP 之前补出,如(35b):

(35) a. 那话我说起来很痛苦的。

b. 那话说起来我很痛苦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 VP 内部“我”为施事,整个句子表达主动含义,而受事成分“那话”是借助另外一个轻动词引进的。中动结构是采用主动形式表达被动含义,被动含义主要借助于句首 NP 的非施事特征实现,而 AP 指向施事的“V 起来”句含有主动意义,所以不属于中动结构。

宋红梅认为“V 起来”句为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以“起来”为话题性语素^[5],其实之所以生成话题句,是句中成分和话题范畴 Top 协约操作的结果,熊仲儒认为在 AP 指向动词时,如果增加施事论元,那么句首的 NP 就会发生话题化操作,如:

(36) 那种机器…… [vP [孩子们] [v' [v] [vP [那种机器] [v' [v 操作 - 起来] [VP [CP Event 很简单] [V 操作]]]]]]]

例(36)为 AP 指向动词时,增加施事主语的例子,位于 vP 指示语位置的“那种机器”是因为话题化而移位到句首,如出现于 TopP 的指示语位置。在 AP 指向 NP 的句子中,虽然不能增加隐含施事,但是同样可以发生话题化操作,位于句首的主语 NP 也可以和话题范畴 ToP 协约操作,移位到 CP 层的 TopP 的指示语位置,从而生成话题句,这些句首的名词短语后面自然就能够添加停顿或者语气词“啊”,如:

(37) a. 这篇文章,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b. 这篇文章啊,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38) a. 这桃子,摸起来很软。

b. 这桃子啊,摸起来很软。

汉语的“V 起来”句可以看成话题句,因为汉语中凡是句中可以和话题范畴协约操作的句子都可以成为话题句,但这只是跟话题范畴协约操作的结果。

四、结语

中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汉语也存在 AP 指向句首非施事性 NP 的“V 起来”句构成的中动结构,中动结构句首的 NP 为动词的逻辑宾语,可实现为受事、工具、处所、材料等多种语义角色,这是轻动词为动词选择论元的结果,这些成分还可以跟话题成分协约操作,从而生成话题句。对比英汉中动结构可以发现英语中动结构在论元结构层面只能实现一个显性域内论元,隐性的施事论元不能出现,只能通过其他形式引进,而汉语中有时候可以直接在“V 起来”或者 AP 之前补出隐含施事,这表明该句式含有施事性,不符合中动结构通过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汉语的句法语义特点,所以汉语“V 起来”句并非都是中动结构。

参考文献:

- [1] SUNG K M. Case Assignment Under Incorporation [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 [2] 曹宏. 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3).
- [3] 古川裕. 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 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J]. 汉语学报, 2005(2).
- [4] 何文忠. 中动构句条件[J]. 外语教学, 2007(2).
- [5] 宋红梅. “V 起来”句作为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J]. 外语研究, 2008(5).
- [6] 熊仲儒. 评价性“V-起来”句的句法语义分析[C]//中国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3-54.
- [7] 严辰松. 汉语没有“中动结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5).
- [8] 吴怀成. 汉语需要中动范畴吗[J]. 汉语学习, 2020(3).
- [9] JI X.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 [10] 曹宏. 中动句的语用特点及教学建议[J]. 汉语学习, 2005(5).
- [11] YOSHIMURA K.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D]. Dunedin,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1998.
- [12] ACKEMA P, SCHORLEMMER. Middles [C]. EVERAERT M, RIEMSDIJK H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2005:

- [13] KEYSER S J, ROEPER T.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15).
- [14] 熊仲儒. 当代语法学教程[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
- [15] HALE K, KEYSER S J. Explaining and Constraining the English Middle[C]. TENNY C(ed). *Studies in Generative Approach to Aspect*. Cambridge, Mass: MIT 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 1988: 41 - 57.
- [16] FAGAN S.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7] STROIK T. Middles and Movement[J]. *Linguistic Inquiry*, 1992(23).
- [18] STROIK T. Middles and Reflexivity[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30).
- [19] 杨佑文. 英语中动结构: 典型与非典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4).
- [20] 熊仲儒, 杨舟. 制图理论与形容词谓语句的自足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1).
- [21] LEKAKOU M. In the Middle, Somewhat Elevated; the Semantics of Middle and its Crosslinguistic Realization[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5.
- [22] CONDORAVDI C. The Middle: Where Semantics and Morphology Meet[J].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89(11).
- [23] 杨永忠. 汉语中动句和作格化[C]//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主编. 对外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74 - 85.
- [24] HUANG C T J. Wo Pao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J]. *Language*, 1988(6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e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Syntactic Analysis of Middle Construction

GUO Xi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emantic type of NP, the realization of implied agent and the forced co-occurrence of modifi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antic role of the subject in 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s is patient, but the semantic role of the subject in a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s can be tool, place or material. The agent must be implicit in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nd the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he implicit agent needs other syntactic means, such as prepositions or clause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whether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can complement the implicit agent. The mandatory co-occurrence of modifi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s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sentence comple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 Qilai AP”,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AP. In addition to pointing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NP and V, it can also point to the agent argu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V Qilai AP” that can appear or supplement the agent argument does not belong to middle constructions. The structure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middle construction; a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 V qilai; implied agent

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

赵国月,高晓仙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重庆 408100)

摘要:当前学界较为关注翻译中的行为研究,却存在“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两种表述,且两者混淆严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中有关“行为”研究的深入发展。由德国功能学派最早提出的翻译行为概念经全球传播和发展,逐渐分化,现已形成语言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和“文本—社会”四种研究路径。特别是最后一种研究路径自成体系,形成了逻辑自洽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成为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本土翻译理论之一。

关键词:翻译行为;译者行为;术语辨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3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74-05

有关“人”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升温,推动了翻译中行为研究的发展,俨然成为翻译学界的显学之一。当前翻译学界有关翻译中“行为”的讨论主要围绕“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这一对概念术语展开。尽管周领顺^[1]从学理上明确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但受西方翻译研究影响,国内学界对“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的概念认识仍模糊不清。有学者将“译者行为”和“翻译行为”混淆,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混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翻译中有关行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尝试从国外到国内,梳理有关翻译的行为研究发展动态,廓清其概念渊源,澄清其发展流变,阐述“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一、相关概念的缘起

“翻译行为”源自德国功能学派的学者霍茨-曼塔里(Justa Holz-Manttäri)提出的“*translatorisches handeln*”。功能学派将整个翻译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而译者只是这一具有目的性的社会活动的执行者。依此理念,霍茨-曼塔里^[2]借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提出“翻译行为理论”(The-

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将“任何参与到翻译过程中的人,如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者、译者、译文使用者和译文接收者”纳入翻译行为的概念范畴^[3],将译作看作“翻译行为”的一部分,“翻译行为”不仅涉及译者作为翻译专家的行为,还包括与客户合作协商的行为等,突出了翻译跨文化交际部分的特性。因此,霍茨-曼塔里定义“翻译行为”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而翻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4]。这一界定边界不明,泛化严重,特别是国内学者在引进国外学者的概念再度加工解读后,重复定义显得更加混乱。

后期的学术出版对“*translatorisches handeln*”一词的英译并没有保持内涵上的一致,比如切斯特曼^[5]将其英译为 *translational action*,成为不仅包含笔译和口译,还包括其他任何不依赖于原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通用概念。诺德^[6]后来也沿用这一译法。霍恩比^[7]和谢芙娜^[8]将其英译为 *translational action*,强调作为“人”的译者的动作。2014年诺德改变以往观点,将“*translatorisches handeln*”英

收稿日期:2022-09-18

基金项目:202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组织项目“美国‘凯迪克奖’儿童绘本汉译与传播研究”(2020SZ38);2021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汉学家韩南的译者行为研究”(SISU202115)

作者简介:赵国月(1983—),男,甘肃张掖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译者行为研究与非虚构文学翻译。

译为“translational action”,用“translational action”涵盖“笔译”和“口译”^[9],其共同特征是用形容词来限定 action。“这一译法使我们理解为用一个形容词去描述与译者相关的客体或现象”^{[10]46}。

源自德语的术语概念“翻译行为”的英译过程,是加深对“翻译行为”认识的过程。从上述两种英文表述到实际的研究中看出,霍茨-曼塔里泛化的“翻译行为”概念逐渐出现了分化的情况,一种是将翻译看作一种社会活动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另一种是将翻译看作与译者紧密相关的翻译行为。

国内学界较早关注翻译行为也是新世纪以后的事,但大多是对西方翻译行为论述的介绍。即便是有学者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认识和见解,也难以摆脱西方翻译行为研究的影子,如姜秋霞^[11]对翻译行为分层次考察,认为翻译行为由“语言行为、文化行为、审美行为和转换行为”组成,翻译行为侧重于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翻译能力的一种操作行为,许建忠^[12]则认为翻译行为由“语言行为、文化行为和审美行为”构成。这种分层次考察推动了大家对翻译的认识,但还是没有明确将“译者行为”与“翻译行为”区分开。

二、研究路径的分化

国内外学界对翻译中“行为”一词的用法不尽相同,有人称其为“翻译行为”,有人称其为“译者行为”,究其本质,背后存在不尽相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路径。

(一)语言学路径

翻译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的推动下走上现代科学化道路。同样,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也肇始于语言学。国外学者如威尔斯^[13]早期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认识翻译过程和翻译步骤,将翻译行为“归纳为语际文本分析与文本综合行为”^[14];梅森^[15]通过翻译探索语言规律,从作为句内和句间凝聚信号的链接词的翻译入手探索语言行为的规律;贝克^[16]应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分析了职业译者语言行为,认为语料库研究可以为译者提供参考,有助于确认影响翻译行为的一系列约束因素和动机,了解在压力和约束之下译者生成译文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当然,语言学路径的翻译行为研究也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随语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从威尔斯和梅森到贝克,虽然都是基于语言本体展开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却有巨大区别。威尔斯和梅森的研究倾向于从语言的微观层面切入,而贝克的研究倾向于从语言的宏观层面切入。语义学、语用学等

新的学科注入翻译研究,对翻译中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静态的语言层面拓展到了动态的语境层面,如国内学者艾琳^[17]等人借助语言学探讨翻译行为。

(二)社会学路径

西方学界功能学派将“翻译行为”泛化为一项社会活动,囊括了与“翻译”相关的一切行为。此看法对后续研究影响很大。国外学界近年来提出了有关译者行为的新观点也延续了这种对翻译行为的泛化认识,如译者在翻译中的“风险处置”^[18]、译员培训中的“网络搜索行为”等皆属译者行为^[19]。

文化转向后,美国学者铁木志科等人^[20]从政治学角度切入,探讨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认为翻译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2010年,铁木志科在后殖民语境下更是将这种政治性的翻译行为上升到“行动主义”,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抵抗”和“介入”^[21],主张译者不仅要抵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西方霸权、美国等具体的政权、资产阶级规范,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主导话语、主导的文学惯例、主导的语言规范,等等”,更要通过翻译担负起“改善社会状况、维护社会契约与国内外正义等责任”^[22]。贝克^[23]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翻译行为界定为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规律性活动。她是翻译“行动主义”的积极倡导者^[24],更是翻译“行动主义”的践行者。2002年6月贝克以进步的政治行动主义为名义,把两位反对以色列军事政策的以色列学者从国际翻译期刊 *The Translator* 编委会名单中除名。^[25]由此可见,行动主义的翻译观主要是从翻译对社会的参与效用上来说的,强调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积极能动性与社会参与性。国外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社会学路径优势明显,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无法有效区分翻译作为语言本体上的行为和翻译作为社会改造方式的行为。

国内学界也有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行为。罗选民^[26]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艺术行为,它还是一种伦理行为、社会行为,为目的所控制”;徐剑^[27]“将二十世纪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概念‘合理性’引入翻译(行为)研究中,反思翻译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当代整个翻译研究,由对翻译行为合理性的考察推及翻译研究的维度、翻译行为合理性解释方式、翻译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与翻译批评的关系等问题”;刘立胜^[28]则结合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惯习”与“场域”来阐释译者行为的异质性与杂合性,认为译者行为指的是个体译者作为社会代理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从事的单个“译者行动”,而不是有规律可循的“译者行为”。

类似研究还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与翻译的被操纵和反操纵的复杂关系^[29],或将翻译行为看作是“一种意向性活动”,或者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入手,通过分析译者的主体意识探讨翻译问题^[30]。持这一观点的最新代表是余静^[31],她从描写翻译理论创始人图里提出的“规范”入手认识“翻译规范”与“翻译行为”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的在于“揭示翻译规范发生改变的机制,以及译者对规范改变的构建”,提出“翻译规范研究需要转换视角,从现有的考察‘(单一)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转换为考察‘(多元)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主张,但对“主流规范”“内部规范”“外部规范”以及“翻译场域”等概念语焉不详,边界仍旧不明。总而言之,国内学界普遍将“翻译行为”泛化为一项社会活动,是“译者为实现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除了翻译过程中的行为以外,还包括翻译前和翻译后的所有译者行为”^[14],这种研究取向无意中放大了译者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译者在语言本体上的作为。

(三) 认知科学路径

西方社会学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行为”概念针对整个翻译流程研究设计。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翻译过程”研究^[32-33],专指译者大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在文本转换过程中针对语码转换所施展的各种行为。这种认知科学意义上的翻译行为研究早在1967年捷克翻译理论家勒威(Levy)就提出过,认为“翻译行为”是“作为决策过程的翻译”^[34]。后来詹姆斯·霍姆斯^[35]在“描述翻译研究”下也分列了“过程导向”的研究。

在这些前期思想的铺垫下,随着认知科学和神经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发展,加上“眼动追踪”“键盘记录”“屏幕捕捉”“有声思维”等技术成熟,使解开幕被学界喻为“黑匣子”^[36]的译者大脑中“决策过程”的想象成为现实。在2008年在德国汉堡举办的第12届EAMT会议上,卡尔^[37]等人提出译者行为研究的模式,具体是“通过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得到便于重复播放和线下分析的‘使用者活动数据’(User-Activity Data, UAD),在此基础上探索译者行为,其目的是从认知视角解释和调查物化后并追踪得到的基本翻译概念”。这是一种纯粹的以译者心理活动为中心的过程研究模式,将个体译者的“决策过程”看作译者的行为,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探索个体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内心世界,探索个体译者的心理状态、情感和态度,最后得到一种物化的实验结果,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特征。不

过它只关注翻译实施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反应和决策过程,不关注译者生成的译文与译入语环境的互动效应,研究结果带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标记,不能代表知识理性的全部内容^[38]。

基于认知科学的“译者行为”研究模式在西方学界率先发展起来,迄今已产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成果,成为“译者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认知科学研究潮流的影响和驱动下,国内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专题学术会议定期召开,专业期刊刊发专栏文章,阐述国内外在该领域中新的研究动态^[39]。国内基于认知的“译者行为”研究延续了国外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便是研究对象或研究材料的更新。

(四) “文本—社会”路径

“目的论”的主要构建者弗美尔进一步将“翻译行为”这种“有目的之行为”分为“翻译”与“与翻译有关的活动”,前者是“以源语文本为基础”的行为,后者是“诸如顾问人员提供关于某地区经济情况和政治局势等信息的行为”^[40]。对这一观点落实较为突出的是中国香港学者梁文骏^[41],他融合弗美尔所说的两种“翻译行为”,借助语料库工具从“文化负载词”入手,在文本层面发现“译者行为”的整体趋向,然后在超文本层面探讨制约译者的社会因素,从社会学视角描写了台湾地区科幻小说翻译的“译者行为”特征。

受弗美尔等西方学者对“翻译行为”层次化的影响,国内学者曹明伦^[42]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以及相对应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文本目的”是译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而“非文本目的”是翻译活动发起人的目的,发起人只是借用翻译这条途径实现其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翻译行为”就是“文本行为”,“与翻译有关的行为”则是“非文本行为”。^[43]周领顺“译者行为”概念进一步发展了曹明伦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概念,提出了具有批评性的系统概念“译者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成体系的理论框架——“译者行为批评”^[44]。

译者行为批评认为“译者行为”不是译者的某次单独翻译行动(act或action),而是对译者多次表现的不同翻译行为的规律性行为倾向(behaviour),是“对具体的‘译者的行为’(translator’s behaviour)的概括和抽象”^[45]。“译者行为”存在翻译内语言(形式和意义)层面的“译内行为”和翻译外社会层

面(超文本但与翻译有关)的“译外行为”之分。“译内行为”就“翻译”本身性质而言,“译外行为”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质而言。译者行为批评对“译者行为”的认识得到体系化和层次化升级,从文本切入追踪译者的行为,但又限于语言层面行为的考察,还超越文本层面,涉及社会和文化与译者行为的关系问题探讨,对翻译的认识更加立体和直观。译者行为批评不仅将“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有效区分,而且既涵盖了西方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行为”研究范畴,也涵盖了费美尔“翻译行为”分层后的研究范畴,更是涉及了铁木志科等人提出的翻译“行动主义”,因为“行动主义”正与译者行为中“译外行为”内涵相一致。

三、结语

全球翻译理论不断演化发展,对翻译中的行为研究逐渐形成两大阵营。第一个是“翻译行为”研究阵营,主要有语言学派的翻译行为研究与社会文化学派的翻译行为研究,前者通过翻译来研究语言行为的规律,局限于语言内,为语言学服务,忽略了“人”的动态因素,后者侧重泛文化意义上的翻译行为研究,倾向于社会学路径,忽略了语言层面的静态因素。第二个是“译者行为”研究阵营,主要有认知学派的译者行为研究与“文本—社会”双向路径的译者行为研究,前者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并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实证性译者行为研究,即纯粹以译者为中心的“过程研究”,后者是对“译者行为”的层次化认识,即“译者行为”有源文本为基础的“译内行为”和超文本的“译外行为”之分。整体来看,德国功能学派的研究关注到了翻译活动中的人的主体性,推动了译者的“显身”,为费美尔和诺德对翻译行为的探讨由泛化向层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的翻译行为研究逐渐向译者为中心的行为研究靠拢,进而催生了我国自成体系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极大促进了翻译中行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周颖顺.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J]. 外语研究, 2013(6): 72-76.

[2] Holz - Mänttari J.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M].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84.

[3] Oyali U.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Association of Nigeria, 2015(1): 51-64.

[4] 仲伟合.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1999(3): 47-49.

[5]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

tion[C]//in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 A. Chesterman, Helsinki: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173-187.

[6]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7] Snell - Hornby M.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56.

[8] Schäffner C.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action [C]//in Yves Gambier & Luc van Doorslaer (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157-162.

[9] Nord C. Translator's preface [M]//K. Rei & H. J. Vermeer (Tr. By C. Nord).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Skopos Theory Explain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ii.

[10] Pym A.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46.

[11] 姜秋霞, 权晓辉. 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 [J]. 中国翻译, 2002(6): 11-15.

[12] 许建忠. 翻译地理学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188.

[13]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2:51-84.

[14] 钱春花, 刘芳. 翻译行为体系研究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11-115.

[15] Mason I. Translator behaviour and language usage: some constraints on contrastive studies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01(26): 65-80.

[16] Baker M. The Role of Corpora in Investigating the Linguistic Behaviour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999(2): 281-298.

[17] 艾琳. 言语行为理论与英汉双关翻译 [J]. 上海翻译, 2010(1): 33-36.

[18] Pym A, Kayo Matsushita. Risk mitigation in translator decisions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18(1): 1-18.

[19] Shih C Y. A quest for web search optimisation: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trainee translators' behavior [J]. Perspectives, 2019(6): 908-923.

[20] Tymoczko M.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 The Translator, 2000(1): 23-47

[21] Tymoczko M. (ed.).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C].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

[22] 倪秀华. 作为抵抗和行动主义的翻译:《翻译、抵抗、行动主义》述评 [J]. 外国语言文学, 2013(1): 66-71.

[23] Baker M.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

- 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 - 11.
- [24]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Emerging Patterns of Narrative Community [C]//in Maria Tymoczko, (ed.)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 23 - 41.
- [25] 倪秀华. 翻译与行动主义: 以斯诺编译《活的中国》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6): 98 - 102.
- [26] 罗选民. 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12(2): 扉页, 6.
- [27] 徐剑. 翻译行为合理性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i.
- [28] 刘立胜. 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的社会学途径[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 [29] 吕世生. 《在路上》文本之诠释的历史变迁: 对国内翻译行为的反思[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2): 64 - 69.
- [30] 胡庭树. 翻译行为的先验现象学视角阐释[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31 - 35.
- [31] 余静. 规范冲突中的翻译行为模式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4): 92 - 99.
- [32] Wilss W.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 - Making in Translation[J]. Target, 1994(2): 131 - 150.
- [33] Chesterman A.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In Olohan, Maeve (ed.),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15 - 27.
- [34] Levy J.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C]//To Honor Roman Jakobson: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vol. 2). The Hague: Mouton, 1967; 1171 - 1182.
- [35] 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In Holmes J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67 - 80.
- [36] Gorle'e D L. The black box of translation; A glassy essence [J]. Semiotica, 2010(1): 79 - 114.
- [37] Carl M, Arnt Lykke Jakobsen, Kristian T H. Jensen. Modelling Human Translator Behaviour with User - Activity Data [C]. 12th EAMT conference, 22 - 23 September, Hamburg, Germany, 2008; 21 - 26.
- [38] 吕俊. 翻译学: 解构与重建: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 外语学刊, 2002(1): 87 - 92.
- [39] Zheng B, Zhou Hao. Revisiting processing time for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n eye - tracking study on eye - voice span during sight translation[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8(5): 744 - 759.
- [40]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C]//in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1 - 232.
- [41] Liang W W. Translators' behavior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 A parallel corpus study of fantasy fiction translation in Taiwan[J]. Babel, 2016(1): 39 - 66.
- [42] 曹明伦. 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 6.
- [43] 赵国月, 周领顺, 曹明伦. 翻译目的、翻译行为和对外翻译: 曹明伦教授访谈录[J]. 翻译论坛, 2019(1): 1 - 9.
- [44]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45]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关键词集释: 代专栏导言[J]. 语言教育, 2020(1): 51 - 53, 5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rom “Translational Action” to “Translator Behaviour”

ZHAO Guoyue, GAO Xiaox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been giving full attention to the a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bu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expressions about a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al Action” and “Translator Behaviour”. And the usages of these two terms are often confused, which to some extent has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Afte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raised by the German functional school has becom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research approaches, linguistics, sociology, cognition science and the “text - society” mode. Especially the last one has grown into a systematic and logic theory - Translator Behaviour Criticism, which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present China.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action; translator behaviour; the term analysis

云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场景、话语与关系

武会园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在云传播视域下,通过回顾、凝练和探究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变革过程、整体效用与宏观前景可发现:诉诸画面的视觉化复调话语的国际传播效用超过独白话语叙事,平凡化的传统符号更加深刻地重构了我国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方式;在全球媒介系统变革、媒介文化奇观丛生的云时代,合作是一种优选的话语权竞赛。因此,我国国际传播要适应新场景、新叙事、新空间的同时,还要回到“人”的初衷,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价值理念,积极由关注内容向关注全方位技术规范转变,以“全球中国”的视野和格局为重塑全球传播秩序和重建全球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云传播;场景;话语;流动空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79-06

当前,人类走进信息文明时代,走进全球传播场景,中国与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云传播技术创新和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融合叠加,使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既孕育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全球媒介网络结构的流动空间已经形成,行为者生产自己的内容和符号以影响他者的智识并挑战权力关系。面对受众全球性、互动即时性和评价多样性的现实,中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传播,要在云时代的流动空间里探寻更加有效的讲故事方式,以进行世界性的传播,进而建构后疫情时代的传播秩序和社会常态。

一、云时代重构国际传播的场景

技术是人类与世界交往的特殊方式,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助推了技术和产业的创新结合,促发了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变革。用于传播、储存、处理以达成人与人交流为目的的信息,同时可以成功征服空

间与时间的媒介技术逐步进入模拟人类感知和认知的发展新阶段,成为社会自我更新的一个技术机制。云传播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是一种依靠可远程访问、可扩展和可测量的信息技术资源,以“共享”和“开放”为传播机制,在云端完成传播过程并进行“云服务”的新型人类信息传播模式。^[1]云传播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信息获取需求、信息传播习惯和信息存储方式。大数据可视化是云传播内容变革的基本趋势,我们已经走进了云传播时代。

伴随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而来的交往疏离、物理隔绝的要求,直接导致政治、经济、社会与人际交流数字化转型的加快。基于云服务的云传播建构了一种流动空间,空间的行政边界被弱化,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被消弭,且两者进入彼此的深层结构:通过云传播连通境内境外的海量数字平台,各类信息资源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最大程度地共享,进而可

收稿日期:2022-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传播研究”(22AXW003);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强校项目“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广东省科普传播的新架构”(Q18298);广东海洋大学社科项目“融媒体背景下学习强国APP的文化传播路径研究”(C19096)

作者简介:武会园(1988—),女,河北唐山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互联网治理。

以打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孤岛”,从而使虚拟化的社会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能够在云端跨境传播,整个世界呈现出大卫·盖勒特所说的“世界流”(worldstream)状态。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流动、技术流动、符号流动”等各种“流”的作用下,一种以现实社会为基础、虚拟社会为核心的流动空间产生了。这种流动空间为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创造了全新的场景,云传播使我国国际传播的文本被解构和重组,诉诸画面的视觉化转向使独白叙事转为复调叙事,新的符号被拓展到国际传播话语中来。

(一)面向未来的传播场景

云时代,国际传播改变了以往基于历史经验而希冀“可能”效果的传播,转为基于全面掌握数据、媒介、用户信息等动态趋势和互动关系以达到“可信”效果的传播。在海量数据、信息碎片、个性化算法的时代洪流里,平台与用户要素之间的关系被重构,尤其数字孪生的元宇宙兴起,国际传播的未来场景被具象化描述,并且除原本参与国际传播的专业机构和相关专家外,广大用户可以以个体具身或数字分身的方式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来。当下现象中潜在的未来趋势和共同话语得以预见,进而可知,云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场景是数字化的、动态的、可视化的,且能够容纳众多个体共同参与的超级场景。

(二)人机交互的智能叙事

云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人机交互的智能叙事模式,加速了我国国际传播的智能化变革。国际传播是一种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模式中的具身实践,与平台、算法等协同建构国家传播话语叙事空间和意义空间。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产生的现象级传播效果,归功于“我们”的意志理念,VR、AR、XR等R系列技术手段和对体育运动共识情感的抒发。云传播技术推动下的国际传播叙述模式,其构成要素不断丰富和转化,深层互动的国际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深耕之要。

(三)符号平凡化的深层影响

云时代的国际传播,会通过云计算、数据分发、节点控制等实现个性化分发,与传播对象形成符号互动、符号共识,以此来增强国际传播的深层影响力。云传播的符号可以无限使用、无穷重复,可视化的影像符号在网络社会中源源不断地被传播、被接受、被解读,重要的国家话语就在复制中得以平凡,其所激发的情感影响就在对外传播中深入下去,实现“传统符号平凡化”^[2]。例如,全球受众对“冰墩墩”的形象解读出不同的聚点:媒介文化奇观、国家形象建构、国

际传播话语等。熊猫在此次国际传播中,被符号化,成为美好中国、和谐中国、体育中国的话语代表。

二、我国国际传播话语的演变

中国在国际场域中,话语博弈面临诸多挑战:西方话语的谣言、妖言,发展中国家话语的怀疑、质疑,国际话语规则的乱序、失序,中国学术话语的错位、缺位。此外,中国的国际传播还面临新媒体生态环境变革的挑战。云传播、云服务和云存储技术的高速发展,智能算法的创新使用以及UGC内容生产模式的普及,空前地释放了人类生产和传播话语的潜能。于是,信息虚假、内容失真、伦理失范的过载现象丛生。在此情况下,对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双维影响下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变革过程、整体效用与宏观前景进行回顾、凝练和探索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一)单一媒体时代的“独白话语”(1949—1978年)

新中国前30年,背向世界的中国受到媒介技术、国家实力等的综合影响,在国际传播空间上大多驻足于海外侨胞的现实空间。但也初步建立起了由通讯社、出版社、报社和广播电视台组成的基础媒介体系,形成了以文字、图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字文化,呈现出了客观、理性的“独白话语”。

一方面,此时的国际场域中,全世界海外侨胞迫切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新变化、新发展;另一方面,裹挟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舆论压迫,充满偏见和敌意的话语误导华侨的认知。为了尽快破局,本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我国停止了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取缔了外国新闻机构。政务院于1949年设立国际新闻局,该局发行的外文版《人民中国》《中国画报》《中国文学》《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多种杂志向世界展现新中国的决心和意志。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统一领导全国外宣工作。此外,新闻业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镇,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新华社于1952年担负起向国内外发布文字新闻和图片新闻的双重责任^[3]。1978年,新华社建立起通讯网络,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奇兵。有志之士在得到中央认可后于1952年9月成立了“中国新闻社”,就附于新华社内,名为“华侨广播组”,于新中国成立3周年的国庆庆典上,以“中国新闻广播电台”的呼号向海外播报华文口语记录新闻,并航寄通讯稿,报道祖国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建树与成就。1957年3月,“中国新

闻社”独立。此阶段我国也尝试通过影像进行对外宣传,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主要负责拍摄新闻纪录电影,以期能真实地展现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成就和祖国的美丽河山。但彼时中国的对外传播体系尚未建立,新闻纪录电影便成了“茶壶里的饺子”。

通过对新华社1949—1978年24篇优秀对外新闻稿的阅览得知,此阶段,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通过报刊和广播开展,形成了以文字叙述为主的传播话语。如《淮河治理的里程碑》(1952年)、《中国第一条横跨沙漠的铁路通行无阻》(1961年)、《东北国营农场蓬勃发展》(1962年)、《农民热爱李双双》(1963年)、《自行车在中国的广泛应用》(1975年)、《高温季节在北京》(1978年)、《小书法家》(1978年)等新闻稿重点描绘国内生产、生活场景。总的看来,新千年之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形成了以“独立自主”为基调、以“广交朋友”为格调、以“自我阐释”为论调的独白话语,致力于冲破“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4]的现实桎梏。但简单的修辞逻辑失去了国际传播话语的“外位性”,针对华侨同胞的对外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中国眼中之中国”,但没能更好地建构“世界眼中之中国”。

(二)多元媒体时代的“开放对话”(1979—1999年)

1978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球范围内,新闻传播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激光照排、有线电视推广、上星传播、互联网等都为我国拓宽国际传播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1980年4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立,指导全国外宣工作,1991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挂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调国际宣传事务,致力于把中国全面、真实地介绍给世界^[5],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开始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1981年《中国日报》问世,面向全球发行。1985年《人民日报》创办海外版,进一步扩大国际传播空间。1990年,中央电视台组建对外电视中心,电视外宣时代到来。至此,由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六大央媒携手共建的“外宣国家队”正式形成。

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传承文字叙述的方式之外,还拓展了影像传播的路径,《漫游中国》《丝绸之路》《万里长城》《神州风采》等纪实影像以文化的视角、开阔的视野、博大的情怀为世界了解中国开启了新天地。面对开放的中国,西方霸权话语式微。1992年,

代表中国出使美国进行外交的大熊猫“玲玲”去世,《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纷纷头版报道这一沉痛消息,且在该报道中一改往日霸权嘴脸,话语中尽显中国“良善温和”的形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我们的对外宣传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基因”,以“和平友好”的态度睁眼看世界,并向世界展现中国。

(三)融媒矩阵时代的“对话话语”(2000—2009年)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考范畴、思考工具、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也将我国对外传播空间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QQ、博客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也丰富了人类信息传播和信息获取的途径,催生了融媒矩阵景象,促发了整体媒介生态的巨变,重构了人类的社会话语体系。

新千年伊始,面向世界的中国开始向融入世界转变,积极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创办孔子学院,与世界各国互办文化交流活动。此阶段,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明显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说明”,形成了以“和平发展”“和谐社会”“跨文化传播”等为关键词的“对话话语”。对话是一种艺术,互联网恰好实现了对话的及时性,增强了传播的有效性。融媒矩阵时代,我国对外传播走向了科学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

(四)云传播时代的“全球话语”(2010年至今)

云时代,全球传播秩序呈现出变革趋势。首先表现为全球权力格局转移。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秩序”濒临崩塌的边缘,全球秩序的重构刻不容缓,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新力量^[6]。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崛起大国如此迅速、在如此众多层面上获得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瘫痪和竞争优势丧失的过度担忧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不信任螺旋式上升^[7]。世界格局仍处于转型、过渡期,有进入“碎片化”时代的征兆。每一次时代场景的变化对不同国家的机遇是不确定的,中国在这样的场景下,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人有一种世界观念,即超越东方西方的天下观念。十四亿级的崛起,中国恰逢其盛。

云时代,全球传播秩序呈现出的第二个变革趋势是媒介奇观丛生,即能够体现当代价值观、能够展现当代生活方式、能够掀起大范围关注和热议的现实议题^[8]。媒体奇观本身构成了一个推进全球传播格局变迁的话语场。云传播使生活本身成了媒介内容资

源,心物互动的技术丰富而深刻,媒体奇观更是浸入人类生活体验的各个领域,呈现出数字奇观。云传播技术完成了传播话语的视觉化转向,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创制了真实的视觉刺点,促使“中国顶流冰墩墩”成为“全球顶流冰墩墩”。路透社发文介绍了日渐圆润的“祖孙三代”,亚运会的盼盼、奥运会的晶晶、冬奥会的冰墩墩,憨态可掬的熊猫作为中国的话语代表,在技术赋权与受众偏好的共同作用下成为“熊猫奇观”。

云空间中,全球传播秩序第三大变革趋势是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变革。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传播秩序的巨变,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借“金砖国家媒体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跨国机制,积极开展媒体外交和合作传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翻译成35种语言畅销海外。同时智库、互联网企业等被纳入国际传播战略中,多元主体的“复调话语”取向明显。为适应云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国际传播新聚点的现实,中国环球电视网快速成为Facebook第一大媒体账号;澎湃新闻主打“外脑”“外口”的“第六声”,成为国际传播话语创新平台;TikTok是我国成功出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在海外现已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以主动建构为目标,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样态。

三、云传播时代的话语权实践

新的媒介技术会促发社会的一种结构性转化,空间是社会的表现。进而,媒介技术会催生一个新的空间,确保这一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世界观和话语系统得以传承和维系。全球传播的起源归结于社会“流动性”的产生,云时代形塑了全球传播的“流动时空”且该空间中蕴含着革命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包括“全球权力、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公地、全球问题”等一系列“全球事务”。也就是说,在云传播时代背景下,“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功能和权力在流动空间里组织”^[9],传播空间转向了一种更具流动性的形式,“流动空间”是云传播逻辑的物质表现。

人类进入云传播时代以后,“信誉和地位会使其发挥信息路线图的作用”^[10],云传播扩大了流动空间的边界与情境,改变了话语权力格局的规模。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的本质来源于传播格局、国际形象、文化张力和公信力等的共同维系。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争焦点。云时代的流动时空下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与博弈,亟须加强流动空间创制、创新流动空间技术、强化流动空间信任。

(一)“情境智力”所在,话语权所养

云时代的流动空间里,外部世界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在这样多层次、全方位博弈的新传播情境下,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并充分利用其变化趋势的“情境智力”便成为最关键的能力,同时,“情境智力”也是提升公信力的重要能力。据《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信任度综合指数以82%的成绩连续第三年位居世界首位”^[11]。

国际传播话语是一个国家情境智力的直观表现,话语权是随着国家实力、国际环境、世界格局变化而变化的,话语随着情境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效力。话语的精准与可持久应用有益于深度驾驭“情境智力”优化传播互动格局。千年文明是我国情境智力的价值根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华文明所代表的价值观开始在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中获得认同。但五千年的文明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被世界所理解。共享、共赢的“利你”话语比友善、担当的“我好”话语更具有影响力,“中国故事”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形成共同话语,以实现国际传播的效能。尤其在国际规则失灵的语境中,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要逐渐从“中国发展故事”向“中国与世界同发展的故事”转变,从“施惠国救助故事”向“施惠国与感恩国携手共建的故事”转变,从“家国情怀故事”向“关切世界人民福祉的故事”转变。

作为史上首次实现转播全面“上云”的奥运赛事,北京冬奥会收获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全球关注度。其吉祥物引发了“冰墩墩奇观”,这一现象级国际传播事件证明,我们在对外传播的内容选择上,可以拓宽广度;在对外传播的技术选择上,可以多元互动;在对话传播的话语选择上,可以增加深度。发挥好“情境智力”,要从直抵人心的故事出发,通过故事与公众产生情感共鸣。

(二)技术规范所在,话语权所强

流动空间消解了个体空间的边界话语权,促进了双方的互动与融合,但个体空间衔接处存留的缝隙空间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形态,空间碎片是流动空间的直观表现,记忆碎片、景观碎片、文化碎片、认知碎片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世界的总体性^[12]。云技术在生活中的嵌入与渗透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云传播强大的能量消解了话语霸权的垄断。但实时交互、智能推荐、大量存储的传播特性所建构的“友好世界综合征”的副作用被强化,一些重要议题被消失,进一步导致了原话语体系的解构和话语

权力的分散,恰如麦克卢汉所说“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13]。

信息驱动的社会已经开启,信息处理能力、信息存储量值、信息传输速度都呈指数级增长,人们成为摩尔定律的受益人。冷静批判学者们看到技术成为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内驱力的同时,也感知到信息技术会形成个人独舞的反连接逻辑^[14]。波兹曼以审慎的态度提醒人们要防备文明向技术投降,媒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话语权的变迁,后真相又印证了虚假信息的快速传播。因此,技术规范成为当今社会应对信息泛滥过热的“恒温器”与“调节器”。

我国已经意识到技术规范要实现从基础设施层、技术协议层、软件应用层到内容层的全面关注。当今云技术的发展,促使二维数字空间的所有规范问题都已跃入三维现实世界的空间,并围绕物理安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了新的议题。信息技术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技术规范必须纳入物质世界明确对网络物理空间的责任,以实现网络物理创新所需的信任和保护。基于此,在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深度融合的流动空间里,遵循技术规范,在安全可信的环境中才更易于中国话语的生成与传播。

(三)理念认同所在,话语权所长

流动空间具有社会性,国际间的交往、互动关系均附着在物理景观,不同国家的话语体系和理念建构又均有差异。空间边界是空间差异的表象,是不同话语体系的外部空间;空间边界又是空间规模的体量,是话语传播效果评定的重要指数;空间边界还是空间情境的具象,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空间情景和传播场景的迥异。云传播技术的“流动”可以将物理上分离的主体放在共时层面在云端互动,达成对话。这种对话实现了对权力的剥离。一直以来,西方霸权国家通过对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的控制,主导全球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希冀在有序、安全的国际规范下,寻求打破信息传播困境的着力点。云时代,数据是经济、是资源、更是权力,十四亿级大国在云存储、云计算、云服务等领域开始掌握话语权。换言之,云传播时代的到来致使全球传播秩序亟待重塑。

中国以人为本、为全世界谋福利的宗旨始终如一,遵循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责任共担的全球格局。未来,从人类传播与媒介、人类信息与社会、人类文明与发展等方面,都要求我们回到“人”的初衷,建立共同体意识,以应对全球威胁和全球转型发展中的世界挑战。合作是另一

种形式的话语权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国际传播的话语基石,是解决话语权不对称的重要方案,是云传播时代更加贴合世界潮流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等领域能够为国际传播提供充足的话语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认同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是我们与世界各国共同肩负起全球发展的责任,更是我们应对全球传播秩序治理转型的智慧贡献。

四、结束语

“流动空间”实际上为不同时期的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为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经历了独白话语、开放话语、对话话语、全球话语的转化和演进,从本质上实现了国家传播话语的建构和聚合,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这一话语演进过程体现了云传播语境下我国国际传播外部话语权的变化,同时还呈现出了流动空间与世界界面对接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我们从背向世界到面向世界,从面向世界到融入世界,终于在云传播背景下开启引领世界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我国国际传播正向着“五位一体”与“中国版中国故事”^[15]转变,展现出了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高度与象征意义。

当然,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未来会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继续流变,流动空间的边界也会不断溢展,话语与技术的互动也会出现新的方式。元宇宙的国际传播场景正在逐步搭建,“中国版中国故事”开始以更具互动性、复调性、全息性的样态在国际场域传播。这不仅涉及话语的生成、编译和阐述,也涉及接收话语意义的受众所选择的传播场景。但无论传播场景、话语表达、媒介平台等因素如何演变,我国国际传播的目标都是为了让世界人民全面了解多元的、发展的、有大国担当的中国;为了与世界各国实现友好邦交,共同应对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危机;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李卫东,张昆.“云传播”:人类信息传播的革命[J]. 图书情报工作网刊,2011(10):48-55.
- [2] [美]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M]. 蔡金栋,梁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55.
- [3] 刘家林. 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21.
- [4] 马克思. 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M]. 中共中央马

-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0.
- [5] 申宏磊,于森,崔斌箴,沈晓雷. 对外宣传工作应改革开放而生:专访新时期外宣事业的开拓者朱穆之[J]. 对外传播,2008(11):5-7.
- [6] 朱禁箴,王璐,余巧楠,等. 新兴国际组织改写全球权力格局:知名国际组织、国际峰会、智库大盘点[J]. 中国经济周刊,2013(26):65-67.
- [7] Jon R. Lindsay. China's Impact on Cyber Security: Fiction and Friction[J].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4(3):7-47.
- [8]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 史安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
- [9] [英]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1:524.
- [10] 赵瑞琦. 美国媒体在印度的结构霸权与话语权力[J]. 公共外交季刊,2016(3):92-98.
- [11] 方莹馨. 《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发布[N]. 人民日报,2020-03-07(003).
- [12] 刘涛.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5):73-92.
- [13] [美]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 [14] 晏青,陈光凤. 被委以重任的连接[M]//[荷]何塞·范·迪克. 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 晏青,陈光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译者序6.
- [15] 任孟山,陈强. “五位一体”与“中国版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J]. *现代出版*,2022(3):21-2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loud Age: Scenes, Discourse and Relations

WU Huiyua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ud communication, by reviewing, condensing and exploring the reform process, overall utility and macro prospec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innov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utility of visualized polyphony discourse with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appealing than the monologue discourse narration, and the trivi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symbols more profoundly reconstruct the expression mod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In the cloud era of global media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media culture wonders, cooperation is a prioritized discourse competition. Therefore, while adapting to new scenarios, new narratives and new Spaces,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human beings”, adhere to the basic valu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actively shift focus from content to all-round technical norm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reshaping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and rebuilding the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the vision and pattern of “global China”.

Key words: cloud propagation; scene; discourse; space of flow

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韩燕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媒体的迭代升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建立健全高校融媒体宣传矩阵,成为营造“三全育人”校园环境的大势所趋。本文分析了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宣传矩阵建设的时代内涵,提出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制定总体规划;整合宣传平台,打造融媒体中心,形成协同联动效应;选择好思政资源,打造融媒体成果精品;实施培育培训计划,加强思政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打造高校融媒体宣传矩阵的建议。

关键词:融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5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85-0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提速降费”,改变了大众媒体使用习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全新的媒体环境,因此,顺应网络媒体发展趋势,充分应用新媒体工具,建立健全高校宣传矩阵,是提升宣传教育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校园环境的大势所趋。

一、高校网络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现状

关于网络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学者们都从理论和实践等角度进行阐释,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的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等方面。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手段,为构建立体的大宣传格局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高校思政工作遇到教育资源、教育形式、考核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大学生受新媒体影响大,其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受到很大冲击,弱化了

传统媒体对思政工作的主流价值引导^[2]。基于网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者们从队伍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管理创新等角度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

纵观近年来学者们关于网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但研究形式比较单一,多局限为理论研究,缺少实证研究。对于如何打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媒体平台研究不多。媒体形态从新媒体到全媒体,再到今日的融媒体,为我国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强的工具,未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涵式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今后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二、融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的优势和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是在高校党政部门主导下构建的融媒体平台,综合了各宣传平台优势,植根于学生社会交往的媒介环境,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育人铸魂的作用。当代大学生伴随着信息技术而成长,聊微信、刷微博、看短视频、逛社区是他们的日常,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获取信息,思维也变得更加活跃。相对于传统的灌水式内容辐射,他

收稿日期:2022-08-10

基金项目: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部校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自媒体时代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2021YBXM009)

作者简介:韩燕飞(1985—),女,河南武陟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新媒体。

们更青睐去中心化、共享型、分享型的媒体传播方式和内容。融媒体的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工具,与传统教育相比,其创新了教育学习模式,更具互动性,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同时便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随时了解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并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3]。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信息内容较传统时期更加丰富化,挑战传统价值观教育模式。如今泛娱乐化的传播倾向,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这些都对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三、融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存在的问题

融媒体宣传矩阵的构建最先在媒体领域实践,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很多高校也纷纷在学校现有媒体平台基础上,创建了融媒体宣传矩阵,在宣传教育、引导舆论、营造氛围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仍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 制度机制不够健全,领导班子重视度不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涵盖面广、涉及部门多,仅仅依靠思政教育部门无法完成,需要在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目前,部分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迎合上级部门的要求,重视形式而忽视效果的现象;相关部门职能未完全发挥作用,制度机制不健全,领导班子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系统,这些都阻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2. 平台多样,但发展不平衡,缺乏联动机制

根据融媒体发展,部分高校适时上线了新媒体宣传平台,但仍旧存在重微信公众号,轻其他宣传平台的情况,尤其是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由于融媒体团队素质参差不齐,视频号和抖音号虽有些精品,但是更新频次不太高。二级学院已经做到了微信公众号全覆盖,但是推送内容较单一,趣味性差,阅读量不高,影响力低。在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二级平台与校级平台联动性差,没有形成合力,传播涟漪小。

3. 内容建设较单一,不善于整合媒体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单一、缺乏感染力,

与学生所处时代、实际生活出现脱节现象,很难引起大学生兴趣,甚至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部分高校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团队运营,一些新媒体平台有“政绩工程”痕迹,内容空洞且少思政教育内容,更新速度慢,在大学生中关注低,起不到应有的思政教育效果。因此,高校要与时俱进,做到与高校学生同频共振,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真正发挥育人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这就要求高校要结合融媒体特征,充分发挥各平台功能优势,展现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内容,实现内容的深度融合。

新媒体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网络素材,大学生活跃在感兴趣的微博、微信公众号、B站、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并且对这些网络素材熟悉且乐于接受。思政教育工作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强互联网思维,深入学习网络技术,善于借助时事热点,将思政内容融入其中,增强影响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追踪学生上网痕迹,及时了解学生需求,筛选出学生喜欢又兼具教育意义的思政教育素材。

4. 缺乏融合思维,思政队伍媒体素养有待提高

融媒体矩阵建设要求实施主体要具备融媒体思维,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媒体思维首先体现在“融媒体+”的理念上,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层面、各领域的工作都要秉持“融媒体+”的要求,结合融媒体便捷性、多样性、交互性等传播特征,提升思政育人的吸引力和“黏性”,扩大思政育人的辐射范围^[5]。目前,一些高校还存在网络思政教育是宣传部单个部门的事,缺乏全盘思维。作为高校与学生接触比较多的单位,学生处、团委和各学院等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心学生需求,精心设计贴近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活动,这样才能通过融媒体平台,做到“润物细无声”,增强育人成效。

学生在哪里,宣传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育人主体,对于学生活跃的网络平台也要做到了解并且灵活运用,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第一时间掌握学生思想和生活状况。目前高校思政队伍素质存在参差不齐,这就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要更新教育理念,提升媒介素养,灵活应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沟通交流方式。

四、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方案

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规律,根据广大师生需求,结合当前学校新媒体发展现状,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探索“融媒体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方式,唱响网上主旋律,占领舆论高地。基于以上内容分析,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打造高校思想政治宣传矩阵。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制定总体规划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在前、谋在前,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明确各平台定位,制定总体目标。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师生生活服务为前提,文化娱乐为基础,抓好教育教学,把做好思想引领作为总目标。

可以成立融媒体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部门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牵头、各职能部门积极协作、各学院共同参与的领导机制。要层层压实责任,学校团委、学生处、学院是与学生联系最为直接的部门,也是各类学生活动主要策划者,策划时要紧紧围绕时政热点,宣传部要及时跟踪宣传报道,弘扬主旋律,唱响网络舆论阵地。

融媒体育人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初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党政工作要点和宣传任务,将网络思想工作纳入学校事业发展总体布局,研判本年度育人热点,制定网络文化作品育人计划,下达至各学院,利用网络文化作品创作实现专业实训和思政育人相结合,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红色”主旋律文化的教育。

要创新网络融媒体考核体系,通过评选优秀通讯员、优秀新媒体等方式,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将网络文化作品纳入科研成果统计、列入职务职称评审条件、作为评奖评优依据,激发广大师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生动力。

(二)整合宣传平台,打造融媒体中心,形成协同联动效应

一般而言,相比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型中央媒体,单个高校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打造独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媒体宣传平台,因此,各高校应充分整合利用现有新媒体宣传平台,在内容深耕上下功夫。我校整合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手机APP新闻客户端、强国号、校报、广播台等媒体平台,初步建立了兼具网络思政和专业实训功能的融媒体中心。同时努力探索“中央厨房式”媒介融合生产模式,突破职能单一、队伍单一、内容单一的传统模式,打破校园媒体版块分割运营模式,建立校园网络新媒体矩阵,实行联动机制,从策、采、编、播、发、管、控、馈八个关键节点进行结构优化,对选题及文稿、图片、视频等素材实行“统一策划、集中采集、分级开发、全媒发布、深度评估”。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融媒体中心从师生关切出发,结合各平台特点及优势,策划系列师生喜闻乐见的微作品。学校微信公众平台开辟“今日疫情动态”栏目,向广大师生传递学校疫情防控举措、疫情防控知识,帮助师生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开辟“郑工故事”栏目,用图文形式记录师生抗疫事迹,鼓舞人心。官方微博每日推送疫情防控知识,帮助师生缓解心理压力,掌握最新防护知识;发起“疫情过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等话题,正向积极引导学生。学校抖音号、视频号发挥短平快优势,用视频记录师生一线抗疫瞬间,推出系列原创抗疫歌曲、手势舞,向师生传递正能量。

加强学校媒体和二级学院媒体之间、校方媒体和学生媒体之间的融合,通过“互粉”,积极转载、评论等形式,形成校内融媒体宣传矩阵,放大宣传效应,形成融媒体宣传合力,增强学校网络舆论阵地建设,整合校内思想宣传力量,发挥协同联动作用。目前我校每个学院都开通有团学微信公众号,部分学院还开通了专业相关微信公众号,学校发布了新媒体联盟相关规定,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上能够做到步调一致,协同联动,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选择好思政资源,打造融媒体成果精品

所谓融媒体育人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制作出包含一定思政元素的融媒体作品成果,通过融媒体平台传播给大学生,对教育对象进行积极、正向引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如何创作出包含一定思政元素、学生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作品成果,是融媒体育人的关键一步。万物皆联,通过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果。创作融媒体作品成果,也可以坚持这一思维模式,即通过打碎与重构,创作出可复制的、易操作的作品形式。

一是提炼思政要点。思政元素包括正确的人生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高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道德修养(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法治素养等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学懂弄通各阶段时政要点、热点,把握好教育时机,围绕时政热点,提炼思政元素,精心策划活动。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2022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等时政要点,精心策划系列活动,通过舞台剧、诗歌朗诵、快闪、趣味游戏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在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我校团委曾策划“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五四主题游园活动,通过舞台剧等多样形式,将党史知识融入其中,给学生上了一堂沉浸式思政

课,在学校微信公众平台推出后,获得一致好评。

二是分析大学生心理特征,用活融媒体平台。大学生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心智还不太成熟,由于信息茧房效应,看待事情不够全面,容易形成片面认知。因此在融媒体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做强主流舆论,适应“零零后”大学生“指尖一代”的特点,以学生喜爱的形式,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理论宣讲、答题竞赛、讲述故事等形式,打造系列包含思政元素的融媒体作品成果,实现思想引领,真正做到入脑入心。疫情封校期间,学校官方抖音、视频号推出了我校学生核酸检测期间模仿潘周聃等系列视频,以视频形式记录学生们苦中作乐、青春向上的精神风貌,获得极高的点赞量。微信公众平台开辟“在‘疫’线共克时艰”“郑工故事”等栏目,充分挖掘学校党员干部、学工队伍、班导师、校医院医护人员、学生志愿者等典型事迹,为大家树立学习的榜样,起到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三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打造新媒体阵地品牌。新媒体宣传平台要紧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让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实际问题。要结合学校特征,在诸如毕业季开学季、重大纪念日等开展系列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利用新媒体技术,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爱党情怀,让广大师生在“沉浸式”参与中,得到精神熏陶。以“两微短视频”为抓手,加强策划、注重原创,可以开辟如《校园微故事》《视觉校园》等栏目,通过深入推进短视频建设、强化互动性等举措,逐步打造一些品牌栏目,扩大学校新媒体宣传影响力。

同时,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网络精品项目,带动校级项目的培育建设,实现国家、省、校三级精品项目的互动,打造具有示范辐射作用的三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集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四) 实施培育培训计划,加强思政队伍建设

首先是打造专兼职宣传队伍。打造一支理论知识、专业技能过硬的宣传团队。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尤其是近年来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使宣传部宣传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学生是信息时代的“弄潮儿”,学生在哪里,宣传工作就要到哪里。宣传部工作人员要学懂弄通新、旧技术,学会大数据分析,预测学生关心关注热点、焦点,生产出大学生喜闻乐见、解惑又解渴的网络作品,积极进行正能量引导。另一方面,要通过系列扶持政策,激励包括党务工作者、共青团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导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网评员、网络文明志愿者等人员共同加

入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学校每年会定期组织思政工作者进行专题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增强业务水平。

其次是培育网络名师。高校思政课老师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圣职责,而高校思政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郑州大学周荣方老师讲到焦裕禄故事时动情而哭彰显了思政课老师的铸魂育人作用。所以,可以从学校专业素养高、学生口碑好、擅长新技术的教师队伍中,培育一批网络工作骨干,通过录制微课、现场讲座等线上线下形式,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校学习强国平台开辟了“润物无声”“郑工慕课”版块,分享了学校“网红”老师的精彩微课,如传媒学院老师录制的《神话传说故事与中国文化》微课,学生在神奇的神话故事中,感受浓浓的文化熏陶。

最后是培养学生骨干,积极发挥学生新媒体团队力量。目前宣传部融媒体中心有微传媒、记者团、广播台三个学生团队,在宣传部老师指导下开展选题策划、作品制作及推送等工作。通过每年定期对学生队伍进行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学生队伍工作水平。开展学生骨干训练营,围绕新媒体运营与策划等主题培训,加强新媒体运营学生骨干培训。多措并举,初步建立一支有理念、懂网络、会技术的学生骨干队伍。例如,在2022年国庆节宣传策划中,三个学生团队统一策划,充分发挥各自团队优势,策划了“我与国旗合影”微信推文、《美丽中国》手势舞视频、《郑工学子祝福祖国》广播剧等一系列内容,营造了喜庆的国庆氛围。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硬件支撑,优化融媒体中心设施建设,积极与网络技术公司对接,提高技术水平和网络承载能力,进一步为教育教学、师生学习生活提供高速、稳定、安全的基础保障。

五、结束语

高校要紧跟时代步伐,搭建好融媒体宣传平台,充分发挥融媒体技术的优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画好网络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心圆;守好高校网络主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出更多专业知识精湛且具有家国情怀、能担当祖国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大学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下转第94页)

中原学与河洛学

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新时代,要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关键词: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河洛学;中原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6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89-06

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三千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峰、文化高地、文化高原。过去素有“逐鹿中原”“鼎立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但我们讲不清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非同一般。在河南,我们都知道“河图洛书”的神秘和神圣,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大家视之为“天书”,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新时代,我们只有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中西文化比较、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以哲学的视野、文明的视野、学科的视野来认识河洛文化、嵩山文明,以中原学、河洛学的相互碰撞、交流和交融,为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头活水”,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和钥匙。

一、河洛文化与河洛学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既强调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也强调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他把黄河文化的战略定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用“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十分传神地表达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指出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中心,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在兼容并蓄中前进。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也指出,要了解中华文化,要到河南,要到洛阳。

悠悠河洛,天下之中;山河形胜,煌煌文明。在时间轴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话把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概而言之,“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更是道尽了朝代更迭的沧桑;在空间轴上“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道出了河洛地区作为中原腹地核心的核心。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生成的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环嵩山区域文化,它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夏商、东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以东汉、北魏、唐之武周、北宋为内容,以洛学或

收稿日期:2022-08-2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原子学研究”(2022XWH061)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主要从事黄河文化、中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宋学为高峰,以古都洛阳凝聚的文化精粹、精华为核心,以“河洛郎”为特征,是海内外华人的民族血脉和精神纽带。河洛文化荟萃了黄河、嵩山文明积淀的精华,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最大贡献,在黄河文化中具有发源、中心、主体、根本的地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主体,具有显著的源头性、根脉性和族魂性特质。

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河南时说,要“让中原更加出彩”;2019年调研河南时说,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奋勇争先”,一个“更加出彩”,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出彩河南”阶段。与之相应,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是新时代洛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动员文化的力量,使“诗和远方”与洛阳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炎黄文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

在洛阳,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理学寻源于此,道学肇始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经过30多年的研究,关于河洛文化的成果汗牛充栋,关于洛阳学、洛学的研究也不断走深。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河洛学”这个概念呢?从横向上来讲,西藏有“藏学”,安徽有“徽学”,湖南有“湘学”,都能自成体系,并代表各自的地域文化。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甘肃,即使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学术名称,但仍有一个贯穿古今的当代显学“敦煌学”。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我们都知道有河洛文化,却不知有河洛学,这是河南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社科界的一个遗憾。

新时代,如何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看待河洛文化?如何提升河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打造“行走洛阳·读懂中国”大品牌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站在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学科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和嵩山文明,才能够具有全国大格局、全球大视野、时代新表达。

首先,河洛学的提出,是由于河洛文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特别讲到黄河四大文化即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突出了河洛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正因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地位重要,才使河洛学的构建成为可能。

其次,河洛学的提出,是地域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化研究中自成体系的学科构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科的建立,为河洛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构建河洛学,对河洛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中原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河洛学的提出,是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随着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复兴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特别是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洛阳、南阳作为副中心城市,迫切需要河洛学的指导与支撑。

建设河洛学,要求我们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在话语体系中,相比较主流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学术话语的影响力是更为深远的。河洛学是对河洛文化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而言,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地理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河洛学研究视域下的儒学研究,不仅包括对思想家的研究、思想观念的研究,尤其应将儒学与洛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具体而言:

第一,要把河洛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轴、主干地位讲清楚。什么是主轴地位?如果从唐宋断开,传统中国其实经历了一个由“东西轴”向“南北轴”的明显转型。河洛地区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作用,一是体现在《诗经·大雅》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是体现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黄河文明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形成期是炎黄阶段,发展期是夏商周时代,兴盛期是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在这个过程中,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是文明轴心区。以洛阳为中心,西边是长安,东边是开封,在东西轴里,洛阳是个主轴。这个主轴后来又变成了南北主轴,杭州、南京、北京,洛阳还是一个主轴。如何把这个文化主轴定位清楚,对于我们认识“天地之中”的枢纽定位十分关键。

第二,要把河洛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体系讲清楚。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1. 河图洛书。河洛文化最早的标志是“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滥觞。古代传说中华龙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时代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包含“五行”思

想的“洪范九畴”。可以说,由“河图”发展出阴阳八卦,由“洛书”发展出“五行”,都孕育产生于河洛地区。河图洛书具有自否定、反身性和人文性的特征,“生”是其本质特征。我们对河图洛书、八卦、六十四卦的演变说不清楚,对源于它的“九五之尊”“大丈夫能屈能伸”“女大十八变”却经常是日用而不觉。《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河图洛书到八卦到六十四卦,清晰地揭示出文明曙光乍现、人类精神世界生成的文明图景。

2. 赫赫夏都。《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定都河洛,在文明时代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后世很多王朝都在这里定都。河洛地区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是从黄帝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期。中国古代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而正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夏文化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就在这里。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二里头位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就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东征伐纣,“息偃戎师”,这个地方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具有“辐辏之势”,是中华文明形成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夏上承三皇五帝时代,下启夏商周至明清之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是我国步入文明门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最早开启了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历史演进过程。从禅让制到分封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都与黄河文明中的制度治理密切相关。二里头夏朝遗址,对于我们领悟和感知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十分重要。对夏文化的研究,将开启国家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3. 河洛文化。儒家文化、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首先创立或传播于河洛地区。特别是“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制度规定,是上层建筑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成分,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习俗。

4. 洛学。北宋时期,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等人继承和发展,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对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探索。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二程把“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对自然、社会、人生诸

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洛学凝聚河洛文化之精华,是河洛文化的结晶和典型代表,并构成了河洛文化的核心内涵。

5. 洛阳学。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与政策指导。洛阳学不仅涵盖洛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而且涉及洛阳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个融贯古今、展望未来、多学科交叉、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等特征。

6. 嵩山文明。河洛文化是在嵩山脚下、黄河之滨诞生的。五岳之中嵩山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位置,与河洛文化从凝聚到辐射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是分不开的。从河图洛书到赫赫夏都、河洛文化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再到洛学、洛阳学、嵩山文明,我们要把这个脉络、体系梳理清楚。

第三,要把“河洛郎”“客家人”的概念讲清楚。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位置,又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是十三朝古都,它是一个文明的辐射源。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源泉在哪?“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郎”这个概念体现得很清楚。“河洛郎”为中原南迁后裔,是中国南方讲闽南语的群体,也是“台湾四大族群”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中原文化随之南迁,在与边陲文化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闽南文化。中原移民南迁入闽对于巩固和发展边陲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中原和闽南建立起深厚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纽带,也赋予了闽南文化深刻的河洛印记。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真实体现。“客家人”最大的特点是“客家非客”。由河洛地区传至中国南方地区的“客家文化”,使中国北方与南方融为一体。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河洛郎,河洛地区是他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故土家园。河洛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中国、建构了最早的国家模式,形成了最早的国家文明、中华文化,并经过数次民族大迁徙,以晕轮效应逐步扩散到四周。“河洛郎”“客家人”就是河洛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的魅力展现。这种心念故土、情系桑梓的浓厚深情,正是河洛文化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特性的显性表达。可以说,河洛文化对于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齐鲁文化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

二、中原学与河洛学

什么是中原学？对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对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文科；对河南省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中原学从时间上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四个阶段；从空间上定位，包括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从古典形态上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河洛学和新时代黄河学，是典型的五方之学。

河洛学与中原学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黄河学着眼的是流域，中原学着眼的是地域，那么河洛学既着眼于流域，又着眼于地域。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与中原学、新时代黄河学是局部与整体、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经过十年磨一剑，省社科联推出的“中原学”学科群如今已进入《河南省“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规划指出“鼓励支持各级社科联、高校、科研机构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特色学术研究品牌”，要求“围绕具有基础优势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在炎黄学、河洛学、甲骨学、老庄学、儒学、黄河学、中原学等领域培养一批国内外知名学术大家、学术品牌”。在2022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划300多个选题中，围绕中原学相关学科设置了十个重大课题。作为河洛学研究，这里面有三个问题是亟待分清的：一是要正确认识河洛文化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包括河洛地区、环嵩山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三个不同的空间流域，对于我们讲清楚“根在河洛”具有巨大的价值，从而能够为“客家非客”的河洛郎构筑精神家园、心灵故乡。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知道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内核、基因、灵魂和精神，是中华文明的“芯”和“魂”。在这里，唯有系统工程方能自立自强，如何用元宇宙技术打开“河图洛书”，是研究“我们从哪里来”的关键。三是要正确处理河图洛书与洛学、新宋学、洛阳学的关系，为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土壤。

河洛学对中原学的贡献、对中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五个大的范畴：

一是“中”。“中”在甲骨文里是一个旗帜插在高地上。河南古称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故曰中州。中州也叫中土、中原，先秦时期有时干脆就叫“中国”。《诗》赞郑国的子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为之中者归之也。”这个“中”从来都是“逐鹿”“鼎立”的要害所

在。“尚中”观念从萌芽到成熟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至西周初年，其内涵已经十分清晰，其标志性的里程碑是周公营洛。“尚中”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深刻反映了中华先人对自己所处特定场域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记载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四个四言短句，被称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十六字箴言”。这十六个字，由帝舜在命令大禹继承他的帝位时作为对大禹的指导和告诫之言当面口授。大禹又由箕子传给周武王，实际上是由上古帝王一代代传下来的统治心法。“执中”是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贡献的最大哲学智慧。“中”慢慢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价值取向“中和”“中庸”。所以中华民族不偏激，不走极端。今天，“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中原崛起”。背景是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六省里，哪个省能代表中原呢？只有河南能够代表中原，其他几个省都是局部地区属于中原，只有河南全部都在中原，而且处于核心部位。二是“枢纽”，连南贯北，承东启西。从中原到中部，到黄河，到中国，到中华，这是一个地理空间。从地域、区域、流域，到国家，到文化圈，是一个逐步辐射、放大、传播的过程。

二是“新”。创新是河洛文化的密码。历史上的洛阳曾经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河洛大地，是文明的摇篮、理学的源头。其中，“通”和“变”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范畴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概念。今天，坚持固本求新、守正创新的实践，我们必须完善机制、人才和资金的支持。河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法律、逻辑，还是各种官方或民间的制度构建、传统习俗等，都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这为我们今天“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等，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三是“兴”。“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起也，第二个意思是同也。河洛文化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呢？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都曾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周亡。”意思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西周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平王东迁。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

的黄河必将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我们现在讲“黄河宁,天下平”。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我们的黄河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四是“理”。二程创造的理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大规律、大准则。“理”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体系。《左传》载,“德,国之基也”。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很多人认死“理”。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把“理”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体系看得很高。“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支撑了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是“和”。和谐是河洛文化的主题词。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洛阳是和谐思想的发源地。和平、和睦、和谐是河洛文化的文化基因,也是其最大特质。

三、在中原视野中河洛学研究的新时代意义

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解释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问题意义重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已经被尘封,湮没在历史中,只有源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始终显示着历久弥坚、风雨如磐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最大特征就是生生不息的“生”。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体”,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一体。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透了,对于解决人类文明的一元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有助于河南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形象。在文明源流的探求上,我们有“满天星斗”说。黄河文明在良渚文明中有体现,在三星堆文明中有体现,在赤峰红山文化中也有体现。这些地方文化是否属于同一个篇章?它们之间有什么前后渊源?还没有讲清楚。所以必须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来认识,确立“一体多元”说,确立“重瓣花朵”说,确立主体主干说。我们不仅要“寻根探源”,更要“正本清源”、固本求源。五大都城遗址、龙门石窟、丝绸之路的研究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三,有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对仰韶文化、黄帝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深入,河洛学所要书写的,就是一部从黄河出发的黄河文明史。

第四,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价值。河洛学研究,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层文化。站位新时代,研究好、解读好河洛文化,建设好、发展好河洛学,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摇篮,是重瓣花朵的“花心”,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灵魂栖息地。河洛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是中华民族根脉所在、灵魂所系,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记忆,也是维系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最强大的精神纽带。在我们看来,北宋洛学正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河洛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包装和融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以河洛文化为主体脉络的华夏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正是因为河洛文化是一个开放创新的体系,它以礼乐为主体,融合三教,不断成熟;从周公制礼作乐始创儒学到东汉经学再到二程洛学,从老子创立道家到道教的形成,从佛教首传中原到龙门石窟的开凿,它们的每一次自我更新莫不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从巫术到术数到辩证逻辑,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领域,最后以儒释道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系统。如果说道家是“想得开”,那么儒家是“拿得起”,释家则是“放得下”。三者或治世或治身或治心,形成了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自如的从容世界。二程洛学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进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特别是理学的“理得”和心学的“心安”,都让我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让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上的栖息地。

第五,有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现代化。河洛学的提出,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从周代的礼乐文化到后世的礼法文化,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到科举制,特别是二程的理学,都为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镜鉴。

我们坚信,在中原学的视野中,建设河洛学、打造河洛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使命,也必将引领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

民出版社,2019.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张新斌.河洛文化与洛阳学[J].中州学刊,2016(12).

[3]程有为,主编.中原文化通史:第六卷[C].郑州:河南人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Study on Central Plains and Heluo Culture

LI Gengxiang

(Henan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As a regional culture centered in Luoyang, Heluo culture is the core and backbone of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Yellow River, the essence and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the study of Heluo culture to the height of Heluo science and treat it as a complete, systematic and complex ideological system,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Heluo culture better. In terms of regional scope and research content, Heluo studies is a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studies, and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studies, is the brightest pearl on the laurel. A good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Heluo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the spiritual homela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Heluo cultur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eluo study; central plains study

(上接第 88 页)

[2]韩燕飞.加强媒体融合,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J].传媒论坛,2019(9):114.

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1).

[3]李佩洁.“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媒体平台建设研究[J].江淮论坛,2021(4):183-185.

[5]赵威,范君,衡连伟.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6-20.

[4]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aganda Matrix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edia Era

——Based o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 Yanfei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CPC Committe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media brings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rix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edia era, 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make the overall plan, integrate the propaganda platform and build the media center.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like forming Synergy and linkage effect, selecting g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creating excellent products of media integration, carrying out training pla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aff, and creating media integration propaganda matrix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elted medi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paganda matrix

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研究

王琦, 马子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调查问卷调查了解252名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的学习动机现状和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利用Excel表格分类进行统计,并使用数据分析工具SPSS28.0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发现:按照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来看,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内在的学习目标及外在的辅导员、校内讲座、社会实践、课堂教学等方面,对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为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建议采取激发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措施:认清自我优势,提高自信心;树立远大目标,实现自我价值;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关键词:听障大学生;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7

中图分类号:G762;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095-06

近年来,关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案例近年来逐渐增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但对于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案例是缺乏的。将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以下简称“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其学习动机的异同,在完善对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研究的同时,帮助健听和听障大学生激发学习动机,进而促进大学生尽快成长成才,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合格接班人,可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同时也为听障大学生进入主流社会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学习动机

“动机是心理学里的重要范畴,动机能够促使个体的活动得以激发与维持,并且推动个体活动向某一目标前进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1]学习动机就是促进个人完成和保持学习、促进其教学活动朝着特定的目标的内心学习过程或自身状态。简单地讲,动机就是直接驱使某个人完成学习的内心动机。

“从学习的动力来源来分,学习动机可以分为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由自身的学习目标清晰度、对所事物的兴趣程度、内心自我需要等自身的因素影响诱导个人采取学习活动,引起自身的学习动力就称为内在学习动机。在学校中教师的教学内容、校园环境、社会上的实践过程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等等,从外界受到的压力与影响而采取的学习活动和产生的学习动力就称为外在学习动机。”^[2]

国内外研究表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了解“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现状,分析“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间存在的差异,研究如何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听障大学生

聋人即听觉障碍人,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听不到或是听不清周围声音,从而在生活上受到影响的人。而听障大学生是聋人群体的一部分,是聋人群体中通过聋人高考单招或普通高考等形式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2021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课题“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公平发展研究”(zks202101)

作者简介:王琦(1965—),男,河南镇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处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三) 健听大学生

听人是指有一耳或双耳未达到以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标准划分的听力损失程度的人。健听大学生是指在听人群体中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二、研究设计

(一) 问卷设计及问卷信度检验

为对“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进行实际调查,根据研究需要编制了“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问卷”,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调查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所学专业、性别、居住区域(城镇或农村)、所在年级、身份(健听或听障聋)、听力损失程度(一级或二级或三级或四级,本题仅听障人回答,健听人不用回答)、来自的高中(普通高中或特殊教育学校);第二部分主要调查被调查人的学习动机,主要从“两类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进行实践调查同时含有少量学生基本信息调查,通过对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长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等 20 余所的随机抽取大学生施测,进行问卷信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本问卷的信度为 0.748。证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可以使用。

表 1 可靠性统计

Cronbach's α	项数
0.748	26

(二) 研究对象的选取及抽样方法

本研究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从北京、天津、青岛、武汉、郑州、长春等地的 20 余所高校中随机抽取“两类大学生”合计 252 人进行调查问卷。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

表 2 被试的基本情况分布

学生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听障大学生	96	38.1%
健听大学生	156	61.9%

三、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研究学习动机是否存在差异的根本要素就是要找出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对“两类大学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学习动机调查问卷主要是针对高校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进行调查,“两类大学生”公用同一调查问卷。学习动机调查结果

表 4 听障、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均值差异检验

	A	B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学生类型										
听	2.32	1.79	2.56	2.89	3.07	2.47	2.37	2.67	2.60	2.55
聋	2.59	1.85	2.34	2.42	3.03	2.58	2.43	2.72	2.69	2.09
T 值	-2.12*	-0.65	1.71	3.53**	0.29	-0.76	-0.39	-0.37	-0.63	2.76**

注: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01$ 。

分为听障大学生组和健听大学生组,利用 Excel 表格逐个对被试的 252 名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进行分类统计,其中问卷共回收 252 份,有效问卷 252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其中健听大学生 156 份,占问卷总数的 61.9%,听障大学生 96 份,占问卷总数的 38.1%。针对以上问卷进行详细数据统计和客观整理与分析,运用 SPSS28.0 对数据进行处理,了解、分析“两类大学生”学习动机是否存在差异性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 内在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1. 内在学习动机总体性分析

将问卷中有关研究内在学习动机的部分按照听障大学生和健听大学生分为两类,内在学习动机主要是从: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学生对专业兴趣程度、学生的内心自我需要三个方面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影响进行调查、了解,并进行整合计算、比较总分平均值。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表 3 听障、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比较

学生类型	综合平均值(分)
健听大学生	25.33 分
听障大学生	24.79 分

从整体的角度出发,从表 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听障大学生综合平均值约 24.79 分,健听大学生综合平均值 25.33 分,健听大学生比听障大学生总分均值略高,但两者之间内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相差不大,同时也说明从整体来说两者之间内在学习动机差异不大。

2. 内在学习动机差异性分析

为更加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解“两类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学生对专业兴趣程度、学生的内心自我需要是否存在差异,运用 SPSS28.0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类大学生”以上三个方面均值差异进行检验。表 4 中 A 代表学生的学习目标清晰度;B 代表学生对专业兴趣程度;C 代表学生上大学的内心自我需要,为更详细地了解“两类大学生”在不同的自我需要比较下是否存在差异,又分为 C1 成为有学识的人、C2 能找份好工作、C3 报答父母、C4 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C5 为继续深造打基础、C6 改变个人命运、C7 促进祖国发展、C8 单纯随波逐流。具体数据如下所示: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后结果显示:健听大学生大部分内在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均值要低于听障大学生,但大部分差异不明显。

从内在学习动机的三个小维度来分析:

在学习目标清晰度维度上,听障大学生均值为 2.59 高于均值为 2.32 的健听大学生,其数据明显高于健听大学生,T 值为 $-2.12, p < 0.05$,说明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目标普遍比健听大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清晰,因此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听障大学生可能因为学习目标更加清晰、学习的方向更加明朗从而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由此说明,听障大学生整体学习目标更加清晰,比健听大学生整体内在学习动机更加强烈,同时更好地激发自身的内在学习动机。从学生对专业兴趣的程度这个维度上看,健听大学生均值 1.79,听障大学生均值 1.85 比健听大学生均值略高,但无明显差异。

在学生上大学内心需求维度上,除上大学因为能找份好工作和上大学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这两方面“两类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以外,其他方面“两类大学生”通过差异分析均无明显差异。在能更好地找工作方面两者的差异显著性 $P < 0.001$,且听障大学生均值为 2.42,健听大学生均值为 2.89,这说明健听大学生上大学是找好工作的内心需求比听障大学生明显更加强烈。在调查问卷中有至少 9 位听障大学生表示:上大学选择所学专业是因为提供给聋人选择的专业寥寥无几,并没有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工作所对口的专业,并且因为听力受损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偏见即使自己想要凭借大学生身份找到更好的工作也是很难被录取。因此,相比较健听大学生,听障大学生对上大学可以找到更好工作的内心需求普遍较低。同时在上大学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方面两者之间 T 值为 2.76, $P < 0.01$,听障大学生均值为 2.09,健听大学生均值为 2.55 两者之间差异较明显,这也说明健听大学生与听障大学生相比上大学的自我需求只是随波逐流,大家都上我也要上的心理更为突出。结合上面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与健听大学生相比较更为清晰,因此听障大学生普遍更加清楚自己上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有自己的想法时也便不会随波逐流。

总之,在内在学习动机中,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目标要比健听大学生的更为清晰,从而使听障大学生随波逐流心理也没有健听大学生的突出。但是由于专业选择量较少以及社会偏见的问题,导致听障大

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找好的工作的内心需求明显弱于健听大学生,这也是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略低于健听大学生的主要原因。

(二)外在在学习动机比较分析

1. 外在在学习动机总体性分析

将问卷中有关外在在学习动机的内容进行数据提取,从校园、社会、家庭三个维度进行调查、了解,并进行整合计算、比较总分平均值。具体数据如表 5 所示:

表 5 听障、健听大学生外在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比较

学生类型	综合平均值(分)
健听大学生	33.41 分
听障大学生	34.56 分

通过分别计算“两类大学生”外在在学习动机的综合平均值,能够更好地对比“两类大学生”之间外在在学习动机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由表 5 的数据可以看出,听障大学生综合平均值约 34.56 分,健听大学生综合平均值 33.41 分,听障大学生比健听大学生总分均值略高,但两者之间外在在学习动机总分平均值相差不大,同时也说明从整体来说两者之间外在在学习动机无明显差异。

2. 外在在学习动机差异性分析

运用 SPSS28.0 以及饼状图分别对“两类大学生”从学校、社会、家庭三个外在在学习动机影响因素有无明显差异进行数据分析。

从学校层面出发,从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学内容以及校园环境外在在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日常大学生生活中学生最常接触的便是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因此教师成分又分成辅导员和任课教师两个角度;同时为了研究更加针对性将教学内容细化分为课程安排、课堂教学以及校内讲座;根据在高校的观察,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宿舍或图书馆进行学习,所以将校园环境分为图书馆和宿舍两个方面。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听障大学生与健听大学生均值差异,并对其数据进行分析。

具体数据如下表 6 所示,由表中所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学校层面对外在在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中,辅导员、课堂教学内容、校内讲座这三个影响因素对“两类大学生”外在在学习动机产生的影响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余的影响因素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从均值来看这些影响因素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比对听障大学生的略大一些。

表6 听障、健听大学生学校层面影响因素均值差异检验

		辅导员	任课教师	课程安排	课堂教学	校内讲座	图书馆	宿舍
学生类型	听	2.60	3.39	3.26	3.50	2.69	3.38	3.24
	聋	2.94	3.29	3.23	3.23	2.97	3.24	3.17
T 值		-2.34*	0.69	0.21	2.12*	-1.99*	0.92	0.47

注: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

其中,辅导员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2.94,对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均值为 2.60,二者差异检验出 T 值为 -2.34, $P < 0.05$,这表明辅导员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远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

课堂教学内容对“两类大学生”的影响差异 T 值为 2.12, $P < 0.05$,说明二者之间差异较大。通过课堂教学内容对听障大学生影响均值为 3.23,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3.50。这些数据可以得出课堂教学内容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的结论。

数据显示校内讲座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2.69,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2.97,二者之间差异检验 T 值为 -1.99,显著性数值为 $0.047 < 0.05$,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差异,且校内讲座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要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出发,可以从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以及兼职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数据如表 7 所示:

表7 听障、健听大学生社会层面影响因素均值差异检验

		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	兼职
学生类型	健听	2.81	2.96	2.78
	听障	3.05	3.28	3.06
T 值		-1.55	-2.18*	-1.88

注: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

由表 7 可知:社团活动和兼职这两个维度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略高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但是显著性均低于 0.05,这表明二者之间相差不大。社会实践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值为 3.28 要大于对均值为 2.96 的健听大学生的影响,二者之间 T 值为 -2.18, $P = 0.03 < 0.05$,说明二者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通过调查发现,听障大学生学习专业大多数为艺术类或计算机类,此类专业更需要实践来检验知识的学习程度,例如:艺术设计专业不定期的校外写生等。并且听障大学生从小就与社会联系不紧密,社会实践更加有助于听障大学生融入社会,激发学生兴趣,在社会中有所学、有所积累,所以社会实践对听障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影响更大。

从家庭层面出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 252 名被试者中,有 17.06% 的人在选择目前的专业时是

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决定的,其中健听大学生 27 人,听障大学生 16 人;有 25.79% 的人认为父母的权势和财力决定了大学生的发展前途,其中健听大学生 37 人,听障大学生 28 人;同时又 13.89% 的人认为家庭的经济负担过重影响了个人的学习成绩,其中健听大学生 15 人,听障大学生 20 人。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可知:民主式家庭教育下的健听大学生 36 人,听障大学生 24 人,这些学生中有 60% 的人现在仍然很努力地学习目前的专业并保持较高的兴趣。由此可见,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可谓很大,大学正是学生由青少年到成年人重要的过渡时期,家庭教育对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对比数据可知,“两类大学生”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差异并不大。

总之,在外在学习动机中,听障大学生比健听大学生略高,但是差异不大。其中,学校层面的辅导员、课堂教学内容以及校内讲座对二者之间外在学习动机影响差异较大;在社会层面,社会实践对听障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的影响远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在家庭层面,对二者均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明显差异。

(三)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比较

针对“两类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是否存在相关性的问题,运用 SPSS28.0 分别对“两类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进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统计比较。

1. 听障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

将被试的 96 名听障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根据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具体数据如表 8 所示:

表8 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相关系数

		外在学习动机总分
内在学习动机总分		0.21*

注: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从整体上分析数据,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与外在学习动机之间都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 0.05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如果听障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越高那么该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

也会越高,反之,听障大学生外在学习动机越高也会对内在学习动机有着正面的影响。因此,提高内在学习动机或外在学习动机都会对提高学生学习动机有很大帮助。

2. 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

将被测试的 156 名健听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根据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具体数据如表 9 所示:

表 9 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相关系数

内在学习动机总分	外在学习动机总分
	0.14

注: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从整体上分析数据,健听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与外在学习动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然而二者之间显著性(双尾)为 0.08 大于 0.05,这表明健听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与外在学习动机相关性不大。这表明内在学习动机的提高可能会带动外在学习动机的提高,但是也有可能不会有影响,反之同理。但是,提高外在学习动机或内在学习动机对提高学生学习动机仍有积极作用。

3. 听障与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比较

将以上“两类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相关性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听障大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健听大学生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但是,二者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都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外在学习动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内在学习动机,可以激发学生自身对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家长的鼓励下、老师的指导下,学生思维更加成熟,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内在学习动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例如:因为学生自身对专业学科的兴趣爱好,从而参加更多的校内外讲座、社会实践,从中积累经验和知识,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高。

(四) 结果与讨论

结合文献阅读以及对实际调查与分析,能够了解到“两类大学生”从整体来看学习动机并无太大差异。可能由于听障大学生自身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偏见,产生与健听大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学习的追求,导致在内在学习动机方面,听障大学生学习目标比健听大学生更加清晰,但是内心对找好工作的需求远小于健听大学生;在外在学习动机中,辅导员、校内讲座、社会实践对

听障大学生的影响均明显大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但是课堂教学内容对听障大学生的影响要低于对健听大学生的影响。

四、激发听障及健听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对策和建议

(一) 认清自我优势,提高自信心

听障大学生虽然听力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是不能给自身贴上弱者的标签,认为自己就是比健听大学生差。听障大学生也要找到自身与众不同的优势,虽然听力受损,但是受到外界的干扰与听人大学生相比大大减少,可以使听障学生在学习时更加的专心。健听大学生的显著优势就是可以正常接收外界信息,比听障大学生容易获得更全面的消息,也可以更容易地融入社会。无论是听障大学生还是健听大学生,要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优点。因此,若大学生可以寻找自身的优势,发掘自己的潜能,就可以在提高自己自信心的同时,激发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

(二) 树立远大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是否制定学习计划和计划是否科学关乎学生学习效果的好坏。所以说“两类大学生”都要针对自身条件设置适合的学习目标,小到第二天要学完哪一章节的知识的短期目标,未来找什么样工作的中期目标,大到过什么样的生活、给国家做怎样的贡献的长期目标。如果大学生有了目标、方向,学习便有了计划、有了动力,进而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作储备,凭自己的力量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自我的价值。

(三) 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高校的教育质量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高校教师要关注“两类大学生”的心理差异以及学习水平的差异,要做到因材施教。并且教师应当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教师自身也要突破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大胆创新,运用启发式教学,增加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四) 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培养人才要实现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学校内不仅要设置专业课程,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专心学习,同时也要有开办艺术教育、劳动教育等形式多

样的校内讲座、实习实训。开展学术讲学、知识竞赛、体育竞赛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学风,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加强家校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家庭对学生学习动机有着很大的影响。家长在学生面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家长的言行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大学生虽还未真正步入社会,但是都已成年,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理想追求,要对学生进行民主式、鼓励式教育,减少打压教育,更不能放任不管,这样有助于促进学生成长。虽然大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但是家长也要积极配合学校,多和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

理变化以及学习状况,加强家校合作,通过家校间的密切配合,让学生感受到家庭和学校的爱,增加学生的幸福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卢强. 教育心理学[M]. 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0.
- [2] 苏秋红. 高校大学生学习动机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责任编辑 许峻)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earning Motivation of Hearing – impaired and Hearing College Students

WANG Qi, MA Zixua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252 hearing – impaired and hearing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excel table is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and the data analysis tool SPSS28.0 is used for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earing – 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and hearing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earing – 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and hearing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learning objectives, external instructors, lectures in school, social practice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hearing impaired and hearing college students, including recognizing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improve their self – confidence, setting lofty goals and realize self – worth,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rais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nriching campus culture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 – rou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home – school cooperation and form a joint force of education.

Key words: hearing – 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hearing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differenc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教育内卷”背景下的大数据技能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式的研究

张东林, 崔 蕾

(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以技能社会建设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为研究目标,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第三方为主导的多方参与的技能型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型,充分利用教育大数据分析预测技能社会岗位需求,为学生提供适合个性发展的就业岗位,构建“人人有技能、人人能服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新风尚,破除“教育内卷”怪圈。

关键词:教育内卷;技能社会;大数据分析预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8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01-05

教育内卷的本质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产业发展与教育产业发展,目标错位、利益割裂、信息不畅和产业链技术技能创新能力不足所致。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在积极探索利用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基于学分制的“1+X”证书制度的技能社会终身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精准预测未来技能社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分析新时代产教融合的技能社会创新人才教育评价模式,实现现代职业教育的因材施教、渠道分流、过程评价和利益共享的多元化就业环境,为破解“教育内卷”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一、问题提出

教育改革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优秀人才”,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同时“高技术”“高效率”与“优秀人才”的工作岗位也产生了巨大冲突,形成了严重的“教育内卷”。“精英教育”“文凭教育”仍然是目前教育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进一步蔓延到了职业教育。究其原因,一是传统产业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已经形成新的矛盾;二是教育行为和产业需求信息不对称、人才培养目标和评价指标“错位”所

致;三是传统的范式教育观念和人才激励政策滞后所致。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生产效能的提高,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型技能人才培养,重构社会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评价模式,激活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创新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失衡,教育理念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一方面高素质的创新型职业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另一方面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大量失业,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政策层面纠正了传统的“精英教育”发展理念,使教育回归本质。

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帮助“人才”实现正确的社会定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才评价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学生及家长片面追求“985”“211”

收稿日期:2022-08-19

基金项目:郑州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重点课题(2021-KYJD-03)

作者简介:张东林(1967—),男,山西永济人,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高级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技能人才评价。

等优质教育资源,严重背离了教育本质,挫伤了学生的身心,破坏了教育生态,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技能社会人才培养评价制度,旨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动态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发展方向,预测未来产业结构和人才岗位匹配评价导向,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秉性结合社会与企业/行业需求选择相应专业,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多元化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避免“万人争过独木桥”的“教育内卷”现象发生。

(二)政策支持

2021年6月17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河南“技能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构建面向生活、服务民生、开放灵活、技能创新、多样服务、结构合理、提质增效的现代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有技能、人人有创新、人人有尊严、人人有贡献”的现代技能社会新风尚,彰显技能社会技能人才的重要贡献和重大作用,使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明显提升。这一目标的提出,为新时代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现代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导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此,依托教育大数据,结合校企联盟、产教融合和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社会人才培养实训课程体系,开展技能人才分类精准指导与评价,制定科学的技能人才评价导向制度,完善技能人才成长环境和奖励机制,在全社会构建“人人有技能、人人有创新、人人有尊严、人人有贡献”的新型社会关系,已经成为河南技能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

二、问题分析

随着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职业教育由于信息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周期错位,致使“人才内卷”愈演愈烈。大数据对于职业教育变革创新发展而言,从技术层面改变了产业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形成了产业依托教育,教育促进产业,使两者融为一体。通过两者聚合效应,改变了传统的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分离状态,重构教育产业生态,使教育回归本质,从而促进技能社会人才评价模式和机制创新。

(一)人才评价模式创新

人才评价是职业教育的风向标、指挥棒。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极度短缺,竞争异常激烈,所以长期以来各

行各业逐步形成了“唯文凭论”的人才评价导向。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资源的扩张,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教育产业化”发展严重脱节,导致一方面高学历的本科生、研究生规模化“复制”,形成“教育内卷”,另一方面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科技前沿产业又“一将难求”,形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为了跳出这一怪圈,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通过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改进人才评价方式,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

(二)人才评价机制创新

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是关系技能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传统的人才评价主要基于经验主义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难以支撑新时代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学术界普遍采用了第四代教育评价机制,其主导思想是“共同构建”“全面参与”“多元价值”的人才质量评价思想,因此构建了集政府、学校、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这种多元评价机制尽管客观,但是具有滞后性。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人才评价方法较好地弥补了第四代人才评价机制的缺陷。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是依据校企联盟、产教融合、产业发展、专业设置、社会需要、利益分配等多方需求对技能人才实施评价,其评价结果更为科学。

三、创新思路

建设技能社会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人人有技能、人人能服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财富共享的新生态,摒弃那些引起“教育内卷”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旧习。为此,根据新时代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需要,按照产业重构、资源优化、专业整合、产教融合、创新引领、精准细分、兼顾效益、共同致富等原则,利用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借鉴“第四代人才评价”理论,构建以政府督导,企业、学校为主体,和委托第三方评价的多方参与的技能型社会人才培养评价模型,动态预测未来技能社会建设对职业技能人才的结构需求和评价指标,通过构建职业教育政德技并修、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1+X”证书的学分制技能培训课程体系,改

进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协调制约影响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诸要素关系,构建技能人才统一评价和使用制度。

(一)评价模型要坚持产业结构升级与技能人才成长的统一

技能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对当前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核心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科技创新和财富分配机制的重构。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在一定的环境下,如果机构设置合理,机制科学,比例协调,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财富分配合理,社会各阶层关系和谐,即经济向好。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内卷,资源浪费,人民幸福指数降低,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即经济萧条。对于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改革财富分配机制来缓解。

产业结构升级就是通过调整产业链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解放生产力,驱动技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主要包括:高端人才、人力资源、研发设计、知识转化、商业模式等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和技能人才成长环境的构建等。财富分配机制是指构建有利于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技能人才评价导向机制,确保根据技能人才对社会贡献大小实现财富分配,驱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财富分配机制,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又是衡量技能人才评价模型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

(二)评价方法要坚持数字化产业链构建与人力资源优化的统一

数字化产业链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未来数字化产业链的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政府、智慧金融、智慧工厂等平台,这些平台的互联互通为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充分的大数据支撑,构成数据服务中心。数据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连接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所有环节,用来存储和技能社会建设相关的一切信息,是技能社会产业结构与技能人才需求评价信息服务体系的核心,也是人力资源优化的依据。

评价方法要坚持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以政府部门决策为指导,以产业发展、劳动报酬、产业发展预测和人力资源等信息为依据,结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构建校企合作、产业联盟、产教融合等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引导平台,形成一个面向政府、市场、学校、家庭、学生、企业和产业管理协会的数字化人力资源

优化产业链。通过数字科技赋能,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驱动商品生产创新及商业模式变革,通过“融合共赢”,重组生产关系,营造起广泛联盟、合作共赢、产业跨界、多边融合的技能人才就业环境。

四、实施方案及政策建议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技能社会多元化人才培养评价,是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通过构建集学校、政府、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数据资源中心,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技能社会人才结构需求分析,形成基于过程管理的技能社会多元化学分制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服务管理综合体,其主要特征在于依托教育大数据,紧紧围绕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坚持党的领导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育人思想,协调各种资源,重构社会生产关系和财富分配机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针对技能社会人才培养与评价目标的要求,实施方案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一)技能社会建设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设计基本原则

针对技能社会建设需要,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原则:一是目标性原则。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是一个集产业、教育、校企联盟、产教融合、利益融合的综合性预测平台,具有预测、培养和评价三重属性,目的是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实现预测技能社会人才结构、培养技能人才和评价人才质量三重任务。二是量化性原则。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学校、企业、行业、社会、家庭、政府等多方参与共同培养,涉及多个环节,为此选择采用可量化管理的学分制课程体系。三是过程性原则。技能培养评价贯穿通识教育、专业学习、技能培训、就业任职等环节,由于时间长跨度大,因此培养评价需要建立精确的过程考评机制,以保证技能培养评价的学分累积效应。四是动态性原则。由于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的,诸要素之间是变化的,因此对于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是动态的,因此在设置评价指标时,要适时调整评价目标,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就业信息。五是整体性和导向性统一原则。技能社会是一个完整体系,对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涉及多元化因素,因此既要从整体上分析技能人才结构,又要满足不同岗位的技能需要,因此培养和评价模式要兼顾整体性和导向性统一。

(二)评价内容和方法

为了确保技能人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破除传

统教育评价体系中的“五唯”顽疾,根据技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技能人才评价内容包括:通识技能、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服务技能、研究技能、创新技能等。技能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方法统一采用“通识教育(思政与道德 100 分) + 专业技能(学历 100 分) + 岗位技能(工作领域 100 分)”的三维多级评价方法。在评价的量化上,每一维可以采用四级评价,如:通识(思政与道德)教育评价,可以分为“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四个级别”,其他二维同理。技能人才综合能力表达并非各维学分的线性叠加,而是根据各维元素对技能强度的影响力采用非线性权重计算,权重采用贝叶斯大数据模型进行动态估算。

课程体系建设采用“学校 + 企业 + 产业需求综合管理服务链”三方共同参与培养评价。为了兼顾当前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学校阶段可以采用学年学分制,课程主要以学校 + 企业的双元育人模式,在课程设置上按照学分制要求进行学分细化。技能实践课程主要通过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产业需求综合管理服务链进行全程跟踪评价,其核心主要针对学生步入技能社会后所从事的工作及工作能力进行技能考评、岗位培训以及对技能社会贡献率的评价等,并把评价的结果换算为学分,且与绩效工资挂钩。

(三) 学分折算模型

学分折算主要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种类型,学历学分折算主要以学生在校参加学习或者实践的时间为参照,总的学分制时间安排为 3 : 3 : 3,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和实习实践课各占三分之一,三年总学分为 170 分(主要指中专,其他类型教育可以参照设计)。其中理论课时以 16 ~ 18 学时为 1 个学分计算,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安排(1 小时折 1 学时),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学分不得少于 5 分。每门课程学分的获得以学生实际参加教学活动的课程占该门课总课时数百分比为前提,如学生参加该门课的学习时间不到总课时数的 70%,则该门课的学分为 0;如超过 70%,则根据考试及出勤情况给予相应的学分。非学历学分折算主要依据学生参加工作后,结合产业需求综合服务链学分制折算要求实施,主要包括:技能社会岗位职责、道德规范、精神文明、创新素质、社会贡献等标准由平台根据个人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详细评价内容可以参照技能社会文明公民评价标准。

(四) 技能等级评价模型

技能社会人才等级评价主要通过大数据学分制人才培养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三类技能知识结构,即通识教育、专业技能和岗位技能,这三

类知识结构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由不同的主体组织评价。通识教育主要由学校在学历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教育大纲组织实施,评价内容包括:思政、道德、生活常识、中国文化、科学知识、基本数学物理化学知识等指标;专业技能主要由学校 + 企业,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同组织评价,落实“1 + X”证书培训制度,评价内容包括:专业理论、专业应用、专业实践、顶岗实习等指标;岗位技能主要由产业需求综合管理服务链组织实施,通过构建以政府督导,学校、家庭、产业、企业参与和第三方人力资源跟踪评价的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按照岗位就业、技能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引领、社会责任、学术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进行岗位任职能力评价。

根据上述评价内容,利用大数据分析,量化评价指标,对有效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将数据分为:通识技能、专业技能和岗位技能。根据学分制要求将教学(培训)内容划分为 N 个知识点,并折算成一定的学分,每个知识点分值在技能贡献率所占权重并不相同。为了客观地表达每个知识点分值的权重,通常选择贝叶斯权重估算法。具体表达公式:

$$E_{\text{技能等级}} = E_{\text{通识技能}} + E_{\text{专业技能}} + E_{\text{岗位技能}} \quad (1)$$

$$E_{\text{通识技能}} = \sum_{i=1}^n A_i W_i, E_{\text{专业技术}} = \sum_{i=1}^n B_i Z_i,$$

$$E_{\text{岗位技能}} = \sum_{i=1}^n C_i J_i \quad (2)$$

其中, $E_{\text{技能等级}}$ 代表技能人才综合能力等级(根据分值可以排序), $E_{\text{通识技能}}$ 代表接受学历教育和适应社会能力的素质能力表达, $A_i W_i$ 代表通识教育学习的一个学分节点(A_i 为系数, W_i 为某一门课程), $E_{\text{专业技能}}$ 代表接受专业培训的综合能力, $B_i Z_i$ 代表专业培训学习的一个学分节点(B_i 为系数, Z_i 为某方面技能), $E_{\text{岗位技能}}$ 代表岗位工作能力, $C_i J_i$ 代表工作能力某一方面工作能力的的一个学分节点(C_i 为系数, J_i 为某个时间节点某方面)技能贡献率。其中的参数 A_i 、 B_i 、 C_i 的确定,采用贝叶斯系数估算法确定。

(五) 政策建议

技能社会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创新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实施“技能中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因此,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加强技能人才培养评价的重大意义,将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创新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充分利用党政组织力量,引导相关单位构建教育大数据中心,开发有利于技能社会建设的技能人才培养

的学分制实训课程体系,依托大数据的客观公正的分析和监督功能,实现评价机制社会化、评价方法多元化、评价内容多轨化、评价方式科学化,从而促使技能人才精准分类和定位,督促各用人单位贯彻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氛围,激发技能人才在技能社会建设中的责任担当和引领创新作用。

五、结语

根据当前新技术、新产业、新环境和新时代经济模式发展的需要及“十四五”规划要求,按照产业重构、专业整合、产教融合、动态高效、创新引领、精准细分、共同致富等原则,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技能社会人才结构及需求分析,形成基于过程管理的政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1+X”证书的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多元化学分制培养评价服务管理综合体,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行业、企业、学校、政府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技能人才数据评价中心,并借鉴“第四代”人才评价模型,利用贝叶斯评估模型,客观精准评价技能人才等级。通过评价导向作用,促进技能社会建设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进,引导学生家长改变职教观念,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能社会“人人有技能、人人能服务、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创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崔蕾. 基于大数据的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的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17(6): 89-94.
- [2] 崔蕾, 陈云雁. 基于“1+X”证书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的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20(2): 107-110.
- [3] 谷洪彬, 杨希, 魏孔鹏. 大数据技术构建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J]. 电脑与信息技术, 2020(6): 28-03.
- [4] 李俊. 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助力职业教育特色发展[J]. 职教视点, 2021(6): 29.
- [5] 丁银军. 大数据时代职业教育多元评价体系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9(9): 23.
- [6] 龚添妙, 谢盈盈. 职业教育技能人才评价制度: 演化、创新及落实[J].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2021(4): 30-32.
- [7] 潘海生, 林晓雯. 建立作为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的评价方式[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4): 5-11.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Big Data Skil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volution”

ZHANG Donglin, CUI Lei

(Zhe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alent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mode as the research targe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pgrad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 skill societ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cultiv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skilled social talents with the third party as the leading role and multi-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big data of education. It calls for making full use of the big data analysis of education to predict the demand for skilled social position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jobs suitable fo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new social relationship of “everyone has skills, everyone can serve, everyone has dignity, and everyone has innovation”. Thus a new social trend of respecting, worriingand learning skills will be set, and the cycle of “education involution” will be broken.

Key words: education involution; skill society; big data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研究

王丽敏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对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该模式的核心是精准援助+团队作战+资源共享,目的在于培育受援学校自身内生动力和“造血”能力,促进管理、教学和科研水平系统性整体提升。就进一步推进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工作提出建议:打好援助组合拳,切实提高援助效果;优选援疆教师团队,强化团队成员担当意识;加强绩效考核评价,完善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评估机制。

关键词:组团式教育援疆;河南高校;对口支援;三位一体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19

中图分类号:G648;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06-04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新疆正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批优秀的高技能人才。河南省在对口支援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过程中,创新性地打造三位一体高校组团帮扶新模式,着力实现教育援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有效助力受援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高校对口支援研究现状

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正式启动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高校对口支援相关问题研究。围绕高校对口支援模式,清华大学课题组将其总结为“八大系统模式”和“五大特色模式”^[1]。华为国则将其划分为支援型、互助型和共建型三种模式^[2]。张怀英等将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总结为全方位战略对接型、内涵建设助力型、多方合作共援型三种模式^[3]。但上述有关高校对口支援模式研究主要以本科院校为例,鲜有文献针对高职院校对口支援模式开展系统研究。

随着西部地区和新疆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高等职业教育对口支援领域。王晓丽等以湖北省对口支援新疆博州职业

技术教育为例,认真探索如何建立职业教育对口援疆长效机制^[4]。俞步松指出东西部职业教育应从“差距合作”向“差异合作”转型^[5]。丁莉东等通过研究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职业教育案例,指出高职对口援疆应从管理理念、办学模式、教师建设及学生就业创业等方面进行重点帮扶^[6]。蔡正栋则就新时代职业教育援疆新机制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7]。田恩舜等认为教育对口支援存在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以及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具有较大改进空间^[8]。

2016年党中央作出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的战略部署,同时决定实施组团式教育援疆试点。针对这个新兴问题,学术界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和探索^[9-11],认为组团式教育支援是民族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12],能够使受援学校教学和管理水平系统性整体提升^[13]。综合而言,学术界一致认为新时代对口支援机制正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正在从“输血”向“造血”的深度支援转变,从“单打独斗式”支援向“组团式”支援转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于组团式支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藏地区的中小学领域,而且大部分属于经验总结形式,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针对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的研究成

收稿日期:2022-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高等职业教育组团式援疆模式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20BMZ070)

作者简介:王丽敏(1973—),女,河南获嘉人,硕士,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教育管理。

果较为少见。开展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研究有助于促进新疆高校高质量发展,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优秀人才的需求。

二、三位一体高校组团式援疆模式分析

为了提高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河南省在对口支援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过程中,倾力打造三位一体组团式援疆模式,紧密围绕一个目标,即培育受援学校自身内生动力、提高其“造血”能力,通过“精准援助+团队作战+资源共享”三条途径,促进受援学校管理水平、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系统性整体提升。

一是精准援助。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目的在“援”,因此需要找准受援学校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有效切入,精准发力。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突出特点是根据受援学校的需要按需而动、按需派援,实施按需定制的援助人才方案。该模式由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援助向“精准滴灌”转变,从而保证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针对性。受援学校则要充分利用组团式援疆资源,积极发挥援疆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补齐学校发展存在的短板,增强学校的发展实力。

二是团队作战。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精髓在“团”,要通过整体作战实现“1+1>2”的效果。以往援疆教师大多由支援学校单方面选派,组织不够统一,力量不够集中,分配不够科学,无法形成团队优势,导致帮助受援学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组团式对口支援团队成员不但包括具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一线教师,还包括具有较强教育管理能力的学校管理干部,更加凸显集团规模优势,注重对受援学校内生动力扶植培育,有利于提升受援学校整体实力,提高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有效性。

三是资源共享。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关键在“联”,要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实现受援学校与援助学校的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援受双方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与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实现支援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援受双方还可以针对受援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合作形式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实现援受双方的“双赢”。即使组团式援疆团队完成任务后离去,援受双方依然可以通过命运共同体形式继续合作,实现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可持续性开展。

三、河南省高校三位一体组团式教育援疆实施策略

(一)工作概况

河南省积极开展高校组团式援疆工作,对口支

援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援疆团队以教学实践和课题研究为载体,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受援学校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通过和河南支援高校开展联合申报,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先后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各一项,实现了哈密市在国家基金申报工作上零的突破,标志着学院科研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积极帮助哈密职业技术学院提升办学层次,以援疆教师为学科带头人,通过与新疆工程学院等高校联合开展“3+2”和“4+0”培养模式教学,实现本科教育在学院的落地,进一步提升学院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能力。在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的帮助下,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区域和社会发展,现已建成交通运输类、财经商贸类、装备制造类、医药卫生类等六大专业群共19个专业,正在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二)具体实施策略

1.明确援助目标,注重顶层设计

河南省教育援疆管理部门积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援助目标,即提升受援高校的内生动力和自身“造血”能力,为受援高校打造一支业务能力强、带不走的本土化教学和管理队伍,实现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因此,结合受援高校的专业建设和发展需求,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突出问题导向,实施三位一体援助模式,着力解决受援学校当前在学校管理、师资队伍、教学科研、德育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校园文化等方面的短板,使高校组团式支援能够聚焦于重点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在原有河南理工大学、中原工学院等高校的基础上,经河南省教育厅积极协调,增加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高职院校加入高校组团式援疆队伍,在三位一体援助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校包系”援助新模式,即一所高校结对帮扶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一个系部,进一步明确责任,提高对口支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准确发现受援学校的薄弱环节,精准发力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由原哈密四所中职业院校合并设立,现有专任教师234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只有49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比较薄弱。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以提高学院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为抓手,通过“师带徒”形式认真做好传帮带工作,开展一系列教学和科研培

训,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有效增强学院自身的“造血”能力。

现代职业教育强调创新驱动,强调实践育人。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没有任何基础,完全是一片空白。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从零开始,帮助学院制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构建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带领学生组建团队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比赛。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软绵绵”棉花艺术品项目作为自治区唯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并获得铜奖,实现了学院在创新创业全国性比赛中的历史性突破。目前,一批致力于创新创业教育的青年教师崭露头角,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从无到有,正在步入全疆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前列。

3. 注重发挥团队整体优势,协同作战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积极探索一所高校对口帮扶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一个系部的“校包系”模式,由河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分别与哈职院旅游管理系等系部签署对口支援合作协议,在系部专业建设、师资力量、教学管理、科学研究、课程改革、实习实训设备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帮助对口系部改善办学条件,更新教学理念,提升内涵质量,以便更好地服务哈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结合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需要,由援疆教师牵头组建“电子商务及物流教学科研团队”“机电一体化系统创新设计团队”“密作品牌管理教学科研团队”等多个教学科研团队,立足哈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带领青年教师先后申报“双级复叠低温机组研制及在瓜果储运中的应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密作品牌战略研究”等科研课题,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有效提升了学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4. 充分发挥团队“联”的作用,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

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南理工大学、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分批次组织学院骨干教师赴河南高校学习,依托河南高校帮助培养在职研究生。学院先后选拔15名教师到河南理工大学攻读在职硕士研究生,并于2018和2019年暑假期间,在中原工学院和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两期管理干部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升培训班,针对性提升教师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哈密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良好的风、光自然

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却没有专业机构从事能源领域相关研究。在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团队的帮助下,河南理工大学和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建哈密豫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重点开展煤炭、矿山机械以及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工作。依托该科研平台,援疆团队带领学院教师先后申报“面向矿物加工的双腔高效破碎机研制”等科研项目,有力促进哈密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援受高校在科研领域的合作共赢。

四、进一步提升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建议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口援疆作为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14]。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成效,河南省高校组团式援疆在现有三位一体援助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 打好援助组合拳,切实提高援助效果

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目的在于“授人以渔”,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通过建立“一对一”“师带徒”“带团队”等形式,帮助受援学校教师尽快掌握高等教育新理念、新方法,以及先进的科学研究手段,切实提高他们的教学科研能力。同时,援疆团队要找准受援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组织后方相关专家来受援学校开展短期讲学或讲座,或者组织受援学校教师到支援学校进行短期专题培训,形成“前方连后方”“大团带小团”的支援格局。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援助方式,切实实现有效援助,形成可持续化发展的援助格局。

(二) 优选援疆教师团队,强化团队成员担当意识

高校组团式援疆的核心使命在于培育受援学校的内生动力,团队成员的工作职责更多地应由过去单纯的“顶岗上课”向“示范引领”转变。因此,在选派组团式援疆团队成员时,不但要看重成员的教学科研水平,还要注重其管理能力和指导能力,优先选派具有“指导力+管理力+研究力”的教师,确保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传帮带和辐射引领作用。在援疆团队教师入疆之前,要做好对援疆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深刻理解教育援疆工作的重要性,高度认识所担负的重要责任,强化团队成员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增强团队成员参与教育援疆工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三) 加强绩效考核评价,完善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评估机制

加强对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工作的绩效考核评

价,强化评估监督,方能提升教育援疆政策运行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一要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价值取向,拓展评价主体,将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有机结合起来。二要建立科学的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绩效评价体系,明确具体的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师资队伍发展、科研能力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指标,合理设计各评价指标权重。三要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从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周期、反馈形式、责任追究等方面,实现高校组团式对口支援绩效评价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参考文献:

[1] 岑章志,钟周,赵琳. 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的实践与经验[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8(2):34-43.

[2] 华为国. 高校对口支援的深化研究[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5):113-116.

[3] 张怀英,黄昕,蒋辉. 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典型模式与运行机制[J]. 教育现代化,2019,6(45):104-106.

[4] 王晓丽,冉新成,徐友军,等. 职业教育对口援疆长效机制研究:以湖北省对口支持新疆博州职业教育为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9):79-82.

[5] 俞步松. 基于产业援疆背景的职业教育对口支援策略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6):43-46.

[6] 丁莉东,阿孜古丽,余文华,等. 江苏对口支援克州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J]. 职业技术教育,2018,39(15):60-62.

[7] 蔡正栋. 新时代组团式职教援疆“校包系”机制的探索[J]. 职业教育研究,2019(11):54-58.

[8] 田恩舜,史亚丽. 教育对口援疆:成效、问题及对策:以湖北省对口支援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为例[J]. 中国民族教育,2018(2):18-21

[9] 钟秋明. 关于“组团式”教育援藏的几点思考[J]. 西藏教育,2017(9):14-16.

[10] 庄辉锦. 做强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J]. 新西藏(汉文版),2018(2):45-46.

[11] 王学男,江长州. 教育援藏:从“单打独斗式”向“组团式”支援转变[J]. 人民教育,2019(1):35-37.

[12] 羌洲,曹宇新. 文化资本视角下民族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19(2):106-115.

[13] 胡坤. 安徽职业教育援疆“组团式”帮扶模式的研究[J].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1):1-3.

[1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完全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N]. 人民日报,2020-09-28.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Henan Colleges Three - sphere Integrated Group Aid to Xinjiang

WANG Lim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ummary of the mode of Henan colleges three - sphere integrated group aid to Xinjiang. The core of the mode is targeted aid, team operation and resources sharing. The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self - hematopoietic ability of the aided college,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c and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lev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work of group aid to Xinjiang, including adopting various aid way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id effect,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eam members, enhanc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mproving group aid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group education aid to Xinjiang; Henan college; counterpart assistance; the three - sphere integrated mode

基于探注协同控制的 深部松软破碎围岩支护技术研究

王进尚^{1,2}, 刘成才^{1,2}, 王玉玲¹, 李润泽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评价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为解决地下工程岩性复杂、节理发育的断层破碎带问题,基于水压致裂法研制一套探查地下工程破碎位围岩异常区装置,确定注浆靶点,并采用浅深孔配合网格式加固注浆方式,形成浅部注浆孔加固圈,深部注浆稳定岩层效果。工业性试验表明:通过采用破碎围岩探测装置、浅深孔配合浆方法和注浆孔优化布置的三位一体破碎围岩探注协同定点定位加固技术,节约注浆量,消除注浆空白带,减小了浅部注浆固结载荷,并使浅部注浆固结圈与充填离层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有利于控制围岩变形,提高了断层破碎带地段围岩的稳定性,避免地下工程坍塌失稳事故发生,为地下工程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破碎围岩;水压致裂;注浆加固;浅深孔布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20

中图分类号:TD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10-04

由于地下工程深度的不断增加,导致地应力也不断增大,在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顶板坍塌事故时有发生,对施工安全生产有着直接影响。尤其当施工遇到复杂破碎松散地质构造,为地下工程渗水、冒顶等地质灾害提供条件,导致岩体稳定性有所降低,直接影响正常生产掘进。因此,研究破碎围岩注浆加固支护技术,为地下工程深部松软破碎围岩支护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降低施工带来风险。本文结合河南矿井巷道破碎带冒顶下沉施工为实例,采用水压致裂法先探确定范围后注浆加固措施,对软破碎巷道周围一定范围内进行注浆围岩裂隙的充填,提高围岩的弹性模量,加强围岩的强度,节约注浆量,减小了浅部注浆固结圈载荷,并使浅部注浆固结圈与充填离层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降低了巷道引起的冒顶失稳风险,为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1-4]。

1 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原理

根据水力压裂法测地应力原理,自主研发了基于水力压裂法围岩破碎异常区探查装置。采用膨胀式橡胶封隔器封堵钻孔所要测的区域,形成密闭致裂空间,并进行高压注水,随着液体压力的增加,孔壁的有效切压应力转为张应力,并逐渐减小,当有效张应力等于或大于煤(岩)的抗拉强度时则孔壁将发生断裂^[5]。通过对比所测岩层抗拉强度大小来判断岩石完整或破碎情况,从而确定破碎异常区范围。 P 表示为孔隙压力, P_b 表示岩石破裂的临界压力,由海姆森公式可得:

$$P_b - P_0 = \frac{T + 3\sigma_h - \sigma_H}{K} \quad (1)$$

方程(1)可以简化为:

$$P_b - P_0 = T + 3\sigma_h - \sigma_H \quad (2)$$

将方程(2)中的有效应力改变为地下主应力

收稿日期:2022-09-2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3B560017);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科研重点培育基金资助(zjz202205);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111068002)

作者简介:王进尚(1979—),男,河南安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从事地下工程施工技术及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时,则有:

$$P_h - P_0 = T + 3S_h - S_H - 2P_0 \quad (3)$$

为了求水压致裂时引起岩石破裂的方程,可将方程(3)整理之后得出如下方程:

$$P_h = T + 3S_h - S_H - P_0 \quad (4)$$

水力压裂裂隙扩展沿最小主应力方向,结果表明,无论垂直主应力大小如何变化,最小主应力与初始水力裂缝方向保持一致。如果某一方向的水平主应力 $S_h = S_3$, $S_V = S_1$ 或 $S_V = S_2$ 中最小时,则起始和延伸都为垂直向裂缝,从而得到最小水平主应力为:

$$S_h = P_s \quad (5)$$

根据上覆岩石的容重计算垂直主应力,即:

$$S_V = \rho H \quad (6)$$

式中: ρ 为上覆岩层容重;

H 为测量段深度。

在实验中,当 S_V 为最小主应力时,压裂过程中初始裂缝是垂直的,从而得到第一瞬时闭合压力 (P_{s1});当破裂面延伸到水平裂缝时,可得到第二瞬时闭合压力 (P_{s2}),显然 $P_{s1} < P_{s2}$,即:

$$S_h = P_{s1} \quad (7)$$

$$S_V = P_{s2} \quad (8)$$

在上述条件下,从压力和时间关系得到最小水平主应力和垂直主应力值,最大水平主应力根据方程(8)导出:

$$S_H = T + 3S_h - P_b - P_0 \quad (9)$$

在重复循环和加压过程中,式(9)中的抗张强度 (T)可以通过现场水压致裂原位测定仪器得到。在第一个循环中,由于压裂段煤层完好,压力会导致煤层破裂,再重新加压后煤层的抗张强度 $T = 0$,此时煤层缝隙将重新张开,张开的压力 P_r ,式(9)将变为:

$$P_r = 3S_h - S_H - P_0 \quad (10)$$

由式(9)和(10),可得出岩石抗张强度的求解方程:

$$T = P_b - P_r \quad (11)$$

从式(11)可知,岩体抗拉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岩石破裂压力 P_b 和重张压力 P_r ,基于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采集这两个数据,该装置主要由智能加压自动系统、封隔致裂室系统和数据自动采集分析系统,如图1所示。智能加压自动系统采用高压泵设定额定压力自动泄压自动回流,压力值不再升高。封隔系统用耐高压胶囊材料在致裂室两端起到密封作用,采集系统在致裂室布置传感器,水压值直接传到压力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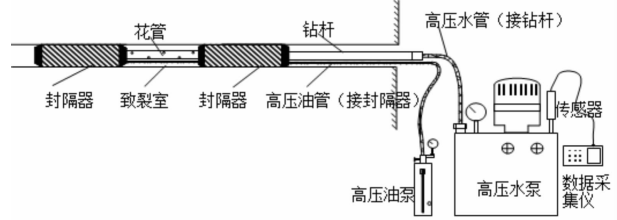


图1 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

首先在破碎围岩疑似处打钻孔,把装置伸入钻孔底部,再加压封隔器供水管,使两端膨胀器紧贴钻孔壁,形成定点定位封隔致裂室密闭空间,然后加压致裂室供水管供水,压力表值会继续上升,导致钻孔孔壁破裂,当液压力显示突然下降到一定值时,再迅速关闭压力泵。根据采集到的时间和压力数据,绘制出压力曲线,并根据曲线图求解所需参数,如图2所示。从钻孔底部处依次间段按照上述步骤测岩层抗拉强度 T ,由于断层破碎带岩层抗拉强度较低,所测值较小就是需要加强区域,通过这种方法确定注浆范围^[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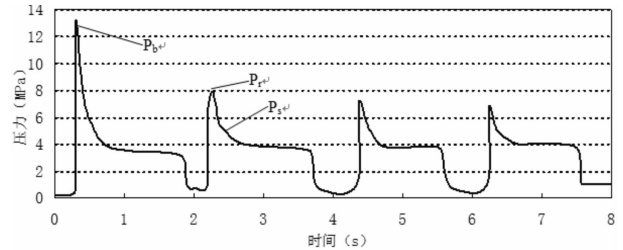


图2 水压致裂法所测压力和时间过程曲线

2 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

由内外结构耦合平衡支护原理分析,“外围结构”指的锚注浆体、锚固体及支架等巷道支护结构。而“内部结构”主要是以塑性硬化区和软化区的岩体为主体在围岩应力峰值附近的承载结构。在“内结构”向围岩内移动的过程中,“外结构”调整应力场达到新的平衡,阻止“内结构”不断向内移动。调整围岩的应力场,减少围岩松动范围扩大,达到稳定维护巷道^[8-9]。采用深封堵加固界定区域,浅孔加固补偿稳定区,从而使巷道围岩支撑压力得到重新分部,如图3所示,当浅部与深部耦合注浆时,围岩周围支撑压力有所降低,有效控制围岩质量。

通过对巷道围岩注浆加固浆液填充岩体破坏裂隙面,提高岩体整体性,从而承载能力也得到增强,进一步平衡过程巷道围岩内应力。岩石破裂形式主要剪破坏,采用莫尔强度理论进行分析围岩注浆加固机理,岩体的内聚力和内摩擦角两个因素决定剪应力大小。破碎围岩体注浆后,浆液与破碎岩体粘结成体,其自身承载力有所增大。从图3分析可知,注浆岩体比未注浆岩体自身内摩擦角和内聚力大,围岩弱

面力学性有所改善的,提高其整体强度,莫尔圆远离注浆岩体屈服包络线,破碎岩体的塑性破坏范围得到有效的控制,围岩整体稳定性能提高^[10-12]。

在施工注浆孔时,先施工长堵注浆孔,长孔封堵影响区域封堵前方裂隙,起到帷幕屏障约束注浆区域作用,再施工短注浆孔在有限空间充填裂隙加固煤岩体,如图4所示,注浆孔1个为点,注浆孔2个为线,注浆孔4个为面,长短注浆孔构成注浆体,形成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每个循环采用长短注浆孔配合方法,长孔前方封堵有限空间,短孔在有限空间加固岩体,这样节约材料,降低成本,降低地下工程施工引起的坍塌失稳风险,为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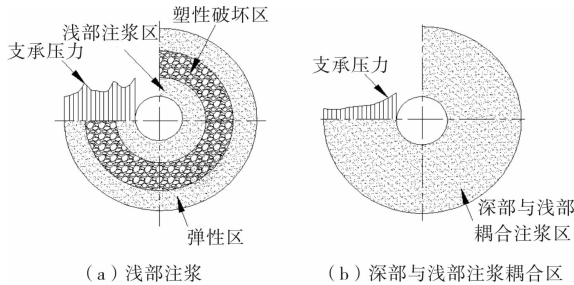


图3 浅深孔注浆时的围岩支承压力分布图

3 工程案例

以焦作矿区某矿巷道为例,根据地质资料,其部分巷道处于断层构造带内,并且纵穿多个岩层,围岩多为高地压松软围岩,巷道围岩存在部分砂泥岩和粉砂岩力学强度低,易受水软化膨胀,破坏了岩石的原生结构,裂隙发育,岩石本身强度降低,因层间滑动夹在层间的薄层泥岩被揉成泥,失去了原有的结构,造成层与层之间呈离层状态,巷道变形严重,主要表现在顶板下沉量大、巷帮片帮严重,容易造成巷道下沉变形冒顶,影响安全生产。由于巷道处于断层构造带内,如异常位置确定不合适,注浆布孔不科学,导致注浆量浪费,可能存在空白区。

根据巷道地质资料,在巷道布置探测钻孔3个,每钻进2m,后置水辫接到高压水泵上,并从充气孔进行对封隔器充气,使两端膨胀器紧贴钻孔壁,形成致裂室,然后高压泵进行注水,致裂室出水孔受水压控制,达到一定压力,钻头处不出水,致裂室出水,压力表值将不断上升,最终导致孔壁破裂,然后迅速关闭压力泵,如图5所示。按照这个程序循环数次,采集压裂段内液压的变化的数值,绘制压力曲线图,求解不同岩性抗拉强度参数,对比所布置测点。在巷道向外3—16m范围区域内所测水力压力最小,说明围岩破碎异常区为巷道顶板3—16m区间,该区域需要重点关注注浆区域。巷道向外16m范围水

力压裂值有所升高,水压值相对偏高,说明该区域需要完整岩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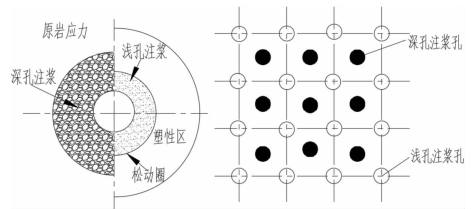


图4 浅深孔注浆布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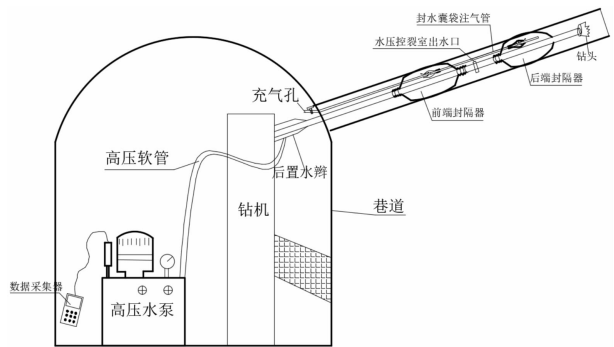


图5 围岩破碎异常区范围探测

针对巷道向外3—16m范围围岩破碎异常区需要采取注浆加固措施,从而提高围岩的稳定性。采用网格格式浅深注浆孔配合注浆方式,浆孔使用风钻机直径为 $\Phi 42\text{mm}$,先施工长堵注浆孔长15m,长孔封堵影响区域封堵前方裂隙,起到帷幕屏障约束注浆区域作用,再施工短注浆孔长3m,钻孔间距为3m,如图6所示,先形成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每个循环采用长短注浆孔配合方法,节约材料,降低成本,注深孔起到加固作用,有效控制深部松软破碎围岩巷道变形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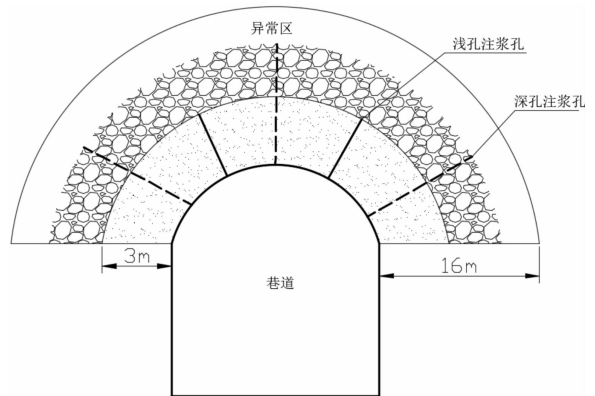


图6 围岩破碎异常区注浆孔布置图

4 效果考察

根据现场注浆情况,针对巷道注浆加固区域进行取样,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松散煤岩体已黏结为一体,裂隙被浆液饱满密实充填,从而岩体的内摩擦角和强度有所增加,充分发挥岩体的承载能力,提高

巷道围岩承载能力,保障巷道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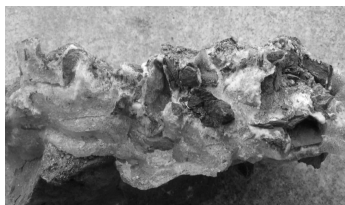


图7 注浆后围岩效果取样

对破碎巷道 30m 范围进行表面位移考察,每隔 10m 布置一个测点断面,共布置 3 个断面,每断面布置 5 个观测点,共布置 15 个测点,测点断面布置如图 8 所示。考察周期为 4 周,隔 2 天观测 1 次数据巷道两帮及顶底板位移量进行测量,最终绘制曲线如图 9 所示,顶底板变化量为 40mm,巷道两侧最大移近量 50mm。如图 10 所示,注浆后顶板下沉速度大大降低,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后,提高了围岩强度整体性,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注浆加固效果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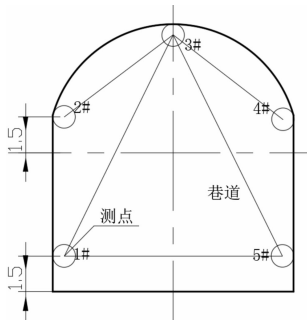


图8 巷道断面内测点布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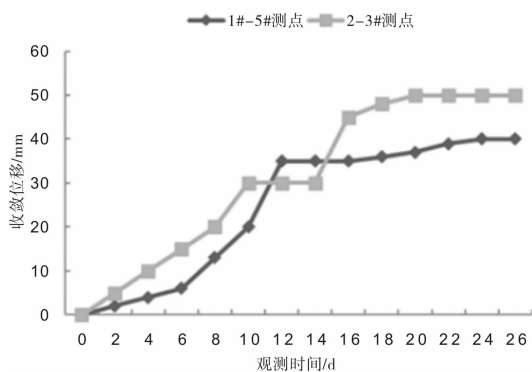


图9 巷道收敛时程曲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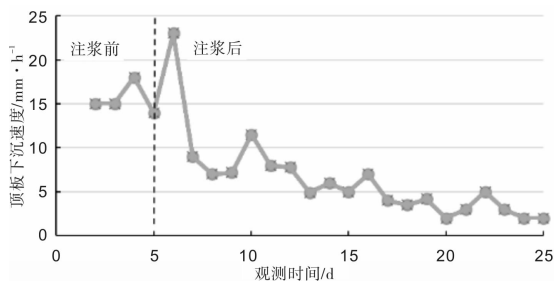


图10 巷道注浆前后顶板下沉速度变化曲线

5 结语

(1)利用基于水压致裂法探查围岩破碎异常区装置,直观地测出巷道围岩强度,判断出破碎位围岩异常区。

(2)提出了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注浆孔 1 个为点,注浆孔 2 个为线,4 个注浆孔为面,长短注浆孔构成注浆体,形成浅深孔配合网格格式协同立体空间注浆加固技术,消除注浆空白带,使围岩弱面力学性有所改善,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

(3)通过现场工程试验,针对确定破碎位围岩异常区位置,采用科学有效注浆措施,形成浅部注浆孔加固圈,深部注浆稳定岩层的目的,节约注浆量,减小了浅部注浆固结圈载荷,并使浅部注浆固结圈与充填离层后的稳定顶板共同承载,降低巷道施工引起的坍塌失稳风险,为巷道安全施工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 [1]陈武谨,孙晓勇,蔡勇.隧洞围岩中断层破碎带注浆加固后的管片受力特征研究[J].水电与新能源,2012(3):32-36.
- [2]孙晓勇.隧洞围岩中断层破碎带注浆后的管片受力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3(2):37-42.
- [3]刘怀国,张劲,章跃林.TBM掘进隧洞回填固结灌浆施工的探讨[J].山西水利科技,2003(4):16-18.
- [4]王国秉.全断面掘进机施工隧洞缺陷的综合治理[J].山西水利科技,2010(4):1-5.
- [5]林旭东.水压致裂地应力测试法在煤矿底板突水预测中的应用[J].中国煤炭,2019,45(6):49-52.
- [6]王进尚.基于水压致裂法的断层防水煤柱合理留设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2.
- [7]王进尚,陶云奇,王经明.基于水力压裂法的断层防水煤柱合理留设[J].煤矿安全,2013,44(2):186-188.
- [8]王卫军,李树清,欧阳广斌.深井煤层巷道围岩控制技术及试验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报,2006(10):2102-2107.
- [9]王进尚,柴磊,邓澄,等.综采工作面大断面回撤通道锚协同支护技术研究[J].煤炭技术,2019,38(7):33-36.
- [10]王进尚,姚多喜,方新建.破碎围岩浅深孔配合加固注浆工艺研究与应用[J].煤炭技术,2016,35(8):150-152.
- [11]王永,朱川曲,李青锋,等.复杂高应力软岩巷道浅部注浆失效的理论分析[J].矿业工程研究,2010(12):3-5.
- [12]魏军贤,王安舍,申文彪.注浆加固技术在煤矿综放回采中的应用[J].矿业安全与环保,2010(1):69-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下转第 118 页)

低周往复荷载下混杂纤维混凝土梁柱结构试验及理论研究

钟 晨^{1,2}, 温学涛^{1,2}, 胡元超^{1,2}, 朱旭峰³

(1. 安徽新华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2. 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3. 中国能源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0088)

摘 要:不同纤维含量下的钢-PVA 混杂纤维混凝土现浇梁柱节点进行低周反复荷载试验, 通过对其骨架曲线、能量耗散以及钢筋应变等分析, 发现对比普通混凝土试件, 钢-PVA 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在核心区的塑性性能和耗能能力均显著提高, 且钢纤维对节点强度和刚度的增强作用优于 PVA 纤维; 对比单一纤维混凝土试件结果表明, 合理配合比设计下的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可获得更好的抗震性能。

关键词:现浇纤维混凝土; 梁柱节点; 低周反复荷载试验; 抗震性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21

中图分类号:TU3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14-05

1 引言

纤维混凝土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新技术。为了改善普通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和降低材料成本, 在混凝土基体中掺加高弹模或高延性的纤维材料已成为改善自身强度与韧性的一种有效手段。纤维混凝土掺加的纤维有很多种, 目前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研究所采用的纤维多为高弹性模量的钢纤维、碳纤维和玻璃纤维, 可以提高框架节点的开裂荷载和峰值荷载, 也有少数采用低弹性模量而延性好的聚乙烯醇(简称 PVA)、聚丙烯纤维和聚丙烯腈纤维, 可以减少混凝土初期的收缩裂缝以及提高框架节点的延性和耐久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掺加单一的纤维以改善混凝土某些方面的性能, 不能同时达到增强又增韧的效果, 而混杂纤维则可以将不同纤维进行优势互补, 达到对混凝土逐级阻裂和增强的目的。

国内外学者近年开展各种类混杂纤维混凝土构件与节点的抗震性能研究, 汪梦甫^[1]、张旭^[2]设计了 3 根 PVA-ECC 柱进行低周反复加载试验, 分析

了高轴压比下不同配箍率对柱抗震性能的影响。韩建平^[3]、崔明等^[4]考虑纤维种类、剪跨比因素, 研究钢-PVA 纤维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徐娜^[5]、赵海龙^[6]分别开展钢-聚丙烯柱和节点试验, 分析纤维种类及掺入范围对构件和结构抗震的影响规律。韦翠梅^[7]采用拟静力试验系统研究钢-聚丙烯纤维混凝土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 并提出了核心区极限抗剪承载力和初裂荷载的计算公式和节点恢复力模型。赵燕茹、郭子麟等^[8]基于已有的试验数据利用 ANSYS, 对单一钢纤维柱与钢-PVA 纤维混凝土柱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由于纤维混凝土本身的材料复合特性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广泛性, 现阶段对钢-PVA 混杂纤维混凝土框架结构节点区的力学理论研究却很少, 本文通过钢-PVA 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低周反复荷载试验, 分析梁柱节点塑性铰区的抗震性能。

2 试验过程

2.1 试验材料与参数

本试验共设计 6 个试件, 采用混凝土强度为

收稿日期: 2022-08-10

基金项目: 安徽高等学校省级自然科学重点研究项目(KJ2019A0883); 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KLBSZD202104);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AH202112216112, AH202112216115);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212216008, 202212216005)

作者简介: 钟晨(1985—), 女, 安徽合肥人, 硕士, 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纤维混凝土研发与应用的研究。

C50, 试件在江苏科技大学试验室一次性浇注成型,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 制作了现浇普通混凝土试件、单一纤维混凝土试件和混杂纤维增强混凝土试件, 试验的各试件编号及研究参数见表 1。

为了准确测量纤维混凝土试件与普通混凝土试件的强度, 在试件浇筑的过程中, 相同养护条件下, 每组留取三块 150mm × 150mm × 150mm 标准立方体试块用来测量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同时每组预留三块 100mm × 100mm × 300mm 棱柱体试块测量混

凝土的弹性模量。混凝土实测性能参数见表 2。

表 1 试件参数

试件编号	纤维掺量 (%)		轴压比	核心区箍筋间距 (mm)
	PVA	钢纤维		
RC-1	0	0	0.2	60
SFRC-2	-	2	0.2	60
ECC-3	2	-	0.2	60
SECC-4	1.4	0.6	0.2	60
SECC-5	1.2	0.8	0.2	60
SECC-6	1	1	0.2	60

表 2 试验所用混凝土性能参数

编号	RC-1	SFRC-2	ECC-3	SECC-4	SECC-5	SECC-6
立方体抗压强度 (f_{cu}/MPa)	54.16	72.94	74.58	71.43	72.76	73.20
弹性模量 ($E_c/10^4 \text{MPa}$)	3.52	3.87	4.01	3.75	3.82	3.98

试件中梁柱受力纵筋及箍筋均采用新三级钢筋 HRB400, 性能参数见表 3。

表 3 试验所用钢筋性能参数

直径	屈服强度	极限强度	弹性模量	屈服应变
d/mm	(σ_s/MPa)	(σ_b/MPa)	($E_c/10^5 \text{MPa}$)	($\varepsilon_y/\mu\varepsilon$)
20	502.43	629.70	2.0	2510
16	500.21	625.40	2.0	2502
6	497.88	619.98	2.0	2480

本次试验选用的 PVA 与钢纤维作为增强体, 聚乙烯醇 (PVA) 纤维由上海锴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端钩型钢纤维由河北省衡水骏晔路桥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纤维的各项性能指标见表 4。

表 4 试验所用纤维力学性能参数

纤维名称	长度 (mm)	直径 (μm)	抗拉强度 (MPa)	弹性模量 (GPa)	伸长率 (%)	密度 (g/cm^3)
PVA	12	15	1500	35	7	1.3
钢纤维	35-40	750	1100	206	-	7.8

2.2 试验试件

柱的设计轴压比取 0.3, 四级抗震。六个节点试件采用统一的尺寸和配筋: 梁截面尺寸 200 × 400, 柱截面尺寸为 350 × 350。梁、柱纵筋采用对称配筋, 梁箍筋为矩形箍, 柱箍筋为矩形加菱形复合箍。试件纵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25mm。为防止试件中试件局部压坏, 在柱端、梁端均预埋 10mm 厚的钢板。

试件设计配筋参数见表 5, 配筋详图见图 1(a)。纤维掺入范围在节点核心区、一倍梁高的范围内的梁端和柱段。

表 5 试件设计配筋表

梁纵筋配筋率	柱纵筋配筋率	梁加密区体积配筋率	柱加密区体积配筋率	节点区体积配筋率
0.826%	2.280%	0.606%	0.844%	1.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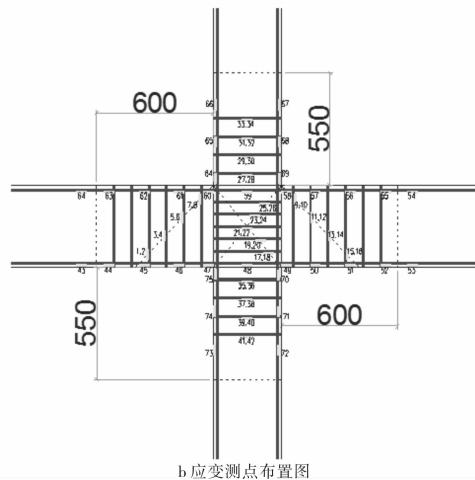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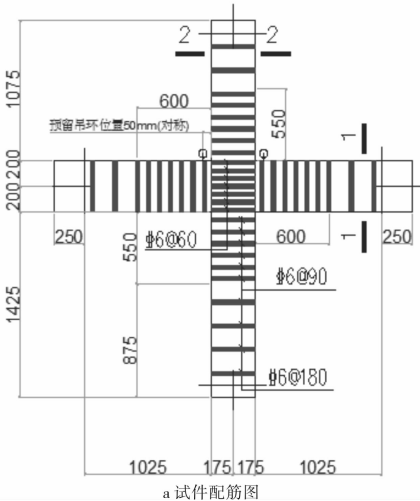


图 1 试件配筋和应变测点布置图

试验还要求: 在试件的相应的部位粘贴应变片, 箍筋前后对称贴, 纵筋选中间一根贴, 应变测点布置如图 1(b) 所示。模板支护完毕后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各试验构件中普通混凝土和纤维混凝土交界处

预先采用快易收口网 (消耗性无需回收) 进行隔离。

2.3 试验设备与加载

为考虑柱的位移-荷载效应, 试验时梁两端反弯点和节点上柱反弯点设计为水平可移动铰, 柱下端反

弯点为固定铰。试验所采集到的位移为层间位移,梁构件只能转动或水平运动,在竖直方向上产生的位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采用4个位移测量装置(位移计)测量柱上下端水平位移和梁两端竖直位移。

首先在柱顶施加竖向荷载至试件拟定的轴压力849kN,分两段280 kN - 570 kN - 849 kN 逐次缓慢加载并使其保持恒定,然后由 MTS 电液伺服作动器在柱顶施加水平荷载。水平加载方式为双向反复加载,采用荷载 - 位移联合控制的加载制度,直至最大荷载下降15%,即 $P_u = 0.85P_{max}$ 后,认为构件达到破坏,停止加载。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梁柱节点耗能特征分析

结构为了遭受地震荷载时不发生倒塌,会通过塑性非线性变形将吸收的地震能量耗散出去,因此耗能指标是评价抗震性能的手段之一。在低周反复荷载试验中,荷载 - 位移曲线形成每个闭合滞回环,代表对应的一次循环加载,由加载曲线、卸载与坐标轴之间包围的面积便是该循环的能量耗散值。如图2所示,工程应用中常用等效黏滞阻尼系数 $\xi_{eq[9]}$ 来表示梁柱节点构件的能量耗散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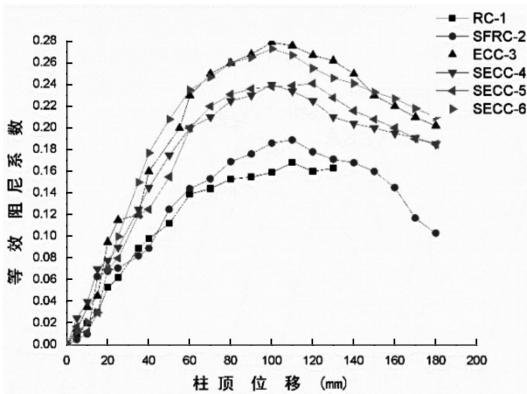


图2 试件等效粘滞系数曲线

图2表明,在低周往复循环荷载下,各个混凝土试件的滞回环面积随着位移的增加不断增加,单一纤维试件 SFRC - 2 和 ECC - 3 与 RC - 1 相比,试件 ECC - 3 的耗能能力提高了 65% - 90%,试件 SFRC - 2 在后期耗能能力还有所下降,分析原因是因为较大含量的钢纤维虽部分阻止了纵筋的滑移,但随着试验加载,试件塑性铰区域表层钢纤维逐渐被拔出或拉断,以及穿过节点区的梁纵筋出现了锚固破坏和较大滑移量。其他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 - 6 的耗能能力也均优于 RC - 1,尤其在试件屈服后表现更为明显,说明钢 - PVA 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可以显著提高梁柱节点构件的耗能能力。

同时,试件 SECC - 4、SECC - 5、SECC - 6 相比

较可知,随着钢纤维掺入含量的增加,其耗能能力也相应提高;同时将 SECC - 6 与 ECC - 3 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耗能能力相当,因此通过合理的配合比设计则可利用钢纤维来代替造价更高的 PVA 纤维,获得最优性能的混杂纤维混凝土材料。

3.2 梁柱节点骨架曲线特征分析

骨架曲线是试验过程中的循环加载形成不同滞回曲线环中峰值点的轨迹,反映了试件受力与变形的各个不同阶段及特性,是分析地震对框架结构弹塑性影响的重要指标。

由普通钢筋混凝土 RC - 1 和单一纤维混凝土 SFRC - 2、ECC - 3 的骨架曲线图3比较可知,两类纤维混凝土节点试件在达到极限承载力时的位移量较小,峰值荷载过后的下降段表现也相对平缓,说明无论单掺钢纤维或者 PVA 纤维的混凝土试件的受力变形与刚度退化均优于普通混凝土试件。其中单掺 PVA 纤维混凝土 ECC - 3 试件的承载力和塑性性能比单掺钢纤维混凝土试件 SFRC - 2 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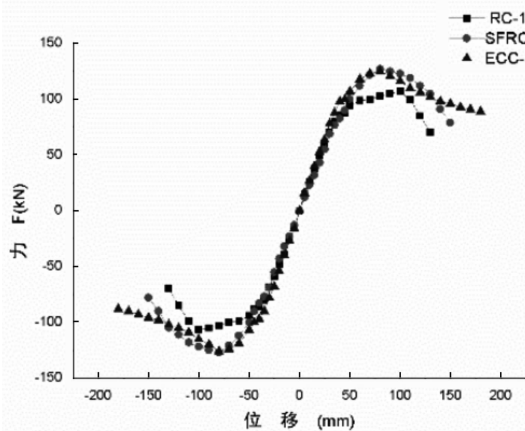


图3 试件1-3骨架曲线

图4所示为单一纤维混凝土试件 SFRC - 2、ECC - 3 和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 - 6 的骨架曲线,可以看出 SFRC - 2 的曲线下降段较为陡峭,说明单掺钢纤维混凝土节点的塑性变形能力不如单掺 PVA 纤维和其余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3—6 的承载力与位移关系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峰值荷载后各试件刚度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因此在设计构件时可用钢纤维来替换部分 PVA 纤维,在保证良好塑性性能的同时降低造价。进一步对比分析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 - 6 可知,随着 PVA 纤维掺量增加,其骨架曲线在峰值后的变化越来越平缓,改善了节点的塑性变形与抗损伤能力;而钢纤维可以小幅度提高节点试件的极限承载力和屈服强度。另外发现 SECC - 6 试件在极限荷载后曲线下落稍快,说明其刚度退化较另外两种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要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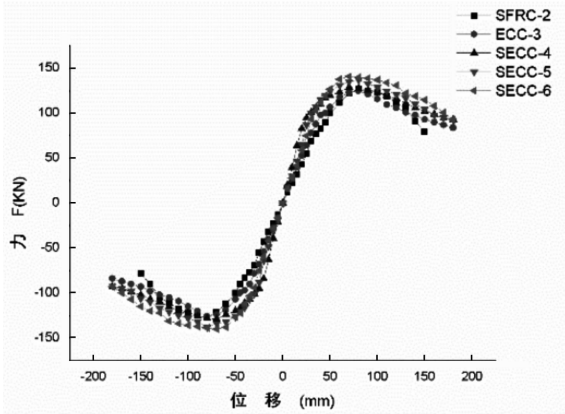


图4 试件2-6骨架曲线

3.3 钢筋应变分析

六个试件中梁内纵筋靠近节点核心区部分均发生屈服,且发生屈服的位移均为 $\Delta = 50-60\text{mm}$ 。RC-1 试件柱纵筋在 $\Delta = 100\text{mm}$ 时屈服,而此时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4-6的柱内纵筋均未屈服。图5和图6是试件中柱内纵筋75号和箍筋22号应变片应变随加载位移变化的情况。在加载初期,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6 中柱内纵筋的应变随着钢纤维的增加而变大,但当加载位移量较大时,柱内纵筋的应变增加速度随着钢纤维的增加而变小,试件 SECC-4 柱内纵筋的应变在加载极限阶段已经接近其屈服强度。

进一步分析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6 节点核心区的箍筋应变,在弹性阶段时箍筋的应变均很小,直到核心区出现第一条裂缝时,箍筋的应变曲线会出现一个向上突变折点;到达承载力极限位移时,试件 SECC-4 箍筋的应变最大,已接近钢筋的屈服值,而试件 SECC-6 的最小,表明 SECC-6 的纤维掺入对节点整体刚度的增强效果比试件 SECC-4 好,而试件 SECC-4 节点核心区较大的剪切变形对于构件的耗能也是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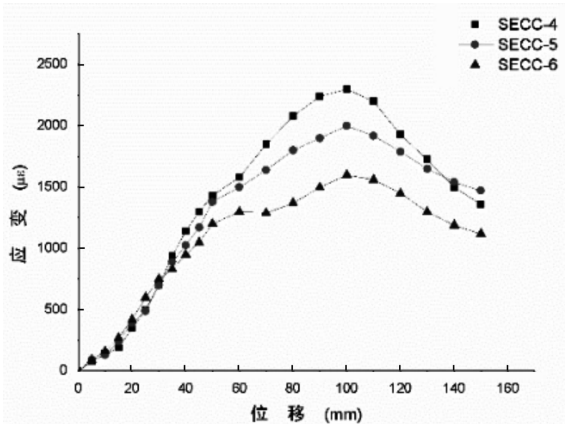


图5 应变片75号应变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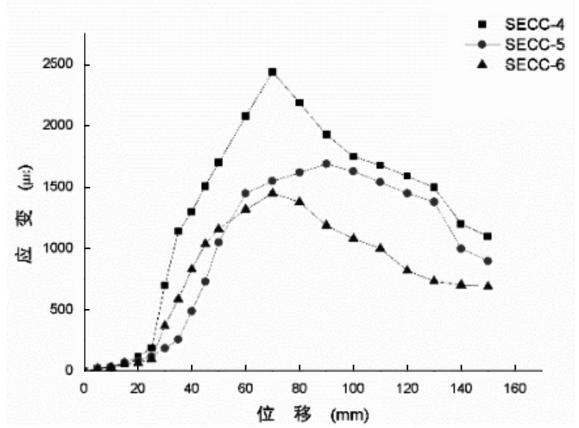


图6 应变片22号应变变化图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试验数据对钢-PVA纤维混凝土的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4.1 与普通混凝土试件和单一钢纤维混凝土试件相比,钢-PVA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可以明显改善节点的塑性性能和耗能能力;且随着钢纤维含量的增加,试件的承载极限和屈服强度均有增大,耗能指标也相应提高,同时钢纤维对刚度的增强作用要比PVA纤维更明显;PVA纤维则在提高节点塑性变形和抗损伤能力方面表现良好。

4.2 对比混杂纤维混凝土试件 SECC4-6 柱内纵筋和箍筋的应变可知,当试件柱顶位移荷载较大时,柱纵筋的应变增加速度随着钢纤维的增加而减小,梁内纵筋由于与基体混凝土的黏结破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滑移现象,这也是试件 SECC-4 耗能指标出现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在梁端范围加入过量钢纤维会引起较大的剪切变形,这对试件耗能也是不利的。

4.3 建议纤维总掺量约为2%,进一步优化该类混杂纤维配合比设计,利用钢纤维来代替造价较高的PVA纤维,可获得抗震性能更为优良的混杂纤维混凝土材料,促进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汪梦甫. 高轴压比下PVA-ECC柱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4(5):1-9.
- [2]张旭. 高轴压比PVA-ECC柱抗震性能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2016.
- [3]韩建平. 高轴压比配筋PVA纤维增强混凝土柱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 工程力学,2017,34(9):193-201.
- [4]崔明,刘文林. PVA纤维增强混凝土框架柱抗震性能数值分析[J]. 低温建筑技术,2017,39(10):39-43.
- [5]徐娜. 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混杂纤维混凝土柱抗震性能有限元分析[D]. 呼和浩特:内蒙古工业大学,2014.

- [6] 赵海龙. 纤维增强异形柱结构抗震性能试验和设计方法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11.
- [7] 韦翠梅. 钢-聚丙烯混杂纤维混凝土框架节点抗震性能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18.
- [8] 赵燕茹,郭子麟,王磊. 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纤维混凝土柱抗震性能有限元分析[J]. 硅酸盐通报, 2017,36(3):

822-828.

- [9] 韩小雷,季静. 基于性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理论研究、试验研究、设计方法研究与工程应用[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n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 – column Structure Under Low – cyclic Load

ZHONG Chen^{1,2}, WEN Xuetao^{1,2}, HU Yuanchao^{1,2}, ZHU Xufeng³

(1.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Building Structure of Anhui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3.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Anhui No.1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Co., Ltd, Anhui, Hefei 230088, China)

Abstract: The steel – PVA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cast – in – place beam – column joints with different fiber content were tested under low cyclic loa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skeleton curve, energy dissipation and reinforcement strain,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rdinary concrete specimens, the plastic performance and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of steel – PVA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pecimens in the core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steel fiber on join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VA fiber.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single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pecime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brid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specimens with reasonable mix ratio design can obtain better seis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cast – in – place fiber concrete; beam – column joints; low – cycle reversed loading test; seismic performance

(上接第 113 页)

Research on Deep Soft and Broken Surrounding Rock Support Technology Based on Exploration and Injection Cooperative Control

WANG Jinshang^{1,2}, LIU Chengcai^{1,2}, WANG Yuling¹, LI Runze¹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Civil Engineering Evalu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acture zone with complex lithology and developed joints in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hydraulic fracturing method, a set of devices for detecting the abnormal area of the roadway broken site surrounding rock was developed, the grouting target point was determined, and the shallow and deep holes were combined with the grid pattern reinforcement grouting method to achieve the effects which would generate a reinforcement circle in the shallow grouting hole, and the stable rock formation in deep grouting hole. Industrial tes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use of broken surrounding rock detection device, shallow and deep hole coordinated grouting method and optimized arrangement of grouting holes, the three – in – one broken surrounding rock exploration and injection coordinated fixed – point positioning and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can save grouting volume, eliminate grouting blank zones, and the load of the shallow grouting consolidation circle is reduced, and the shallow grouting consolidation circle and the stable roof after filling the separation layer are jointly supporte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ontrolling the deform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and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in the fault fracture zone. It reduces the risk of collapse and instability caused by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safe construction of roadway engineering.

Key words: broken surrounding rock; hydraulic fracturing; grouting reinforcement; shallow deep hole layout

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研究

王 勇,李 层,韩 益,郑丽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桂花、玉米须为主要原料,木糖醇、柠檬酸、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黄原胶为辅料,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结合感官评价以及离心沉降率,确定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最优配方,并测定相关理化指标。结果显示:最佳配方为桂花提取液添加量30%,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35%,木糖醇添加量3%,柠檬酸添加量0.010%;稳定剂为复合稳定剂,其中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0.03%,黄原胶添加量0.05%,海藻酸钠添加量0.03%。产品中菌落总数及相关理化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关键词:桂花;玉米须;木糖醇;保健饮料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22

中图分类号:TS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19-05

桂花作为我国传统名花之一,其花香清新,不仅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高,而且还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桂花性温、味辛,具有健胃平肝、生津去痰的功效^[1],含有多酚^[2]、总黄酮^[2]、萜类^[3]、连翘脂素^[4]等多种活性成分。玉米须味微甘,性平,具有利尿解热、保肝利胆的功效,对于治疗水肿、高血压、胆囊炎、胆结石、糖尿病等疾病有一定的效果^[5]。研究发现其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黄酮及其苷类、糖类、有机酸、挥发油、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甾醇类等^[6]。这些成分都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桂花;玉米须;木糖醇;柠檬酸;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黄原胶。

1.2 设备

恒温水浴锅;电子天平;高速多功能粉碎机;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高速离心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手持式 PHB-5 型 pH 计等。

1.3 方法

1.3.1 制作方法

桂花提取液的制备:将清洗干净的干桂花于60℃下干燥30 min,取10 g干燥后的桂花放入已洗净灭菌的烧杯中,加入1000 mL纯净水,80℃下水浴浸提2.5 h,冷却至室温,过滤,保藏备用。

玉米须提取液的制备:将洗净晾干的玉米须粉碎,称取10 g玉米须粉末,加入800 mL纯净水,70℃下水浴浸提1.5 h,冷却至室温,过滤,冷藏备用。

混合调配:将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与木糖醇、柠檬酸、复合稳定剂混合并搅拌进行调配,采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方法,得出最佳配比风味的饮料。

杀菌:将调配好的饮料装入高温灭菌瓶中,放入压力蒸汽灭菌器中,85℃下杀菌30 min。

1.3.2 饮料配方正交试验方法

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木糖醇、柠檬酸添加量是影响饮料品质的主要因素,在各单因素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到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木

收稿日期:2022-09-16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02102310330);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0B150029);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zkz202108);河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011068009);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科研启动费(22037)

作者简介:王勇(1988—),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天然产物的合成、食品分析研究。

糖醇、柠檬酸 4 个因素的添加量,筛选出各因素的 3 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选用 $L_9(3^4)$ 正交表进行试验,最佳配方由感官评价分值确定,因素水平表见表 1。

表 1 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A 玉米须提取液/%	B 桂花提取液/%	C 木糖醇/%	D 柠檬酸/%
1	30	20	2	0.006
2	35	25	3	0.008
3	40	30	4	0.010

1.3.3 饮料稳定性正交试验方法

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黄原胶 3 因素的添加量由各单因素实验结果得出,最佳添加量取决于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分。筛选出各因素的 3 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选用 $L_9(3^4)$ 正交表进行试验,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分值选择最佳配方,因素水平见表 2。

表 2 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A CMC - Na/%	B 海藻酸钠/%	C 黄原胶/%	D 空列
1	0.03	0.03	0.03	0
2	0.05	0.05	0.05	0
3	0.10	0.10	0.10	0

1.3.4 产品感官评定

感官指标测定参考 GB 7101 - 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9],由 10 名食品专业人员组成感官评分小组,进行产品感官评定^[7]。感官评定标准如表 3 所示。

表 3 感官评价表

项目	评定标准	分数
色泽 (20 分)	色泽很好,透明	16 ~ 20
	色泽较好,透明	11 ~ 15
	色泽一般,略不透明	6 ~ 10
	色泽较差,不透明	0 ~ 5
香气 (20 分)	具有桂花及玉米须香气,且气味柔和	16 ~ 20
	具有桂花及玉米须香气,但气味不柔和	11 ~ 15
	仅具有桂花及玉米须的一种香气	6 ~ 10
	桂花及玉米须香气均不具有	0 ~ 5
口感 (30 分)	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味道,口感和柔和性很好,	24 ~ 30
	酸甜感很好,无异味	
	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味道,口感和柔和性较好,	16 ~ 23
	酸甜感较好,无异味	
	仅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一种味道,口感和柔和性一	8 ~ 15
	般,酸甜感一般,略有异味	
	仅具有桂花和玉米须的一种味道,口感和柔和性较	0 ~ 7
差,过酸或过甜,有异味		
组织状态 (30 分)	状态均匀,清澈透明,无颗粒感	24 ~ 30
	状态均匀,液相较均一,有微量颗粒沉淀	16 ~ 23
	状态不均匀,底部有少量杂质或有较多沉淀	8 ~ 15
	状态很不均匀,不澄清,沉淀很多	0 ~ 7

1.3.5 产品离心沉降速率的测定

向离心管中倒入待测样品 10 mL,高速离心机内以 8000 r/min 离心 20 min,结束后取出离心管,倒掉上清液,测残余物烘干后的质量,计算离心沉降率^[8]。

$$\text{离心沉降率} = \frac{M_0}{M} \times 100\%$$

其中: M_0 为残余物烘干后的质量,g; M 为离心前样品的质量,g。

1.3.6 产品理化指标的测定

黄酮含量的测定:采用张晓明等^[10]的硝酸铝比色法测定样品中的黄酮含量。

微生物指标测定:检测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主要参考 GB 4789.2 - 2016^[11]和 GB 4789.3 - 2016^[12]。

可溶性固形物的测定:用精密型数显糖度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以百分含量(%)表示。

酸度的测定:用手持式 PHB - 5 型 pH 计直接测定饮料酸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配方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2.1.1 桂花提取液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木糖醇和柠檬酸添加量 3 个因素,所得产品由专业感官评价人员品鉴,结果为当桂花提取液的添加量为 25% 时感官评分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分析原因是当桂花提取液添加量在较低水平时,桂花香味不突出,口感不清爽;当添加量超过一定的量时,桂花提取液本身的苦涩感会加重,导致评分过低。总体感官评价来看,桂花提取液的最佳添加量为 25%。

2.1.2 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玉米须提取液、木糖醇和柠檬酸添加量 3 个因素,当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为 35% 时感官评分达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分析原因是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较少时,饮料风味不足,添加量过多时,玉米须的味道会遮盖饮料的风味,导致口感下降。经过总体感官评价来看,玉米须提取液的最佳添加量为 35%。

2.1.3 木糖醇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和柠檬酸添加量 3 个因素,当木糖醇添加量为 3% 时感官评分达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分析原因是木糖醇添加量较少时,饮料口感寡淡,添加过多时饮料过甜,失去自然清新口感。经过总体感官评价来看,木糖醇的最佳添加量为 3%。

2.1.4 柠檬酸添加量的影响

固定桂花提取液、玉米须提取液和木糖醇添加

量3个因素,当柠檬酸添加量为0.01%时感官评分达到最高,低于或高于此添加量,产品感官评分均降低。这是因为柠檬酸添加量较少时,饮料口感不协调,添加量过多时饮料发酸,影响整体口感。经过总体感官评价来看,柠檬酸的最佳添加量为0.01%。

2.2 配方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2.2.1 正交试验结果

由表4的正交实验结果和极差值可知,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口味影响的因素大小顺序为A>C>B>D,即玉米须提取液对饮料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木糖醇添加量,桂花提取液添加量和柠檬酸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较小。由正交表可得,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最佳配方组合为A₂B₂C₂D₃,即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为35%,桂花提取液添加量为30%,木糖醇添加量为3%,柠檬酸添加量为0.01%。

表4 产品配方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感官评分 (均值)
	A 玉米须提取液	B 桂花提取液	C 木糖醇	D 柠檬酸	
1	1	1	1	1	75.3
2	1	2	2	2	79.0
3	1	3	3	3	76.6
4	2	1	2	3	89.7
5	2	2	3	1	83.4
6	2	3	1	2	84.3
7	3	1	3	2	70.2
8	3	2	1	3	80.5
9	3	3	2	1	81.0
k ₁	76.966	78.400	80.033	79.900	
k ₂	85.800	81.033	83.233	80.100	
k ₃	77.233	80.633	78.833	80.166	
R	8.834	2.633	4.400	1.266	

2.2.2 验证试验

由此前单因素实验得出的最佳配方组合为A₂B₁C₂D₃,由于和正交表得出的最佳配方组合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做验证试验,验证试验如表5所示。

表5 验证试验

试验组合	A 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	B 桂花提取液添加量/%	C 木糖醇添加量/%	D 柠檬酸添加量/%	评分
A ₂ B ₂ C ₂ D ₃	35%	30%	3%	0.010%	93.5
A ₂ B ₁ C ₂ D ₃	35%	25%	3%	0.010%	89.7

根据上表的验证试验可以看出A₂B₂C₂D₃组合感官评分比A₂B₁C₂D₃组合更高,按照此条件下做出来的复合饮料具有明显的玉米须和桂花香味,口感清爽柔和,酸甜恰到好处,所以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工艺的最佳配方应为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为35%,桂花提取液添加量为30%,木糖醇添加量为3%,柠檬酸添加量为0.01%。

2.3 产品稳定性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2.3.1 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1所示。饮料的离心沉淀率在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为0.05%时达到最低为1.32%。感官评分在添加量为0.05%时分数最高为87分。这是因为随着羧甲基纤维素钠的添加,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不断减小,口感变得厚重,结合以上两个数据说明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在0.03%~0.10%范围内能够保持饮料的稳定性和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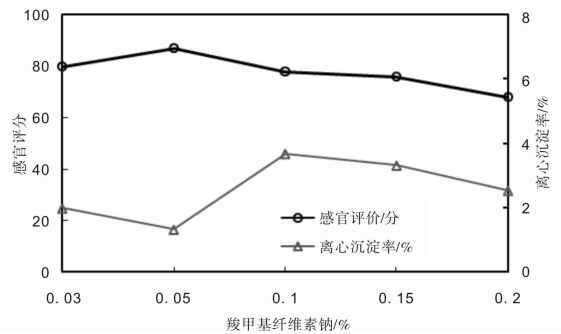


图1 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2.3.2 海藻酸钠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海藻酸钠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2所示。离心沉淀率在海藻酸钠添加量为0.03%时最低为1.58%。感官评分在添加量为0.05%时分数最高为86分。这是因为伴随着海藻酸钠的添加,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不断降低,饮料口感变得逐渐黏稠,结合以上两个数据说明海藻酸钠添加量在0.03%~0.10%范围内能够保持饮料的稳定性和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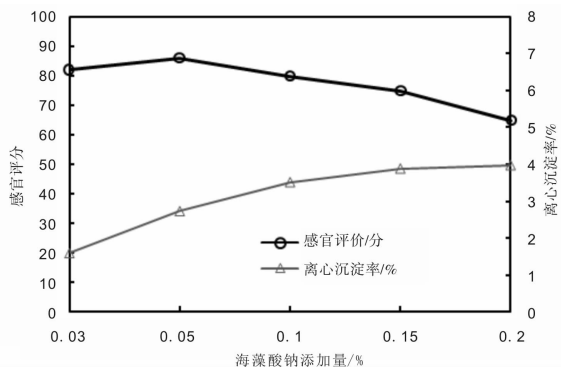


图2 海藻酸钠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2.3.3 黄原胶添加量对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影响

根据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作为指标,黄原胶

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如图3所示。离心沉淀在黄原胶添加量为0.05%时最低为1.37%。感官评分在添加量为0.05%时分数达到最高为88分。这是因为添加黄原胶时,其在饮料中的溶解度不断下降,饮料口感不再清爽,结合以上两个数据说明黄原胶添加量在0.03%~0.10%范围内能够保持饮料的稳定性和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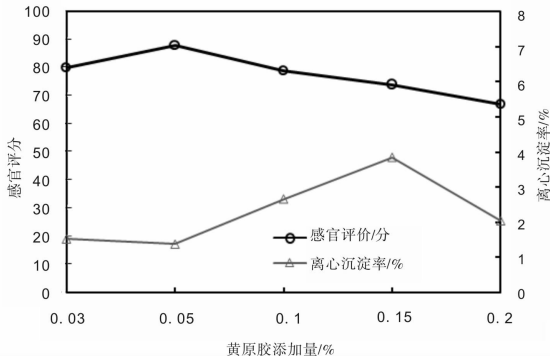


图3 黄原胶添加量对离心沉降率和感官评价的影响

2.4 产品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桂花玉米须复合饮料做了正交实验后,饮料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见表6所示。由离心沉降率极值来看,C>A>B;由感官评定值极值来看,A>B>C,总体来看最优组合为A₁B₁C₂时沉降率最低,此时的饮料不但组织状态稳定,而且还保持着良好的风味。从极差值能够看出,海藻酸钠添加量对饮料的影响是最大的,接着是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黄原胶添加量的影响最小。由感官评分可以看出A₁B₁C₂组合为最优组合。

2.5 产品感官指标分析

饮料色泽:将适量饮料置于无色透明烧杯中,在自然光下呈现出晶亮透明的浅黄色。

饮料气味:轻嗅饮料,能闻到清新浓郁的桂花香气,具有玉米须的特有清香味。

饮料口感:口感清爽,酸甜度适中,无桂花的微苦味和玉米须的微涩味,爽口且无黏腻感。

饮料组织形态:饮料无分层现象,整体均匀一致,组织形态良好。

2.6 产品理化指标分析

(1) 黄酮含量分析

图4为芦丁标准曲线,其线性方程为 $y = 2.2232x + 0.0068$, $R^2 = 0.9994$,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在510 nm处测定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吸光度,由标准曲线回归方程可得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中黄酮浓度数据,进

而计算出产品中黄酮含量。经计算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中黄酮含量为2.120 mg/mL。

表6 产品稳定性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指标	
	A CMC-Na	B 海藻酸钠	C 黄原胶	D 空列	离心沉降率/%	感官评分 (均值)
1	1	1	1	1	3.94	79
2	1	2	2	2	3.02	84
3	1	3	3	3	5.87	68
4	2	1	2	3	5.29	72
5	2	2	3	1	5.91	71
6	2	3	1	2	6.25	65
7	3	1	3	2	6.59	78
8	3	2	1	3	5.92	70
9	3	3	2	1	4.89	76
K ₁	4.278	4.513	4.783	4.156		
K ₂	5.290	4.633	4.063	4.780		
K ₃	4.900	5.320	5.320	5.237		
R	1.012	0.807	1.557	1.081		
k ₁	77.000	76.667	71.667	70.667		
k ₂	69.333	74.000	78.000	76.000		
k ₃	74.667	69.667	72.333	78.324		
R	7.667	7.000	6.333	7.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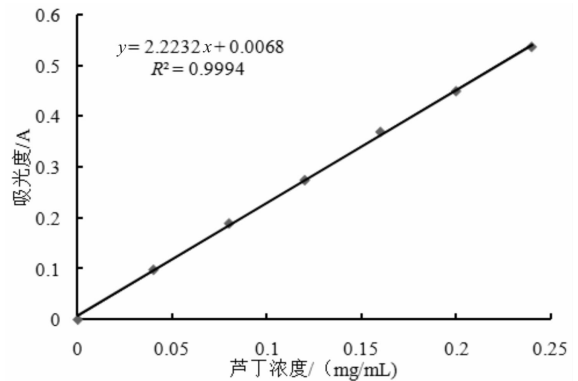


图4 芦丁标准曲线

(2) 微生物指标分析

85°C杀菌30 min条件下桂花玉米须木糖醇复合保健饮料的菌落总数和大肠杆菌菌群数如表7所示。

表7 实验条件下产品中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数

项目	菌落总数 ^b /(CFU/mL)	大肠菌群 ^b /(CFU/mL)
国标	≤10 ⁴ CFU/mL	≤10 CFU/mL
保健饮料	6.5 × 10 ³	0

(3) 可溶性固形物

饮料中可溶性固形物可用精密型数显糖度计直接测定,经测得样品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3.0%。

(4) 饮料酸度

用手持式PHB-5型pH计直接测定饮料中的酸度为3.6。

3 结论

以桂花和玉米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制复合保健饮料,经过产品工艺配方研究,制得桂花玉米须木糖

醇复合保健饮料。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饮料最佳配方为:桂花提取液添加量 30%,玉米须提取液添加量 35%,木糖醇添加量 3%,柠檬酸添加量 0.010% (稳定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钠添加量 0.03%、黄原胶添加量 0.05%、海藻酸钠添加量 0.03% 的复合稳定剂)。根据实验测定,饮料中菌落总数及相关理化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参考文献:

- [1] 祁舒展,姜卫兵,魏家星.我国桂花的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研究进展[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6(10):171-174.
- [2] 林富平,周帅,马楠,等.4个桂花品种叶片挥发物成分及其对空气微生物的影响[J].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3,30(1):15-21.
- [3] 鄢洪星,黄义林,周传涛,等.桂花经济价值及其繁育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9(1):62-63.
- [4] 王恒禹,刘茜,董艳萍.玉米须多糖及其降糖功能研究进展[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8,32(1):30-34.
- [5] 李颖,崔少宁,李国强.小米木糖醇饼干的研制[J].粮食与油脂,2016,29(7):46-49.
- [6] 蔡健,王薇,陈国威,等.桂花黄酮类化合物最佳提取工艺研究[J].粮油食品科技,2005(1):16-18.
- [7] XUE A, CUI M, ZOU H, et al. Analysis of polyphenolic

compounds in *Osmanthus fragrans* flowers by extractiv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 mass spectrometry [J]. *Shipin Kexue/Food Science*, 2018, 39(16):221-226.

- [8] 岳淑梅,王金梅,康文艺.桂花三萜类成分及降血脂作用的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24):126-128.
-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22 [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22.
- [10] 张晓明,郭春燕,白建华,等.玉米须黄酮超声波提取工艺优化及数学模拟[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5):89-92.
- [1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GB 4789.2—2016 [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
- [1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GB 4789.3—2016 [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Xylitol Compound Health Care Beverage of Sweet - scented *Osmanthus Corn Stigma*

WANG Yong, LI Ceng, HAN Yi, ZHENG Lip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sweet osmanthus and stigma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xylitol, citric acid, sodiu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sodium alginate and xanthan gum as auxiliary materials, through the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 combined with sensory evaluation and centrifugal sedimentation rate determine osmanthus stigma of xylitol the optimal formula for composite health drink sweet osmanthus, an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the beverage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formula was 30% osmanthus extract, 35% corn whisker extract, 3% xylitol and 0.010% citric acid. The stabilizer was a composite stabilizer, in which sodiu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was added 0.03%, xanthan gum 0.05% and sodium alginate 0.03%.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and related physicochemical indexes in the product were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andards.

Key words: sweet - scented osmanthus; corn stigma; xylitol; health care beverage

不同预处理方法对鸭肉品质的影响

冯冲,姚虹,陈思嘉,李泓晔,耿雪,朱川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化学和生物混合法对鸭肉进行前期预处理。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对预处理鸭肉进行感官评价和质构分析,确定了鸭肉的最佳预处理条件。结果表明,复合磷酸盐添加量0.2%,加酶量0.1%,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配比2:1,酶解温度45℃,酶解时间10 min,预处理鸭肉 pH6.0 左右时,感官评分最高。

关键词:鸭肉;预处理;质构;品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5.023

中图分类号:TS25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5-0124-05

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其他禽肉中蛋白质含量高得多,脂肪和维生素含量也比一般的肉类中含量多得多,还含有微量钙、铁、磷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1-3]。鸭肉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功能保健作用备受人们的关注^[4],但是,鸭肉的肉质过于紧实,咀嚼性差,其腥味和其他一些不良气味令人难以接受,其口感、风味、消化能力差等缺陷影响人们的消费^[5-7],开发鸭肉系列新产品迫在眉睫^[8]。鸭肉制作过程中的前期预处理非常重要,目前,常见的鸭肉预处理方法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Arcila J A 等^[9]利用木糖葡萄球菌对肉类进行了发酵,结果显示,其所产生的硝酸盐还原酶、脂肪分解酶和蛋白酶能够使肉类的颜色得到保留。Broncano J M 等^[10]增添蛋白酶到香肠中,提高了产品的抗氧化稳定性。采用植物乳杆菌和乳糖葡萄球菌两种不同的蛋白酶混合发酵液对干香肠进行发酵,提升了产品中的蛋白质水解速率,缩短了产品的成熟时间,明显增加了产品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11]。本文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预处理发酵前鸭肉原材料,分析预处理后鸭肉品质的变化,筛选出最佳预处理方法以改善鸭肉制品的口感、色泽、安全性等,使其变得更加美味,为开发鸭肉系列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香辛料及辅料为当地市场出售;鸭胸肉来自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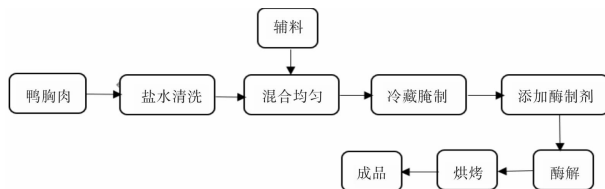
抗坏血酸:食品级,石药集团维生药业有限公司;复合磷酸盐:食品级,徐州添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脂肪酶: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木瓜蛋白酶:10万 u/g,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LCD-A200 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HH-6 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华峰仪器有限公司;C20-SDHJ07G 多功能电磁炉: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pH计:上海仪迈仪器科技有限公司;CT3 型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 公司;YZ-BW-2012D 杨子空气炸锅;FSJ-A05B1 粉碎机: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工艺流程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发酵鸭肉发酵剂的筛选及关键技术研究”(202111068045)

作者简介:冯冲(1970—),女,河南潢川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发酵工程。

1.3.2 pH值的测定

参照阮一凡等^[12]的方法,略有修改。取10 g样品置于搅拌机内,加入90 mL蒸馏水,搅拌60 s,过滤,用手持式pH计测定发酵鸭胸肉的pH值变化,并与质构分析结果作对比。

1.3.3 感官评价

参考GB 5009.44—2003《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分析方法》^[13],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预处理好的鸭肉用空气油炸锅处理后,由10名不同年龄的教师及学生对产品色泽、气味、滋味、组织形态、口感、咀嚼等进行感官评分,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感官评价评分表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分
气味	有鲜鸭肉特有气味,肉味浓郁	优秀 16~20
	肉味较浓郁	良好 12~15
	肉味不浓郁,并伴随怪味	较好 6~11
	酸腥味特别强,甚至恶臭	较差 0~5
色泽	肉质鲜艳,色泽均匀有光泽,颜色诱人	优秀 16~20
	肉质鲜艳,色泽较均匀有光泽	良好 12~15
	肉质暗淡,色泽较均匀	较好 6~11
	暗红转褐色,无光泽,色泽不均	较差 0~5
组织形态	均匀完整,接受性好	优秀 26~30
	均匀完整,接受性较好	良好 22~25
	较均匀完整,接受性一般	较好 16~21
	不均一,接受性差	较差 10~15
滋味	口感好,很嫩,咀嚼性好,鲜美	优秀 26~30
	口感较好,较嫩,咀嚼性较好,鲜味不足	良好 22~25
	偏烂或偏硬清淡,无特殊异味	较好 16~21
	无嚼劲或过硬,无鲜味,有异味	较差 10~15

1.3.4 质构仪测试

设置质构仪的各项指标。夹具: NONE; 探头: TA4/1000; 操作模式: 距离测定; 测试距离目标: 50 mm; 测试类型: TPA 质构分析; 循环次数: 2; 测试速度: 2 mm/s; 返回速度: 2 mm/s; 预测试速度: 2 mm/s; 负载单元: 10000 g; 触发点负载: 10 g。

质构仪测定指标为硬度、形变量、粘力、黏性、弹性等,对测定结果进行分析^[14]。

1.3.5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中,选取3个因素:加酶量(A)、酶解温度(B)和酶解时间(C)。每个因子选择3个水平进行测定,从而寻找最佳预处理方法。

表2 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设计

水平	(A)加酶量/%	(B)酶解温度/℃	(C)酶解时间/min
1	0.05	37	5
2	0.1	45	10
3	0.15	50	15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佳复合磷酸盐添加量的确定

复合磷酸盐添加量分别为0.1%、0.2%、0.3%和0.4%,加入肉料中。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和pH

值测定,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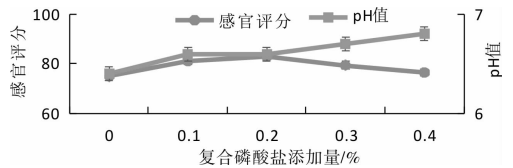


图1 复合磷酸盐添加量对感官评价和pH的影响

由图1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添加不同浓度的复合磷酸盐,鸭肉的pH值出现变化。随着复合磷酸盐添加量的增大,鸭肉的pH值逐渐变大,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复合磷酸盐是一种具有碱性的缓冲剂,这个现象与刘宗敏等^[15]的研究结论相同。由于pH值的不断增加,鸭肉产品自身所携带的负电荷也逐渐增加,电荷之间渐渐出现排斥现象,这个现象会增加肌原纤维之间的距离,导致其分子结构变得松弛,从而提高了肉制品的保水性。另外,添加不同浓度的复合磷酸盐,鸭肉的感官评价分值有先升后降的倾向。在复合磷酸盐添加量为0.2%时达到最高分,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复合磷酸盐量的增加,鸭肉产品的保水性不断增加,肉制品的嫩度也不断增加,其软组织咀嚼性下降。综合感官评价和pH值,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0.2%为最佳条件。

2.2 最佳酶制剂配比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为0.2%,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分别为1:1,1:2,1:3,2:1和3:1,酶解温度37℃,酶解时间20 min,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pH值测定和质构分析。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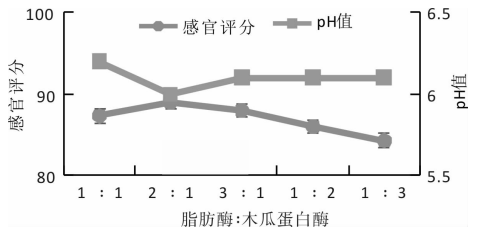


图2 酶制剂对比对感官评价和pH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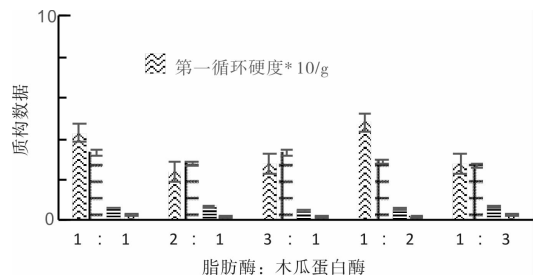


图3 酶制剂对比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的变化,鸭肉制品的感官评分也不同。脂肪酶和木瓜蛋白酶的功能有所不同,木瓜蛋白酶是

一种水解蛋白质,可降解蛋白质大分子物质,使其转变为低分子量的多肽甚至氨基酸,使肉类变得更加光滑、细嫩,提高了其食用价值,有利于人们消化吸收。脂肪酶对食物味道和香气的改善有帮助,原因是脂肪酶可以分解出脂肪酸。根据感官评分和 pH 值,选择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 为最佳条件。

图 3 质构分析结果显示,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配比为 1:2 时第一循环硬度最高,配比为 2:1 时第一循环硬度最低,说明在此配比下鸭肉更嫩,肌肉纤维组织更加细化,口感更好。酶制剂对比对鸭肉制品咀嚼性的影响不明显,一般来说,咀嚼性难以精确测量,因为咀嚼性与多种因素甚至是口腔状况有关,不是说咀嚼性越低越好。5 种酶制剂配比的鸭肉制品弹性和胶着性差异并不明显,可以推断,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 时,鸭肉硬度更低,口感更好。综合感官评价、pH 值和质构分析结果,最终确定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 为最佳条件。

2.3 最佳加酶量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 0.2%,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加酶量分别为 0.05%, 0.1%, 0.15% 和 0.2%,酶解温度 37℃,酶解时间 20 min,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pH 值测定以及质构分析,结果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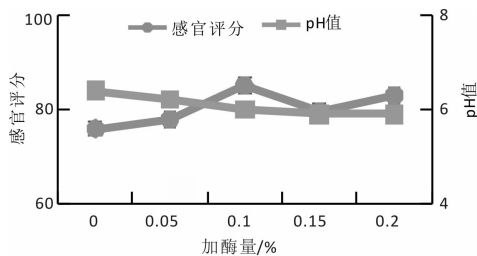


图 4 加酶量对感官评价和 pH 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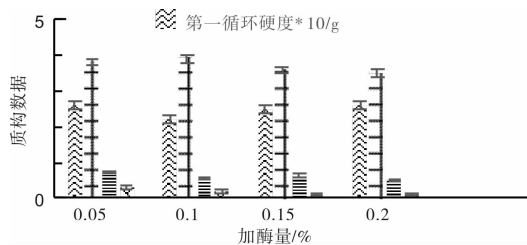


图 5 加酶量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 4 和图 5 可知,加酶量为 0.1% 时,鸭肉的感官评价得分最高,pH 值也在最适生长范围内。原因可能是由于酶的作用,在适当的条件下,对鸭肉中的结缔组织、弹性蛋白和结构比较复杂的胶原蛋白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改善了鸭肉的溶解性和

保水性,从而改善了鸭肉的鲜嫩度。但是随着酶用量的增加,鸭肉的感官评分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添加了过多的酶导致蛋白质水解程度过高,从而生成了低分子量小肽氨基酸类物质,造成肉制品变软,保水能力减弱,进而影响口感。质构分析显示,经过不同酶制剂添加量处理后,对鸭肉的胶着性影响并不明显,加酶量为 0.1% 时第一循环硬度最低,其他 3 种酶制剂添加量的第一循环硬度大致相同;加酶量为 0.05% 时成品弹性和咀嚼性均较高。综合感官评价、pH 值和质构分析结果,最终确定加酶量 0.1% 为最佳条件。

2.4 最佳酶解温度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 0.2%,脂肪酶-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加酶量 0.1%,酶解温度分别为 25℃, 30℃, 37℃, 45℃ 和 50℃,酶解时间 20 min,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测定 pH 值以及质构分析,结果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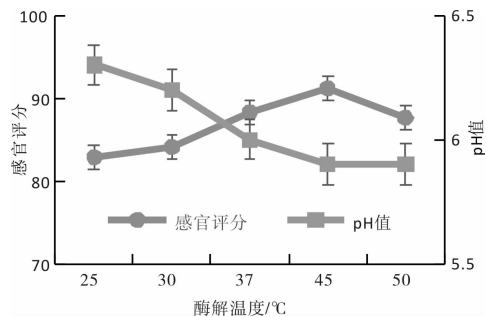


图 6 酶解温度对感官评价和 pH 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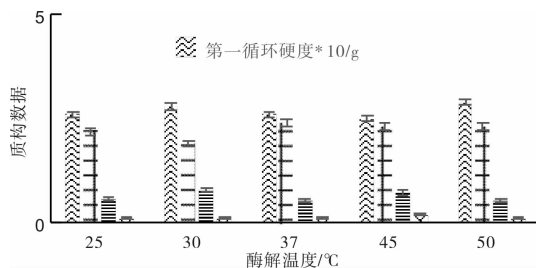


图 7 酶解温度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 6 和图 7 可知,随着酶解温度的升高,肉制品的 pH 值明显下降,感官评分先升后降。酶解温度超过 45℃ 时感官评分才下降,可以推断酶制剂具有最佳酶解温度。质构分析显示,酶解温度为 30℃ 时成品弹性最高,酶解温度为 45℃ 时第一循环硬度最低且咀嚼性相对于其他酶解温度来说稍高。在 25~30℃ 时,胶着性逐渐下降;37~50℃ 时,胶着性趋向平稳,此时肉制品中的水分已经开始渐渐流失;酶解温度为 45℃ 时,鸭肉硬度更低,口感更好。综合感官评价、pH 值和质构分析结果,确定酶解温度 45℃ 为最佳条件。

2.5 最佳酶解时间的确定

选择复合磷酸盐添加量 0.2%, 脂肪酶 - 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 加酶量 0.1%, 酶解温度 45℃。酶解时间分别为 10, 20, 40, 60 和 80 min, 对成品进行感官评价、pH 值测定以及质构分析, 结果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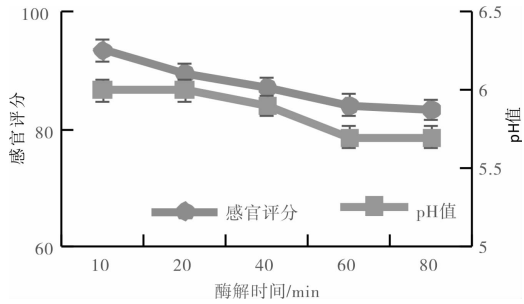


图 8 酶解时间对感官评价和 pH 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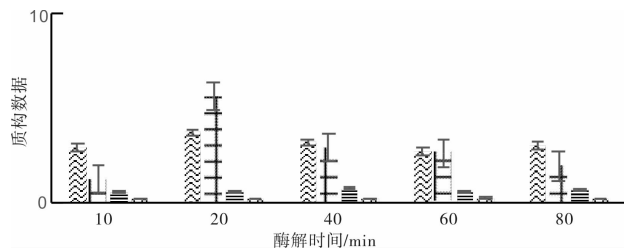


图 9 酶解时间对质构结果的影响

由图 8 和图 9 可知, 随着酶解时间的增加, 鸭肉制品感官评分逐渐下降, pH 值明显减小, 在酶解时间为 10 min 时, 感官评分最高, pH 为 6.1。原因可能是鸭肉水解到某个阶段后, 肌肉纤维细胞及其肌间结缔组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肌肉中的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发生分裂, 损坏肉制品原有的组织结构, 使其保水性和黏附性发生了变化。质构分析显示, 酶解时间为 20 min 时鸭肉胶着性最高, 影响制品的口感。不同酶解时间鸭肉的弹性变化不明显, 酶解 60 min 时制品咀嚼性最低, 其他酶解时间咀嚼性相差不大。酶解 10 min 时, 第一循环硬度最低。综合感官评价、pH 值和质构分析结果, 确定酶解时间 10 min 为最佳条件。

2.6 正交试验结果

如表 3, 以鸭肉的感官评分为指标, 由极差分析得到各因子优先次序为 B > A > C, 即酶解温度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加酶量和酶解时间, 最优水平组合应为 A₂B₂C₂。以鸭肉的 pH 值为指标, 由极差分析得到各因子对发酵鸭肉 pH 值影响的优先次序为 B > C > A, 即酶解温度对发酵鸭肉的 pH 值影响最明显, 其次是酶解时间, 加酶量的影响最不明显。因此, 为了获得最合适的 pH 值, 各因子的最优水平组合应为 A₂B₃C₂ 或 A₂B₃C₃。由于酶解温度对鸭肉的感官

评分和 pH 值均有极为明显的影响, 因此选择鸭肉的最佳酶解温度为 45℃。对于酶解时间的选择, 鸭肉的感官评分和 pH 值这两个指标都显示酶解时间为 10 min 最好, 因此选择酶解时间为 10 min。考虑到加酶量的选择对于 pH 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根据感官评分选择最佳加酶量为 0.1%。根据上述分析, 最终确定鸭肉的最佳预处理条件为 A₂B₂C₂, 即加酶量为 0.1%, 酶解温度为 45℃, 酶解时间为 10 min。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加酶量/%	B 酶解温度/℃	C 酶解时间/min	感官评分	pH
1	1	1	1	80.4	6.3
2	1	2	2	85.8	6
3	1	3	3	83.6	5.9
4	2	1	2	87.7	6.1
5	2	2	3	92.5	6
6	2	3	1	82.1	6
7	3	1	3	81.4	6.2
8	3	2	1	83.9	6
9	3	3	2	84.5	6
k ₁	83.27	83.17	82.13		
k ₂	87.43	87.4	86		
k ₃	83.27	83.4	85.83		
R	4.16	4.23	3.87		
k ₁	6.07	6.2	6.1		
k ₂	6.03	6	6.03		
k ₃	6.07	5.97	6.03		
R	0.04	0.23	0.07		

表 4 感官评分的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A dj SS	A dj MS	F 值
A 加酶量/%	2	36.3	18.15	1.273
B 酶解温度/℃	2	35.64	17.82	1.246
C 酶解时间/min	2	25.31	12.655	1.051
误差	0	*	*	
合计	8	97.25		

3 结论

在传统预处理方法的基础上, 引入新的预处理方法处理鸭肉, 并考察其品质性状的变化规律, 得到的鸭肉产品滋味浓郁, 品质良好。单因素试验设定了复合磷酸盐添加量、酶制剂脂肪酶 - 木瓜蛋白酶配比、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 5 个因子, 正交试验取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 3 个因子, 以及对酶制剂脂肪酶 - 木瓜蛋白酶配比、加酶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这 4 个因子进行质构检测, 得到鸭肉的最佳工艺条件为复合磷酸盐添加量 0.2%, 脂肪酶 - 木瓜蛋白酶酶制剂配比 2:1, 加酶量 0.1%, 酶解温度 45℃ 和酶解时间 10 min, 在此工艺条件下处理的鸭肉具有较高的感官评分和较好的质构。

参考文献:

- [1] 胡献国. 秋日鸭肉 养阴润肺[J]. 养生月刊, 2020, 41(10): 894-895.
- [2] MULLA M, AHMED J, AL-ATTAR H, et al. Antimicrobial efficacy of clove essential oil infused into chemically modified LLDPE film for chicken meat packaging[J]. Food Control, 2017, 73: 663-671.
- [3] LEE Y O, NAM H K. A Study of the Bio-Nutritional Evaluation of Duck-Meat [J]. Case Reports in Surgery, 1981, 2015(5): 1-3.
- [4] 胡爱军, 郑捷. 食品原料手册[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 [5] 卜宁霞, 陈娟, 李永琴. 发酵肉制品风味物质的研究进展[J]. 宁夏农林科技, 2020, 61(11): 65-68.
- [6] HANSEN E B. Commercial bacterial starter cultures for fermented foods of the fu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2002, 78(1/2): 119-131.
- [7] 徐为民, 殷燕涛, 诸永志, 等. 不同腌制方式对鸭肉腌制速率及肉质的影响[J]. 现代食品科技, 2014, 30(8): 201-205.
- [8] FEMÁNDEZ M, Ruíz - Moyano S, Benito M J, et al. Potential antimicrobial and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autochthonous starter cultures and protease EPg222 in dry-fermented sausages[J]. Food & Function, 2016, 7(5): 2320-2330.
- [9] ARCILA J A, WEIER S A, ROSE D J. Changes in dietary fiber fractions and gut microbial fermentation properties of wheat bran after extrusion and bread making[J].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5, 74: 217-223.
- [10] BRONCANO J M, TIMON M L, PARRA V, et al. Use of proteases to improve oxidative stability of fermented sausages by increasing low molecular weight compounds with antioxidant ac [J].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1, 44(9): 2655-2659.
- [11] CHEN Q, KONG B, HAN Q, et al. The role of bacterial fermentation in the hydrolysis and oxidation of sarcoplasmic and myofibrillar proteins in Harbin dry sausages [J]. Meat Science, 2016, 121: 196-206.
- [12] 阮一凡, 潘道东, 孙杨赢, 等. 混菌发酵鸭腿工艺优化及其贮藏品质特性[J]. 食品科学, 2020, 41(10): 101-109.
- [13] 卫生部. 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5009.44-2003[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 [14] 张秋会, 宋莲军, 黄现青, 等. 质构仪在食品分析与检测中的应用[J]. 农产品加工, 2017(24): 52-56.
- [15] 刘宗敏, 江红波, 王鹏, 等. 磷酸盐在肉制品中应用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 肉类工业, 2010(8): 37-3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treatment Methods on the Quality of Fermented Duck Meat

FENG Chong, YAO Hong, CHEN Sijia, LI Hongye, GENG Xue, ZHU Chuanhao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Duck meat was pretreated by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methods. The sensory evaluation and TPA texture analysis texture analysis of pretreated duck meat were carried out by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test, and the optimal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osage of complex phosphate was 0.2%, the dosage of enzyme was 0.1%, the ratio of lipase to papain was 2:1, the hydrolysis temperature was 45°C, the hydrolysis time was 10 min, the pH of pretreated duck meat was 6.0, and the best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 was 93.4.

Key words: duck meat; pretreatment; quality and structure; quality